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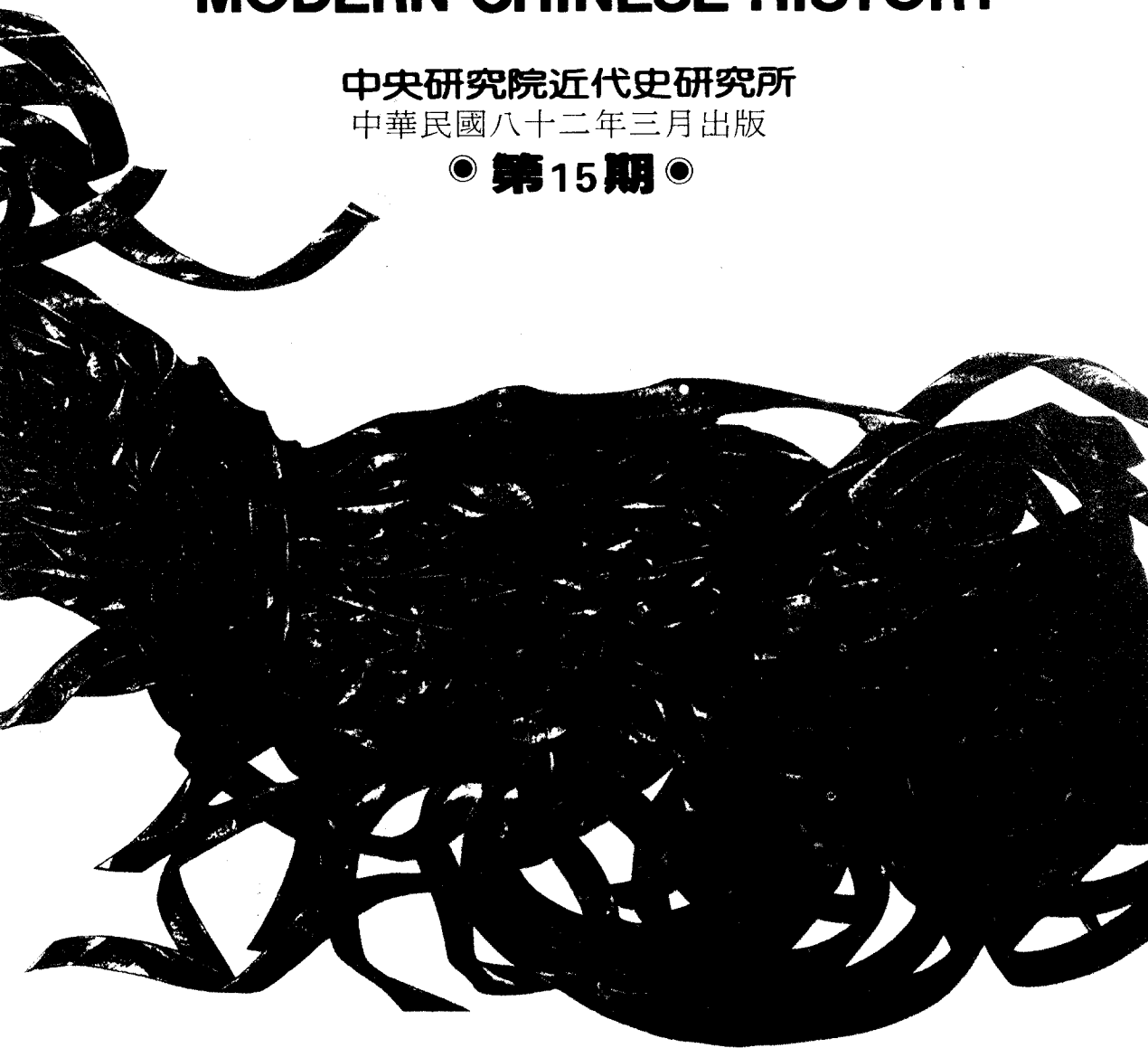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出版

◎ 第15期 ◎





本所新研究大樓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張啟雄	3
	「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會史 1620-1920」研討會……………賴惠敏	8
	「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紀要……………歐陽哲生整理	13
	記柏克萊、康乃爾兩大學在魯斯基金贊助下的兩次「上海近代城市史」研討會……………葉文心	19
	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朱浚源	21
	The IX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Ursula Richter	26
學術演講	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黃仁宇	33
學人簡介	何炳棣……………馬泰來	48
	入江昭 (Akira Iriye) ……………楊大慶	54
研究概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研究計劃 (民國81年3月—82年2月) ……………江淑玲輯	64
	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與東亞的新型文化…………… James L. Watson 報導·林滿紅譯述	70
	香港的明清史學者及其研究動向……………李金強	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來的研究工作……………張海鵬	89
	大陸學術界研究南京保衛戰問題述評……………孫宅巍	95
	近十年來韓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吳金成	102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the Chinese Experience…………… Zhang Kai-yuan & Peter Tze-ming Ng	118
	國史館館藏臺灣工業發展檔案介紹……………薛月順	129
德西檔案館所藏中德關係史料 (1927-1938)……………馬文英	1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 (十二) ……………莊樹華	149	

---

新書評介	李孝悌著：《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楊肅獻 153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合著：《十字街頭與塔：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蘇雲峯 157
	吳景平著：《宋子文評傳》……………陳 絳 164

---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 論文目錄 (1991-1992)……………李達嘉輯 169
------	---

---

大事紀要	1991年7月至1993年2月近代中國史研究 大事紀要……………游鑑明輯 172
------	---

---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游鑑明輯 183
------	---------------------

---

研究討論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i>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i> -A Response to Mr. Ch'en Chü-po's Criticism……………Thomas A. Metzger 197
------	---

---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陳三井 王樹槐 林滿紅 呂芳上 張瑞德  
          陳秋坤 賴惠敏  
執行編輯 林滿紅  
助理編輯 范毅軍 李宇平 李達嘉 游鑑明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十五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出 版

---

定價 新臺幣 250 元



學術會議

#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

張 啓 雄

## 一、會議緣起

一般而言，歷史上層人物的研究在學界大有人在，唯關於歷史基層人物的研究，則未有多聞。解嚴之後，社會的價值觀趨向多元化，關於上層人物的新史料不斷出現，至於基層歷史人物對社會的貢獻，也開始被重新認識。總而言之，目前已是對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展開全面性研究、重新評價的時候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鑒於此，乃決意舉辦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以期發現更多的基層歷史人物，更客觀的去評價上層歷史人物。遂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四——六日，邀請學者專家一百六十五名參與盛會，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廳，舉行為期三天的學術研討會，討論三十七篇有關近代中國歷史人物的論文。其議程如下：

## 二、會議議程

1. 蔣永敬：胡汪蔣分合關係之演變
2. 張玉法：袁世凱的仕宦階梯，1881-1911
3. 陳正茂：曾琦與民國政治
4. 李國祁：晚清政治人物的比較分析——劉坤一與張之洞初任巡撫的政治表現
5. 王家儉：是清朝的忠臣還是民國的罪人？——對於末任甘新巡撫袁大化的歷史評價
6. 許文堂：李石曾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
7. 莊吉發：于式枚與德國憲政考察
8. 薛化元：張君勱與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形成
9. 郭鳳明：中國法律現代化之先驅沈家本——清律之修編與現代化
10. 卓遵宏：孔祥熙的財政觀

11. 簡筌簧：凌鴻勳與抗戰前中國鐵路建設
12. 李恩涵：伍朝樞的外交事業
13. 陳立文：宋子文其人與其外交作風
14. 邵銘煌：高宗武對日謀和活動
15. 陳存恭：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徐永昌
16. 劉鳳翰：何鍵與湖南軍事演變——一個軍事集團的形成與發展
17. 呂秋文：徐樹錚之武力撤消外蒙自治
18. 王聿均：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
19. 蘇雲峰：曹雲祥：清華改制升大和教授治校的奠基者
20. 陳哲三：陳泮嶺的事功初探
21. 呂實強：胡適的史學
22. 陸寶千：歐陽漸之新儒學
23. 周昌龍：吳虞與中國近代的反儒運動
24. 許介鱗：戊戌變法與梁啟超在日的「啟蒙」活動
25. 王樹槐：葉恭綽的文化活動
26. 王爾敏：鄭復光與泰西科技知識
27. 何信全：梁漱溟論中國民主化的難局
28. 王成勉：余日章先生政教觀之研究——以其在青年會主政時期之檢討——
29. 李金強：民族主義基督徒黃乃裳
30. 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礦業合作的構想，1924-1930
31. 吳文星：清季李春生的自強思想——以臺事議論為中心
32. 謝國興：侯雨利：生意人抑企業家
33. 孫子和：巴塘教士梅玉林被戕及其對康藏教務的影響
34. 蕭金松：多羅郡王頗羅鼐——1728-1747 年期間的西藏當權者
35. 林修澈：貢桑諾爾布與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族近代史上的兩個關鍵人物
36. 趙令揚：論何啟對西方的認識
37. 張朋園：梁啟超的家庭生活

### 三、論文重點

第一、二場的討論主題是近現代政治人物的探討。政大教授蔣永敬提出「胡汪蔣分合關係之演變」一文，以孫中山先生去世為轉折點，論述三人之分合關係。孫先生在世時，胡汪蔣三人大致保持分工合作關係；去世後，三人則為繼承領導權而時起紛爭。首為胡汪之爭，繼為汪蔣之爭。蔣恒以聯合戰線，以二敵一，取得最後勝利。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對清末袁世凱的仕

宦階梯有精闢的分析，袁氏的第一個階梯是以其家世和淮軍為進身背景，因而受到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提拔，從此開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並為李鴻章執行中韓宗藩關係的強化政策，並因之現身國際政治舞臺。袁氏的第二個階梯是小站練兵，培養了他個人的實力，成為袁氏此後能更上一層樓的起點，進而取得榮祿與慈禧的信任與重用，終於使袁氏的政治勢力壯大起來。雖然，以後因革命風潮盛行，在滿漢民族主義的衝突下，袁氏落職回籍，但實力已經壯大的袁世凱，終於在二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時東山再起，逼清帝退位。至於許文堂教授的李石曾研究，旨在探討他對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獻身，尤其對李石曾的個人資料及其與無政府主義教育之發展多所著墨，肯定他對該運動所作的貢獻。

第三、四場的討論主題是近現代憲政與財經建設人物的探討。于式枚對憲政雖頗能因時損益，但他認為在苛虐之後，欲以立憲救亡，適足以促其速亡，莊吉發教授對此頗有發揮。從五五憲草的修改到政協憲草，張君勱不只在內容上用力頗多，而且在其法典化的過程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薛化元教授認為政協憲草是張氏主觀意願與客觀環境的妥協結果，不過，它與張氏的一貫政治主張有契合之處。卓遵宏教授從理財、賦稅、金融、公債、戰時財政來論孔祥熙的財政觀，認為孔氏一生最善於理財，貢獻也以此為最大，豈知竟以財政失衡下臺，自其財政觀來看，關係因素甚多，實不能專責孔氏之財政措施失當。

第五、六場的討論主題是關於現代外交與軍事人物的評論。李恩涵教授對伍朝樞的外交素養與外交生涯經過一番析論之後，認定伍氏的外交事業是穩健性的革命外交。陳存恭教授對徐永昌的評價是其在北伐抗日戰爭上立功、在著述上立言，他在爭權奪利的時代環境中，高風亮節、效忠國家，而建立了崇高的武德，在立德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因此陳教授推崇之為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何鍵為保定軍校出身，以游擊隊起家，後參加國民革命軍，率部北伐，曾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電令嘉獎；寧漢分裂之後，投靠桂系，出任湖南省出席兼清鄉督辦，後何以湖南為資源，打出擁護中央、連絡西南、清剿共黨為口號，發展成為一支十萬人以上的軍事集團。劉鳳翰教授對何鍵集團的形勢與擴張有極為詳實的分析。呂秋文教授論徐樹錚以武力脅迫外蒙撤消外蒙自治，回歸中國，其動機並不是急於伸張國威，而是出於私怨，對於國家邊事無益。因此呂秋文教授責其表面上雖然解決的甚為痛快，實際上卻給後來的外蒙獨立留下無窮的後患。

第七、八場的討論主題是關於近現代文史人物的評論。郭廷以創辦近代史研究所是眾所皆知之事，唯對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創建之關係熟悉者甚為有限。朱氏曾獨排眾議，強調基於治史方法不同，近代史無須附設於史語所之下。由於朱氏堅持近代史須單獨設所，遂聘郭氏為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自籌備起始，以至立所宗旨、經費、研究陣容等等策畫，朱氏出力甚多，王聿均教授對此有詳細的敘述。關於曹雲祥對清華大學的貢獻主要是在校政的改革上，尤其是他提出清華改制升大計畫、實施教授治校、健全校政、善用所屬改革學制和課程、提前結束舊制設立大學、使清華學校與留學分途，大學獨立，經費充裕，為北伐後之改革和擴充奠定基礎。蘇雲峰教授的論文即是對此一為人遺忘已久的清華校長，重新加以發掘、定位。呂實強教授在胡適的史學一文中，認為胡適的治學涉及範圍至廣，但真正著力深究則在於哲學及中國文學與經史，其中尤以歷史為重心。胡適不僅擴大了史學的領域，並且將科學方法引入史學研究，彰顯了卓著的績效。以此使他不但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中國文學史、傳記文學、禪宗史、文化傳統辨析等各方面，均有突破性的貢獻。而其對整個史學所發生的影響，在和他同時代的學者中，似很少有人可與他倫比。歐陽漸畢生事業在刻經與講學，有其睿見精思，其於佛教則信心堅固而願力宏大，於儒家則欲其能再度振衰起敝以挽救世運，重新建立「四書」的解釋。然其所見者，非儒家之真實也。陸寶千教授評之曰：竟無（歐陽漸）所見之儒學，乃一不完全之佛教也。吳虞被稱為是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周昌龍教授根據多種新出史料，分析其生平學術背景及反孔非儒理論，尋繹此理論之歷史脈絡，並作出檢討。

第九、十場的討論主題是關於近現代化宗教人物的評論。許介麟教授強調流亡海外以後的梁啟超，其思想見解純粹承抄襲自當時日本思想家的觀念與見解，了無新意。至其對國人的啟蒙活動，也只是一些翻譯自日本的作品，看不出創作面，所以許教授將梁啟超重新評價為「文化買辦」。一個傳統的中國士大夫，當他面臨中西文化衝突時，他如何適應？他如何在新舊文化中求取平衡？基於這個問題意識，王樹槐教授透過葉恭綽文化活動的個案研究指出，葉氏認為中國文化應順應潮流，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保持自己文化的長處，發展出一種新的中華文化。王教授認為這位傳統中國士大夫，在任官之餘，極力提倡中國文化，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因而給與正面評價。王爾敏教授則以鄭復光為例，論述鴉片戰爭之前，一位傳統儒生面對西洋科學知識的客觀態度。王教授以太空新說先驅、太陽中心天體說、比重定律、



重心觀念、人體生理識見等十二項目，論證鄭復光科學識見之卓越，進而推崇其能以一介小儒而使科學文化生根，其功績實不下於大聖大賢。

第十一場的討論主題是近現代臺灣人物的研究。陳慈玉教授的論文是利用臺灣顏家、山西煤礦公司和日本三井財閥的原始資料，以及臺灣日日新報與礦務檔案，分析顏國年在三井企業企圖投資山西煤業中的先鋒角色。同時也指出臺灣的本土資本家在非常環境之下，為開拓自己的一片天地，而與日本財閥協調乃至合作。其中，顏氏就是當時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吳文星教授的論文旨在探討清季臺灣的洋務思想家李春生對臺灣的外交、國防、經濟、產業等事務的看法，剖析其與清季臺灣自強運動之關係，指出其對臺灣涉外事件提出較務實高明的處理方案，積極鼓吹建設現代海防以杜外患，又其倡導建立現代臺灣產業經濟以奠定因應變局之基礎，充分顯示李氏不為環境所囿，係一思想進步、深具遠見之思想家。

第十二場的討論主題是近現代邊政人物的研究。頗羅鼐是十八世紀初期西藏歷史的中心人物，出身後藏貴族，雍正六年（1728年）以平定阿爾布巴之亂有功，獲清朝授權總理藏政。統治西藏十九年，與朝廷充分合作，深得皇帝信賴，累功晉封貝子、貝勒、郡王。政大教授蕭金松對其為清朝建立西藏主權之功與影響，有深刻的描述。政大教授林修澈所撰寫的德王與貢王論文，直到目前為止，在臺灣算是絕無僅有的研究。貢桑諾爾布在其旗內推動現代化，德穆楚克棟魯普在內蒙建立政權，是內蒙古近代史上的兩件大事。貢王的教育現代化，德王政權的國家性格，是本文力圖突破的要點，也是本文的主要賣點。

第十三場的討論不設主題用以包羅萬象。張朋園教授以「梁啟超的家庭生活」一文，來品評梁啟超的生活面。本文討論梁氏的婚姻、子女、家計、健康等四個方面。梁啟超是個新時代的倡議者，提出了許多新觀念，但自己並沒有完全走出傳統。但梁氏對子女的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可稱為士人的典範。

#### 四、蓋棺是否論定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何只千萬，其中除了少數的政治性上層人物有較多的研究外，仍有不少基層的歷史人物及其史料尚待發掘。由本次學術會議的主題與討論可以知道，本次所提出的歷史人物雖多，但離全面探討的目標仍

遠。其次，學術性的歷史人物探討，雖有其客觀性存在，但是我們也不可忽略歷史人物有其時代性，隨著時代的推移，人物的評價可能也會有所變動。換句話說，蓋棺不一定就論定。人物的評論既然不容我們隨意以古論今或以今論古，那麼如何恰當地建立一套客觀且擲地有聲的評論標準，就是研究者的責任了。

---

## 「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會史 1620-1920」研討會

賴 惠 敏\*

近年來由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放清宗人府的檔案，使得中外學者研究清代皇族蔚成風氣。因此，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李中清先生，申請蔣經國基金會補助會議的經費，於今年元月四日至五日兩天，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會史 1640~1920」研討會，與會的學者有民族學院的王鍾翰教授、定宜莊教授，北大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侯仁之教授、韓光輝教授，中醫研究院陳可冀教授，美國猶它大學沙其敏教授，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徐藝圃教授、鞠德源教授、胡啟松教授，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張丕遠教授，南開大學歷史所杜家冀教授，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劉素芬教授，北大經濟所研究生賴忠文、美國賓州大學研究生康文林、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助理蔡淑美小姐等。與會學者針對皇族的人口發展及環境變遷進行討論，所發表的論文及其要點，簡略介紹如下。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淑美、李中清、康文林、馬文清：〈「宗人府檔案」電腦資料庫的建立、分析利用及其困難〉。皇族宗室家譜的資料輸入電腦資料庫，已有三年時間將近八萬人的詳細的個人檔案，子孫檔中包括姓名、爵位、官職、父名、父爵、父職、母親名分、母名、生卒年、過繼與否、居住地、妻妾數等。女孫檔另增加夫名、夫爵、夫職、文定日期、婚嫁日期及夫婿死亡日期等。玉牒中並無子孫檔的文定日、結婚日期、死亡原因、薪餉，及土地的收入。必須利用像戶口冊、俸餉冊等來補足，預計完成建檔的工作還須兩年。

鞠德源教授撰寫〈清代皇族人口的登記制度〉，介紹各種登記皇族人口的冊籍，如紅名冊、紅女名冊、孀婦冊、娶妻冊，九年一期人口報告冊等等。從這些登記冊的比較，鞠教授發現宗人府在登記名冊時，填寫不够嚴謹，影響玉牒編撰的可信度。例如九年一期的人口冊為修玉牒的重要史料依據，有固定填寫格式，許多隱匿人口可能在修玉牒前才填寫於人口冊中，造成皇族人口「堆積」現象。即修玉牒前一年的出生人數突然增加，這現象每九年就發生一次。咸豐七年後，改為族長、學長清查誤報，情形略有改善。不過，到太平天國後登記制度又不完整，最大原因是官員腐敗，造成呈報系統紊亂。尤其對嬰幼兒的登記，或有漏報，或有卒年不詳。尤其以王公漏報的人口較嚴重，平民則因族長的管制，漏報者少。

李中清、王豐、康文林教授合寫〈清室皇族中的嬰兒和兒童死亡率：清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父母的生育策略〉。分析皇族的上層、中層、低層之父母各採取不同策略來控制出生兒的數目和性別。低層的貴族經濟並不富裕，蓄意控制嬰兒的存活率，簡而言之即採取殺嬰的方式，減少孩子數量，所以嬰兒死亡率的增加是明顯趨勢。但低層貴族要依靠孩子養老，必須設法保住孩童，採用小兒醫療照料的新方法，降低兒童死亡率。

殺嬰問題在大陸是個敏感話題，在場學者幾乎一致反對皇族殺嬰的說法。他們舉例說如果有殺嬰行爲，為何清代筆記文集都未提及，特別像昭璉的嘯亭雜錄記載許多皇族醜惡不法事跡，卻也無殺嬰的記錄。

賴忠文先生：〈清朝皇族嬰幼兒死亡率分析〉他指出清代早期（1640～1774）宗人的採用年及周歲方始呈報的制度，使得大量周歲內夭折的嬰幼兒，往往生、卒年皆不載入玉牒，導致嬰兒死亡率偏低。清中期（1774～1838）出生呈報制度採季度呈報，一年分四季，嬰幼兒的死亡記載增加。但1810年以後漏報率增加，男、女高達15%，64%。清晚期（1838～1900）皇族人口的呈報近乎崩潰。在男女的人口數據上，宗室女子並無養贍，其遺

漏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所以他的結論是玉牒所登記的新生兒、嬰兒的死亡數據是不可靠的，利用這些數據必須相當謹慎。

劉素芬教授：〈清代皇族婚姻與宗法制度〉。她論述清朝皇族宗法制度經康、雍、乾三朝的努力，至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日漸完備。其影響皇族人口婚姻之途徑，亦透過皇族內部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封建宗法道德秩序之約束而得以實現。從皇族內部社會階層的分化、男女結婚年齡趨於晚婚、多妻制度與改嫁的式微、提倡守節守寡及男尊女卑的觀念以至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均可能導致生育率的下降。可見宗法制度具有消極抑制人口成長的作用，是造成它在人口迅速成長的明清時期驅於高度成熟的關鍵。

王豐教授：〈兩種不同的預防性限制機制：中國歷史人口對婚內生育的控制〉。作者認為歐洲歷史人口利用晚婚、獨身的機制，限制人口增長；相對而言中國也有兩種控制人口的機制。第一、婚姻年齡逐漸延後，從皇族婚姻模式中可看出皇族的女兒平均初婚年齡，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增長了三歲，由十八歲變為二十一歲。男性人口的婚姻也有類似的變化。從生育第一個小孩的年齡來間接觀察，以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年齡從二十一歲提高到二十六歲。按平均第一胎生育間隔為三年的假設推算，男性平均初婚的年齡由十八歲增至二十三歲。第二是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間隔的延長。作者從皇族的社會地位，及多妻單妻家庭的比較發現：多妻的父親生育時間比單妻的多七年；社會階層低的男子生育期比高階層貴族短兩年。

此外，皇族在婚內對性生活、生育進行節制，甚至溺嬰，此為預防性的限制機制。此限制機制是導致現代人口轉變的重要文化因素。

個人參與會議所提清代皇族的過繼研究，分析皇族的收養制度之特點。以皇族所代表上層社會，嚴禁過繼異姓之子，與其他漢人縉紳家族的規定相同。而在中國的下層社會，立嗣採取買異姓子、招贅、養女招贅等方式甚為普遍，又如八旗兵丁為了生計問題，抱養嗣子冒領錢糧的情形也相當多。

從皇族的社會階層來觀察，過繼的功能不只解決後嗣的問題還包涵政治與社會意義。皇帝可以將其子姪過繼給親王，占有廣大的莊園。至清末，慈禧太后更利用過繼制度，將與她有親戚關係的姪兒、外甥，過繼為同治皇帝、瑞親王後，成了皇帝、大阿哥、郡王。對王公階層而言，有些人並不是無子才收養嗣子，而是王公之子有機會獲得世襲爵位和選任官吏。朝廷為制止之，刻意地壓抑王公過繼子嗣，不准其歲考應封爵位，待遇有別於王公親生子。同時，不准應封爵位者出繼，以免利用過繼製造投機取巧。在四品宗

室及閒散宗室兩階層中，大都是無子才收養子嗣。過繼除了傳承子嗣外，兼具有撫孤卹寡的功能。

康文林：〈清末北京死亡原因研究〉。他利用 1909 至 1910 年北京門吏記錄出殯的資料，有死者姓名、住址、性別、年齡、結婚與否、死亡原因等記錄，共有 2721 人。小孩死於痧疹、疹子、瘟疫、抽瘋的比例較高，其他還有消化系統、癆症、天花等死因的。成人的死因約有癆症、瘟疫、痧疹、呼吸器官、老病、消化器官等，女性犯癆症的比例較男性高，男性則患瘟疫的比率較高，所謂「瘟疫」大概是傳染病與寄生蟲。作者認為女性的活動限制於家中，比較會得癆症；男人常出門在外，容易得傳染病。不過二十歲至四十歲婦女死於女病的人數也不少，有產後失血和月經病兩種。

1909 至 1910 年北京城人口死亡的季節高峰與皇族人口相類似，都在春天，這顯然異於其它歷史人口的死亡季節高峰冬天或夏天。另外，北京城成人年齡別死亡數量類似皇家人口的年齡性別死亡率，可見皇族人口還是有若干代表性。

陳可冀教授發表〈清代瘟疫與清帝壽命〉。他從清史稿中找到幾種流行的傳染病，天花、真性霍亂、腸傷寒、菌痢、白喉、結核病、猩紅熱、鼠疫、瘧疾、肝炎等病症。同時，陳教授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脈案，分析清代各朝皇帝的死因。儘管民間對順治、康熙、雍正死因有各種傳說，但陳教授未找到直接史料證據，仍將三位皇帝的存因存疑。乾隆帝死於高年心氣虛衰、嘉慶死於重症肺炎、道光死因不詳、咸豐死於肺結核大咯血、同治死於天花、光緒死於多系統結核病、宣統死於膀胱炎。從以上皇帝死因看起來，死於天花的人數並不多，顯示清代控制天花的傳染病達一定的水準。早在明朝 1567~1572 年左右發明種人痘，萬曆以後廣為流傳。康熙皇帝也提倡種人痘，他的第二子得天花，是由南方來的醫生治好的。種人痘不會致命，有抗體、安全，但不易普及。1805 年葡萄牙商人傳入種牛痘技術後，能利用人工大量生產痘苗，易於普及。但有學者提出疑問為何牛痘傳入中國後，同治皇帝還死於天花？陳教授認為種牛痘只是預防性措施，不能治療。

郭松義教授：〈清宗室的等級結構及經濟地位〉。他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宗人府堂稿分析宗室的生計問題，從康熙年間開始顯露下層宗室的生計問題，雍正、乾隆有了優待宗室的規定。宗室生活揮霍無度，典賣祖宗遺留的老圈地後，生活僅依靠微薄養贍銀米維生，遇有婚嫁、喪亡則有紅白恤賞銀。咸豐初年內亂外禍不斷，國家財政困難，恤賞銀兩均告停止，一些宗

室靠舉債度日，或有因此發生債務紛爭，及鬪毆事件。宗室整體生活每況愈下，影響婚姻和子女出生情況，清後期一夫多妻制人數比例減少，女子婚齡提高，延長子女生育間隔，這些都與宗室的生計變化有關。

韓光輝教授：〈清代皇族的管理與教育〉。他論述皇族的管理組織有族長、學長，其職務與功能超過漢人家族的族長。此外，管理皇族的另一套行政系統是佐領與牛叅。至於族長與佐領的行政權限範圍如何區分作者並未論及。關於教育方面，負責教養宗室的機構是宗學，凡十八歲以下的宗室子弟皆可入學，每月給銀米若干。學而優者可參加科考及當差，當差是指任職於中央機構額設之宗室官缺，不過到光緒三十二年以後亦有宗室補放知府、知縣等官缺。韓教授的專長是研究北京城的人口，他寫過清代京師八旗人丁的增長與地理遷移、清代北京地區人口的區域構成、民國時期北京市人口初析等論文。

張丕遠教授：〈北京城的氣候變化與作物收成〉。他利用晴雨錄的記載研究北京氣候變化，晴雨錄有兩份手稿，由皇帝寢宮太監與欽天監官員負責記錄天氣變化。晴雨錄主要由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時間從雍正二年(1724)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不過中間共缺三十六年的資料，目前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有關雨雪的登記分有小雪、大雪、小雨、大雨，下雪記錄是按時間而定；下雨則按入土之分寸。依照現代辦法將大雨、小雨的區分點設為一毫升。另外，又根據清宮奏摺搖集北京的收成記載，研究冬小麥與秋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降雨量相關係數為 7.8，表示降水量愈少收成愈好。

從晴雨錄的長期記錄來看，中國氣候在 1816 年至 1830 年有一個跳躍式的變動，因為 1816 年夏威夷火山爆發影響高空的溫度，破壞大氣層的穩定性，此後的變化到 1830 年才完成，中國的氣候變成降雨量少乾旱型的氣候。影響有二，其一是冬小麥的收成；其二為傳染病減少。1833 年夏威夷火山第二次爆發，對中國影響是大水，次年旱災蝗蟲肆虐。氣候變化與人口、物價的變動息息相關，不過目前未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過去兩、三年臺灣與美國學者共同建立一套皇族人口的電腦輸入工作，並對數據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發現有許多疑點難以解答。借著這次討論會匯集專精於民族學、醫學、檔案學、歷史學、社會學、氣象學、歷史地理學、電腦、統計學等學科的學者們，共同解決皇族人口的疑問。會後並參觀一檔館搜藏的清皇室的玉牒與宗人府檔案，由於徐館長鼎力相助，往後將可陸續影印所需的研究資料，因此關於清皇族的問題將可開拓新的研究角度。

# 「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紀要

歐陽哲生\* 整理

今年是著名學者、教育家、文學家胡適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海內外部分學者於 1992 年 7 月 13、14 日在北京舉行了「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有 21 位學者參加。大家圍繞著胡適研究的發展狀況和今後胡適研究的學術走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會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各抒己見，顯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胡適研究者的新姿態。下面將與會者的發言記錄整理如次：

耿雲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去年我們在胡適先生的故鄉舉行了第一次胡適學術討論會，海內外反響很大。當時有少數朋友因故沒有到會。大家研究的學科不同，很少相聚的機會。有不少朋友表示希望今年再聚會一次，我們的願望今天實現了。陳宏正先生是這次聚會的最熱情的支持者。此外，相隔萬里，大洋彼岸的兩位朋友唐德剛先生和周質平先生，今天也趕來參加聚會，我們非常歡迎！還有兩位令人尊敬的前輩，鄧廣銘先生、王子野先生今天也來到會，我們既歡迎又感謝。這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家可就我們已經做過的工作做一回顧，更重要的是考慮一下今後我們還要做些什麼，怎樣做。

周質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美國最早研究胡適的學者是格里德，他寫了一本《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重點是探討自由主義為何在中國失敗。六、七十年代，除了美國一位女學者寫了一篇〈胡適與整理國故〉的論文外，幾乎無人問津胡適研究。1984 年，周明之先生寫了一本《胡適與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他參看了胡適留美時期的大量檔案材料。比較美國、臺灣、大陸三地胡適研究的狀況，一般來說，美國學者認為胡適思想已經過時，故他們認為胡適已成為一個歷史人物。臺灣學者對胡適思想的興趣也在減退。大陸對胡適研究的氣氛似乎日漸濃厚。我現在正在搜集胡

\*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適的英文著作，Eugene L. Delafield 與袁同禮於1963年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4 本上曾發表了一份胡適英文著作目錄。我在他們已有的基礎上繼續整理，現搜得 216 篇，還有 20 多篇尚未收齊。

鄧廣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我想談談胡適的評價問題。去年在香港開會時，有的學者認為胡適淺薄、梁漱溟深刻，我覺得這兩個人物不是一個檔次上的人物，不能把他們兩人放在一起比。梁漱溟的思想基本上是傳統的一套，他對儒家、佛家學說都取頓悟的態度，這是違背科學精神的。至於把胡適與末代皇帝放在一起就更不對了，溥儀是封建遺老，胡適是先進人物，不應借溥儀來醜化胡適。我並不是說胡適不能批，批要看歷史條件。從歷史的角度考察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沒有胡適就沒有魯迅、郭沫若、周作人。當然，如果只有胡適一人吶喊，沒有其他人遙相呼應，新文化運動也就不成爲運動了。

王子野（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胡適給梅光迪的信，我曾抄過，後來可惜丟失了，那是一筆很有價值的文學史料。有些人物不可比，有些事卻是可比的。我記得胡適當年演講時，常常是濟濟一堂，人滿爲患，而張東蓀發表演講，則稀稀拉拉，聽眾寥寥，這是可比的。

唐德剛（原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我認識胡適也算是緣分。在哥倫比亞大學，胡先生是一塊大招牌，我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一次，胡先生主動與我握手，問我的名字，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啟發也很大，所以我對年輕人很注意。歷史上的英雄是時勢造成的，但很少有英雄能造時勢，胡適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究竟是什麼時勢造就了胡適，胡適爲時代又造了什麼樣的勢？這是值得探討的。如對中西方進行比較，在古代，中國領先於西方；進入近代以後，西方又遠比中國先進。近一百多年，中國社會處在劇烈的變化之中，每十年發生一次變化，每十年要產生一個人物。胡適認爲中國現代化的基礎是文化現代化，所以他著眼於創造新文化。我們研究胡適要下笨功夫，要做目錄研究，既要宏觀研究胡適所處的時代，又要微觀研究「胡適學」，只有這樣，才能將胡適研究推向前進。

朱文華（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講師）：胡適研究從五十年代步入「誤區」，到文革時期被視爲「禁區」，再到近十年來逐漸發展成爲一門「顯學」，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現在對胡適的研究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紀念、回憶性的；一類是學術探討性的。從發展的角度來總結胡適研究，仍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在材料方面，許多論文、論著所使用的材料是輾轉抄



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在研究領域方面，有些問題尚未觸及，如美國與庚子賠款，胡適與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他的師友關係。胡適的朋友學生大致可分三個系統：北大系統、中國公學系統、海外系統，可否模仿《明儒學案》、《魏源師友記》，編一套《胡適師友案》。在力量組織方面，胡適研究至今沒有正式的學會組織，可否在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下面成立一個「胡適研究會」。1999年是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到那時再組織一次大規模的胡適學術研討會，爭取胡適研究再上一個臺階。

沈衛威（河南大學中文系講師、文學博士）：從學術角度重估胡適文化遺產，胡適的許多東西都已過時，許多後輩在某些專門領域超越了他。但胡適具備大學者的風範和意識，他開創了一個時代。對胡適研究的價值取向可分為歷史意義的和現實意義的。歷史意義的胡適研究就是要回到胡適去，還胡適一個本來面目。現實意義的胡適研究則有待政治環境的寬鬆，在胡適研究這個問題上，政治對學術的限制作用很大。

周質平：「五四」新文化人提倡德先生、賽先生。但在二十年代，對科學的提倡實際上壓倒了民主，這對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了極大不利。在近代歐美，民主和科學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密不可分。即使在政治黑暗的時候，學者們仍能以自己的科學精神從事學術活動，學術超越了政治，這顯現了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以我們現有的胡適研究而言，也應如此。應該說，在政治上有諸多忌諱的時候，研究胡適反而更有意義。

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輯）：我從事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表示自己對歷史、對現實的深切關懷，我認為離開了這種關懷，學術研究就會失去它應有的價值，不管外界社會政治環境如何，學者都可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去認識歷史，參與現實。我在擔任編輯工作時，接觸胡適研究方面的稿子不少，但發稿不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稿子質量不高，研究深度不夠，基本上停留在重新評價的研究層面上。這一點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

歐陽哲生（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從1986年我寫作碩士論文，開始從事胡適研究，到現在已有五、六年了。從事這項研究，我體會最深的有兩點：一是風險意識，胡適研究過去被視為「禁區」現在也還有許多「雷區」，在這個領域要幹出成績很不容易。既需要你腳踏實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還需要你勇敢於為科學獻身的精神，也就是說要有膽有識。二是現代意識，胡適研究在大陸雖起步較晚，但它一開步，就很

快進入海外學術界的視野，可以說，胡適研究的起點實際上很高，幾乎有許多問題都是被人翻出來研究了幾遍。現在我們要再上一個臺階，就必須灌注現代意識，拋除成見，這首先需要將胡適置於現代化潮流中去重新認識，胡適在為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中曾經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功不可沒。

**季維龍**（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成立胡適研究會是一個好的設想，即使不能成立，也應加強聯繫。從發展的角度看，可以制定一個五年研究計劃，集中力量，相互合作。應該加強與海外胡適研究會的聯繫，搞一些基礎研究，如胡適著譯編年目錄。

**顏振吾**（安徽省績溪縣政協副主席）：搞胡適研究，有如開礦，它所包含的精神礦產十分豐富。胡適一生行誼、思想，哪些有現實意義、有歷史價值？這需要我們去大力挖掘。胡適說：與朋友相處，要有疑處不疑。此話說得極好，胡適一生受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影響極深，表現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曾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同胞們都應該這樣〉，就是希望中國人和睦相處，不要搞自相殘殺，不要爾虞我詐。

**黃艾仁**（安徽省滁州師專中文系副教授）：我是從研究魯迅，走到研究胡適。研究魯迅要實事求是，研究胡適也應該這樣，過去說為曹操最早平反的是郭沫若，後來又說是魯迅，我看《新青年》，發現為曹操平反的人是胡適，我就寫了一篇題為〈最早為曹操平反的是誰〉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反響。這樣，我開始步入了胡適研究領域。胡適研究現在還有一些禁區、盲區和難區。前一段播放的電視劇《太陽之歌》，批判胡適的「問題與主義」，說明許多人仍然受到「左」的影響，這就是盲區。胡適研究有經費困難，要打開研究局面，必須克服經費困難，這就是難區。

**唐力行**（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我從事胡適研究，時間較晚。前一段時間，我主要是搞徽州學研究，徽州學與胡適有聯繫，它為胡適研究提供了地域文化背景。我從研究徽州學到研究胡適，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社會環境的寬鬆，為我們研究胡適提供了便利。今後我準備研究胡適與徽州文化的關係、胡適的家族史。

**唐德剛**：臺灣有些人美化胡適，把胡先生塗成一個大花臉，這實際上是醜化，這不符合「胡適主義」。余英時在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序中說胡頌平是一個最理想的寫胡適年譜的人選，我認為他是最不合格的，他缺乏現代頭腦。胡適有二十七年在美國，胡頌平對這一段胡適的生活根本不熟悉。我們搞「胡適學」研究，要紮紮實實從微觀研究開始，重修一

部胡適年譜，將胡頌平編年譜時所遺漏的空白點補上，使譜主一生的行誼能翔實地反映出來。

**聞黎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胡適研究在缺乏資助的條件下，能形成一支基本隊伍，這本身不僅反映出勇於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的決心，也表現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感。這精神極可貴。我祖父聞一多與胡適關係密切，都是新月社成員，又一起創辦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他擔任中基會翻譯莎翁全集委員會主任，也是胡適的推薦。關於他們的關係，我準備做以認真研究，相信可以說明不少問題。

**沈寂**（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現在許多年輕人對胡適很陌生，五十年代「胡適大批判」的歷史陰影尚未消除。我們現在搞胡適研究，要從基礎平面做起，要讓大家熟悉胡適，了解歷史真相，這就需要多出版胡適本人的著作，需要大家多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

**易竹賢**（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胡適研究要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有些問題一時講不清，可以逐步突破，這也符合胡先生本人關於一點一滴進步的思想。胡適的政治思想尚有很大爭議，有些可放下暫且不論，有些可加以分析，如胡適提倡民主、法制，這是他積極性的一面。胡適的學術活動和思想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它不受時空限制，我們要多加研究。胡適關於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與魯迅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極為深刻，現在看來仍不失其意義。

**曹伯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副總編）：我起初研究胡適，如編年譜，主要是搞一些開荒性的工作，因為當時在觀念上仍有很多障礙。今後我們研究胡適，應該多做基礎性的工作，如修年譜，編全集，個人力量不夠，可以組織大家通力合作；在專題性研究方面，可以深入研究胡適的方法論，胡適一生重視方法論，他的方法論自成系統，很值得我們研究。在研究態度方面，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只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即使意見不一，也應存一種相互容忍的態度。

**胡明**（中國社科院《文學評論》編輯部副編審）：我之所以從事胡適研究，是因為有一種無形的內在驅動和文化認同感，是爲了表達我對歷史、對現實的深切關懷。我覺得今後胡適研究應朝著更細密的方向發展，要深入地研究胡適思想；同時也要兼顧普及胡適研究的工作，要讓更多的人了解胡適，了解歷史的真相。

**吳二持**（廣東省汕頭大學高教研究室講師）：我覺得胡適研究，首先要

自己解放自己，不要爲成見所蔽，不要受傳統觀念束縛，要從現代化的角度研究胡適，將胡適思想的現代意義挖掘出來。

陳漱渝（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我建議國內學者與海外學者通力合作，編一套《胡適全集》。現在做這份工作很有必要，它帶有搶救歷史資料性質。胡適的著作如果不加注，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人與事，後人很可能無從知曉了，現在我們做這份工作還來得及，應該抓緊時間，組織人力，分工合作，把這件事做起來。

耿雲志：總起來說，大陸上的胡適研究工作是以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爲起點，從那以後，研究胡適的論文，每年都在報刊上大量出現。1985年以後，每年都至少有一本專著出版，現在年譜、傳記，專題論著都已有多種問世。青年學生對胡適表現了很大的興趣，以胡適爲題目的學位論文，差不多每年都有若干篇，這是很可喜的現象。1991年胡適百年誕辰之際，我們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的胡適討論會，這是有很大意義的一次突破。現在到了一個新起點，需要我們努力把胡適研究工作進一步拓展。

胡適是現代中國知識領袖中比較最自覺、最富有理性的推動現代化運動的人。我們的胡適研究工作的進展及其所達到的水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種標尺。它的時代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今後待做的事情很多，有些基礎性的工作還要下大力量去做。例如搞一個比較最完整的、最有系統的胡適著作目錄，爲編輯胡適全集打下基礎。編全集的工作，只要條件具備，應及早進行。此外，更深入的綜合研究，還需做極大的努力。要把胡適的思想揭示透徹，把他和時代的關係揭示清楚，不下大工夫是不行的。

爲了推動我們的工作，大家強烈地希望組織起來，能搞一個獨立的研究會最好，能在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下面設一個二級學會也好，如兩者都不能實現，就做爲一個胡適研究聯誼會。總之，大家要經常聯繫，團結協作，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把胡適研究工作推向前進。

（說明：這篇〈紀要〉係根據紀錄整理，未經發言者審閱。）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 記柏克萊、康乃爾兩大學

### 在魯斯基金贊助下的兩次「上海近代城市史」研討會

葉文心\*

有關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在中國大陸是八十年代新起的現象。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個地區「七五」國家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計劃的結果逐一發表，城市史成爲「四化」政策、改革開放聲浪之中新興的史學領域，擺脫了大陸現代史一貫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主導思想，既不談革命英雄人物功過，也不辯論路線左右政策是非，平平實實地把眼光專注在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鉅大的變化，一方面使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架構、統計數據，一方面運用大量的文字素材加以描述，找出了不少新材料，也出版了數量相當可觀的專書及論文。又因爲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員多半來自當地的研究機構，譬如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等，所以研究者在對於地方文化特色的命題取材，又格外有一份貼切感，不比以往全體一致談全國性大動向時那般有份抽象的生疏。

與此同時，美國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着眼點上也產生了變化，在民國史的範疇裏，重新發現了城市的重要性。比起中國大陸，美國學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指導原則。所謂城市研究，未必是對城市本身市政設施、道路、供水、公共衛生等現代化空間的研究，而是對在都市環境中所發生的形形色色人文現象的注意。近年所成的專書及論著，內涵其實頗爲紛雜。但是因爲取材都來自城市，跟大陸學術界近年的走向不期而遇，兩股力量交匯之下，乃有以上海近代城市發展史爲焦點，自前年秋天開始推出的兩個魯斯基金研討會，一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一在康乃爾大學，都以上海

---

\*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社會科學院爲行政上的對等單位，分頭邀集上海及美國各大學的研究人員共同參加。

柏克萊的討論會由該校的五名學者作爲基本成員：Frederic Wakeman, Joyce Kallgren, Elizabeth Perry, Thomas Gold, 及葉文心。採取小型討論會模式，自1991年秋天開始，連續五學期，輪流以其中一人爲召集人，原則上邀請上海學者兩位，連同主持人，一共是三篇論文，另邀三人評論，二、三十名至四十名對相關題目研究素來有成的學者，參加討論。有時所提論文也不限在三篇。每學期討論會的主旨，由召集人擬訂。已舉行過的討論會有 Wakeman 主持的上海市政治秩序（1991年秋），葉文心主持的上海中產階級都市、企業文化結構（1992年春），Kallgren主持的上海社會服務家庭計劃老人福利（1992年秋）。即將舉行的有Perry 主持的上海工運及其政治意義（1993年春）。尚待舉行的是 Gold 有關公民社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討論。全部系列在柏克萊舉行的部份將於1993年秋天結束。

康乃爾大學的魯斯計劃，由歷史系系主任高加龍（Sherman Cochran）主持。自去年夏天開始，一年一度召開討論會，共計分三年舉行。去夏討論會由主持人擬訂以消費文化及消費社會爲主題，探討二十年代上半上海商業活動與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論文五篇，高加龍、葉文心之外，上海社科院院長張仲禮、經濟所丁日初、沈祖焯各提一篇，評論員五名，邀自各校，參加討論的有康乃爾各系的教授、研究生及其他各校研究人員等共五十餘人，可謂盛況。第二度的康乃爾討論會將在今年九月舉行，以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各行各業對日本佔領軍在求存與抗爭之間的取舍爲重點。第三度的康乃爾討論會將於明夏擴大舉行，暫擬以「商業組織與消費社會」爲主旨。

此外今夏柏克萊、康乃爾兩組的部份研究人員，將組隊前往上海社科院，參加上海城市開埠一百五十年的討論會。

兩大學在魯斯基金贊助之下的上海城市史研究，到目前爲止並沒有論文集的出版計劃。兩校研討會主要的推動力量，是各主要參與者及其各自分頭進行中的專著計劃。其中魏克曼、斐宜理二教授已有成書即將出版，其他各人的研究工作及撰述也都各有進展。上海方面參與討論會的應邀學者，原本也都各有所專、各自選材發揮，討論會中提出的論文因此也各按原有計劃發表。

# 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

朱 浚 源\*

爲邀集全世界各國研究華人與華僑問題的學者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亞裔研究系，以華人的法律、政治、經濟之現況與問題爲範圍，於1992年11月27日至29日，主辦了一次盛況空前的國際性超大型華人研討會。其經費來源，全部由金門灣地區的華人提供，特別是池洪湖先生。

這個巨型的研討會，以「落地生根」爲主標題，「各國華人華僑法律、政治、經濟之現況與問題」爲副標題。事實上，其所邀約的論文題目牽涉範圍，涵蓋面遠超過副標題所界定的法律、政治與經濟，舉凡語言、文學、宗教、社會、思想等無不包括在內。參加的學者專家至少有二百八十一人，分別來自全世界二十七個國家或地區：其中美國116人、中國大陸36人、臺灣18人、香港11人、澳門6人、加拿大14人、日本12人、法國4人、德國4人、荷蘭3人、英國2人、義大利2人、奧地利1人、澳洲14人、紐西蘭4人、哥斯大黎加3人、巴拿馬2人、瓜地馬拉2人、墨西哥1人、巴西1人、新加坡9人、菲律賓4人、馬來西亞4人、印尼4人、越南2人、泰國1人、婆羅洲1人。

會議的焦點集中在討論散布在一百三十個國家之中，三千多萬名的華人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狀況。過去四十年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主義、冷戰衝突，以及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敵對緊張關係，嚴重影響了華人在所居國家的地位。特別是中共早期輸出世界革命，在東南亞以及其他地區與當地共黨聯合，企圖推翻政府或影響執政，更使反共問題與排華問題連成一氣。而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海外僑社的爭奪勢力範圍，更增加問題的複雜性。此外，海外華人承續中華文化，自詡文化的優越性，亦不易立即與當地文化相融合。幸而近兩、三年以來，全球政治氣候有了戲劇性轉變，使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得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有了較大的空間：學者們有更好的條件來研究華人在各國的狀況。

由於這個緣故，此次會議的目的，是要重新考慮冷戰以後，華人在各國作為少數民族之一，所遭遇問題的情況。會議主要重點在區域性問題上面，次而及於認同的問題，均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來舉辦；另外，以綜合討論會方式舉辦的，主題包括企業投資與政治參與、臺灣及大陸兩地政府的華人政策與華語的傳續、以及華人文學與香港問題；以專題演講方式舉辦的，有投資問題、人權問題、華人移民的新趨勢三大類。文章或用英文，或用中文，或用法文、西班牙文發表均可。

整個會議集中在 27 日上午到 29 日中午。會議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小組討論 (Concurrent Panels)，為會議的重心，分為十個場地同時舉行四次；第二種為綜合討論 (Concurrent Symposia)，根據主辦單位的安排，選擇性地找了 16 篇文章，分兩次在兩個場地舉行；第三種為全體討論會，也就是以專題演講的方式，在午餐時間提出，全場學者一面吃飯一面聽講，講後容許零星的發問，由演講者直接回答。透過以上這三種會議方式，可以看出主辦單位的用心：希望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以最密集的方式宣讀完總數達 211 篇（但主辦人王靈智的統計為 203 篇）的論文。與會者為了配合，必須從上午起床直到晚宴結束，將每一分鐘都提供給大會。換言之，至少從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整整十二個鐘頭，主辦單位都希望充分利用。

密集式的會議，對生活在當地的學者而言，或許負擔不算太大，但對於遠從海外甫行搭機前來，時差問題還沒解決的學者而言，則難免苦不堪言。

此次會議，以「落地生根」為主題，使會議宗旨顯得特別明白清楚。主辦單位刻意強調在各居留國生根的重要性，以有別於老華僑過去的「落葉歸根」，與中國僑鄉藕斷絲連的老觀念。主辦此次會議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即表示：落葉歸根是一種民族自大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海外華人，常置當地情況於不理，抱著過客的心態在生活。相對的，他們這種作法也影響當地的政府，認為當地華人總是抱著這種心理的「異鄉人」，以異樣眼光與政策來對待華人，因此對華人相當不利，出現了多次的排華事件。

香港大學校長王廣武在開幕的專題演講之中，以「海外華人研究現況」(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為題，歷數世界各國研究此一問題卓然有成者。此一文章，與他在一九八八年發表的「論東南亞華人認同之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有雷同



處，但包涵範圍與主題遠為廣闊。在結論中，他以保守的語氣展望華人研究：認為海華研究要成為學術上完全獨立的領域，還有許多主要的困難存在。但因海外華人在經濟上的成就，以及中國大陸近年以來在經濟結構上的改變，使得海華研究至少已經成為漢學研究（Sinology）的一個重要部門。在未來，它甚至還將進一步發展，成為社會科學以及民族學中少數民族研究的一個次級學門。

主辦人柏克萊的王靈智很有心要長期投入這個領域，因此在研討會結束之後，決定成立一個暫時性的籌辦單位（稱為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來共同籌劃建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SSOC)。或許如果這個計畫成功的話，海華研究的將來會更加燦爛光明。

此次會議應邀從臺灣前往開會的人數約有 18 人，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研究員張存武、政大教授陳鴻瑜、李國雄、講師李盈慧、僑委會華僑通訊社副社長楊建成、主任秘書趙林、華僑經濟年鑑主編陳懷東、淡江大學副教授郭岱宗、黎明工專副教授黃建淳、世華銀行副理曾慶輝夫婦，以及我本人等。

在兩百多篇的論文之中，與近代史研究直接有關的大約有五分之一左右。茲為方便歷史學者參閱，特別逐一挑出，並依當時發表的場次與時間順序，臚列於後：

1. 周中堅（南寧，廣西社會科學院）：嚴冬歷盡苦忘春——柬埔寨華人滄桑四十年。
2. 黃昆章（廣州，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走世界華人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論印度尼西亞華人落地生根。
3. 黃建淳（臺北，黎明工專）：晚清新馬華僑領袖進階模式的探討。
4. Lee Kam Hing 李錦興（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After Independence.
5. 廖小健（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馬來西亞華人地位探源。
6. 黃松贊（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華人的自立：簡論華人二戰後的生存道路。
7. 周南京（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略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菲律賓華人社團的增殖。
8. 劉笑盈、于向東（河南，鄭州大學歷史系印度支那研究室）：越南華人四十年

歷史。

9. Yen Ching-hwang 顏清滄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delaide, Australia) :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A Preliminary Study.
10. Anne Atkinson (Aboriginal & Intercultural Studies, Edith Cowan University,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 The Rol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abour to Western Australia in the 19th Century.
11. 吳行賜 (廣州，廣東華僑研究會)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ustralians Since 1966.
12. 李炎思 (廣州市華僑歷史學會) : 美國華人社會經濟轉型期的發展趨勢。
13. 徐雪筠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 試析戰後美國華人地位變化的相關因素及其前景展望。
14. Renqiu Yu 于仁秋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Y-Purchase, Purchase, New York) : This is Our Home: New York Chinese Laundrymen's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Base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
15. 莊國土 (福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 : 中國政府對海外華僑政策的變化。
16. 郭雷 (上海，復旦大學) : 論中國海外華僑華人政策的變化和發展。
17. 李盈慧 (政治大學) : 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
18. Evelyn Hu-DeHart 胡其瑜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ity and Race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lorado) : Coolie, Liberator Fighter, Shoemaker: The Chinese of Cub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 Laura Hall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 The Arrival and Settlement of the Chinese in Guyana in the 19th Century.
20. Jose Campang Chang (Can Chon-man, Guatemala City, Guatemala) : Chinese Colony of Guatemala (1900-1990)
21. Justo Chang (Chan Ken-Tou, AVANSCO, Guatemala) : Video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Guatemala.
22. Lok Si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 Apple King Nicaragua: William Siu, Remembering Biographies.
23. Benjamin Wong (Castaneda, Colonia Doctores, Mexico) : Posibles origenes del surgimiento del sentimiento antichino en Mexico ("Possible Origins of the Rise of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Mexico")

24. 陳政明、陳炳（廣州市華僑研究會）：祕魯華人與廣州僑鄉關係的變化。
25. Hamilton Chang 鄭漢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 Paisanos en el Per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in Peru.
26. Jennifer Gee 朱慧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 Desde el ensaque del huano hasta el culitvo eu los valles: Chinese Labor and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eru.
27. 張天（寧夏銀川，寧夏大學）：二戰後前蘇聯華人狀況述評。
28. 徐樹秋（黑龍江，黑河文史資料研究工作委員會）、薛水盛（黑河林業局）：
29. 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僑生回國升學在臺灣：回顧與檢討。
30. Yang Chien-Chen 楊建成 (Overseas Chinese News Agency, Taipei, Taiwan) : Overseas Chinese in Taiwan Politics.
31. 黃猷（福建廈門，福建省華僑歷史學會）：中國僑務政策的形成、發展與面臨的挑戰。
32. 莊國土（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中國政府對歸僑、僑眷政策的演變（1949-1966）。
33. Edgar Wickberg 魏安國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Philippines Cities since World War II : The Case of Manila.
34. Wing ChungNg 伍榮仲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 Collective Ritual and the Resil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ganiz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 A Vancouver Case Study.
35. Clara Chu 曹惠萍 (U. C. L. 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 Information Sources on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36. Betty Lee Sung 李瑞芳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 Archival Recor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37. Fok Kai Cheong 霍啟昌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 The Forgotten Link: American Chinese and the Fragrant Harb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Archives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Chinese.
38. 譚天星（北京，中國華僑歷史學會）：Contemporary Scholship o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39. 張存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Taiwan'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1952-1992.
40. 吳鳳斌（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Studies on New Chinese Imm-

igrant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41. 李國樑（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第二次大戰後東南亞華人落地生根的進程：大陸學者的研究。
42. Robert Ko 柯尹文 (Excerpta Medica, Princeton, New Jersey) :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Press.
43. 黃鏞琨（廣西南寧，廣西華僑歷史學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趨勢。
44. 吳奕琦（廣東汕頭，汕頭大學臺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菲律賓、泰國、印尼三國華文文學的歷史發展及其比較。
45. Tai Ann Koh 許黛安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 Dispossession, Possession and Domesticatio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Literature in English by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a/Malaysia and Singapore.
46. 朱法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末以來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47. 許肇琳（廣東廣州，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思想觀念變化看華僑人社會的演變發展。

## The IX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Ursula Richter\*

Every two year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 holds a congress in one of the Old World's scholarly centres where China is studied. Last year, the site was Paris. The conference, taking place from 13 to 17 September, 1992, was hosted by the prestigious Collège de France (the very birthplace of academic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inology in the West were, when it was still called "Collège Royal", the first professorial chair for our field was erected in 1814). Organizat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staff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Chine) of th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Traditionally, the EACS's congresses convene under a leitmotif. The theme for the IXth congress was set quite broadly as *Changement et idées de changement en Chine* (Change, and ideas of change, in China). Papers were given either in French or English; for brevity's sake, I quote all entries in English, adding (F) for papers given in French. In view of the great number of speakers, I omit contributions tackling strictly classical or linguistic topics.

Sunday, 13 September, 1992

15:00—18:00 h: Reception of the congress participants at the French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Space

Monday, 14 September, 1992

8:00—9:00 h: Enrollment of participants

9:00 h: Opening address by E. Zürcher (The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president of the EACS

9:15 h: Inaugural lecture, Jacques Gernet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The notion of change in China" (F)

10:00—12:00 h: "The notion of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ages" Coordinator: P. E. Will (France: Paris, EHES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griculture, 18th-19th centuries" (F)

—Francesca Bray (USA: Los Angeles, UCLA): "Female labour: A very classical development" (F)

—Francois Gipouloux (France: Paris, National cent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From traditional economy to reforms: continuity and ruptures" (F)

Early afternoon panels, 14:00—15:30 h:

I. —Alexei Volkov (Russia):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s in ancient Chinese mathematics"

—Catherine Jami (France: Paris, CNRS): "Change in mathematics: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studies on calculating instruments”

- II. —Vibeke Bördahl (Norway: Oslo University): “‘Wu Song fights the tiger’ in Yangzhou storytelling”  
 —Barend J. ter Haar (The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The place of children in Chinese religion, magic, and folklore”
- III. —Aleksi A. Bokshanin (Russia: 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dynamics of modif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imperial China”  
 —E. B. Vermeer (The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Government treatment of refugees, vagrants, ‘shack people’, loafers, and other floating elements in Ch’ing society”  
 —Marina Miranda (Italy: Naples Univers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 IV. —Marja Kaikkonen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Effects of propaganda: The change of *Xiangsheng*”  
 —Torbjörn Lodén (Sweden: Stockholm University): “Redefining traditions and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Gao Xingjian’s novel *The Spiritual Mountain*”

Late afternoon panels, 16:00—17:30 h:

- I. Linguistic panel (Speakers: Federico Masini, Italy; Ulrich Kautz and Gunnar Richter, both from Germany)
- II. —Monika Motsch (Germany: Bonn University): “A new method of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stics: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Michel Hockx (The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Zhou Zuoren’s poem ‘Rivulet’ (*Xiao he*, 1919)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baihua* poetry: A receptionist approach”
- III. —Jean-Louis Rocca (France: Lyon Catholic Univers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du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changes: The example of Chinese bureaucracy at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and in the 1980ies” (F)  
 —Barna Tálás (Hungary: Budapest, Ministry of Finance): “Chinese common market-vision or perspective?”  
 —Andrei Onikienko (Russia: Moscow): “Reform of state-run enterprises in China: Towards higher efficiency”
- IV. —Harro von Senger (Germany: Freiburg University): “The idea of

change as a fundament of the Chinese art of cunning”

Tuesday, 15 September, 1992

Morning panels, 9:30—11 h:

- I. Panel on “Syntactic evolution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Speakers: Sergei Yakhontov, Russia; Alain Peyraube, France)
- II. —Mitja Saje (Slovenia: Ljubljana University): “Changes in Chinese-Slovenian relations”  
—Gennady Tchachenko (Russia: Vladivostok Academy of Sciences):  
“Soviet influence in Manchuria (1917-1935)”

10:45—12:15 h:

Panel on “Rational assessments: Changes and contents”:

- Christoph Harbsmeier (Norway: Oslo University): “Rhetoric and rationality in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Rome”
- Francois Jullien (France: St Denis, Paris University VIII):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future ever since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 yi*)” (F)

Early afternoon panels, 14:00—15:30 h:

- I. —Lucie Borota (Czech Republic: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A making of the ‘doubles’ of character-types in an 18th century novel”  
—Woei Lien Chong (The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Philosopher Li Zehou on the relevance of Kant’s philosophy for modern Chinese culture”  
—Raoul D. Findeisen (Germany: Bonn University): “Evolution, Superman, overman, *chaoren*-Nietzsche’s concept as transitional idea of change”
- II. —Elena Devedjieva (Bulgaria: Sofia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ition to pluralistic society in the ‘80s-Ideas and reality”  
—Ignazio Dandolo (France: Paris): “A basis change in modern China: From endogenous to exogenous legislation. The case of penal law.”
- III. —Ursula Richter (Taiwa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A changed perspective on antiquity-Historical skepticism in the May-Fourth era”  
—Jana Rosker (Slovenia: Ljubljana University): “The bipolarity of progress and tradition within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nachist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century”  
—Hilary Chung (U. K.: Oxford University): “Image of modern women

and assumptions of change. Male attitudes to modern women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rough literary imagery”

Late afternoon panels, 16:00—18:00 h:

- I. —Mark E. Lewi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 rites as fabric of history” (F)  
(Two other papers on classical topics given by Hans van Ess, The Netherlands; and Jan de Meyer, Belgium)
- II. —Dieter Heinzig (Germany: Cologn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road’ to ‘Yibian dao’: Changes in CCP foreign policy in 1949”  
—Alain Roux (France: St Denis, Paris University VIII): “Contributions to a genea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ivil socie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official syndicates in Guomindang Shanghai” (F)  
—Guido Samarini (Italy: Venice University): “Third-Force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the Fuj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933-1934)”

Wednesday, 16 September, 1992

Morning panels, 9:00—10:30 h:

Panel on “Changes of the Self;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ividual”:

- Wolfgang Bauer (Germany: Munich University): “Time and timeliness in 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 Anne Wedell-Wedellsborg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self as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80s”

10:45—12:15 h:

Panel on “Change of paradigm in medicine”:

- B. J. Andrew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Tailoring tradition: The impact of modern medicin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1887-1937)”
- Elisabeth Hsü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Bian* and *hua* in Chinese medicine: reflexions on a senior Chinese doctor’s comments”

Afternoon panels, 14:00—15:30 h:

- I. (Papers on classical topics read by Rudolf Wagner, Germany; Maja Milcinski, Yugoslavia; and Jörg Schumacher, Switzerland)
- II. (Papers on classical and archaeological topics read by Achim Mittag; Mayke Wagner; and Magdalene von Dewall, all from Germany)



- III. —Wu I Chuan Beyens (France: FNRS): "Change and constancy in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ur of Chinese"
- Roland Lew (Belgium: Brussels Free University): "Change in China and change of ideas about Ch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crisis of real socialism" (F)
- Marina Thorborg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Changes in Chinese idea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f China"
- IV. —Brian Hook (U. K.: Leeds University): "Immigration to and 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in the transitio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 Nina E. Borevskaya (Russia: 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experiment: In search of the educational model for XXIst century Chinese economic science development: the nineties"

Thursday, 17 September, 1992

Morning panel, 9:00—12:00 h on "Changes of manners and material habits":

- Paolo Santangelo (Italy: Naples University): "Emo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Francoise Sabban (France: EHESS): "Change of tastes and innovation techniques: the refinement of sugar in China" (F)
- Marco Ceresa (Italy: Venice): "The invention of warm water"

Early-afternoon panels, 14:00—15:30 h:

- I. —Vladimir Liscák (Czech Republik: Prague University): "Some approaches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mall ethnic groups in South China"
- Foon-Ming Liew (Germany: Hamburg): "The aboriginal offices during the Ming period (1368-1644)"
- Victor Larin (Russia: Vladivostok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outh-West provinces in Ch'ing China"
- II. —M. van Veen-Isovic (Luxembourg): "The post-1971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Eleonora Pivovarova (Russia: 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main ideas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practical realization"
- III. —Olga Lomová (Czech Republic: Prague University): "Recent changes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 as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debates"

- about the Roots in 1989”
- Leif Littrup (Denmark: Copenhagen University): “The River and the historians”
- Marie-Claire Quiquemelle (France: Paris): “Chinese cinema and censure from the 1930s until today” (F)
- IV. (Three linguistic studies, presented by Mieczyslaw J. Künstler, Poland; Mihail V. Sofronov, Russia; and Gottfried Spies, Germany)
- V. —Agnès Chalier (France): “A critique of correlative thought” (F)
- Philippe Foret (France): “A changing landscape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imprint of Manchu policy” (F)
- VI. —Donatella Guida (Italy: Naples): “Ming images of Nanyang: Myths and symbols from *Haiyu* (Words of the Sea) (1536)”
- T.M. McCellan: “Zhang Henshui’s Eighty-one Dreams: bridg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Bart Dessein (Belgium: Gent State University): “Miscellany on the heart of scholasticism: its pos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texts...”

In a by-programme,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a reception at the EHESS (Monday night); to the inauguration of an exhibition “Impressions of China” at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uesday night); and to the projection of two ethnographic film videos by Jacques Pimpaneau, Paris, shot in rural Jiangxi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1992; and Marie-Claire Quiquemelle, Paris, taken in the Guizhou countryside at the lunar New Year festivities of 1990, 1991, and 1992; these films were shown at the French National Museum of Asiatic Arts, *Musée Guimet*, where congress participants were previously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delight in the museum’s famous Chinese art collection (Wednesday night). The usual sessions of the EACS council took place. For the site of the next EACS conference in 1994, the Czech capital Prague was announced to whose Chinese Studies scholars like Jaroslav Prusek gained a prominent name (see also the research note on Prague’s Lu-Xun Library in this issue).

# 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

黃仁宇\*

我們在一件事態的轉變過程中，身入其境，往往難能體會進展之速。在臺灣的推行民主，開放言論，也有這樣的情景。1984年我在大陸出版的《萬曆十五年》已有數本流入臺灣。當時中央研究院幾位年輕的朋友——張彬村、黃寬重和沈松僑各先生——就希望我們也出一本臺灣本。只因大陸版用簡體字，流入臺灣已屬違法。以當日的戰時心理：一本書既有大陸版，即對臺灣不利。這倒不一定是中樞的政策，只是在當時緊張的情況之下，很可能有不三不四的人從中議論，所以我們不能不有所戒懼。幸虧有陶希聖先生出面支持，既替《萬曆十五年》寫了一段介紹，又親自主持臺灣本的出版，才算順利通過。今日各位看到報紙雜誌的言論，和我們在七八年前的禁忌和顧慮相比，也就可以體會今昔之不同，當中的變化已是非同小可了。

我所謂「大歷史」的一種觀念，能在臺灣立足，得力於中央研究院各位先進和各位同事的協助不少。1986年年底我奉中研院之邀，參加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即以「中國近五百年史爲一元論」爲題，在當時也算放肆。而且那一次來臺北，得和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呂士朋和張朋園諸先生接近，得益不少。以後《放寬歷史的視界》之出版，更得到黃進興先生的支持。《萬曆十五年》和《放寬歷史的視界》出版之後，兩書都經吳院長過目，並承他在百忙之中引見。這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可是當時我們就已談及讓我再來臺北時和各位報告我這十多年來讀歷史寫歷史和講歷史的過程。我當然珍視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首先讓我向吳院長、陳所長和中研院各位致謝，也還感謝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系，和呂學海先生主持的社會大學。今天我所講的恐怕是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如果有一得之愚的話，各位先生的支持與鼓勵實不可少。

---

\*前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教授，本文爲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演講。

我所標榜以宏觀的眼光看中國近代史，不過是最近十年事。可是親身切眼體會歷史之展開，已經好幾十年。大凡我們這一輩艱苦流離，已經和歷史所發生大規模的震盪接近。而我個人又算機緣特別好。抗戰時我從軍，一當下級軍官就是十年。在穿草鞋吃狗肉之餘，學著和士兵一起講粗話，領會到很多不見於書本上的知識。比如說，我們下部隊之前，總以為我們軍校畢業生以新時代的思想與技術，可以在行伍之中發生領導的力量，及至當了連長、排長，才覺悟到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以前的希望可以算作一種理想。其現實則是我們要和士兵看齊，受他們的羣眾心理支配。維持部隊的向心力不是紀律與責任感，倒是有面子和無面子的傳統觀念與社會價值。我在十四師的時候有一位連長，他在訓話時一味用尖刻的話挖苦他的士兵，有如：「洞庭湖又沒有蓋子，你們這些傢伙為甚麼不跳進去淹死的好？」而偏偏他的士兵對他惟恭必敬，不敢造次。可是當連長的也要表現他自己的粗線條，確是英雄好漢。例如向敵接近時不匍匐爬行，而是挺身前進。甚至我在駐印軍時，還看到戰車部隊在敵砲射程中不放下掩蓋。我當然不是提倡應當如此，而是報告事實演進確是如此。其癥結則是社會的力量大，個人的影響小。中國很多的事好像全是少數人在上作主，而實際上往往是他們遷就於下級，即是基層的力量大。

後來我在美國教書，又逢上了人所未有的經驗。我曾在各長春藤大學做過研究工作，可是自己執鞭任教的地方，總是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學。這些地方又有一種好處：他們也不管你是專家不是專家，凡在歷史系任職首先就要分擔「西洋文化入門」的課程一組。這一來就逼著我對於宗教革命，文藝復興，荷蘭獨立，英國內戰和法國大革命等等題目產生一種綜合的瞭解。大凡教書總是這樣：學生得益少，先生受益多。起先我還埋怨自己不爭氣，沒有趕上上游，才開這樣的雜貨攤。日後才體會這是增進我宏觀眼光最好的辦法。凡事有正則有反，舉一則反三。看到西洋歷史以直線型的進展才體會中國歷史表面看來以朝代循環作主題之由來。

看到旁人所犯的錯誤，也給自己一種警惕。目下美國講學歷史的重分析而不重綜合。有演繹而無歸納。這樣的治史，往往對一人一時一事恣意批評，而忽視後面的組織與結構。不僅以小權大，而且以靜議動。千篇一律的埋怨指摘，而忽視了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這也就是說只有消極性的歷史，沒有看透歷史的積極性格。

我還記著 1944 年年終中印公路快要打通，國軍由雲南打出和由緬甸打

入的部隊即將在緬北一個叫做南坎的小村莊會師之前夕，我們都在新三十師司令部，這時候也來了一批中外的新聞記者，因為一切都在戰時狀態，吃飯時也無桌椅板凳，只是大家都蹲在地上，晚餐也只有白米飯和酸白菜。恰巧我的貼鄰則是艾薩克司 (Harold Issacs)，當日他代表《新聞周刊》。一經打開話匣子之後他就老實不客氣的用中國話和我說：「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裏的人不好！」我當時就懷疑，這是否可能。同時所謂好壞，好在甚麼地方，壞在甚麼地方，都無從交代。可見得這種觀察，只有直覺沒有邏輯。而日後艾薩克斯也成爲了大歷史家，他寫的書《中國革命之悲劇》至今仍是權威之作。各位也知道史迪威將軍曾和蔣委員長抬槓，被辭回美之後身故，他的日記書牘等由白修德編成《史迪威文件》出版。裏面也講到他敬慕中國人的地方。有一天史將軍看到鐵道上一節貨車，也無機車拖拉，只好由苦力用臂力挽。遠看起來有如一隻百節蟲，鐵道兩旁只看出數十個肢體蠕蠕而行。史即在當日日記裏記下，中國人的精神偉大可佩，中國人只要保持這種精神，不怕沒有出頭的日子。史將軍的讚揚可感，但是他沒有提及誰在組織動員這只大百節蟲，誰又將中國之人力與資源結合起來，對日抗戰，前後又八年之久。這也就是有直覺而無邏輯。

各位有閒時也可以再翻看《史迪威文件》。這書裏講到國民黨戰時腐敗的情形很多，有的也證據確鑿。可是要追究起來，誰供給這些內幕，很有意思。白修德把這些人的名字都隱沒去了。我一計算，一共有十五處。雖然是否恰是十五個人不得而知，但是有多數的中國人向美國客卿獻策，暴揚中國的黑幕，已無可置疑。

按其實當日中國政府無法申辯，今日時過境遷，一切都可以坦白交代。中國要動員三百萬到五百萬的兵力以全國爲戰場，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和強敵作八年生死之戰，可算是洪荒之所未有。亦即從秦始皇到宣統皇帝，過去沒有過這種事情。這時候政府的權力只能擴大，不能收縮。而這時又沒有適當的組織，後面缺乏支持它的社會架構。（如果有的話則不會招致日本之侵略而且殺進堂奧了。）這當頭如何是好？只有馬虎將就，苦肉計有之，空城計有之，也談不上合理與不合理，合法與不合法，於是長沙大火，黃河決堤，一切都來，只要能維持當前的局面繼續抗戰，不惜犧牲。史迪威沒有查勘得明白，表揚中國精神偉大的百節蟲，並非志願服務，大抵都由強迫拉夫拖來。如果社會組織還沒有進化到某種程度，使當中的動員設計統依數目字安排，則你繼續贊揚老百姓好，斥責政府裏的人不好，並沒有幫助我們解決問

題。

私下給史迪威供給情報的中國人可稱之為道德高尚。他們雖在戰時仍不放棄人生道德之標準，理想主義可佩。但是也可以斥之為無骨氣。明知大敵當前，被敵人俘虜則只有被砍頭或抓去被作為人肉靶子，也不顧及領導人和近身同事以挖肉醫瘡的辦法去解決問題，他們還去媚外求榮，只望將自己置身事外，很難令人同情。所以好與壞甚難分解。看你如何著眼而定。

說到這裏各位免不得要問：難道是非全無標準以致公道不伸？

我要即此申明：這問題不由大歷史而產生。實際上這是目前現況，寫回憶錄的，甚至寫歷史的各行所是，缺乏共通的觀點。是非不明公道不伸，是一種極為危險的局面。我們提倡要放寬歷史的視界，增進歷史的縱深，正是要解決這當前的問題。

因為這問題牽涉到我的一生：我的前半生有了從前面與下層觀察事實演化的機會；我的後半生志在事後闡釋此中情節。並且和西洋史、日本史比較正是我謀生的工具，衣食之所寄託。所以我確實花了一段時間，將這整個問題作過深切的考慮。其結論則是：

過去中國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是人類歷史裏一種極大規模的重新組織與重新構造，這當中很多事蹟不能用平常的尺度衡量。至少我們要將它看作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擾攘的局面進展到隋唐大統一的過程同樣看待。

其所以如此乃是傳統中國依賴「尊卑男女長幼」等等社會價值作寄託。這種組織不能在現代世界裏存在。

從鴉片戰爭以來重要的里程碑如自強運動，甲午中日戰爭，康梁百日維新，辛亥的民國肇造不是各別不相關連的行動，而是一種長久遠大的羣眾運動中的環節。外面的壓力增強，中國的反應也增高，最後逼不得已將兩千年來的君主體制也一概放棄。

民國肇造後的軍閥混戰已不可少。因為舊體制業已解散，新體制尚未登場，只有私人的軍事力量可以暫時維繫局面。可是這種私人軍事的力量也難能在一兩個省區之外收效。在這過渡期間最為表現羣眾運動的革命性格者無逾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已經看清革面洗心應從自己著手，士大夫階級有了這樣的覺悟，中國歷史不能再倒退回去。

將一個舊社會推翻，重新創造一個新社會，採取一個「立」字的方式。

中國國民黨在蔣先生領導之下自黃埔建軍以來主持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能獨立自主，實在是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有如立字

上端的一點一橫。

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因著土地革命翻轉了社會的低層機構，有如立字下的一長橫。臺灣方面因 1953 年耕者有其田的法案，也完成了低層機構的改革。

現今海峽兩岸共同的注意通商，其目的不僅是增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是創造一個多元的社會，樹立各色各樣法治性的聯繫，使高層機構能反應到低層的需要，亦即充實立字上下之間的兩點。

這樣以商業體制作基礎的社會架構，符合凡事都能用數目字管理的條件，構成永久體制，才全面的促成中國的現代化。

以上這種解釋我已經自 1986 年開始在報紙雜誌裏專書裏發表，最近也由電視播出。大部發表用中文，一部也用英文，發表的地方有紐約、臺北、香港。即在北京那一方面也因《萬曆十五年》之跋已將要旨傳達著過去。從各方的反應看來，我沒有氣餒的理由。並且只有感到興奮。

這當然不是說以後凡作史的人都要接受我的規範。充其量我也不過說出，我們運氣好，在這二十世紀的末年，局勢明朗，以前的糾紛，至此告一段落。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可以因此作大範圍的綜合。臺北大為開放言論的尺度，就已表示革命已經成功，過去戰時狀態的條件已不存在。我的綜合不足為憑的話，至少有實驗性質。我在七月八日《聯合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歡迎讀者修訂我的歷史觀。但是希望向前修訂，不要向後修訂。我們既已獲得言論之自由，更要珍惜這自由，不要動輒以「翻案」的方式，將白解釋為黑，將黑解釋為白，那樣子仍是向後修訂，也辜負了今日自由之可貴。還有人指出我所講述的資本主義韋伯沒有如此說過，或者馬克思並未如此說過，那也都是將我的歷史觀向後修訂，那只能與時代相去逾遠，不見得有出路。

我下面的提議是針對今後而言。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段共識，認為今日歷史上的前因後果已告一段落，中國近代史可以重新修訂，這是一個極好的機緣，我們今後寫歷史，可以從下面這些步驟著手：

### **第一，我們應當繼續蒐集原始資料。**

我自己在研討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就得力於親身切眼看到的事蹟。這些事蹟至今尚未見於筆墨。這樣看來，書本上遺漏的原始資料一定很多。過去我們不能講也不願講的情節，通常對以後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舉一個

例：

我生長於湖南長沙，在 1920 年代，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名李道階曾任湘西長溪縣縣長。到後來他放棄烏紗帽，也沒有奉准辭職，就率家逃回長沙。事後從我父親的口裏才知道當地駐軍的一個旅長，要他的女兒爲姨太。如果不潛逃，就救不了女兒，看來省會的權威也無從支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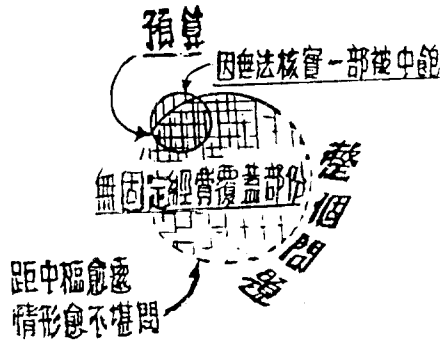
我父親還有一個朋友，叫左國雍，是左宗棠的後人，1930 年代任瀏陽縣長。當日在匪徒出沒的期間，縣政府抓到了三個嫌疑犯，經他草率審問，即都判死刑，準備立即斬決。那時候我母親正作客於茲地，就和他爭論。她認爲當中一個老頭子癡軟懦弱，決無爲匪之可能。固然我母親的辯護完全憑她的印象，但是縣政府的審訊也同樣的缺乏實證。當我母親和他再三爭辯的時候，我們的「左叔」就很輕蔑的說：「看他這樣子，活著算甚麼！」我母親即頂著他說：「你自己活著算甚麼！」信不信由你，經她這場爭辯，這老頭子竟無罪開釋。

如果我不親耳聽到父親母親口述，我不敢相信這些事情可能在二十世紀發生。又因爲以後我研究歷史，讀過明朝海瑞所著《海瑞集》，內中提及他任淳安縣令審案的詳情，再看到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英文）知道縣級政府明清及至民國以來一脈相傳的沿革，更因爲我自己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確切的瞭解除了通商口岸之外中國的民法刑法行政機構只能隨著社會轉移。除非社會有革命性的改造，財政稅收經過一段突破，中國無從現代化。上述兩個例子，也仍是傳統中國社會以「尊卑，男女，長幼」的簡陋信條維繫原始式的農村組織無法適應於現代環境的一種暴露。我敢於武斷的說這兩個例子決非單獨發生。各位即看到魯迅所寫小說以及沈從文的筆記亦必有同感。

在這過渡期間軍隊裏的情形，也至今缺乏翔實的報導。國民政府在抗戰之前夕整個的預算只有法幣十二億元，按當日匯率只值美金四億，這是一個極小的數目。既要維持陸海空軍又要支持建設與教育，恐怕老早就捉襟見肘。抗戰開始我們被驅入內地之後，國軍所掌管區域工廠數只有全國百分之六，發電量只有百分之四，如何生存？我在 1941 年當少尉排長的時候每月的薪餉只四十二元，在街上吃一碗麵，即是法幣三元。山上的土匪標價收買我們的輕機關槍每挺七千元，是我一個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餉。

最近我已經將當日我在十四師所經歷的一段寫成短文發表，以師長關漢騫將軍爲題，內中也提到軍中經理，半取包辦制，[我還怕當中敘述得不澈





底，有引起誤解的地方，不料後來接到關公子闕定正先生的一封來信，不僅不以爲我在揭發當日黑幕，還欣賞我筆下翔實的報導他先人的性格，亦即是有福同享，有禍難共當，膽敢承當責任，不以名利爲最終目的。我當然也敬佩關公子之父風。可是我作文的目的，尚不止是紀人物，而是勾畫當日國軍不僅冒險犯難而且掙扎著在衣食上求生存的實情。

類似的情形又何止盈百上千。但是今日我們翻閱敘述當時情節的文字，只有一片「貪污無能」的責罵。其實一個官僚貪污無能，百十個幹部竭盡忠貞。各位只要看到這幅圖解，也可以不待爭辯，瞭解貪污無能的責罵，不能符合情景；而且至今埋沒的歷史資料尙且汗牛充棟。

所以我建議趕緊廣泛的收集原始資料，集結各種回憶錄，過去很多禁忌，以及掩過飾非的地方現在都可以不顧。中國以過去一百年的時間，將舊社會向前一推，至少也革新了三百年。這不可能所有的工具齊全，各種步驟合理合法，有了這種膽識，各位蒐集的新資料必會打破斷觴濫調，而具有創造性格，讀來有司馬遷筆下慷慨激昂的色調。

## 第二，在整理各種資料時，不急切的以道德的名義論斷。

中國人寫歷史重褒貶，歷史家一定要把他筆下之人物，解釋爲至善與極惡，才算盡到了作史的宗旨。如是康熙是聖明天子，萬曆是無道昏君。張學良是好人，蔣介石是壞人。這在舊時代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大致上一成不變，才勉強可以解釋得通。同樣辦法要擺在今日地覆天翻，乾坤顛倒，倫理道德的標準要重新創造重新修訂的時候，不僅不恰當，而且有時幾近滑稽。班固作《漢書》又在書中加列「古今人表」列有古人1931人，內中有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或有巢氏也包括孔門七十二弟子，下迄趙高、李斯，統由歷史

家班固將他們的德行人品按三等九則的方式列入上上至下下。今日這「古今人表」唯一的用場則是表現《漢書》作者的心襟。今日若假以道德不離口，亦只見其心襟窄狹。

錢穆先生作《國史大綱》他一提到東漢末年三國鼎立的時代，各人都尚氣節，但是錢先生也說出這是一種狹義的氣節。亦即社會秩序已在轉變，當事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雖敵對人物，仍用過了時的道德標準自爲標榜，互相攻擊。比較起來也與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發通電的情節指斥對方爲逆爲賊大同小異。

其實這種緊抓著道德名義不放的態度也不盡止於中國歷史家。巴黎大學初設法國大革命專門講座時，首任專門講座教授奧拉德（A. Aulard）即強調大革命時丹敦是好人，羅伯斯卑爾是壞人。他的高足弟子馬蒂耶（A. Mathiez）即將他所說的好壞翻了一個面，羅伯斯卑爾真心誠意的替小民造福，丹敦貪污好貨，態度游離，隨時可以出賣革命。及至本世紀中歷史家的眼光更爲開放，很少的人仍舊拘泥於這種「好」「壞」的規範。以後接任這專座的勒弗微（G. Lefebvre）更明白道出：「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

不急切的以道德的名義論斷，並非主張擯棄道德不要或者蔑視倫理。不過倫理道德是人世間最高的權威，真理最後之環節，一經提出即無爭辯之餘地，故事即只好就此結束，以狹義的道德寫下來的歷史勢必將一段偉大的事蹟，分裂爲無數片段，讀來時只有袁世凱錯，孫中山錯，蔣介石錯，毛澤東錯，於今鄧小平又錯。對以上各人公平與否不論，首先就否定了中國的歷史。我已經提及我們以穿草鞋，吃狗肉，衣不蔽體的部隊和強敵抗戰八年，即算沒有憑自己的力量打倒日本，最低限度也將他拖垮，這不僅在中國歷史裏突出，在世界歷史裏也難能找到類似的事蹟，而這樣的情形不算。中共的土地改革，其範圍之大，程度之澈底，超過隋唐之均田，也抹殺不計。而今臺灣海峽彼此都儘力通商，十年二十年之內，就使整個國家改觀，從過去殖民地 and 次殖民地的地位，今日成爲一個舉足輕重的一等國家。這種種一切艱難困苦，先烈死難的情形統統忽視，而只記得起某些人發了國難財，某些人受罪受得冤枉；那也真是能見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了。

歷史家商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說及，寫歷史的目的無非將今人現局講得合理化。如果有些人以他們窄狹的眼光寫成的歷史說及各位的立足點都不應該存在，一味呻吟嗟怨之餘也不指示我們今後的出路，那也用不著和

他們計較，《莊子》說：「夏蟲不可以語冰。」於今電氣冰箱早已問世，也是他們猛醒的時候了。

中正紀念堂門口的路標題為「大智」「大仁」與「大勇」，可見得設計人並沒有忘記仁義道德，可是既稱大仁大勇，已是針對非常的局面，放棄尋常的尺度，去打開難關。既然如此，我們在評論時務必要體會到前人的艱難。他們在內外煎逼的環境裏，通常很少有不同的手段可供選擇。即是我不同意於我的「左叔叔」左國雍的態度，可是當日社會情形如是，如果他不將犯人立即處決，則地方秩序無可維持，我不願處在他的地位裏一時一日。至今不得已將這段往事提出，乃是暴露社會現象，而不是在他身後批評議論他的品德。

### 第三，以宏觀眼光看歷史時注重非人身因素 (impersonal factors) 所產生的作用。

簡略說來，中國的長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內將中國社會向前推進三百年。這種規模與長度，不是事前任何人所能籌謀與逆料。然則又不是完全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大概首先有志之士受著環境的逼迫，採取革命行動，將社會上本來就不穩定的因素放縱。於是因著大規模的震盪，其他各人也隨著加入。這廣大的羣眾運動，因時就勢，經過一段正反離合的階段，最後才找到合理的解決。我所說的創造高層機構，翻轉低層機構，和重新釐定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也和其他國家所經過類似之程序大致相同，詳情已在我所著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裏敘及。這全部經過，有如盧梭與黑格爾所提倡之「公眾之志願」(general will) 所促成。既為公眾之志願即不可能由領導人物獨斷。而且領導人物自己往往做了執行歷史發展之工具。比如說蔣先生定都南京創造了一部份新型的軍隊和表面現代化的部院，而後面缺乏同樣新型與現代化的社會架構去支撐它們。他蔣先生只能挺身而出，以一己代替應有的架構。所以旁人以為他是大獨裁者，而現已公布他所記日記的一部份，即表示他自己有無限之痛苦，這種痛苦，不在乎對付敵人，而在乎對付內部。如果歷史家不願意被趨炎附勢之名去為領導人物說話至少也可以把事實後面的非人身因素拉出來檢討分析。

再舉一個例：1930 年中原之戰因北伐成功之後提議裁軍而起。引起李白馮閻組織一個反蔣的大集團，又有了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與西山派代表的右派的參加，兩方動員一百四十萬人，激戰時馮軍每日發射砲彈二

萬發，抗戰時無此火力，戰後蔣先生自己承認中央軍死三萬傷六萬，馮閻軍死傷十五萬（上海《大隆報》1930年10月13日），民間之損失，尚不可勝計。而且這距抗戰只有七年，這樣的窮兵黷武，最可能為口誅筆伐的對象。

可是破口謾罵，任何人都能，也無待於歷史家。歷史家之眼光不同於常人，乃是他們不沉湎於歷史應當如何展開。首先事出非常，他們就應注意何以竟如是之展開。為甚麼幾百萬的兵大爺願意在這場合中作礮灰，內中也不可能盡是利令智昏，毫無國家觀念的將領以及各級幹部。今日我們當然無意於褒揚軍閥，贊成內戰，甚至不能武斷的說當日這中原大戰的情形完全無可避免。可是這事竟已發生，我們首先就要摒棄理想環境上的十全十美之解說，先將現實解剖得清楚。

這種戰爭，當然也表現人類的壞性格。但是並不只以中國人為然。英國內戰時反對黨把國王打敗馬上就引起在議會裏佔主要地位的長老會徒和圓頭黨軍中的獨立派火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不得意的武士就慫恿著西鄉隆盛出頭，有所謂「西南戰役」，西洋人稱之為 *Satsuma Rebellion*。中原大戰由北伐成功提議裁兵而起，首先就符合這種模式。

各位不要忘記，中國在專制時代，好像皇權無限，其實大部的威權，不過矯揉造作的儀式上之裝飾，實際是對內不設防，以無數的小自耕農作抽稅的對象，財政的收入極為微薄，各種嚴刑峻法也只能有選擇性的以殺雞儆猴子的方式執行。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消極性帶防禦性的政治體制，維持各地區的平衡，一般的遷就經濟落後地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馬上就要實施現代化的中央體制，必和地區間無數的利益集團發生衝突。同時中央所在的地區為江浙，金融經濟比較發達，更被內地落後的地區嫉視。

嚴格說來，這時候新國家還未組織就遂，忠於國家還是一種抽象的理想，另一方面中央集權抑是各地區保持他們現有的體制，倒關係各人切身利益，不僅是各人衣食之所寄託，也與他們盡忠於上官下屬與同僚袍澤共事的情誼一氣拖連。各位不要忘記美國即在南北戰爭時——距今不過一百多年——很多美國人還以為忠於各人所在之州超過於聯邦。各位也不要忘記我剛一上臺就說及中國軍隊裏的向心力並不是現代權利義務的責任感，而是傳統的社會價值，也包括忠義等觀念。

此外當日全國的識字率可能低於百分之十，農村裏剩餘的人手，不應募為兵，即落草為匪，在社會裏很少其他出路。這種種壓力，都使內戰的可能

性無從避免。

而且中原之戰在中國近代史裏也並不是全然的一個負因素。這次戰事之前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軍各自為政，再加上東北軍——他們可以和日本自辦外交，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二集團軍)則聯俄，經此一戰之後，這些現象不再發現。原來國民政府的裁軍計畫是縮編全國的軍隊為六十五個師，全國軍費不超過國家收入百分之四十。這計畫如果實現，必採取精兵主義，可是後面缺乏適當的工業支持，社會條件也不夠擔任現代化的後勤，仍然不合實際。經過這一戰之後中央集權的方針部份實現。國民政府在江浙地區的局勢鞏固，藉此也廢除釐金，實行關稅自主。東北軍入關，張學良就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可是中樞的統一政策並不能全部貫徹。南京能夠實際控制的區域仍不過黃河以南，近於北緯三十五度的地區。據寧承恩的回憶錄(《傳記文學》總331號)華北四省的工商業稅捐，包括綿紗、捲煙、麵粉、工礦、印花等雖名義上由中央統轄，實際特派員由張學良派，收入也由他運送華北收編各軍。馮玉祥經此一戰之後不再成為問鼎中原的力量，但是舊部如宋哲元、韓復榘仍有控制省區的能力，閻錫山與李宗仁也始終沒有離開原有地盤。自是蔣先生控制的約三十個師，被稱為中央軍嫡系，外圍用津貼的方式又維持若干省區部隊，更外圍的則只要他們名義上服從中央，更不計較。總兵力從北伐之前的一百四十萬人擴充到二百三十萬人。以後因「剿共」戰事又將中央的力量，推廣到西南若干省區。這種新平衡的局面，亦即是抗戰開始時的陣容。這樣歷史性的發展，一方面與過去創立朝代的情形相似。有如唐朝與宋朝的統一，都經過相當的反覆。另一方面也與抗戰的局勢銜接。長期抗戰的決策，就是利用中國的人力和敵方拖，只有這樣的陣容才能構成一個泥沼。如果堅持精兵主義，一定要和對方勢均力敵，反而只有門面，缺乏縱深。

所以蔣委員長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上層機構，不能使下端整齊劃一，有歷史上和地理上的因革在，這也就是我主張重視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由來。

#### 第四，大歷史的邏輯必與當事人的邏輯不同。

以上這種情形不出於蔣委員長的本意。所以他本人的期望將軍隊縮編為六十五個師，騎兵八旅，砲兵十六個團，工兵八團，總人數不出八十萬的計畫始終沒有實現。西安事變之前他還希望將對日戰事延遲三、五年，以期待空軍的發展能接近於對方。這種計畫也被打破，所以縱是英雄，必受時代的

限制。

我始終提倡蔣介石替中國創造一個高層機構，毛澤東翻轉社會上的低層機構。起先只有我一個人如是說，還不能十分自信。去年我從故宮博物院秦孝儀先生那邊借來一部份資料，內中節錄著蔣先生一部份日記，內中有一段，說及：「至余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爲最後之一著。」(1944年2月5日) 瞑眩瘳疾即是閉著眼睛開藥方，出自《書經》，「藥勿瞑眩，厥疾弗瘳。」亦即是說，這種病已深沉到這程度了，除開冒至大之險，採取這不符尋常分寸，不合邏輯的辦法之外，別無他法。可見得他的決策，由時勢逼成，並不是預先構成計畫，以後按著一步一步的做到。

對蔣先生極端崇拜的人講，我這樣的解釋，不可能對蔣先生的聲望減少一分一寸。去年我在中華電視臺就曾講出，1941年我在蔣先生的軍隊裏當少尉排長，手下只有三十六個兵，我常常因爲管御經理的事情晚上睡不著覺。而他蔣委員長膽敢帶著三百萬到五百萬這樣的兵，和日本作戰，一打就是八年。他的精神與氣魄，我想像都想像不上。

可是蔣先生與毛先生活動於本世紀的前半期，他們彼此的事業都已在世紀的中期達到最高峯。他們和歷史過於接近，沒有我們看得的真切。而尤其他們沒有看及身後又一、二十年多餘的縱深，所以他們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只有我們後人才可以綜合判斷。

中國在本世紀的問題實有雙重性格：一方面除非創造一部新型的海陸空軍不能救亡圖存，除非製造一套新型的財政稅收系統，以合法的姿態取得外強的承認，不能得到國外的支援。這一套工作只能從現有的資料著手，有如中原之戰，其目的不外是消除對方的抵抗，把他們收編過來，而不是澈底殲滅。即是利用保甲制度，也仍是遷就於過去社會之環境與習慣。可是另一方面若是下層機構仍是因循不改，也仍只能依人成事，永遠不能產生新生的力量。

這兩套工作，任何一套就使參加的人一生勞碌未盡，偏要同時展開，既互相支援又互相衝突，既前後連貫又互相重複。而需要兩種不同的革命理論，牽涉了相反的外交政策，發動了兩種不同的組織，終於造成了兩種大規模的羣眾運動。所以國共兩黨，團結之後又分裂，分裂之後又團結，有內在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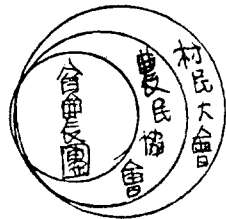
蔣先生製造新中國高層機構的情形，已由毛澤東述及。毛在1936年著《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就提及國民黨「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

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歷史時代之軍隊，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毛澤東沒有想及的，這幾句話，是他給對手蔣介石莫大的恭維。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龐大無朋的軍隊，後面當然也要有一個政府去操縱它。即使這高層機構不盡符合世界標準，也是以前之所無，所以蔣介石在歷史上的地位，有創造性質。

1987年中國共產黨也刊印了《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初版即印了五萬冊，內中說及八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二千一百萬人以上，內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傷亡指戰員六十餘萬人，敵後解放區人民羣衆傷亡六百餘萬人。」那麼其他約一千四百餘萬的傷亡數，勢必出自國軍和國軍後方的民眾了。

今日敵對的意識既不存在，歷史家即不妨將兩方活動的實況拿出來講解。中共成功之處，即是他們利用國民政府的上層機構，他們不另製造如是之機構。因之在抗戰時及內戰時整個的放棄城市文化，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因之他們可以全力去翻轉製造一個新的低層機構。據專家估計土地改革期間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命。但是新的低層機構，完全由下向上構成，爲中國歷史之所無，所以也具有創造性格。

據參加這運動的人說及土地改革期間的低層機構，最核心的組織爲貧農團，由貧農團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協會擴大而成村民大會。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經過這三層的審核，任何一層不通過即不能入黨，或者要送到特殊的訓



練處改造。雖說今日這樣的情形已逾四十年，而且即當日醞釀時即有一段矯揉造作，但是中國的傳統鄉鎮保甲的組織，一向由下級承應上級的旨意包辦，新中國的下層機構，至少已脫離傳統的疇範。即算今日的人民公社不復運行，而大陸的鄉鎮工業勃興，仍表示新的力量由下層突出，具體紮實。中共黨員五千萬人，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不識字，唯其如此，他們代表大陸羣衆的一個剖面，不容忽視。最近有些從大陸來的人隨便就說共產黨的領導權即將垮臺，我不敢輕於置信。

實施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共產主義。劉少奇說過，共產主義是人類最高的一種理想。現在看來中國農業剛有的一番整頓，工商業剛組織就遂，就想停滯社會上分工的發展，必無前途。但是大陸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之所作為，倒符合於「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的稱號，所以幾十年對外隔絕，在國境東西南北作戰，大家都吃同鍋飯，穿藍布棉襖。這期間的成就乃是存積了一段國家資本。據他們國務院一個下屬機關的統計，這期間政府向農民低價收購食糧又低價配給城市裏的居民，因之兩頭剋扣，存積的資本達人民幣六千億以上。(這一段我所說的消息來源，分別載在《放寬歷史的視界》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書內，恕我一時不能憶及。)所以大陸方面不待外援，已可著手今日的經濟改革。即稱之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的三個基本條件無從避免。此即信用展開，資金廣泛的流通。人盡其才，經理與所有權分離。技術合作，交通通信，律師業務等全般活用。這也是現下中共的設施。所以四個堅持與否，我們從歷史上所看到的邏輯，必與當事人所保持的邏輯不同。

寫歷史與寫個人傳記不同，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人身方面或為對頭，但是他們的工作在歷史上的意義卻可以前後連貫。尤其從歷史長遠的眼光看去，必定前後連貫。要不然中國在 1990 年間豈不和 1920 年間完全一模一樣或者甚至倒退回去？我曾在美國遇到一位教歷史的先進，他就說起，他高興講中國歷史，從甲骨文到人民公社都講，惟獨自鴉片戰爭到 1949 年定都北京的一段他不願講。然則這仍是一種消極的看法，他忽視了全人類最大規模的一次改革。而且在中國歷史裏留下了這麼一個大黑洞，也就不倫不類。

還有人以為大人物自己說的不算數，只有歷史家的解釋才有現在的用意，也可以算作狂妄。在消除這段疑惑時，讓我再舉一個例。以下一節也出乎一個大人物之手筆：「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惡果，在昔日反視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

寫這段文字的人，已經看清了歷史在時間上的意義。這段文字也表揚了左派人士標榜而為「唯物論辯證法」的真髓。各位能否猜出寫這文字的作者是誰？其答案則是蔣介石，這也就是《史迪威文件》裏說缺乏四年大學教育的蔣介石。這段文字出現於蔣先生 1944 年 5 月 31 日的日記。

說到這裏我的講題將近結束。我還記得一九八五年初來臺北時，就有以



至於這整個運動的長期動向，倒可以從側面客觀的條件看出，不可能是為同事問及，「你這麼講來，前因後果都由你一個人解釋得明白。那豈不是只有你的書刊？我所研究的專題為甲午中日戰爭，難道因你這樣的講說弄到沒有事做？」

這絕對不可能。我所提出的始終不過時間的一個問題。即是今昔之不同，於今逢到歷史上的一個大轉捩點，以前的資料，有了一個大綜合的機會。我所謂大歷史，與經濟學家所謂「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相近。本身即是一種粗枝大葉的綜合，又仍待微視的研究分析訂正。即使最廣泛的使用，也不過在高中和大的程度內，使讀歷史者有一個基本的輪廓。以後更詳細，更精確，更有實用價值的資料不可能因我的書刊而被歧視。宏觀經濟不能解答就業失業問題，不能分析物價指數，也不能預測消費者的心理。總之就不可能壟斷微視，更專門更深刻的研究。

並且即是一位年輕學者，完全相信我所作的宏觀論斷，也用不著在他的著作裏標明黃某人曾如是如是說。最重要的，不要忘記後面有一個天翻地覆的局面。即是1949年至1950年間，大陸來的人口，遷移到臺灣的超過二百萬，這也是洪荒之所未有，所以我們已經剛渡過一段像魏晉南北朝那樣分離顛簸的局面，面臨隋唐之交重新創造新局面的良機。這是研究歷史的人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不要錯過這機緣，把個人的局部的偶然的不如意事過度發揮，見小失大。這也是我不揣冒昧以「大歷史」標揚的用意。謝謝各位。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即將出版

### (2) 林銜道先生訪問紀錄

陳三井、許雪姬 訪問 楊明哲 紀錄

板橋林家為臺灣第一大家族，並以其鉅富，而使「臺灣林」聞名中外。林銜道先生，即板橋林家族人，生於民國4年（1915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經濟系，光復後先後擔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員及省文獻會委員，並在文獻會主委任內退休。學識闊博，鑽研臺灣古蹟及文獻數十年如一日，曾任教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目前仍在每年冬夏令舉行的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中授課。對臺灣史研究具開創之功，貢獻極大。



## 學人簡介

# 何 炳 棣

馬 泰 來\*

1966年7月，何炳棣教授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何先生通古今之變，其成就不單為國人同行所共仰，在國際學界上也擁有極崇高的地位。例如：何先生在1975~76年任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會長，這是第一位亞裔被選任美國最大的亞洲研究學會的會長，也是迄今唯一的華人會長。1979年，何先生又被選為美國文理學院院士（Fellow,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在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華人院士極少，除何先生外，僅貝聿明、張光直、杜維明等數人而已。

何炳棣先生，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南開中學肄業，1934年考進清華大學，本來準備讀化學，入學後不久即改讀歷史，1938年畢業。當時清華大學歷史系人材濟濟，系主任為蔣廷黻先生，教授有陳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劉崇鋳先生等。蔣先生認為治史者必須有良好的社會科學基礎，鼓勵學生修讀經濟學和政治學課程。他又主張先讀西洋史，學習西方史學的方法和觀點，然後再分析和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問題。高瞻遠矚，不求近利。對於中國歷史，則考證與綜合並重。何先生深受影響，日後研治歷史，即沿此途徑。

清華大學畢業後，何先生即隨校往昆明，任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六屆中美庚款獎學金；1945年赴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英國及西歐史。1952年以有關十九世紀英國土地問題、土地改革運動和土地政策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香港中文大學、勞倫斯大學，及丹尼森大學皆曾先後授予何先生榮譽法學和人文科學博士學位。）

\*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

1948年，何先生應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聘，任教歷史系，計十五年。1963年，轉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授中國歷史及制度課程；1965年出任湯普遜歷史講座教授（James Westfall Thompson Professor of History）（湯普遜〔1869~1941〕為芝加哥大學名教授，治歐洲中古史，雷海宗先生在美留學時導師。而何先生又嘗為雷先生高弟。誠史學界佳話。）1987年，自芝加哥大學榮休，計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十四年。往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任歷史及社會科學傑出訪問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但仍治學不倦，立志多以中文寫撰，研討一系列對當前仍有現實意義的較大歷史課題，以求加深瞭解目前中國主要癥結的歷史根源，及其解救之道。何先生在加、美大學任教四十餘年，可謂桃李滿門，而私淑者更不可勝數。

何先生著作等身，與一般專攻中國歷史的學人和漢學家不同，他有不少重要論文是在歐美第一流社科專業學報發表的，影響深遠，不局限於研治中國歷史者。如：何先生研究中國農作物的三篇開創性論文，〈新大陸農作物傳華考〉、〈新大陸農作物在華傳播史略〉，和〈中國歷史上的‘早熟稻’〉，分刊《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植物學會）《植物科學彙報》和英國劍橋大學編印的《經濟史學報》（原文見著作要目）。有關明清兩代中國社會階層間流動的研究的初步成果，刊《社會與歷史的比較研究》。〈黃土與中國農業起源〉刊《美國歷史學報》。

何先生治學，以宏博見稱，研究大題目，解決大問題，認為學者不應花費精力在第二流的題目上，而對其學生選擇論文題目尤為嚴格。何先生的幾部專著，研究的都是中國歷史、甚至是世界歷史上的重要課題。（他在班上曾說明《中國會館史論》本係楊聯陞教授邀請為《清華學報》所撰，其文太長，後改印為專刊。這是例外。）

研究大問題，假如資料掌握不足，則易流於空泛。所以何先生極重視論證的積聚，不依賴孤文寡證。為了研究明清社會，何先生翻閱大量方志，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錄。花了數個夏天把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藏書有關部份都翻遍了。何先生不標榜珍罕史料，但由於見聞廣泛，每能發現新史料，並據以提出精確新見。如他在1954年發表的〈揚州鹽商〉（這是何先生在完成英國史方面的博士論文之後，撰寫的第一篇中國經濟史、社會史論文），引用罕見的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估計鹽商集團的利潤和財富，進而探討何以資金利潤如此龐大而竟不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原因。（如家

族分產及儒家以家族為中心的倫理觀；更重要的是「富不與官爭」，社會最終權力在官位而不在財富，致鹽商子弟之聰慧者無不讀書應舉，而不以繼承父業為念。）這是研究明清商人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分析透徹，引用史料宏富，時人有關著作莫不深受其影響。

由於他史識豐富，故每能獨具隻眼，沙裏瀝金，從明清筆記（如謝肇淛的《五雜俎》），以至長篇說部（如《醒世姻緣傳》），發掘例案，解說問題。更重要的是他能在一般人所習見史料，見人所未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何先生對史志所載「丁」和「畝」的解釋：二者都是賦稅單位，而不是實際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何先生常稱他受英史嚴格專業訓練，一生得益不少。他對「丁」「畝」的解釋，在國史而言，是創新之見，而實受西方史家如梅特蘭〔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1850-1906〕對英國中古土地圖冊及賦役制度研究的啟發。）

何先生治學興趣甚廣。早年在清華大學，發表論文皆有關清季洋務、外交。五、六十年代，自英史重返國史，所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及《明清社會史論，1368~1911》二書，以大量中文史料為基礎，運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包括統計學）加以分析，創見殊多，影響深遠，為學界所公認中國社會史的經典著作。但何先生並不固步自封，自明清社會而上溯中華文明的起源。

何先生的研治中國上古史，亦是從基礎功夫作起，先設法掌握現代考古學和它所應用的一些科學知識（如：地質、土壤、古生物、古氣候、植物孢粉分析等），然後再與大量考古資料和古代文獻相互印證。更重要的是何先生並不閉門造車，在研究上如遇上其他學科專業問題，即不恥下問向該學科的權威學者請教。芝加哥大學的古代近東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是研究古代近東的重鎮，何先生得從其諸大師切磋，進而認識的第一流學者，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農作物起源權威哈蘭教授（Jack R. Harlan）等。所以每能採用各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綜合新見，如：華北黃土區古代自然環境（半乾旱草原）及其原始耕作方法（休耕期短暫，輪耕周期不超過三年；而不是游耕制）；並從彩陶、青銅、語言、文字、社會、宗教、政制等多方面確證中華文明是獨立自發，並非源自近東兩河流域。

何先生目前正準備撰寫一極廣義的學術性自傳，包括對一些師友的回憶。金針度人，後學必獲益不淺。謹望能早日問世。

1993年2月

---

 何炳棣先生著作要目
 

---

## 一、中文專著

1. 《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
2. 《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
3. 《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 二、中文論文

1. 〈英國與門戶開放政策之起源〉，（燕京大學）《史學年報》，2卷5期，1938年。
2. 〈張蔭桓事蹟〉，《清華學報》，13卷1期，1940年3月。
3.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册，臺北，1965年。
4. 〈周初年代評議〉，《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卷，1973年。
5.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册，1978年。
6. 〈南宋至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3期。
7. 〈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詁互證示例〉，《歷史地理》，10輯。
8. 〈「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二十一世紀》，8期，1991年10月。
9. 〈答劉述先教授——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二十一世紀》，10期，1992年4月。
10. 〈原禮〉，《二十一世紀》，11期，1992年6月。
11. 〈答孫國棟教授「克己復禮」爭論平議〉，《二十一世紀》，13期，1992年10月。

## 三、英文專著

1.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nd printing, 1967) 義文譯本 *La Cina: Lo sviluppo demografico, 1368-1953*.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1972. 中文譯本《1368-1953 中國人口研究》，葛劍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日文譯本由斯波義信教授主持，尚待完成。
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nd printing, 1967; 3rd printing, 1976) 義文譯本 *La Cina: II sistema*

- sociale, 1368-1911*.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1974. 日文譯本《科舉と近世中國社會：立身、出世の階梯》，寺田隆信、千種眞一譯，東京：平凡社，1993。
3. Ed. *China in Crisis*, Vol. 1: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in 2 volu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2nd printing, 1970)
  4.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 C.*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四、英文論文

1. "Weng T'ung-ho and the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X, No. 1, February 1951.
2.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VII, No. 1-2, June 1954.
3.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LVII, No. 2, Part 1, April 1955.
4. "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 *Plant Science Bulletin* (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II, No. 1, January 1956.
5. "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IX, December 1956.
6.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368-1911,"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I, No. 4, June 1959.
7.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368-1911," *Proceedings of the 1959 Annua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8.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With Vernon K. Dibb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III, No. 3, April 1961.
9. "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XXXIV, No. 3, Fall 1961.
10. "Records of China's Grand Historian, Som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XXXVI, No. 2, Summer 1963.
11.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Bureaucracy in Ming-Ch'ing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XX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Vol. V, Moscow, 1963.

12. "Lo-yang, A. D. 495-534: 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XVI, 1965-66.
13. "An Historian's View of the Chinese Family System," in *Man and Civilization: The Family's Search for Survival*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Medical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San Francisco), New York, 1965.
14.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 [Landsmannschaften] in Upper and Central Yangtze Provinces—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 V, No. 2, December 1966.
1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VI, No. 2, February 1967.
16. "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VI, No. 1, October 1969.
17. "An Estimat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Sung-Chin China," *Etudes Song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 Leiden, 1970.
18.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Its Longevity" (the AAS Presidential Addres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V, No. 4, August 1976.
19.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Chinese Agriculture," in Charles A. Reed, e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77.
20. "The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 China—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V, No. 4, August 1984.

---

本刊「學人簡介」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具有重大貢獻之中外學者。內容除了介紹其學術生涯外，更希望能對其學術上的成就多所著墨。來稿請依本刊格式撰寫，並附傳主之著作目錄。若能附寄照片，尤表歡迎。來稿請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

# 入江昭 (Akira Iriye)

楊 大 慶\*

## 一、學術生涯

1988年11月，擁有一萬三千名會員的美國歷史學會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希爾頓飯店召開年會。當時以該會主席身份向大會發表題為「歷史的國際化」演說的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 (Stein-Frei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入江昭先生。他是美國歷史學會成立百餘年來第一位享此殊榮的亞裔學者，更是全球知名的國際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 專家。

入江先生於1934年生於日本東京。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千萬日本軍民因戰敗而痛哭失聲，年僅十一歲的入江卻因戰爭結束而有如釋重負的感覺。1953年入江自東京成蹊高等學校畢業後，考取以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 (Joseph C. Grew) 命名的獎學金，隨即東渡太平洋，負笈美國賓州哈瓦福德學院 (Haverford)，主修英國歷史。1957年獲學士學位，畢業論文題目為 “The Anglican Cler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正是美國學術界開始對美國東亞政策進行反思。哈佛大學於1956年成立了包括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在內的美國遠東政策研究會 (American-Far East Policy Studies)。翌年二十三歲的入江昭被選為該會首屆研究生，入哈佛歷史系深造，隨費正清、奧斯卡·韓德林 (Oscar Handlin) 及歐內斯特·梅 (Ernest May) 等學者研究美國與東亞歷史。四年之後以 “American Diplomacy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 1926-1931” 論文，獲博士學位。

一九六〇年代初，入江先生在哈佛歷史系擔任講師，1966年前往加州

---

\*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大學新設之 Santa Cruz 分校任教，不久轉往紐約州的羅契斯特 (Rochester) 大學任教。其後接受著名的芝加哥大學聘請，任歷史系教授。入江先生任教芝加哥大學長達二十年，曾擔任歷史系系主任及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另先後應邀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夏威夷大學，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講學。入江先生榮獲多種研究獎金，其中包括著名的 Guggenheim Fellowship。1978 年入江先生出任美國外交史協會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主席，更於 1982 年當選美國文理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士。1989 年入江先生重回母校哈佛執教，現為查爾斯·華倫 (Charles Warren) 美國史講座教授，並兼任賴世和日本研究所 (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主任。

## 二、國際史研究

十九世紀的歐洲，隨著民族主義的興盛，以研究一國當政者如何處理對外關係為中心的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成為史學研究的顯學。雖然當時德國的蘭克學派 (Ranke School) 即以檔案研究著稱，但基於多國檔案文獻的國際史 (又稱為國際關係史) 研究，卻在近幾十年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入江先生成名之作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不僅廣泛參閱美、英、日、中等國外交檔案文獻，更補以法、德、俄文資料。此書成為多國檔案研究的典範，也奠定入江先生在美國與東亞關係史研究領域的學術領導地位。入江先生在此書中運用國際關係系統理論，著眼於影響各國對外政策且不斷變化的國際框架，對一九二〇年代遠東國際關係進行大膽新穎的探討，指出美國、蘇俄、中國、日本先後發起外交攻勢，最終導致華盛頓條約體制 (Washington Treaty System) 的解體。

傳統的外交史研究被諺稱為僅是將外交官對話記錄拼湊而成，到六十年代這種研究取向已日趨式微。而以入江先生為代表的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徵，則在於不侷限於對少數政府官員或外交決策者分析，另外還將作家、學人、記者，以及其他知識分子也納入討論。1972 年出版的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一書中，入江先生不僅利用美、日等國的政府檔案，更深入分析大量的報紙、雜誌，

及通俗出版品，從而對世紀之交美、日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獲得全面認識，進而提出兩者互為因果這一新穎論點。入江先生所採行的研究取向，就是將外交史研究提昇到研究對象、方法，及材料均更為廣泛的國際史。

入江先生對於國際史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大概在於將「文化」這一主題，引進了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是故曾有學者建議成立一所以「入江昭」為名的「文化國際關係研究所」。入江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就提出了現已獲得多數歷史學者接受的論點：「國際關係不只是力量 (power) 間的關係，亦是文化 (culture) 間的關係。」這意味著歷史學家必須把外交決策者和普通公民都看成為各國文化的產物，在研究外交事物時，重視他們的記憶 (memory)、感情 (emotion)、偏見 (prejudice)，和思想 (idea)，因為對於別國他方的印象 (image) 在國際關係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早在研究生時代，入江先生就發表過關於明治維新後二十年間，美國出版品如何描述日本的論文。1967年所出版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的這本膾炙人口著作中，入江先生敘述了近百年來美國、中國、日本三國決策者和知識階層如何認識對方，進而如何看待世界及共同的問題。費正清為此書撰寫長序，稱讚作者取材廣泛，立論公允，為他人所不及。七十年代中入江先生主編一本由美、日學者共同執筆的論文集，專門研究美國和日本的相互印象。1981年獲得普立茲獎提名的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一書，在力量和文化兩個不同層次上，探討美日太平洋戰爭的意義，體現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入江先生認為，雖然美國和日本在戰場上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但至少在1943年以後，兩個決策者在意識型態上，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已逐漸立場接近，並有眾多相通之處。雖然不少學者對相通的程度持不同意見，但這種過去歷史學家所忽略的相通性，現已受到普遍重視。

入江先生眾多著述中，他力圖擺脫單國歷史的狹隘框架，堅持從多國視角研究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他和導師費正清一樣，堅信歷史不只是為一國讀者而寫，而是要為全人類所能接受。他雖然研究國際間的偏見與衝突，但更重視各民族、各國間的共通性，以及為促進國際相互瞭解所作的努力，因為這是減少誤解、杜絕國際衝突的希望所在。入江先生目前的研究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間文化交流」，也正體現他這一孜孜不倦的追求。

### 三、有關近代中國史的研究

入江先生不僅以對美亞關係、日本外交的研究享譽學術界，他在中國對外關係史方面，也深有造詣。他對中國問題的興趣，主要來自家庭環境的影響。其父入江啟四郎先生早年擔任日本同盟通訊社記者，駐華多年，熟諳漢語，曾著有如何閱讀中國報紙以瞭解政治、社會的入門書，以及英俄在華爭奪利權、外國人在華地位等多本學術著作。戰後入江啟四郎先生入大學任教，繼續從事中國外交的研究。入江昭先生本人就讀哈佛大學研究所時，雖已能閱讀中文資料，然口語會話尚不能運用自如。1960年其導師費正清曾資助他四百美元赴臺灣進修漢語，據入江先生回憶，此時新婚燕爾，大部分時間是和夫人光子度過，因此學習成效不大。四年之後再獲費正清鼓勵，單身一人來到臺北，一面利用中研院近史所所藏外交檔案充實博士論文，一面為以後的研究打下漢語會話的基礎。

入江先生對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晚清公眾輿論與外交政策都有研究，但尤以對近代中日關係研究，為西方學界所稱道。他除發表多篇相關學術論文外，另曾於1980年主編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為題的論文集，此書在西方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入江先生更應邀為西方中國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劍橋中國史》撰寫一章，專門敘述九一八事變前數十年，日本對華侵略及中國國際地位。去年哈佛大學出版入江先生的新著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是由多篇演講稿匯輯而成，不過此書透過軍力、文化、經濟三個層面，分析明治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間，和戰後的中日關係，顯然是將中日關係史研究和國際史理論熔於一爐。該書大膽論證，引人深思，被稱為是關於近代中日關係史最佳單本著作。

### 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哈佛大學，入江先生講授「美國與東亞關係史」、「一九三〇年代國際關係」，主持「國際史專題討論」，另與其他教授合開「國際關係史」、「美國對外關係史」等課程。每至期末，入江先生邀請研究生到家中小聚，品嚐夫人光子精心烤製的糕點，在融洽氣氛中交流學習心得，此項聚會，已

成爲一項傳統。

入江先生治學嚴謹，勤奮博聞，碩果累累；然待人謙和，毫不自誇。其誠懇虛心態度，令同事與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入江先生以中國一句古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其實這句話也正是入江先生本人的寫照。

入江先生從事研究多年，著作等身，發表之單篇論文甚多，書評更是不計其數，一時之間難以蒐集齊全。現將其英文和日文專書，及部分英文論文羅列於後，謹供學界參考。

---

### 入江昭先生著作目錄

---

#### 一、專 書

1.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7)
3. *Pacific Estrangement: American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The Cold War in Asia*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5.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 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6.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Dutch translation (1989), Japanese translation (1991)
8.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二、編 著

1.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Encounter at Shimoda: Search for A New Pacific Partnership*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edited with Herbert Passin.

4. *Foreign Employe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edited with Edward R. Beauchamp.
5.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edited with Yonosuke Negai.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edited with Warren I. Cohen.
7. *America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 1931-1945*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0) edited with Warren Cohen.
8.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edited with Warren Cohen.

### 三、論文

1. "Chang Hsueh-liang and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1 (1960), pp. 33-43.
2.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Japan in American Writing (1853-1883)," *Papers on Japan* 1 (June 1961), pp. 1-14.
3.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Aggression: Re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3
4. "Far Eastern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in Dorothy Borg, ed.,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5. "The Ideolog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Grant Goodman, ed., *Japanese Imperialism Reassesse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6.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Late Ch'ing China," in Mary Wright, et al.,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7. (in Japanese) "Peaceful Expansionism in Japan," in *Chuokoron*, 1969
8. "Imperialism in East Asia,"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0), pp. 122-150.
9. "Kayahara Kazan and Japanese Cosmopolitanism," in Donald Shiveley, et al., eds., *Biography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10.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Expansion, 1918-1931," in Bernard Silberman & Harry Harootunian ed., *Japan in Crisis: Essays on Taisho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37-269.

11. "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 in James Morley, ed., *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2. "The 1920's," in Ernest May, et al., eds.,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Dorothy Borg, et al.,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4. "Imperialism and Sincerit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73
15. "Japa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mes Morley, ed.,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6.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Expansionism," in Bernard Silberman, et al., eds., *Japan in Cri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17.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ism," in Robert Bauer, e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75
18.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Asian-Pacific Power," in Gene Hsiao, ed., *Sino-American Detente and Its Implications*, Praeger, 1975
19. "Japan as a Competitor," in Akira Iriye, ed., *Mutual Imag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0. "Introduction," in Norris Hundley, ed., *Asian Americans*, ABC-Clío Press, 1975
21. "Robinson and Gallagher in the Far East," in Roger Louis, ed., *Imperialism*, New Viewpoints, 1976
22. (with Neil Harris)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Japan: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in Kaplan and Muchako, eds., *Japan, America,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3. "Expectations and Developing Attitudes in the Pacific," in Gordon and Rothwell, ed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cific*, Ballinger, 1976
24. "Continuities in US-Japanese Relations, 1941-1949," in Akira Iriye and Y. Nagai, 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25. "Was There a Cold War in Asia?" in John Chay, ed.,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1977
26.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William J. Barnds,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 "Origins of the Sino-American Cold War," in John K. Fairbank, ed., *Our China Prospect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7
28.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n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cribner's, 1978
29.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J. Miller, ed., *The World of Asia*, Forum Press, 1979
3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2 (Spring 1979), pp. 115-128.
31. (in Japanese) "Culture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huokoron*, 1979
32.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1979
33. "The Making of a Realpolitik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0
34.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4-274.
35. "Western Perceptions and Asian Realities," *Harmon Memorial Lectures in Military History* 23 (1981).
36.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Martin E. Weinstein,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fter Vietn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37.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Asian Security," in Chai-Jin Lee, ed., *Security Policies in East Asia: Four Essay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2
38. (in Japanese) "From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to the Japanese-American Alliance," in C. Hosoya, et al., eds., *A History of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Yuhikaku, 1982
39.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after 1953," in Richard Burns, ed.,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BC-Clío, 1983
40.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ast Asia," in Warren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41. "Contemporary History as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June 1984
42.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1985

43. "War as Peace, Peace as War," in Akira Iriye, et al., eds., *Experienc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5
44. "The Asian Factor," in Gordon Martel,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 Allen and Unwin, 1986
45.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1 (1987).
46.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Occupi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8
4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8
48. "Reischauer, Fairbank,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1988
49. "Japan's Drive to Great Power Status," for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1989
5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1 (1989).
51. "Japan's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an 1991)
52.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7. 1 (June 1990)
53. "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1945-1990," *The China Quarterly* 124 (December 1990).
54.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7, pp. 178-179.
55. "The Ideolog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mperial Japan and China."
56. "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John K. Fairbank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 四、日文專著

1. 《米中關係のイメージ》，日本國際關係研究所，1965。
2. 《日本の外交》，中央公論社，1966。
3. 《日米戰爭》，中央公論社，1978。
4. 《二十世紀の戰爭と平和》，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
5. 《新日本外交》，中央公論社，1991。
6. 《日米關係五十年》，岩波書店，1991。
7. 入江昭、有賀貞編，《戰爭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

#### 五、日文論文

- i. 〈近代日本外交の遺産〉，《中央公論》，第 80 卷 1 號（1965 年 1 月）。



2.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仏教布教問題——清末日中関係の一断面〉，《國際政治》，第 64 卷 2 號 (1965 年 4 月)。
3. 〈日米敵對意識の源泉〉，《國際政治》，34 號 (1967 年 10 月)。
4. 〈日米外交史家の見た 1930 年代——河口湖セミナーについての報告〉，《國際問題》，115 號 (1969 年 10 月)。
5. 〈日中関係と英米の「見たさる」協調〉，《國際政治》，第 47 號 (1972 年 12 月)。
6. 〈日米関係の源流〉，《中央公論》，第 90 卷 6 號 (1975 年 6 月)。
7. 〈第二次世界大戦史の問題點〉，《國際問題》，第 216 號 (1978 年 3 月)。
8. 〈歴史としての現代史——戦後アメリカ外交史研究の諸問題〉，《UP》，144 號 (1984 年 10 月)；145 號 (1984 年 11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論文集

- |                         |                 |
|-------------------------|-----------------|
| ①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 精 500元 平 450元   |
| ②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精 700元 平 600元   |
| ③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400元 平 1200元 |
| ④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300元 平 1100元 |
| ⑤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400元 平 1200元 |
| ⑥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400元 平 1200元 |
| ⑦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500元 平 1300元 |
| ⑧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精 1500元 平 1300元 |
| ⑨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 精 1100元 平 1000元 |
| ⑩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 精 1200元 平 1100元 |
| ⑪ 近代中國科技史論文集            | 精 450元 平 400元   |
| ⑫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二冊)   | 精 1600元 平 14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研究概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研究計劃

(民國81年3月—82年2月)

江 淑 玲\* 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涵蓋明末清初到現在約四百年間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各方面的變遷。為便利研究工作之推展，近史所自民國77年2月起，分為四個研究組：一般近代史組、政治外交史組、社會經濟史組、文化思想史組。

目前近史所進行之研究計劃，計分兩大部分：(一)為各研究組之學年度研究計劃；(二)為由其他機關補助之專案研究計劃。

### 一、各研究組之研究計劃

1. 一般近代史組：主要以綜合分析方法，研究明清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之相互關係。進行之專題有：現代化區域研究：包括雲貴、山東、山西等地區；抗戰時期的臺灣華僑；清代臺灣的勇營；日據時期臺灣的保甲制度；中共黨史；臺灣企業集團等十二個專題。

2. 政治外交史組：以近代中國政治史、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與此關係密切之近代中國軍事史及法制史亦包含在內。進行之專題有：政治人物；海外華人；教案研究；國軍發展；中韓、中日、中英、中法、中美關係等二十一個專題。

3. 社會經濟史組：以近代中國之工業、農業、財政貿易、交通、水利等為主要領域，與此有關之人口、華僑、宗教、人民生活、經濟思想等亦包括在內。進行之專題有：上海電業、上海商人、上海服飾；日據時期臺灣新興財團；日據時期往來兩岸之臺灣商人；日據時期臺灣的女性醫護人員；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代臺灣畝產量；明清時代的商人與商業組織；清代皇族的社會階層與人口行為；十九世紀中國的經濟思想等十三個專題。

4.文化思想史組：以近代中國思想、學術、教育、科技史為研究領域。進行之專題有：民初學術發展；近代人物思想；民初科技社羣與專業社會形成；明清時期的育嬰文化；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社會輿論等十九個專題。

## 二、其他機構補助之專案研究計劃

進行之專案計劃，補助機構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教育基金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等，計劃分述如下：

### 1.清代皇族的社會階層與人口行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賴惠敏

計劃執行期：民國81、3、1～82、8、31

計劃內容：清代宗人府小玉牒是一份記載皇族人口的資料，不但登記詳細且數量龐大，是研究清代上層社會的基本資料。本計劃將利用各種版本的玉牒，經核對後，全部輸入電腦，在人口資料都儲存完畢後，進行統計分析，得到各種婚姻、生育、死亡的人口數量與比例，然後比對皇室人口的官品爵位，檢視人口增殖與社會地位的相關程度。為了更明確的證實經濟條件對人口的影響，也搜集官方檔案所記載王公貴族的莊園數量、俸餉冊等，瞭解各等級的爵位和職位的實際收入。由探討皇室人口的經濟來源，可同時用以判斷經濟對人口行為的影響力。

### 2.抗戰時期的陸軍大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張瑞德

計劃執行期：民國81、9、1～82、8、31

計劃內容：陸軍大學成立於光緒 32 年，為培養高級指揮官與高級幕僚人員的最高軍事學府，辛亥革命以後，北京政府繼續辦理。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接管陸軍大學，將其隸屬於軍令部，招考國軍各單位的優秀幹部入學。戰時陸軍大學，設有正規班、特別班、將官班、參謀補習班、外文班等，並設有兵學研究院培植師資。至抗戰勝利時，陸大畢業生在軍中雖僅有 2,000 餘人，但多已擔任要職。對此一重要機構，學界迄無專門性研究，本計劃擬根據陸大原始檔案及其他檔案史料，對陸大於抗戰期間發展史實，作一全面探討。

3. 臺南幫企業集團的形成與發展：第二階段，1960~1990（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謝國興

計劃執行期：民國 81. 11. 1~82. 10. 30

計劃內容：本計劃係一後續性計劃，前此已完成「臺南幫企業集團的形成：第一階段，1920~1950」計劃，其研究範圍僅止於 1950 年代末期，亦即臺南幫企業集團「形成」的歷史淵源與由商而工的第一階段面貌。此執行中之計劃則著重於 1960 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與變化，臺南幫之「發展」亦呈現複雜多端之現象，除繼續涉入多角化經營的製造業外，亦參與社會公益、文教事業，以及跨入服務業與金融業。因此藉其近三十年來之發展的追蹤考察，期使「臺南幫」的個案研究得一完整面貌與整體性分析，為瞭解光復後臺灣歷史提供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視角。

4. 北伐時期學生運動研究，1920~1927（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呂芳上

計劃執行期：民國 81. 12. 1~82. 11. 30

計劃內容：民國史上，包含學生運動在內的羣眾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是五四之後的北伐時期（1920~1927）。此項計劃係以這一階段的學生運動作主題。利用新近開放的原始檔案作為基礎，觀察由「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的發展過程。北伐時期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不同的政治黨派都介入了羣眾運動。此研究將特別注意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在學生界的競爭；研究計劃的成果，不只可以了解學生與政治複雜關係的初期發展，同時也可補足民國史上學生運動研究的空白。

5. 日據時期往來兩岸的臺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林滿紅

計劃執行期：民國 81. 12. 16~82. 12. 15

計劃內容：本計劃擬就臺灣可參用之文獻與口述資料對上一計劃「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的商貿關係」再作補充。特別著重：1937 年至 1945 年期間之發展，亦將觸及日據一段發展及光復以後發展之關連，以及日據時期的臺商與不同時段內的日本政府及當時中國不同政權間的關係。這個研究除可指出光復以後臺灣的工商階層崛起之背景之外，在此海峽兩岸經貿關係急遽變化的時刻，回顧兩岸經貿關係在歷史時期的發展，可供古今對照思考。了解兩岸商貿關係在日本佔領臺灣時期所發生的變化，也有助於了解環太平洋地

區歷史時期區內之貿易關係。

6.近代中國的法治與監獄：刑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胡國台

國外合作機構：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國外協同主持人：Dr. Michael Dutton

計劃執行期：民國 79. 7. 1~82. 6. 30

計劃內容：本計劃的目的在探究近代中國刑罰之運用與政府控制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就政府維持社會秩序所使用的控制手段，做一整體系列的研究。提出控制與刑罰為主題的目的，在於探究下列問題：(1)近代中國中，「國家」的性質是什麼？(2)傳統社會中，最有活力的層面是什麼？(3)傳統「控制」的技巧是什麼？那些是政府用以監督及控制人民所使用的手段？本研究計劃係以三年時間，從事收集資料，分析、整理史料，以及撰述等三個階段。

7.傳統中國兒童健康與醫療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熊秉真

國外合作機構：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國外協同主持人：Lawrence Gartner M. D.

Arthur F. Kohrman M. D.

計劃執行期：民國 80. 10. 15~82. 10. 14

計劃內容：此計劃係以兩年為期，期對傳統中國嬰幼兒的健康實況，作一全盤了解，並澄清當時的醫療環境和保健狀況的一些重要問題。計劃之第一年，將以新生兒 (Newborn) 和嬰兒 (Infant) 的健康與保健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比較醫學界作更多的介紹，並將已知而未盡了解的若干有關中西嬰兒健康與醫療演變的問題，作更深入而詳細的分析。計劃之第二年，將以幼兒健康 (年齡一~七歲) 為重心所在，以傳統西方兒童健康與醫療之發展，實際凸顯中國健康文化與醫療制度之特質與長短所在。

8.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張存武

國外合作機構：菲律賓國家歷史館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國外協同主持人：奎松 (Dr. Serafin D Quiason)

洪玉華

吳文煥

計劃執行期：民國 79. 7. 1~82. 6. 30

計劃內容：（見本刊 14 期）

9.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王樹槐

國外合作機構：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國外協同主持人：Susan Mann

成露西

鮑家麟

計劃執行期：民國 81. 7. 1~83. 6. 30

計劃內容：（見本刊 14 期）

10. 《最近一百五十年中國史》撰寫計劃（中華教育基金會補助）

計劃主持人：劉廣京、張玉法、陳永發

計劃執行期：民國 81. 8. 1~83. 7. 31

計劃內容：本計劃為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先生「編著一部《中國近代史》芻議」之反響。全書將分上、中、下三冊。上册：晚清篇（由劉廣京先生主筆），本冊以十九世紀初葉之制度與文化為基礎，首先提供關於中國歷史傳統之簡要論述，接著論鴉片戰爭以後之外禍與內亂、通商口岸之發展、變法自強運動之起伏、西洋科學之初步認識、辛亥革命之起因與後果。中冊：民國篇（由張玉法先生主筆），本冊自辛亥革命開始，討論民國初年之政治、經濟與文化；進而論軍閥時代內憂外患之互為因果，及五四時代崇尚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之重要意義。接著再討論國民革命軍北伐之經過，及抗戰前十年現代化之成績，包括現代教育之擴展，及政府遷臺以後，臺灣政治、經濟、學術、教育之發展。下冊：中共篇（由陳永發先生主筆），本冊第一部分為中共建黨以至於延安時代之歷史，包括抗戰期間，中共各邊區政府軍政情形及一九四七年前後內戰之歷史，以及全國經濟所受



# 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與東亞的新型文化

James L. Watson\* 報導・林滿紅譯述

## 一、人事異動

1.主任 中心前任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已於 1992 年 7 月 1 日在六年任滿之後卸任，目前正以七年一度之年假專心撰寫其名著——《中國文化革命之起源》第三冊。在此年假過後，他將返校任教。

新任中心主任 James L. Watson，乃一從事實地調查之人類學者。過去二十五年中有很多時間住在廣東省的鄉村進行田野調查工作，雖亦能略操國語，但較擅長粵語。他偏好中國的鄉村文化，著作範圍包括家庭組織、親族關係、祖先崇拜、宗教與文化象徵、農業技術，及工業化對傳統生活方式之影響等方面。在哈佛，他每年都開的課程是：「中國的家庭、婚姻與親族關係」（通識課程）及「中國飲食習慣的社會人類學分析」（大學部）。這些課程均與他和夫人 Rubie Watson（哈佛 Peabody 博物館比較民族學室副主任）長年在中國鄉村進行的調查有關。他們曾在珠江三角洲、新界、江蘇、臺灣做過田野工作。目前他們也在著手調查香港華僑的江西祖墳。

2.副主任 在中心極力爭取之下，原任教學中心（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副主任之 Robert E. Murowchick 由 7 月 1 日起任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於 1978 年獲耶魯大學考古學學士學位，1980 年獲哈佛東亞區域研究所碩士。之後，曾至武漢醫學院教兩年英文。其研究興趣在探討古代中國南部與東南亞的關係，尤其著重青銅器製造技術及其社會、儀式含意。他目前正在進行一個殷商考古遺址之空中鳥瞰圖及衛星探測圖之電腦圖像分析。

## 二、研究計畫

東亞地區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變化很快。在太平洋盆地區，

---

\*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正有一種「新型的」中國文化在孕育著。這種文化可稱為後工業化、後現代、後社會主義文化，就其跨越國界而言，更可以說是後民族主義文化。這種變遷在臺北、香港、新加坡、洛杉磯特別明顯。甚而麻州的劍橋也受波及。在香港、臺灣的直接影響之下，這套新文化體系在廣東、福建正開始出現。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將會密切注意這樣一個發展。

過去幾十年中，哈佛在國際關係、政治精英的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心將更加拓展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一般人民的經濟、社會生活研究。

中心最近展開的研究包括：(1)鄧小平走向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以及中央政府計畫經濟的式微；(2)深受西方速食文化影響的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其飲食型態的轉變；(3)中國大陸城市中新近出現的股市及財產移轉市場；(4)1992年9月22日成立「臺灣研究小組」，以探討近代臺灣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

此外，中心依舊將維持多種學術研討會，並將召開許多學術會議。中心依然每週五有一次研討會，每個月也召開英格蘭地區的中國研討會、前近代中國研討會、東南亞研討會，及新英格蘭東亞藝術史研討會。1992年8月，中心繼1990年開的「回教徒在中國」會議之後，召開了「在中國的猶太社區」會議，一共有兩百人參加，過後將有會議之錄影帶發行。1993年9月，中心將在 Luce 基金補助之下召開「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傷痕與政治疏離」會議。如果經費許可，中心希望一年至少開一次國際會議及幾個小型的研討會。

### 三、出版計畫

目前中心正擬提升自己印刷、製圖的桌上排版系統電腦設備。由於副主任在教學中心已頗有這方面的經驗，目前發展尚稱順利。

不久的將來，中心將可以自印論文初稿、會議論文集、書目、工具書、年度報告與通訊。

### 四、通訊

稱為 *Fairbank Center Newsletter* 的通訊將由1992年取得哈佛東亞區域研究所碩士的 Dawn Odell 編輯。有意受贈此通訊之中心相關學者或行政機構主管、捐助人，請將姓名地址交給 Odell 編輯。

# 香港的明清史學者及其研究動向

李 金 強\*

明清史學術性研究始於民國時期新舊史學交替演進中。其時由於政治上清末革命黨人之反滿，以及三〇年代抗日之影響，故明清遺民種族思想、南明抗清史事以至滿洲先世及明代倭寇均為史家首先關注之課題，著述均流露強烈民族主義之特質。<sup>①</sup>其次，學術上一因西方寫史以章節分題之新體例，經日本東洋史學者師承撰述示例，別開史界新天地，如稻葉岩吉之《清朝全史》（但燾譯，1914，上海中華），刺激我國史家學效新體例撰寫明清史之志趣；<sup>②</sup>二因明清檔案之發現與刊布，明實錄校刊及清史纂修遂促成明清史研究之起興，民國以來明清史家人才輩出。當中以孟森（1867~1937）、吳晗（1909~1969）、朱希祖（1879~1944）、王崇武、謝國楨（1901~1982）、蕭一山（1901~1978）等人最為著稱。<sup>③</sup>1949年後一部分史家相繼南下，南移香江，<sup>④</sup>而明清史研究之風氣與成果亦開始移植本地，燈火相傳，而香港一地之明清史研究由是得以建立及開拓。<sup>⑤</sup>

1949年南渡史家至港者，以明清史為專業之學者，尚未多見。然明清史終能於本地開展，實賴錢穆（1895~1990）與羅香林（1906~1978）兩位

\*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

- ① 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天津教育，1988），頁14-17。
- ② 梁啟超：〈東籬月旦〉，載於《飲冰室文集》（臺北，新興，民57），頁215-217。又參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上海，生活，民25），頁216-217, 225-227；莊吉發：〈民國七十六年清史研究概況〉，《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0期（民77），頁411-412。並參劉俐娜：〈五四時期史學思潮新探〉，《近代史研究》，1期（1991），頁164-165。
- ③ 徐弘：〈六十年來明史之研究〉，《六十年來之國學》（臺北，正中，民63），頁385-389；章道均：〈近六十年來國人對明清史的研究〉，《史學彙刊》，4期（民60），頁253-262。
- ④ 李金強：〈民國史學南移：左舜生與香港史學〉，《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2期（1989），頁85-86。
- ⑤ 關於1949年以前，本港已有明清史著述之發表，一批南粵學者如陳佰陶、張學華注意明遺民；賴際熙注意廣東志乘；羅翹棠注意明史地理考證，早開風氣。參羅香林：〈香港的漢學研究〉，載於《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民51），頁95-127。

前輩學者之研究與教學啟迪所致。

錢穆被譽為我國當代史學大師，<sup>⑥</sup>然其學乃繼承中國學術傳統而成為「二十世紀國學界的一位通儒」，於抗戰時期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名重史林。錢氏史學精神向以禮敬傳統而著稱，實為錢氏回應西力衝擊而求力挽「傳統」於狂瀾之既倒，難怪余英時謂其史學乃「為故國招魂」。<sup>⑦</sup>錢氏於1949年抵港後，隨即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以發揚中國文化學術的優良傳統為宗旨，並出任新亞書院院長及首任研究所所長（1955~1964），<sup>⑧</sup>而新亞研究所即為本港明清史專業人才之首要培養機構。

錢氏史學尤長於學術思想。<sup>⑨</sup>蓋自三〇年代起講學北大，即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科；並先後出版《王守仁》（商務，萬有文庫，193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1937）及《宋元明理學概述》（臺北，中華文化，民42）三書，奠定其於明清學術思想研究之地位，影響五〇年代起本地學者從事此一方向之研究，余英時即明言研究清代思想乃「啟途於師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sup>⑩</sup>1964年，錢氏更進而撰寫〈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新亞學報》，6卷2期），藉詩文論史，指出明初從龍及開國儒臣，竟然心存元統，與朱明實乏同仇敵愾之忱，錢氏史學遂與明史相涉，並引發後繼者對於朱元璋與士人關係之探究。<sup>⑪</sup>可惜錢氏於1966年離港赴臺定居，本港史學界遂失去受教於錢氏之機運！

羅香林，早年負笈清華大學，為民國名史家朱希祖之快婿，來港前以客家、唐史及孫中山研究著稱學界。<sup>⑫</sup>1949年後南下香江，一度任教於新亞

⑥ 王俠：〈錢穆先生〉，《中國歷史學會會訊》，38期（民79），頁1-3；陳祖武：〈錢穆與中國史學〉，《中國史研究動態》，11期（1990），頁21-24。Jerry Dennerline以錢氏〈八十憶雙親〉一文為基礎，寫成討論錢氏生平及學術思想之專著 *Ch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⑦ 余英時：〈滄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民80），頁17-56。陳豐祥：〈從《國史大綱》看錢穆的史學造詣〉，《教學與研究》，3期（民70），頁185-203。

⑧ 錢氏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見其自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岳麓，1986），頁239-308；又《新亞研究所概況》，頁8。

⑨ 嚴耕望謂錢氏學問由子學入門，故其學之重心，即在於學術思想。見〈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新亞學報》，16卷上（1991），頁131。

⑩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自序，頁2。

⑪ 羅炳綿：〈明太祖的文字統治術〉，《中國學人》，3期（1971）；及趙令揚：〈論明太祖政權下的智識份子〉，《明史論集》（香港，史學研究會，1975），頁1-13。

⑫ 《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1979），參李璜、林天蔚及余偉雄三位之紀念文章，頁86-89, 100-102, 117-121；又參李岩：〈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述略〉，《中國史研究動態》，4期（1991），頁18-23；M. MA: "Professor Lo Hsiang-L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XVI: No. 1 & 2, pp. 1-2.

書院，於 1951 年為港大中文系主任林仰山 (F. S. Drake) 延攬，受聘於該系，歷任講師以至於教授，1968 年退休後出掌珠海文史研究所，直至逝世為止。羅氏著述遍及宋元史、明史、近代史、中外交通及基督教史，蜚聲海內外史學界，對本港史學研究與教育產生重大影響。<sup>⑬</sup>

羅氏岳翁朱希祖，為章炳麟 (1869~1936) 門生，朱氏素以南明史知聞於民國史壇，出版《明季史籍題跋六卷》等書文。其妻朱倌亦以東林黨研究，深受明史學者注目。<sup>⑭</sup> 據云朱氏死後部份南明史料亦交由羅氏保存，羅氏與明史研究，由是結緣。<sup>⑮</sup>

羅氏於港大任職期間，講授《明史》此一專書及中外交通史，<sup>⑯</sup> 並且開拓明代中外交通此一研究領域，成為本港明清史研究，繼學術思想以外另一重要研究動向。隨後出版《西婆羅洲羅芳伯與所建光和國考》(香港中國學社，1981)，該書縷述清初客籍羅芳伯於西婆坤甸 (Pontianak) 建國史事，書後附錄為「中國舊籍中之婆羅洲史料匯纂」，下開其與門生編纂明清史專題史料匯編之濫觴，並發表明代中外交通論文多篇；<sup>⑰</sup> 此外，又利用族譜探討明代衛所及清初移民史實。<sup>⑱</sup> 羅氏上述一系列之研究工作，其門生趙令揚、陳學霖、羅文等人即受其影響，先後將《明實錄》中有關東南亞史料及西藏史料分別輯出成書，出版《明實錄中東南亞史料》(香港，學津，1968，兩冊)，<sup>⑲</sup> 及《明清實錄中之西藏史料》(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1)。<sup>⑳</sup>

<sup>⑬</sup> 李揚盛：〈羅香林與香港史學〉(香港浸會學院榮譽學士論文，1991)，頁 5-19。

<sup>⑭</sup> 羅香林：〈朱邊先先生行狀〉，載於氏著《乙堂文存》(香港中國學社，民 54)，卷二，頁 95-120。

<sup>⑮</sup> 參余偉雄一文，同註<sup>⑭</sup>，頁 121。

<sup>⑯</sup>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頁 236。羅氏於港大講授《明史》一書，其內容包括明史纂修之三時期、明太祖本紀、明神宗本紀、劉基傳及徐光啟傳，並從其講義手跡中，可知亦講選舉志、外國傳；同時已注意西方明史學者如 Frederic Motc, C. O. Hucker 及 C. R. Boxer 等人之著述，而明史外國傳及 C. R. Boxer 之著述為研究明代中外交通所需注意者。參羅氏乙堂史學講義第四冊，藏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sup>⑰</sup> 包括〈明初所謂西洋之地望考〉，《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1965~66 年度)，〈婆羅洲與中國交通史實〉，《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2 期(1961)，〈明初中國與西洋項里之交通〉，《大陸雜誌》，36 卷 2 期；英文稿見《珠海學報》，4 期(1971)；〈明代對東南亞各國關係之演變〉，《南洋大學學報》，創刊號。

<sup>⑱</sup>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中國學社，1971)，頁 4-8, 75-102。

<sup>⑲</sup> 該項工作乃由羅香林及饒宗頤兩位首倡其事。見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序〉。又該書乃以梁鴻志影印嘉業堂明實錄傳鈔本為依據。時中研院史語所之明實錄校刊本尚未出版，而梁本難免錯誤，故徐泓認為尚有再校之必要，見徐泓：〈六十年來明史之研究〉，同註<sup>⑬</sup>，頁 388。

<sup>⑳</sup> 該書亦由羅氏指導其門生輯錄，羅氏去世後，由其子羅文及李纘錚完成是項工作，見李纘錚跋，載於《明清實錄中之西藏史料》一書。

其後趙、陳等人並相繼撰寫有關明代中外交交通史論文。<sup>②</sup>

綜上可見，錢、羅二氏實為本港華文史學中明清史研究之兩位重要奠基者。

與錢、羅同一時期之前輩學人，尚需一提者為簡又文(1896~1979)。簡氏以治太平天國史著稱，其後出版《白沙子研究》(香港猛進書局，1970)，該書以西洋哲學概念研究明代粵中大儒陳白沙之思想體系，以至其一生行誼、道德、文學及書法。陳榮捷譽該書為研究陳白沙「有系統而深刻之專編」。簡氏其後又撰寫“Chan Hsien-Chang's Philosophy of the Nature”一文，將白沙思想首次推介至西方，並引起西方學者之注意。<sup>③</sup>

正當錢、羅二氏對本港明清史之教學及研究進行播種植根之際，數位由大陸遷臺之史家，亦相繼受聘來港任教，從而使本地明清史研究增加一批生力軍，並且得以茁壯。當中以牟潤孫(1908~1988)、全漢昇、王德昭(1914~1982)、陳荆和四位先後至新亞書院及研究所任教最為重要。<sup>④</sup>

牟潤孫自謂早年深受梁啟超(1873~1929)之《國學入門書目》及《清代學術概論》兩書之啟迪，遂注意晚明史事，<sup>⑤</sup>撰寫〈談遷著述考〉及〈張岱著述考〉。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在學期間，分別受教於民國時期名史家陳垣(1880~1971)及柯劭忞(1850~1933)，得悉傳統中國史學之真諦。<sup>⑥</sup>其後著述起自春秋，下及明清；自1954年來港後，除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科，與明清史相關外，其撰著課題漸以清初學術史、明清史事、盛清皇室斂財及紅樓夢為主。牟氏精於考史，別出新見，如考出蔣良騏之《東華錄》內多清室隱諱之史料，即為一例。其明清史之論文散見於所著《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1987)及《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1990)二書。

全漢昇於三〇年代畢業於北大，深受陶希聖及傅斯年之影響，遂以中國

② 見中國南海關係史論文集專輯，《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2期(1961)；趙令揚：〈記明時中國人在東南亞之勢力〉，《明史論集》(香港，史學研究會，1975)，頁51-66。陳學霖於70年代仍從事中國與馬六甲關係之研究，見Edward L. Farmer, "Directory of Scholars and Research," *Ming Studies*, 5 (1977), p. 8.

③ William T.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3-92.

④ 《新亞歷史系系史稿》(香港新亞歷史系學會，1983)，頁6-7。

⑤ 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1990)，頁465-466。又參牟氏序謝正光編著：《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民79)，頁1。

⑥ 牟潤孫，同前註，頁466-469。

經濟史為其研究領域。1949年前，全氏以研究唐宋經濟史著稱於史界，自1949年後其研究重心，向下推移至明清經濟史及近代中國工業化兩方面。1966年來港任教，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一科，講授內容，部分即涉及明清時期；其明清經濟史著述主要集中於明清銀銅貨幣供應，物價研究，以及明代中外貿易史等課題。研究細緻，多所創發，故楊聯陞譽其為「經濟史之祭酒」，<sup>②⑥</sup>誠不虛話。並開拓本港明清及中國近代經濟史之研究領域。全氏明清經濟史之重要論文，分別刊於其《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二冊）及《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三冊）；近日又出版《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民76）一書，即為全氏綜合歷年有關明清經濟研究成果之通論史書。

王德昭，出身北大，其著述遍及中西歷史，故自稱為「雜家」。<sup>②⑦</sup>1965年來港後著力研究晚清之改革與革命，對本港史學界之辛亥革命研究產生一定之影響。<sup>②⑧</sup>然王氏早年撰寫《明季之政治與社會》（重慶，獨立，1942）小書，主要分析明代招致衰亂之原因；及至臨終前夕，又出版《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82），<sup>②⑨</sup>綜述清代科舉制度之由來以至於廢止，並論其與政治、社會、教育各層面之關係。王氏之於明清史研究，未容忽視。

陳荆和，早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1962年出任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主任。<sup>③⑩</sup>陳氏前此曾於越南順化大學任教，首開研究明清之際朱明遺民流寓南越所建立之華裔社區——如明香社（即維持明朝香火，後改稱明鄉社），先後於新亞學報發表論文多篇，<sup>③⑪</sup>並出版《承天明鄉社陳氏正譜》（香港新

②⑥ 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食貨月刊》，復刊 14 卷第 11、12 期，頁 445-458；又參李木妙：〈全漢昇教授〉，《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4、5 期（1991），頁 109-118。

②⑦ 王德昭：〈鏗然舍瑟春風裏——述往事為鄭天挺毅生師壽〉，《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香港，1985），頁 128。

②⑧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近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78），頁 791。

②⑨ 周佳榮：〈從「明季之政治與社會」到「清代科舉制度研究」——我所認識的王德昭師〉，同註②⑦，頁 172-176。

③⑩ 《新亞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1949-69)》，頁 147；內謂 1962 年研究所教務長謝幼偉建議成立東南亞研究室，通過後，遂聘陳氏出任該室主任。

③⑪ 〈十七、八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承天明鄉社與清河唐——順化華僑史之一頁〉，〈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植南圻〉（上、下），均載於《新亞學報》，3 卷 1 期（1958）；4 卷 1 期（1959）；5 卷 1 期（1960）；8 卷 2 期（1968）。

亞研究所，1964）一書。此外，陳氏又收集歷年發表有關菲律賓華僑史研究之論文，而成《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討論西屬菲律賓時期中菲貿易之出現，並及西屬初期對於華僑之管治，以至菲華之動態。

綜上所述，四人中以全漢昇之研究，影響較大，刺激本地學者對於明清經濟史之研究；而牟氏及陳氏之著述，則分別促進本港明清學術思想與中外關係研究之進一步發展。

此外，尚須一提者為柳存仁。柳氏亦出身於北大，1949年南下香港，一度於中學任教，然心存學術，<sup>⑳</sup>繼續進修。自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注意明代道教及明清通俗小說之研究，自成一幟；其研究成果亦多於本港學術刊物發表，並出版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Hong Kong: Lung Men Book Store, 1967) 及《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1977，兩冊）。前書為柳氏利用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及皇家亞洲協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所收藏之中國小說，研究明清通俗小說之版本與內容，並附所見小說目錄之提要。後書為柳氏論文集，重點在於收其對明代道教書目之編纂，明儒與道教關係及明清通俗小說研究；柳氏此一方面之研究，深受國際學術界之注意。<sup>㉑</sup>然柳氏自1962年前赴澳洲國立大學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任教後，未能對本地明清史研究產生直接影響。

上述前輩學人對於明清史教學及研究之啟迪，<sup>㉒</sup>隨著大陸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於明清史史料編纂及研究陸續入傳，<sup>㉓</sup>以及本地學者參與美國 C. L. Goodrich 所主持之明代傳記研究計畫之撰寫工作，<sup>㉔</sup>明清史研究風氣由是

⑳ 錢穆謂得悉柳存仁於新春佳節，尚在家中閱讀其自行手抄錢著《先秦諸子繫年》一書，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同註⑧，頁252。

㉑ 柳存仁：〈民國以來之道教史研究〉，《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民81），下冊，頁1519-1545。

㉒ 其它學者在大專院校任教明清史者，以新亞歷史系為例，五〇年代由何格恩任教；六〇年代分別由陶振譽、何佑森及金中樞三位任教，然對本港明清史研究未見明顯之影響，參新亞歷史系系史稿，頁6-7。

㉓ 如存粹學社編集：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香港，1979），五冊，主要為重印自1949年後大陸學者研究社會經濟史之論文；自1979年後隨著中國大陸之開放後，本地學者對於大陸明清史研究，更為瞭解。參趙令揚：〈近四十年中國大陸之明史研究〉，《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同註⑧，上冊，頁505-513。

㉔ 趙令揚「序」，見於鄭德華、劉詠聰編：《香港地區明清史研究期刊論文索引》（香港，地平線，1981）。

大開。自七〇年代以降，明清史學者及研究成果，不斷在各大專院校湧現，其中以新亞研究所及香港大學最爲重要，進而召開一連串明清史學術研討會，<sup>⑳</sup>得與海內外明清史學者交流研究心得，而香港一地之明清史研究遂自成局面。

（一）新亞研究所——自錢穆創設於五〇年代後，至 1974 年脫離中文大學，於 1981 年開招博士研究生，爲本港培訓不少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之人才。創所之後，在錢穆影響下，開始出現明清史研究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者爲余英時、羅炳綿、蘇慶彬、楊啟樵及黃開華五位之著述，而以余英時最爲傑出。

余氏爲錢穆草創新亞時期首批弟子，錢、余師生情誼至爲篤切，<sup>㉑</sup>早年研究漢魏史，其後注意清代思想史，於 1973 年回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兩年，旅港期間先後完成及出版《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1976）及《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1975）三書，上承乃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路數，而自闢蹊徑。<sup>㉒</sup>首書將方以智歸入明遺民之列，而以綿密考證方法，確證密之自沉惶恐灘殉難之晚節，並附方以智晚年史料，爲方以智研究開新途。<sup>㉓</sup>次書及收入《歷史與思想》中之兩文，包括〈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爲余氏研究清代思想史，結合中西學術，別立新論之代表作。上述書文乃余氏從思想「內在理路」研究清代思想，認爲清代考證學興起是相應宋明儒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起，並漸由儒學中的「尊德性」轉向「道問學」，此一學術思想之新動向，余氏名之爲「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之興起，並以戴震及章學誠作爲個案，說明清代學術變化之新動向及其地位，極具創見。論者謂余氏爲近七十年來研究清代考證學起源三位重要學者

<sup>⑳</sup> 本港各大專院校召開有關明清史之學術研討會計共九次，參鄭德華、劉詠聰編，同前註，頁 213-216。

<sup>㉑</sup>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同註⑳，頁 1-29。余氏於 1952 年畢業於新亞書院文史系，隨即入新亞研究所，1955 年負笈美國哈佛大學，參《新亞生活月刊》，1:1（1973），頁 1。

<sup>㉒</sup> 關於余氏對於清代思想研究之「心路」歷程，參氏著〈從「反智論」談起〉，《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民 71），頁 108-124。

<sup>㉓</sup> 見 Willard J. Peterson 之書評，*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4（1974），頁 292-298。其後隨著方以智新史料之出現，大陸學者又提出方氏乃「疽發背死」之新註，余氏利用新史料續撰三文，往復辯析密之自沉惶恐灘，至此終成定讞，見余氏《方以智晚節考》（增訂本）（臺北，允晨，1986）一書。又大陸學者李學勤等及本港學者勞思光皆佐余氏謂方以智死節之說，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專輯》，《新亞學術集刊》，2 期（1979）。



之一。<sup>④</sup>綜觀余氏對於清代思想研究之貢獻，套其首先引介之「典範」(paradigm)一詞譽之，<sup>⑤</sup>最爲貼切；尤有進者，余氏針對民國以來中國新史學之全面反思，對於當代中國史學影響尤爲深遠，然此點則非本文所能詳論。<sup>⑥</sup>

羅炳綿，早年研究中國中古史，於研究所任職助理研究員時，亦因錢穆影響轉而從事清代考證學之研究，稍後出版《清代學術論集》(臺北，食貨，民 67)，書中七篇論文，分別討論章學誠之修纂史籍考、校讐論及對同時代學者之譏評；其次，探究清代藏書家如錢謙益、錢晉、毛晉以至黃丕烈等人活動史，並論諸人與考證學發展之關係，最後又討論錢大昕利用藏書家善本校勘考據，尤具特色。至七〇年代，羅氏研究興趣轉移至社會史方面，並鼓吹國人注意社會史研究。<sup>⑦</sup>羅氏本人亦「坐言起行」，先後發表一系列典當業的專題論文，並以清代爲其重點。<sup>⑧</sup>羅氏後至浸會學院及中文大學任教講授明清史。

蘇慶彬，其初以研究中古時期入居中國著人而著稱。1958年錢穆建議蘇氏與胡詠超合作從事清史稿人名索引之編製，其後蘇氏獨立完成此項工作，並發表〈清史稿人名索引——大學士〉(上、中、下)，刊於《中國學人》1—3期(1970~71)；並仿汪輝祖《元史本證》之例，以「諸王列傳」爲本，檢校《清史稿》內相關史料；撰寫〈清史稿列傳本證〉(《新亞學報》，13卷，1979)一文；又注意清代學術史，研究章學誠史學及清人考證學中之辨僞法。<sup>⑨</sup>

而楊啟樵與黃開華則有異於前三位，均以明史起家。楊氏早年即以〈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及其影響〉(《新亞學報》，6卷2期)，而受錢穆稱許，

<sup>④</sup> 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期(1991)，頁148-150, 153-154。

<sup>⑤</sup> 參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民 65)，頁381-386。

<sup>⑥</sup>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同前註，頁247-270；又參〈本刊「代發刊辭」的再反省〉，《史學評論》，8期(民 73)，頁151-197。

<sup>⑦</sup> 羅炳綿：〈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途徑的探索〉，《食貨月刊》，復刊6卷8期(民 65)，頁474-482。〈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和史學趨勢〉，《大陸雜誌史學叢書》，五輯1冊，頁5-13。

<sup>⑧</sup> 羅氏關於典當業之研究論文合計五篇，見〈中國典當業的起源和發展〉，《食貨月刊》，復刊8卷7期(民 67)，文內註①羅列各篇論文出處，頁323-324。

<sup>⑨</sup> 蘇慶彬：〈閻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僞方法之研究〉，《新亞書院學術年刊》，3期(1960)；〈章實齋史學溯源〉，《新亞學報》，8卷2期(1968)。

④ 該文乃討論明代諸帝溺尚方術，以至方士亂政；其後赴日留學，轉移研究雍正帝，其代表作即《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香港，三聯，1981），該書以雍正硃批論旨為主要材料，討論雍正其人，並提出雍正乃服餌丹藥中毒暴斃之說。其後楊氏結集歷年撰寫明清史專題論文十篇，而成《明清史抉奧》（香港，廣角鏡，1984）一書，除上述明帝崇尚方術一文外，尚有明代人才培訓、戶口以至清初捐納、方伎、雍正硃批、鄂爾泰、及全謝山等研究。楊氏之研究尤重史料，立論堅穩。

黃開華於研究所時，即以研究〈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新亞學報》，6卷，1、2期）而受知於學界，④ 討論明代統治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之制度與政策問題，至為詳盡。其後出版《明史論集》（香港，誠明，1972），除收前文外，尚有明代兩京體制中南京政府組織、晚明政治與土風衰敗，以及黃宗羲政治思想及史學之研究，全書四十餘萬言，以專題研究申論有明一代之治亂，尤為難得。

綜觀上述諸氏之研究，雖云各有所擅，然其共通有二：其一，各人研究或多或少均注意錢穆研究近三百年學術思想此一範疇，遂促成「明清學術」於香港明清研究中，得以「蔚為大國」；其二，重視史料，其研究特質，即其論點之光輝乃建基於堅實史料之上，而新亞史學，其要亦在於此。

此下出身於該所之學者，繼續注意明清學術思想此一方向者，尚有謝正光從事明遺民研究，④ 周啟榮從事清代經世思想研究，黃兆強從事清代史學研究，撰寫〈趙翼史學研究〉（碩士論文，1979），然均留學海外，分別於美國、臺灣兩地任教。周、黃二氏著述，容後再述。

至於全漢昇之明清經濟研究，亦於該所產生影響。全氏先後指導鄧青平從事雍正養廉制度之研究，⑤ 以及林樂祿研究明代賦稅制度，並相繼完成〈明代金花銀的折納〉（碩士論文，1982）及〈明代田賦的改折〉（博士論文，

④ 楊啟樵：「前言」，載於《明清史抉奧》，頁1。

④ 該文後收入包遵彭主編《明史論叢》（臺北，學生，民57），第5輯，頁2，包氏譽該文為「引證博洽，用力至深。」

④ 謝正光編著：《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民79），收明遺民二千多人之傳記史料，編首「代自序」，為作者舊作〈清初所見《遺民錄》之編撰與流傳〉一文，原刊《新亞學報》，15卷（1986），頁415-436。

⑤ 鄧青平：〈清雍正年間（1723-35）的文官養廉制度〉，《新亞學報》，10卷1期（下）（1971），討論該制度成立之背景、內容及成效。

1986)，又發表論文多篇。<sup>51</sup> 林氏對於明代金花銀及田賦改折之研究，已引起學界之注意。<sup>52</sup> 最後，筆者亦在此一方向下，完成〈清代福州之研究〉（碩士論文，1977），該文借助都市地理學概念研究清代福州之發展。

(二)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及研究所（1974年前）均屬中大成員，故該校明清史教學與研究，其來有自。羅炳綿於1979年至中大任教，負責明清史之教學，隨即發表〈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新亞學術集刊》，2期，1979），從社會經濟之變化，說明清代考證學之淵源與發展，實為羅氏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之著述，亦為國內馬克思史學研究成果受到本地學者注意之典型例子。羅氏近年轉向清代四庫全書之研究。<sup>53</sup> 其次，值得注意者為許冠三對於王船山思想之研究，先後出版《王船山的歷史學說》（香港，活史學研究社，1978）、〈原王船山之理〉（《香港中文大學學報》，5卷1期）、〈王船山的宇宙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0卷，上册，1979）及《王船山的致知論》（香港中文大學，1981）。後書討論船山之智識學說與方法論，書末附「船山學術思想生命年譜」，該譜共分上下，上部記其生前學術活動，下部記後人對船山學術之發揚與研究，甚具參考價值。此外全漢昇門生李龍華研究〈明代開中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卷2期），頗為詳實。

踏進八〇年代後，中大先後召開兩次與明清史有關之研討會，其一為「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中國與歐洲國際研討會」（3月，1987），由該校國際交換計畫學部主辦，邀請海內外著名學者出席，並宣讀論文二十六篇。<sup>54</sup> 會中討論關於中國哲學、文化對於歐洲產生影響及西方科技引進中國之論文十三篇，由李弘祺彙集而成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51</sup> 如林榮祿：〈明代金花銀的折納〉，載於《明清史研究論文集》（香港珠海中國文史研究所學會，1984）；〈明代的白糧〉，載於《國史論集》（同前，1986）；及〈明代存留糧的改折〉，《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民76），後二文分別討論明代田賦中的「起運糧」及「存留糧」。又近刊〈明初四朝田賦的折納物〉，《新亞學報》，16卷上（1991）。

<sup>52</sup> 吳有能：〈談明清史的特色及變化——訪問馬楚堅、譚棟華及林榮祿先生〉，《書目季刊》，24卷1期（民79），頁81-89。

<sup>53</sup> 羅炳綿：〈《四庫全書》編集重心的轉變〉，及〈紀昀的學術思想與《四庫提要》的立場〉，均載於《新亞生活月刊》，7卷6期（1980），頁1-4；8卷8期（1980），頁1-5。

<sup>54</sup> 李弘祺：〈十六至十八世紀之中國與歐洲國際研討會〉，《中文大學校刊》，2期（1987），頁8-9。

一書。<sup>65</sup>其二為「明末清初華南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12月，1991），由歷史系主辦，提交論文二十六篇，全會以袁崇煥為中心課題，並旁及明末清初華南地區之歷史人物。<sup>66</sup>

（三）香港大學——明清史研究，以中文系為主。該系自五〇年代以降，由羅香林講授中國歷史，而劉百閔及饒宗頤兩位講授中國文學，學風漸開。其中羅氏開拓之明清中外交通研究，饒宗頤亦有所參與，並發表著述。<sup>67</sup>此外饒氏又出版《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香港，龍門，1977），爬梳傳統史學觀念，明清諸家之正統論，即為其中一環。而劉百閔又講授近思錄及中國哲學史，出版《經子肄言》（香港，學不結齋，1964），全書接近一半篇幅討論佛道二教、新儒學及明清學術思想，<sup>68</sup>頗能深入淺出；該系由是開展明清宗教及學術思想之研究動向。

自八〇年代以降，中文系漸以明清史研究著稱於學界。其一，該系六〇年代畢業生對於明清史研究之推動及貢獻，包括趙令揚、陳學霖、馬幼垣及黃兆漢四位。其中趙、陳二位，均受其師羅香林與饒宗頤之影響，從事明實錄東南亞史料輯集工作，其後又參加前述明代人物傳記計畫之撰寫，遂成明史學者。

趙令揚，於六〇年代末從澳洲雪梨大學學成回港，重返其母系任教，講授明清史及中國史學史兩科，先後出版《明史論集》及《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香港，學津，1977）兩書，前書收錄有關明代東南亞、會同館、太祖與智識分子、宦禍、黨禍及李贄史學等論文；後書則與其師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性質相近。趙氏除不斷發表著述外，<sup>69</sup>並且繼承該

<sup>65</sup> 該論文集之歐洲學者關於我國史學界盛稱中國文化對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之影響，均採修正的看法。又參楊意龍（John D. Young）的書評，*Sino-Western Relations Journal*, Vol. 14 (1992), 頁 45-46。

<sup>66</sup> 馮明卓：〈一次求實的國際學術交流——記香港中文大學明末清初華南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清史研究》，1（1992），頁 119-120。

<sup>67</sup> 馬幼垣：《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民 69），頁 4。又饒宗頤關於明清中外交通論文，如《論明史外國傳記張璉之訛》、《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植，清詞與東南亞諸國》、《星馬華文碑刻繫年》、《Some Place-names in the South Seas in the Yung-le Taitien》，均載於氏著《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1982），下冊。

<sup>68</sup> 劉百閔：《經子肄言》（香港，學不結齋，1964），頁 1-2，該書乃劉氏將其於港大中文系教學十年之講義結集成書。

<sup>69</sup> 趙氏其它值得注意的明清史論文，包括討論明初政治者，〈朱高熾、高煦兄弟爭位淺議〉，《明清史集刊》，1（1985），頁 1-14；討論明代智識分子者，則有〈無國有家無家有我——談談明代智識分子〉，《明報月刊》，8（1982），頁 32-34；討論正統論及史學思想者，則有〈從學術到政治：略論清初之正統觀及文化觀〉，《明報月刊》，9（1982），頁 30-32；〈明史之編修與南明正統問題〉，《國際漢學會論文集——歷史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3），中冊，頁 719-734；〈論龔自珍對史之觀念〉，《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香港馮平山圖書館，1982），頁 265-276。

系優良學風，大力推動明清史研究，而其門生亦受其研究影響，注意學術思想及宦官等課題之研究。

陳學霖，任教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早年受聘參與明代人物傳撰寫工作，獨力完成八十一個傳，為該項集體研究計畫個人完成最多者。<sup>⑩</sup>其後出版 *Li Chih 1527-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fe in His Life and Works* (N. Y.: M. E. Shaspe)，該書整理及譯述有關研究李贄之新舊史料及近人研究概況，為研究李贄生平與思想之重要書籍。此外，陳氏又是新近出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七卷，第一部分中第四章建文、成祖、仁、宣四朝之作者，其於西方明史學術地位，於此可見。

馬幼垣任教於夏威夷大學，雖然師事羅香林，修讀明史專書，然醉心於近代中國海軍史之鑽研，自 1973 年起，即注意明清小說之研究，出版《中國小說史集稿》（臺北，時報，民 69）。至於黃兆漢則於 1972 年前赴澳洲國立大學進修，主要導師為柳存仁，從事張三豐之研究，1981 年學成返回其母系任教，先後出版《明代道士張三豐考》（臺北，學生，1985）及《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88），後書收論文九篇，其中四篇與明清道教有關，包括明代張天師、張三豐、清代道教西派及道士文人的宗教生活。

其二，外來學者之應聘，從而加強該系明清史研究之陣容。當中以何丙郁及杜維運兩位最為相關。何氏向以研究中國科技史而著稱，於八〇年代初出任該系系主任，並與趙令揚合作編著：《寧王朱權及其庚辛玉冊》（香港大學中文系，1983）及《明實錄中之天文資料》（香港大學中文系，2 冊，1985~1986）。前書庚辛玉冊乃明代鍊丹術之書籍。而杜維運則於七〇年代末期由臺大歷史系應聘來港，於該系講授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以清代為主。杜氏早年即以研究清代史學而著稱，於 1950 年受其師牟潤孫影響，開始注意趙翼史學，遂進而研究乾嘉史學，<sup>⑪</sup>於港大中文系任教時，先後出版《趙翼傳》（臺北，時報，1983）及《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1984）兩書。前書為杜氏繼研究趙翼史學後擴大撰寫趙翼之長傳，該書並因受到評

<sup>⑩</sup> Richard I-cheng Liang, "Review of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清華學報》，新 12 卷第 1、2 期合刊，pp. 318-319。

<sup>⑪</sup> 見杜維運：〈廿二史劄記考證〉，《新亞學報》，2 卷 2 期（1957），頁 301。又參〈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62），該書為杜氏於 1959 年於臺大完成之碩士論文。

議而引起學界注目。<sup>②</sup>後書為作者研究清代史學成果之總結集。最後近年以研究清代珠江三角洲著稱之大陸學者譚棟華亦於該系兼任。

由此可見，隨著中文系早期畢業生及外來學者先後加入該系之教學與研究工作，明清史研究由是日漸發皇，其中趙令揚對於明清史之推動，尤為不遺餘力，除了不斷招收以研究明清史為對象之研究生外，<sup>③</sup>更進而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出版明清史專業期刊；港大中文系自八〇年代起，遂以明清史研究著稱於學界。

就研討會召開而言，由中文系主辦與明清史相關者，計共二次，其一，為「明至民國思想史研究會」（與歷史系合辦，12月9日至10日，1982年），出席者除港大中文、歷史系師生外，尚包括本港各大專院校之教師，提交論文二十一篇，其中港大中文系師生提交以明清學術思想為題之論文六篇。由此亦可見學術思想此一動向，在本港明清史研究中始終佔有主流地位。其二，為「國際明清史研討會」（12月12日至15日，1985年），該會為慶祝香港大學創校七十五週年而舉行，廣邀海內外明清史學者參加，出席人數102人，提交論文七十九篇，為本港明清史研究之學術盛舉，而海峽兩岸之明清史學者亦得以首次聚首，加強交流。本港於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所扮演之中介地位，於此可見。<sup>④</sup>

其次，在趙氏推動下，中文系又出版《明清史集刊》，藉此「為各地明清史研究同行及本港年輕一代學者提供發表研究成果及交流學術心得之園地」，<sup>⑤</sup>現時已經出版兩卷。與此同時，中文系新一代年輕的明清史學者亦陸續湧現，為本港明清史研究增添實力。

自七〇至八〇年代，由中文系訓練出身，從事明清史研究，計有何冠彪、李焯然、楊永安、許振興、劉詠聰及曹光明，其中以何冠彪最為突出。何氏先後出版《元明間中國境內蒙古人之農業概況》（香港，學津，1977）、《戴名世研究》（香港大學中文系，1987）及《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三書，後二書即為何氏從事明清學術思想研究之代表作。戴名世一書，探討較

② 謝正光：〈從《趙翼傳》的立論說到趙鳳北在詩壇上的地位〉，《明報月刊》，7（1986），頁80-84；謝氏一文，堪稱苛評；並參杜維運之答辯文章，〈我豈好辯哉〉，《明報月刊》，9（1986），頁104-107。

③ 鄭德華、劉詠聰編，同註②，見附錄③，頁227-231。計自1980~87年，該系以明清史為題之博士論文8篇，哲學碩士論文27篇，文學碩士論文49篇，合計84篇。

④ 劉詠聰：〈記「國際明清史研討會」〉，《清史研究通訊》，1（1986），頁51-57；錢佰城：〈記香港「國際明清史研討會」〉，《讀書》，9（1986），頁110-112。

⑤ 趙令揚〈序〉，《明清史集刊》，1（1985）。

少為學界注意之戴名世生平與思想，及其南山集一書，有關史事考訂，俱見精審。而後書除論明遺民及遺民子弟出路問題外，主要以人物為中心，討論明清學術思想之淵源及流變，並評騭時人對於相關課題之研究論點，如書中對於浙東學派譜系之評議，即為顯例。此外，何氏又繼續其師趙令揚對於明代宦官此一課題之研究，注意清初宦官與政治之關係。<sup>66</sup>

李焯然，於港大時即由趙令揚指導撰寫晚明學術思想之碩士論文，稍後至國立澳洲大學進修，亦師事柳存仁，研究丘濬，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勤於著述，並將其於1981~85年間發表有關焦竑、李贄、丘濬、嚴嵩評價及東林黨爭諸論文，結集而成《明史散論》（臺北，允晨，民76）一書。至於其他年輕學者，楊永安研究祝允明之思想與史學，<sup>67</sup>許振興研究明代邊防，<sup>68</sup>劉詠聰研究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觀，<sup>69</sup>以及曹光明研究萬斯同史學。<sup>70</sup>

最後，港大明清史研究尚須一提者為歷史系之呂元驄（Adam Y. C. Lui），呂氏於該系講授清史，並以研究清代前期政治史及制度著稱學界，著述豐富，先後出版以英文撰寫的專刊四本及論文多篇，探討清代科道官、翰林院、清代官僚升遷及培訓、清初之貪污、順治與多爾袞共治等課題，近日又出版 *Ching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1644-1795*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該書主要交代清代前期之文化、政府組織及社會等方面問題，為一通論性小書。<sup>71</sup>

綜上可見，港大明清史研究，以中文系最為重要，隨著該系年輕學者之出現，使本港明清史研究，特別是學術思想此一方面，依然為本港史學發展

- <sup>66</sup> 關於本港學者對於明清兩代宦官之研究，由柳存仁及趙令揚首開其先，繼續撰著者包括何冠彪、楊永安、劉詠聰及中文大學之游子安，然仍以何冠彪發表論文最多；參劉詠聰、冷冬〈近四十年來港臺地區宦官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12（1990），頁22-25。
- <sup>67</sup> 楊永安：《吳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之思想與史學》（香港，先鋒，1987）；又楊氏曾出版《明史管窺雜稿》（香港，先鋒，1987），書中多為其學生時期之著述，內有〈五十年來明史研究簡述〉一文，然對本港明清史研究，著墨甚少。
- <sup>68</sup> 馬楚堅：〈近十年來中國研究明代蒙古之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同註<sup>39</sup>，頁486，該文羅列許氏已發表之論文七篇。
- <sup>69</sup> 劉詠聰：〈清初四朝女性才命觀管窺〉，《明清史集刊》，2（1986~88），頁63-96；及「中國傳統才德觀與清初四朝關於女性「才」與「德」之比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 XXVI: 1（1988），頁95-128。
- <sup>70</sup> 曹氏於港大時，師事杜維運，後至澳洲國立大學進修，研究明史之論贊；關於其研究萬斯同史學，已發表〈萬季野的史學背景〉，《書目季刊》，15卷3期（民70）；〈萬季野的史學〉及〈萬季野史學中的辨偽方法〉，《國立編譯館館刊》，11卷2期（民71）及12卷1期（民72）。
- <sup>71</sup> 呂氏之著述目錄，可參 *Ching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1644-1795* 一書之書目部分，pp. 143-144。

之重要領域。

(四) 珠海文史研究所——珠海書院，於 1969 年成立中國文史研究所，於 1971 年分設中國文學研究所及中國歷史研究所。後者於 1974 年始招博士生，該所創設之初，即由羅香林出任所長，對於該所之奠基與發展，貢獻至大。<sup>⑫</sup> 時羅氏曾於歷史研究所講授明史，<sup>⑬</sup> 而文學研究所則有王韶生講授廣東文學發展，而以明清為主，<sup>⑭</sup> 該所明清史研究風氣由是大開；1984 年且曾舉行「明清史研討會」，宣讀論文十篇，會後並出版《明清史研究論文集》（香港珠海中國文史研究所學會，1984）。

該所在上述羅、王兩位影響下，從事明清史研究而受到史學界注意者，計有郭永亮、馬楚堅及朱鴻林三位。郭永亮於珠海畢業後至意大利那不勒斯文哲學院進修，並取得博士學位，近日出版《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9）一書，為研究明清澳門史著述。<sup>⑮</sup> 而馬楚堅則為出身該所用力最勤，著述最豐者，發表大量論文，包括何吾騶生平、神宗施政與明亡、明代摺報（軍事情報傳遞）、家丁及清代蒙古驛站等課題，其中尤以明清邊防中之兵制、情報及通訊系統研究最為突出。<sup>⑯</sup> 郭、馬二位皆由羅香林所指導，而朱鴻林則受教於王韶生，後負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丘濬，<sup>⑰</sup> 並注意晚明學術思想，近日出版《明儒學案點校釋誤》（臺北，中

⑫ 何文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歷史研究所大事記〉，《珠海學報》，12 期（1981），頁 377-391。

⑬ 羅氏明史講義之內容，包括(1)明代在中國歷史上之重要意義及明史一書之代表性；(2)明史一書之纂修經過及其得失；(3)明代的開國與明教白蓮教等問題之演變；(4)蒙古旁支之帖木兒汗與明成祖之遺鄭和下西洋問題；(5)明代國勢之轉弱與滿洲之興起；(6)南明之更迭與會黨問題；(7)明代之理學及其影響；(8)明清之際的廣東詩歌。參余偉雄：〈恩師羅香林教授研究史學之偉大成就〉，《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頁 121。

⑭ 《珠海書院中國文學、歷史研究所概覽》（香港珠海書院，1981），頁 20。

⑮ 李德超：〈「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述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 期（民 79），頁 223-232，李氏亦出身於珠海文史研究所，其博士論文為研究澳門之三巴寺，對於郭永亮一書，李氏指出錯失甚多。

⑯ 〈明末何吾騶相國之生平與志節〉，〈明政由亂入治之關鍵〉，及〈明代的家丁〉，均載於《明史研究專刊》，4 期（民 70），5 期（民 71）及 8 期（民 74）；〈明代摺報之創立及其編制〉，〈明代摺報的運作與功能〉，均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7（1986），及 18（1987）。〈清代外蒙古驛站路線之創建〉，《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下冊；〈清代內蒙古驛站路線之創置〉，《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1 期（民 78）；又參吳有能：〈談明清史的特色及變化〉一文，同註⑮，頁 81-89。

⑰ 朱鴻林之博士論文為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 Hsüeh Yen 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Frederick W. Mote 謂其撰寫明代十五世紀後期政治爭議，主要參考此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 Press, 1988), Vol. 7, Part 1, p. 798.



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80）。黃宗羲《明儒學案》，向為研究明代學術思想最具價值之書，及至商務萬有文庫、世界書局分別出版斷句本，北京中華書局又出版沈芝盈校本，使該書可讀性提高；然其中點校偽讀繁多，故朱氏以沈本為主，將錯誤者逐一校出訂正，遂有點校釋誤之作。

最後尚須一提者為該院文史系黎傑早年刊行《明史》（香港，海僑，1962）一書，為一本明史入門之通論書籍。

(五)浸會書院——明清史之教學與研究，與新亞研究所具有密切關係。七〇年代，羅炳綿即曾在史地系任教，<sup>78</sup>該系畢業生周啟榮及黃兆強均先後至新亞研究所攻讀，周氏畢業後，至美國加州大學進修，師事劉廣京，從事清代經世思想研究，發表論文多篇；<sup>79</sup>黃氏畢業後則前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研究章學誠之研究史。<sup>80</sup>及至八〇年代史地分家，由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之楊意龍，一度出任系主任，楊氏曾出版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該書從中西文化相遇及互動角度，研究耶穌會士以利瑪竇為首來華傳教及其所引致之反應；並利用中文資料，探討國人首次反教（南京教案），及耶穌會傳教之史實，一新西方學者研究耶穌會士之視野。<sup>81</sup>

及至 1986 年，歷史系重開明清史一科，即由筆者講授，<sup>82</sup>系中學生亦開始注意明清史之研究，相繼撰寫學術性論文，較著者包括區紹賢之〈清代福建農業發展的危機及出路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黃文江之 *Metteo Ricci's Mission to Chinese Buddhism* (Ching Feng, Vol. XXXIII, No. 4, 1990)；林錦源：〈明代皇帝宮廷生活初探〉；劉仲永：〈明成祖與立儲問題析論〉，均載於《浸會學院歷史系年刊》，5 期（1988）。

<sup>78</sup> 羅氏於該系年刊發表〈吳晗與明史的研究〉，《史地》，創刊號（1970）。

<sup>79</sup> 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5 期（上）（民 75）；周啟榮：〈史學經世：試論章學誠《文史通義》獨缺「春秋教」的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8 期（民 79）；及“Scholar and Society: The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oncerns of Wang Chung (1745-1794)”，《漢學研究》，4 卷 1 期（民 75），後文討論汪中之考據與經世思想之關係。

<sup>80</sup> 黃兆強：〈綜論趙翼確為《廿二史劄記》及《陔餘叢考》之作者〉，及〈同時代人論述章學誠及相關問題之編年研究〉，均載於《東吳文史學報》，8 期（民 79），9 期（民 80）。

<sup>81</sup> 參 Jonathan Spence 之書評，*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V: No. 1 (1984), pp. 198-200.

<sup>82</sup> 明清史一科於 1975 年起停開。又筆者之清代福州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清代福州交通略述〉，《香港浸會學院學報》，Vol. IX (1986)，及〈福州沿革略述〉，《中山季刊》，2 期（1983），後文即以清人治歷史地理之成果考論福州沿革。

隨著 1988 年該系開辦學位課程，並規定畢業生必須撰寫學位論文 (Honour Project)，兼且於八〇年代末，出身港大之劉詠聰應聘來系任教，撰寫明清史學位論文之學生因而為數不少，<sup>⑧</sup> 部分學生畢業後，且繼續進修，故該系明清史研究，堪稱方興未艾。

綜上可見，本港明清史研究，由於北方學統之學者，以錢穆及羅香林為首，分別於 1949 年南移香江，彼此合力於本港推介中國歷史、文化，而明清史研究即在此一學術背景下奠基，並且確立了學術思想、中外交通及經濟三方面的研究動向，其中以學術思想，尤為主流，著述層出不窮；當中以余英時之研究成果，最為矚目，引致國內外同行之關注；而港大中文系，亦在趙令揚之大力推動下，出現新一代明清史學者，使本港明清史研究，後繼有人。綜觀本地出身之明清史學者，大多在本土接受基礎史學訓練，認識中國史學之精神與面貌，繼而至西方進修或訪問，對於西方史學或漢學亦有相當瞭解，且不少於學成後任教於海外，並與本地學者互通聲氣。由此觀之，未來本港明清史研究之日益精進，應可預期。

<sup>⑧</sup> 1990~1991 年，以中文撰寫之榮譽學士論文 46 篇，明清史合計 20 篇，接近半數，參《浸會學院歷史系年刊》，6 期(1991)，頁 95-97。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38) 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 精400元 平350元

黃嘉謨、朱浚源訪問 鄭麗榕、丁素湘紀錄 328頁

潘宗武先生，廣西鍾山縣人，民國前一年生。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歷任廣州培桂中學教務主任兼代校長職務、廣西學生軍政治指導員、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股長、廣西賀縣、南丹、平南、蒼梧等縣縣長、廣西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區縣訓練指導處處長等職。行憲後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至八十年年底退休。近年從事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活動，並致力廣西文獻編撰工作，貢獻良多。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來的研究工作

張海鵬\*

## 一、基本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於 1950 年 5 月，現已年過不惑。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擔任所長，直到 1969 年去世。實際上，自 1958 年起，副所長劉大年一直主持本所工作。「文革」結束以後，劉大年於 1978 年出任所長，直到 1982 年，繼任者是余繩武。現任所長是王慶成。1982 年後，劉大年一直任名譽所長。

社科院近史所除了圖書館外，原曾擁有一座檔案館。該館原名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即今日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史料整理處初建時的十餘名工作人員（包括主要負責人王可風）都是從社科院近史所派出的。70 年代中期正式劃歸國家檔案局管理。

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圖書館中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是中國大陸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圖書資料中心。現有藏書（包括報刊資料）五十多萬冊。除了原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少量藏書外，它主要是接受了各方面的捐贈和移交。這些捐贈和移交主要來自：原中法大學部分期刊和西文圖書，原海關總署部分書刊，河北滄州教會部分圖書，大連滿鐵部分日文書籍和剪報，上海鴻英圖書館的大量近代報刊（黃炎培贈送），柳亞子家藏近代報刊，蕭一山藏書，胡適在北平故居及其它地方遺存的個人檔案資料書。捐贈中還有一些來自所內的研究人員，為張遵驪、張國淦、王崇武、聶崇岐、謝璉造、孫瑞芹、榮孟源諸位先生，其中張遵驪先生捐贈的乃祖張之洞的奏章、電稿、批札等價值極高。「文革」中還接受了公安部門送交的書刊資料。此外，還從舊書攤上採購了大量珍貴書刊資料。在此基礎上，又利用有限經費，選購國內外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出版物。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圖書館藏書雖頗豐富，也存在不少弱點。第一，因不是出自自身積累，捐贈和移交部分往往不够系統、完整；第二，缺乏官文書檔案的收藏；第三，私文書檔案多出自晚清人物，民國人物很少；第四，因限於經費，不能大量購進西方各國存留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檔案資料。

## 二、以往十年的研究工作

1978年中共糾正了以往「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確立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方針以後，社科院近史所贏得了建所以來從事近代史研究的最好時期。按照新的方針，組織、調整了研究力量，重新制定了研究計畫，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積極參與了各項學術研討活動。

第一，組織、調整研究力量。1978年，改變了所內分設研究組的建制，設置並逐漸健全了9個研究室、2個課題組、1個刊物編輯部、1個資料編輯室。它們是：近代政治史研究室、近代經濟史研究室、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中外關係史第一室、中外關係史第二室、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通史研究室、國外史學動態研究室，以及史學理論課題組、近代思想史課題組、近代史資料編輯室、《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從以上專業分工可以看出，研究力量主要在政治史、外交史方面，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方面，基礎尚不够雄厚，有待聚集人才，做出成果。國外史學動態研究室是1988年底在原翻譯室的基礎上改建的。鑑於今後直接閱讀外國歷史著作的人員逐漸增多，專司翻譯的機構是否繼續存在成爲疑問。應該組織具有一定中國近代史專業知識的人才，去關注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狀況，研究有關著作的出版，分析他們的歷史觀點、研究方法，借鑑對我有益的方面，促進研究工作的開展。現在看來，在原翻譯室基礎上的職能轉變是困難的。上述期望的實現，還有待新的研究人才的出現。

第二，制定了研究計畫。主要是圍繞若干重點項目進行。

①《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主持，到1984年已出版三冊。筆者編著的《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是與此書配套的。

②《帝國主義侵華史》，丁名楠主持，其第一卷在1958年出版，中間因客觀和主觀的原因拖了20年，1978年決定重新研究、編寫，第二卷於1987年出版，第三、四卷，正在撰寫中。

③《沙俄侵華史》，余繩武主持，全書分四卷五冊，第一卷在1978年

出版，第四卷在 1990 年出版。此書是 1960 年代與蘇聯交惡以後，為服務於外交當局的邊界談判而組織力量進行研究的結果。

④《中華民國史》，李新、李宗一主持，1988 年 11 月李宗一去世後，此書的撰寫工作在民國史研究室的主持下繼續進行。1982 年出版第一編 2 冊，1987 年出版第二編第一、二兩卷共 3 冊。此書共三編十一卷共十六冊，其它各卷正在組織編寫中。

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李新、陳鐵健主持，第一卷《偉大的開端》，於 1983 年出版，還有幾卷因書稿壓在出版社，未能問世。此書共 13 卷。

⑥《中國通史》，蔡美彪主持。本書繼續范文瀾未完工作，將范著《中國通史簡編》4 冊改名為《中國通史》出版，自第五冊起，由蔡美彪主編。已出版第五、六、七、九冊，第十冊新近已出版，第八冊尚在編寫中，正在組織第十一、十二卷（至 1911 年清亡）的編寫。

⑦《19 世紀香港史》，余繩武主持，已完稿，不久可出版。此書是為配合收回香港談判而動議撰寫的，研究過程中，從英國和香港收集了大量有關香港的史料，尤以香港歷屆總督檔案為寶貴史料。本書是在研究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

⑧《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外關係史第一室主持，早幾年已完稿，因出版難，尚未問世。（編者按：本書已於 1992 年 10 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⑨《中國國民黨史》，原由李宗一主持，現由楊天石主持。此項目由於資料和人事的原因，進展不快。今後可望加快進行。

⑩《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研究（1840～1930）》，從翰香主持。從翰香是社科院近史所新建的經濟史研究室主任，考慮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力量雄厚，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史室新成立，難以在同樣的題目上與經濟所競爭，便另闢蹊徑，抓住華北農村經濟進行研究，以便訓練人才，早出成果。該室研究力量配置較好，齊心協力，並不他驚，預計不久會有可觀的成果公布。另，該室副主任虞和平的《商會與中國近代化》的研究也已告成，即可送交出版。

⑪《清末新政與中國近代化進程研究》，由敝人主持，主要研究 1901～1911 年間清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要回答清末最後十年間的新政確促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但又不能順利實施這一問題，說明中國推進近代化的困難。這個項目現有幾位研究人員在做。我本人作為主持人，由於冗務分心

太多，無暇潛心研究，拿不出像樣的成果，實在十分遺憾，應亟謀改進。

⑫《中國近代史學理論的發展》，蔣大椿主持。這個項目今年內可完成。

⑬《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蔡美彪主持，1983、85、87年間分別出版三卷。這是在50年代范文瀾、金毓黻主持編成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的基礎上，重新蒐集資料進行編輯的。這是歷史學家與地球物理學家合作的產物。其成果供地球物理學家分析研究中國地震發生的規律、判斷、預測今後的地震活動，極有好處。

此外，還有一些個人研究項目，不備列。

應該指出，有些個人著作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如劉大年的《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結集了他對中國近代歷史和史學理論的思考及一些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很受重視；王慶成的《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其中分析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尤其精彩；羅爾綱以耄耋高齡，潛心研究太平天國歷史，著作等身，新近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四卷一百五十多萬字，集中他一生研究的心血；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近代史研究所學人的幾本著作，頗受重視，它們是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朱東安著《曾國藩傳》、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樊百川著《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喻松青著《明清白蓮教研究》、趙金鈺著《日本浪人與辛亥革命》、章伯鋒著《皖系軍閥與日本》，龍盛運著《湘軍史稿》等；民國人物傳記，重要的有：李宗一的《袁世凱傳》、尚明軒的《孫中山傳》、周天度的《蔡元培傳》等。

第三、創辦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門學術刊物《近代史研究》。該刊1979年創刊，由錢宏、丁守和主編，1989年改由夏良才主編。該刊主張學術研究的嚴肅性，發表論文言必有據，不事空談，在國內外學術界建立了較好信譽。

此外，創刊於1954年的《近代史資料》，這一時期恢復；又新辦了《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前者主要發表中國近代史料，很受讀者歡迎，後者主要介紹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論文，今後擬加強國外史學動態的研究。

第四、積極參與各項學術研討活動。自1979年南京太平天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以來，社科院近史所參與籌劃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國內學術討論會，國際方面的還有1980年濟南義和團運動史學術討論會，1981年武漢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85年涿縣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討論會，1986年廣州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1987年杭州近代中國社

會變革國際學術討論會，南京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1990年北京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1991年瀋陽「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等；國內的學術討論會很多，不備列。以上所列各次會議，除1990年的一次是為紀念社科院近史所建所四十周年由該所出面主辦的以外，其它各次會議多是以民間學術團體名義出面主辦的，實則該所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召開國際學術討論會對於推進學術交流是有意義的，但是花費甚多，由於獲得國外資助很困難，今後只能量力而行，選擇有重要意義的題目適當主辦此類會議。

### 三、今後的研究計畫

1991年起，中國大陸進入經濟建設的第八個五年計畫。社科院近史所也相應制定了八五計畫期間的研究項目。大要如下：

1. 繼續進行未完成的各研究項目。如前述《帝國主義侵華史》、《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清末新政與中國近代化進程研究》、《中國通史》等。

2. 新開闢一些研究項目。

①《近代中國人對民主的認識與實踐》，耿雲志主持，研究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產生的歷史條件，分析其屢遭失敗的原因。

②《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蔣大椿主持，側重考察馬克思主義關於客觀歷史過程的理論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狀況。

③《近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析》，王慶成主持。

④《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和風尚變遷》，劉志琴主持。

⑤抗日戰爭研究。現正在培養和聚集人才，擬首先研究抗日戰爭史若干專題，如抗戰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中日關係）、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和發展等。

為了推進抗戰研究，社科院近史所在1991年內參與組織了民間的學術團體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並編輯出版了《抗日戰爭研究》學術刊物。該刊物以敝人為主編。敝人不是抗日戰爭研究的專家，忝列主編，只是為了在提倡抗戰研究方面，略盡綿薄之力。

⑥《中蘇國家關係史（1917～1949）》，余繩武主持。

⑦《咸同時期地主階級研究》，龍盛運主持。

3. 在八五期間應當完成的個人項目如下：

- ① 蔡美彪：元代蒙漢碑研究。
- ② 張德信：明代職官制度研究。
- ③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史。
- ④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
- ⑤ 曾業英：民初政黨研究。
- ⑥ 丁守和：從戊戌到五四的中國思想文化。
- ⑦ 章百家：1937~1949 年的中美關係。
- ⑧ 劉明達：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工人運動史。
- ⑨ 俞旦初：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史學與社會研究。
- ⑩ 蔡開松：中國近代賠款研究。
- ⑪ 黃光域：外國在華企事業匯典。
- ⑫ 耿雲志：胡適及胡適派研究。
- ⑬ 陳鐵健：蔣介石評傳。

4. 八五期間準備出版幾種近代史料：

- ① 羅爾綱、王慶成主持的太平天國資料匯編；
- ② 張振鷗主持的中法戰爭資料匯編；
- ③ 薛銜天等人編輯的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
- ④ 章伯鋒主持的抗日戰爭史資料匯編；
- ⑤ 耿雲志主持的胡適檔案匯編。

以上所述，是社科院近史所的研究計畫。計畫是紙面上的東西，要實現它，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語云：計畫趕不上變化。也許，隨著主客觀情勢的變化，上述研究計畫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調整。不管是否作出調整，我們認為如能實現上述計畫，對於推進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總之，保持和發展現有優勢，逐步加強薄弱環節；發揚嚴謹踏實的學風，反對粗製濫造，注重學術質量，是我們對發展學術專業的基本態度。今後我們將一本這種態度，努力進行。

---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



# 大陸學術界研究南京保衛戰問題述評

孫 宅 巍\*

發生在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因為保衛的對象是中國首都，城陷後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因而成爲正面戰場中舉世矚目的戰役。

大陸學界對於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系統研究，開始於八十年代。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爲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此後，大陸學者寫出了一批研究正面戰場的論著。這些成果，首次展示於1984年春在南京召開的全國首屆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上。

但是，對於南京保衛戰的研究，則稍晚於這一步伐。因為即使在抗戰勝利後由何應欽、陳誠等高級將領撰寫的著作（《八年抗戰之經過》、《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也沒有將其作爲一次獨立的戰役來加以敘述。

後來，隨著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和抗戰爆發五十周年兩大紀念日的來臨，在學術界湧現出的一大批研究論著中，對南京保衛戰的研究文章和著述，終於異軍突起，成爲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

茲根據本人蒐集的有限資料，將大陸在這方面研究的概況略述如下：

## 一、概述部分：

由郭雄等編著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重要戰役介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書，首次將南京保衛戰與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著名戰役並列介紹。該書對於南京保衛戰雖僅作了一般性的敘述，文字亦僅有四千餘字；但它打破了史學界長期以來，不以南京保衛戰爲一獨立戰役、更不將其與其他諸戰役相提並論的局面。

1987年6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華民國史叢書」中，出版了由張憲文主編的《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書。該書分二十七章，逐一論述了抗

---

\*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重要戰事，並將南京保衛戰列為一章。此章亦僅有七千餘字，篇幅不算長；但它首次運用歷史檔案資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審視與論述了南京保衛戰，故有其獨特的貢獻。

江蘇古籍出版社於 1987 年 11 月為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一書，在其背景部分，專門敘述了南京保衛戰的經過和南京的失陷。此段文字並不長，展示內容亦未超過前書。不過，該書將南京保衛戰的過程，寫進南京大屠殺專著之中，揭示了這一戰役同南京大屠殺慘案之間的內在連繫，卻頗具特色。

高榆等人撰寫的《南京保衛戰紀實》（《南京史誌》1988年第6期），運用豐富的歷史資料和生動活潑的文字，記敘了中國軍人在南京保衛戰中，所進行的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戰鬥，歌頌了他們的愛國主義壯舉。

《南京方誌通訊》1990年第3期，發表了何平、德英的《南京保衛戰戰事述略》一文。該文長達一萬八千字，充分運用迄今已經發表和發現的有關史料與論述，詳細介紹了南京保衛戰的準備、進行和失敗，其中對構成南京保衛戰主體的淳化、牛首山、光華門、雨花臺、中華門、孟塘、大胡山、楊坊山、紫金山、東郊、棉花堤、水西門、賽公橋等處戰鬥，逐一作了介紹；文後並附蕭山令、羅策羣、司徒非、姚中英、朱赤、高致嵩、易安華、李蘭池、程智、蒙翰芬、符儀廷、樂以琴等十二名烈士的簡要生平、事跡。由於該文發表時間較晚，因而得以掌握較多的資料信息，使之成為南京保衛戰概述文章中，較為完整和詳盡的一篇。

1991年10月，由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著、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人民革命史》一書，對南京守軍的英勇抗敵和南京城的失陷，有簡要的敘述。

## 二、史料部分

### 1. 檔案類

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藏檔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於 1987 年 8 月出版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較為完整地公佈了有關南京保衛戰的軍事檔案。該專題資料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中的一種，分上、下兩冊，共一百三十四萬字。其中設有「南京保衛戰」專章，內分「戰爭部署」與「戰鬥經過及突圍情況」兩部分，共 54 頁，內含蔣中正、何應欽、唐生智等人的電報十五件，南京衛戍軍、第七十八軍、第

六十六軍、第一百六十師、第五十一師、憲兵司令部的戰鬥詳報六件，以及第三戰區南京會戰經過概要與唐生智簽發的撤退命令各一件。這批檔案資料的公佈，為學術界進行南京保衛戰的研究，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不足的是，所公佈「戰鬥詳報」似還不够完整，尚缺不少軍、師兩級的報告；已刊的軍、師戰鬥詳報中，亦缺少原件所附人員、武器彈藥的損耗統計。

在前書稍後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係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南京市檔案館利用該二館館藏檔案聯合編輯。全書共七百零八頁、五十五萬六千字，主體內容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燒、殺、淫、搶的暴行，但在其「日軍侵佔南京」部分，公佈了一批有關日機轟炸南京、日軍進犯南京與南京失陷的檔案資料。其中，除一部分與前書內容有所重複外，尚有不少新增電報、公文；此外，所列日本陸軍軍官西垣新七於1987年記述的《中國事變史》有關部分，可作為研究日軍動態和作戰的參考。

## 2. 回憶錄類

在紀念與研究抗日戰爭的熱潮中，許多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及南京保衛戰的官兵，撰寫並發表了自己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部分曾陸續散見於各地的「文史資料」書刊中。後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組成《南京保衛戰》編審組，在搜集已發表回憶文章的基礎上，又約組了一批稿件，編成《南京保衛戰》一書（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該書共收入五十九篇回憶文章，附有南京保衛戰大事記、南京保衛戰中中日雙方軍隊指揮系統表，以及作戰地圖五幅，計二十七萬六千字。書中正文，按「綜述」、「江陰阻擊戰」、「廣（德）泗（安）戰役」、「南京外圍與複廓城垣戰」、「南京失守和日軍的暴行」五個部分編排，內容涵蓋了南京城郊與南京戰略區範圍內的大小數十次戰鬥，以及與之有關的上層決策經過。該書可謂集南京一役回憶文章之大成，為學術界深入研究這一戰役，提供了十分珍貴和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此外，在《南京保衛戰》出版前後，還有部分對此次戰役的回憶文章，為該書所未能包容，如《抗日風雲錄》（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5年出版）中所輯：王綿舉撰《南京保衛戰的部署及戰鬥經過》、謝耀華撰《南京保衛戰親歷記》等。

## 3. 翻譯類

齊福霖翻譯的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第一卷第二分冊（中華書局 1981 年 5 月出版）中，「攻占南京作戰」一節，對於日軍攻擊南京的戰略方針、作戰部署和戰鬥經過，有較為完整的敘述，是學術界研究南京保衛戰中日軍一方活動的主要參考資料。

毛良鴻、朱阿根翻譯的日本著名史學家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殺》（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年 8 月出版）和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翻譯的日本拓植大學講師田中正明所著《「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二書，係分別從不同的立場來證實和否定南京大屠殺之存在的著作，但是，在其論爭的內容中，也提供了部分南京保衛戰的戰鬥實況資料。

### 三、論文部分

隨著對於南京保衛戰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陸學者針對以往對於這一戰役及有關人物的偏頗看法，發表了新的見解。歸納起來，近十年來的學術論文，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對南京保衛戰進行了再認識。

#### 1. 是否屬於一次獨立的戰役

孫宅巍在《如何評價南京保衛戰——再論南京保衛戰》（《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 1988 年 9 月出版）一文中，針對史界、軍界以往多不把南京保衛戰視作一次獨立戰役的情況，從戰略目標、作戰計畫、投入兵力、戰鬥經過四個方面論證，認為：「南京之戰，日、中雙方，各有既定的戰略目標、統一的作戰計畫和部署，分別投入了十萬和十五萬人左右的兵力，進行了一系列大小戰鬥。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戰役存在，當確認無疑。」

#### 2. 投入兵力及其損失

對於中國方面投入南京保衛戰的兵力，過去各種著述中極不一致，少至二個師或五萬人，多至二十萬人。張其立在《探討 1937 年南京保衛戰的幾個問題》（《南京史誌》1988 年第 4 期）一文中，不同意一位臺灣學者的文章《孤城英烈一將軍》（《南京史誌》1987 年特刊轉載）中所稱，南京孤城中，「只有蕭（山令）將軍的憲兵部隊和陸軍的兩個步兵師」的說法，指出當時守備南京的部隊有約十五個師強。孫宅巍在《南京保衛戰雙方兵力的研究》（《抗日戰爭史事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和《南京大屠殺與南京人口》（《南京社會科學》1990 年第 3 期）中，則依據有關戰鬥詳報與回憶文章提供的數字，加以推算，認為投入南京保衛戰的中國軍隊，共有十三個建制師又十五個建制團，約十五萬人左右。

對於中國軍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損失，日本古屋奎二在《蔣總統秘錄》一書中稱，「中國軍傷亡超過了六千人」；日本大本營公佈的南京戰果為八萬六千人。孫宅巍在《南京保衛戰雙方兵力的研究》中認為，中國軍隊在戰鬪中傷亡了約一萬人，而有九萬人損失於撤退和城陷之後；損失總數計達十萬人。

### 3. 時空範圍

南京保衛戰時空的終點，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城的失陷，這是沒有歧見的；但是，從何時何地開始，納入這一戰役的範圍，卻眾說紛云，迄無定論。張其立在《探討 1937 年南京保衛戰的幾個問題》中，不同意《孤城英烈一將軍》一文中所說，「南京保衛戰是自 11 月 18 日起，到 12 月 13 日止」。張文認為，南京保衛戰的開始時間應是 12 月 4 日。孫宅巍在《試論南京保衛戰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民國檔案》1993 年第 1 期）一文中認為：要確定在漸進運動過程中的南京保衛戰時空範圍，必須考慮到影響戰役進行的各種複雜因素，因此，應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解釋，應著眼於直接保衛南京城的戰鬪，可把戰役開始的日期界定為 12 月 4 日，開始的地域大致界定為江寧鎮——淳化——湯山——龍潭這一弧形圈以內；廣義的解釋，應以對南京城的戰略進攻和防禦為出發點，可以說，11 月 12 日上海的失陷，便是南京保衛戰的開始，而這一戰役的空間範圍，則包括了東至瀏河、太倉、崑山、嘉興、平湖，南至溧水、祿口、秣陵關，西至長江中的江心洲，以及長江以北的江浦、六圩、靖江等地在內的廣闊地域。

### 4. 敗在何處

以往人們一提起南京保衛戰的失敗，多將南京城的失陷，作為其主要標誌。孫宅巍在《試論南京保衛戰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文中主張：南京城的失陷，僅僅標誌著南京保衛戰的結束，並不是南京保衛戰失敗的標誌。在古往今來的軍史上，一個戰役的勝負，並不僅僅決定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抗戰初期的特定條件下，南京保衛戰的勝負，則完全不取決於南京城的守棄。該文認為，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南京保衛戰需要達成三個具體的目標，即：較多地消滅敵人、較少地損耗自己、較長地固守陣地。可是，中國軍隊並未能實現這三個目標中的任何一個，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說，南京保衛戰是失敗的。

### 5. 如何評價唐生智。

在許多涉及到南京保衛戰的論著中，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被指責為「敗仗將軍」、「逃跑司令」和「沽名釣譽的人物」。但是，單純的責備和謾罵，並不能代替對於一個歷史人物的公正評價。

高秋萍在1984年6月由江蘇省中國現代史學會主辦的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上，報告了學術論文《南京保衛戰與唐生智》（《中華民國史文集》，江蘇省中國現代史學會編，1984年11月印行）。高文認為：「應該從當時的具體情況出發，不應苛求於唐生智個人，更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為唐生智的錯誤。」「對唐生智在南京保衛戰這段歷史活動中的褒貶，不能因循舊中國歷史上慣罵臣子不罵皇帝的傳統。」

孫宅巍在《評唐生智在南京保衛戰中的功過》（《歷史檔案》1985年第4期）一文中認為：唐生智「守土抗敵有功，指揮失誤有過」，他個人「只能在歷史提供給他的那個舞臺上活動」，「由他所承擔的責任，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孫氏最近在《試論南京保衛戰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文中，更進一步提出：唐生智的功、過都是客觀存在，過不能掩功，功不能抵過。沒有必要強求將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量化成一個精確的數字比例。「南京保衛戰中的唐生智，總的說來，不愧為一名抗日愛國將領」。

## 6. 歷史意義

以往在抗日戰爭史上，南京保衛戰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當人們逐步承認這一戰役的存在以後，又往往因其結局的失敗與悲慘，而心情黯然、評價不高。其實，失敗的結局，並不能掩蓋戰役的重大意義。孫宅巍先後發表了《試論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江海學刊》1985年第5期）與《南京保衛戰及其失敗》（《抗日戰爭史新論》，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二文，論述南京保衛戰的偉大意義。文章認為：守城官兵的愛國主義壯舉，是全體中國軍民的共同光榮和驕傲；這一戰役，還從組織指揮方面，為中國人神聖的抗日救國事業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孫氏在其後發表的《如何評價南京保衛戰——再論南京保衛戰》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南京保衛戰，雖然從雙方投入的兵力和持續的時間來說，只是一次中等規模的戰役；但由於南京是當時中國的首都，是日軍借以脅迫中國投降的攻擊重點，加之南京守軍英勇拼搏、犧牲慘烈，這又使它成為抗戰初期一次舉國矚目的重要戰役。

在近年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人們正期待著一部研究南京保衛戰的學術專著早日問世。南京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南京保衛戰史》（孫宅巍著），將填

補這一學術研究的空白。

綜上所述，大陸學術界對於南京保衛戰問題的研究，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有了良好的基礎，其勢正方興未艾。這一研究，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果：第一，確立了南京保衛戰在抗日戰爭史中應有的地位。自八十年代以來，在各種有關抗日戰爭論著、辭書、教科書，以至文學作品中，關於南京保衛戰的敘述，均赫然醒目。第二，圍繞這一戰役的學術探討，正在不斷深化。許多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已經提出，隨著討論的展開和新鮮資料的披露，結論將會愈益明朗。第三，與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相得益彰。保衛戰是大屠殺的背景，大屠殺是保衛戰的結局。因此，對這兩個課題的同步研究，正發揮互相促進、互相補充、互相完善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期刊

《口述歷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專號 393頁 平裝400元

民國81年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第3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刊登南部地區二二八相關人士的訪問紀錄共32篇。出版之後，深受各界矚目，至11月中旬已銷售一空。本期在內容上較上期更為豐富，有以下幾種特色：一、就地區來說，本期的內容包括全省各地，不只侷限於南部。二、就訪問者而言，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法源、張淑雅、江淑玲外，都是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工作小組成員：賴澤涵、黃富三、黃秀政、吳文星、許雪姬、方惠芳、陳美妃。換言之，絕大部分的訪問稿是該小組在執行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工作的副產品。三、就訪問的時間、次數來說，本期的訪問紀錄北部、南部地區中有十三篇是新稿；也有三篇訪問紀錄是這一、兩年分別完成的。四、就訪問對象而言，本期的訪問對象出現母子、兄弟、姊弟檔，有的是同時進行訪問，有的是分別訪問，然後將訪問紀錄予以綜合，希望能增加訪問內容的深度及廣度。五、就受訪者的口述紀錄而言，不同背景受難者站在不同的立場、觀點來看同一件事，也都一併刊出，希望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能呈現出來。六、就受訪者的身份來說，不全是菁英分子，也包括受難的小市民。本期43篇訪問紀錄中，北部地區19篇、中部地區6篇、東北部（包括東部）地區9篇、南部地區9篇。並附珍貴照片多幀。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近十年來韓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吳 金 成\*

## 一、概 觀

韓國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在 1945 年日據時期結束之後，方能真正進入正常的階段。韓國早在三國時代與中國開拓正式交流關係以來，不僅深入了解中國，並且主動接受有較高水平的中國文化。結果，到朝鮮時代，朝鮮知識分子亦即士大夫階層對中國經史方面的了解和見解既高又深，他們現存的文集和著作幾乎都對中國歷史和人物有獨特的評論。目前，韓國學界已開始搜集和整理此方面的資料目錄。<sup>①</sup>由此可見，韓國學界對中國史的了解，不僅早已開始培養了良好的傳統，並且一直保持了較高的水平。不過，韓國學界以現代史學的觀點和方法探討中國史的研究，只有在 1945 年以後才能開始進行。

在 1945 年以後，中國史的研究先由唐代史和元代史為起程，但因韓國在冷戰體制下的特殊環境條件以及難以得到史料的原因，遂使韓中關係史的研究成為主流。到 1950 年代末期，才能超越這個研究範疇之外，以漢代史的研究為主，深入中國史本身的研究，其研究論文也隨著增多了。不過，在研究動向的整體來看，1960 年代可成為韓國學界對中國史研究的轉捩時期。1965 年首創「韓國東洋史學會」，次年出版《東洋史學研究》期刊。<sup>②</sup>1969 年，國立漢城大學將「史學系」分成「國史學系」、「東洋史學系」和「西洋史學系」，如此韓國第一個「東洋史學系」終於誕生了，進而積極推動中國史的研究。

\* 韓國漢城大學。又，本文經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李慶龍重新整理。

① 閔斗基、吳金成、李成珪：〈朝鮮學人的中國史編纂書目和中國史關係論述目錄〉，《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4，1980；拙稿，〈朝鮮學者之明史研究〉，《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83。

② 《東洋史學研究》於 1992 年起改為季刊，今年 12 月發行了第 41 輯。



閔斗基教授是第一位進行包括明清時期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韓國學者。閔教授在 60 年代初，爲了澄清中國近代的來源，切入明代和清初時期紳士階層的研究。閔教授將在 60 年代發表的研究成果，集成《中國近代史研究——紳士階層的思想與行動——》（一潮閣，1973）一書。<sup>③</sup>這一專著除了完全脫離韓國學界在 1945 年以後以韓中關係史爲主的研究潮流之外，更進一步真正研究中國史本身的內在問題，於是成爲最完善地推動此新學風的第一本研究成果。不僅如此，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內容都展現了國內學界對中國史研究更向前邁進的潛在能力，爲此方向奠定了堅固的研究基礎。本書在討論明清時期的社會支配階層當中，鑑於日本史學界所使用的「鄉紳」概念不合史實的情況，乃提出「紳士」概念以取代「鄉紳」。這本書的一篇論文早已譯成日文，被介紹於日本學界，因此目前在日本使用這個「紳士」概念和用辭的學者日漸增多起來。

自從 1960 年代後半期以後，韓國史學界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人員上培養出可稱爲第二代的研究者們。不過，一直到 70 年代前半期，有關韓中關係史、政治史或制度史的研究仍然占多數。其原因一方面在於研究人員的不多，另一方面是由於問題意識不够確切以及研究資料的不足等等問題所造成的。70 年代後半期開始，研究人員逐漸增多，其中一些學者又較注意研究社會經濟史，其研究成果更擴大了新的研究範圍。

進入 80 年代以後，韓國的中國史學界在各方面的研究上劃下新的時代。第三代研究者人數增多，進而對中國史各個方面的研究也很可觀。因此能够在全國性的中國史學會議上，分組（panel）爲秦漢史、明清史以及近現代史等會場進行學術討論。尤其在 1983 年 11 月，韓國東洋史學會在漢城組成了其次級的幾個專門研究會。此時，「明清史研究會」與「近現代史研究會」也分別成立，更提高各個方面的研究水平，特別是近現代史的研究人員大爲增加。

如上所述，由於這些直接的或間接的學會活動的結果，使得學者個人和集體的研究成果提高其水平，從而相當好的研究著作也隨著逐漸增加。《東洋史學研究》（第 20 輯）在 1984 年出刊以「近代中國的上海」爲專題的特輯，明清史研究會在 1990 年出刊《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近現代史

<sup>③</sup> 將其中的 5 篇外加一篇論文編成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ed. by Philip A. Kuhn and Timothy Brook, HUP, 1989。

研究會也出刊《中國國民革命之分析研究》（1985）、《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構造分析》（1990）。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立漢城大學的東洋史學研究室所編撰的《講座中國史》（全七卷，知識產業社，1989）。

## 二、研究專著

近十年來，有關明清史的個人研究已有以下三種專著。首先，就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而言，有曹永祿所著的《中國近世政治史研究——明代科道官之言官的機能——》（知識產業社，1988）一書。本著作對於明代可稱為監察官或言官的科、道官之形成過程與其在政治運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從時間上的演變去加以深入分析。這本書的研究意義不僅在於它是韓國學界對明清政治史方面最初的專著，更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學界未多注意的「科、道官」在制度上和實際運作上的職能加以深入的分析，所以其個中意義實為深遠。

其次，就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而言，吳金成著有《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研究——明代紳士階層的形成與其在社會經濟上的角色——》（一潮閣，1986）。④本書首先澄清明代紳士階層在制度上和實際上形成的背景，又對於世界的明清史學界從前不大注意的長江中游之穀倉地域即三省（江西、湖南、湖北）地域加以分析其社會變遷。換句話說，著者以此地域的水利開發為主，分析了其人口移動與農業生產力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又據此澄清紳士在此社會變遷當中所扮演的社會經濟上的角色。這本書成為韓國第一部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的最初專著，又是漢城大學東洋史研究叢書的第三卷。

其三，就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則有崔韶子所著的《東西文化交涉史研究》（三英社，1987）。本書分析從明末到乾隆年間士大夫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對西學所持的態度和觀點，以總結明末清初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以及接受西學的過程。

此外，還有集體研究的成果。明清史研究會出刊了集體研究，即是《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漢城，1990）。本書分別在政治、社會、經濟、文

④ 本書於1990年以《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會經濟的役割——》（汲古書院）為書名在日本語譯出版。

化和對外關係等五個方面，對產生現代中國的母體時期即明末清初的社會做了綜合的照明。同時各個作者都站在盡力接受世界學界的研究成果的水平上提出了個人的評估和展望。

近十年來，韓國學界在中國近、現代史方面也有不少專著出版。最值得注意的個人專著乃是閔斗基《中國近代改革運動的研究——以康有為為中心的 1898 年改革運動——》（一潮閣，1985），這是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叢書的第二卷。作者早在 1973 年出版了前面所述的《中國近代改革運動的研究》，而本書則是在此後發表的論文中以戊戌變法運動為專題的論文匯集而編的。其主要內容包括：作為戊戌改革運動的背景之各種思潮、湖南和上海地域的各種組織的政治活動、由康有為主導的改革運動的基本方向和戊戌改革運動的展開過程、戊戌改革時期的國際環境、康有為和其改革運動的思想，以及有關戊戌改革運動的資料等等。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專著是以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叢書第五卷出刊的尹惠英《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伐前夜北京政權內部的崩壞過程（1925～1925）——》（一潮閣，1991）。至今學界只能單純地把 1920 年代初北京政府看成革命運動的「對象」，而其深入的研究並不多。因此，本書遂集中地探究北京政府在內政、外交和財政方面上一連串的失策與各界對此的反彈，以及此政權因其內部的崩壞逐漸喪失「正統」的過程。

此外，80 年代還出版了辛勝夏《近代中國對西方的認識》（高麗苑，1985）、鄭世鉉《近代中國新思潮論的展開》（博英社，1981）、車培根《中國近代言論史》（漢城，1983）和宋榮培《中國社會思想史》（漢城，1986）等專著。辛勝夏的著作，對於清朝從道光至同治年間對西方勢力的認識和反應加以整理研究。

同時還有令人矚目的共同研究，由閔斗基教授等為中心共同出刊三本著作。首先，《中國國民革命的分析研究》（知識產業社，1985）對中國現代史上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即國民革命（1923～1928）從多樣的角度去進行分析，以試圖為國民革命描寫更正確的全貌。其內容包括辛亥革命之多樣性、國民革命理論在思想上的摸索、中國國民黨左右兩派的革命觀之比較、黃埔軍官學校內的國共合作和對立，以及國民革命的財政基礎等等。其次，《中國國民革命指導者的思想與行動》（知識產業社，1988），透過對國民革命時期胡漢民、蔣介石、廖仲愷、陳公博、戴季陶和甘乃光等六名國民黨領導者的活動的分析研究，去重新檢討他們의思想和行動的實際意義。其

三，《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構造分析》（知識產業社，1990），盡力超越目前將國共兩黨以政治史為主要的研究觀點之外，而將國民革命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看作一個社會運動，進而有意澄清其社會運動的結構。其內容，除了為企圖將國民革命在其結構上切入理解而事先討論這個研究觀點的導論以外，還包含了：北京政府對國民會議運動的因應過程和其處理善後的會議、北伐時期上海工商階層在政治上的反應、國民革命時期的婦女政策、國民革命運動與反基督教運動、國民革命與學潮、北伐與罷工，以及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基礎等等。綜合這三本著作而言，韓國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們，從新的與多方面的角度去切入探討國民革命在其結構上的各個層面、在這個時期活動的許多領導者以及國民黨內的派系政治，都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東洋史學會所編的《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也可視為韓國學界至 80 年代為止中國史研究之成果。東洋史學會 1991 年移地在北京舉行其第十屆研討會和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靖難之役與朝鮮〉、〈明清時期紳士階層在研究上的諸問題〉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理念分歧與實踐問題〉等論文。本書是由這些論文和其評論輯成，雖然並不包羅韓國學界對中國史研究的整個方面，然而其意義仍在於將韓國內中國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做一個概括。

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所編刊的《講座中國史》（全七卷，知識產業社，1989）也值得注意。這套書是為紀念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系創立二十周年，由本系六名教授和本系出身的博士班以上的年輕研究者二十六名以三十六篇論文探討中國史全時代的政治、社會變遷和思想等而合編的。各個研究者都在盡力綜合世界學界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各自的見解。第一卷包括有關先秦和秦漢時代的四篇論文；第二卷以魏晉隋唐時代為主，共為五篇論文；第三卷以唐末宋元時代為主，共為五篇論文；第四卷以明清時代為主，包括〈明朝的統治體制與政治〉、〈陽明學的成立與發展〉、〈明清時代的農民反亂〉、〈明清時代國家權力與紳士階層〉和〈清代的思想〉等共七篇論文在內；第五卷以十九世紀中後期為主，包括〈第一、二次中英戰爭〉、〈太平天國與捻軍〉、〈洋務運動的性質〉和〈中華帝國秩序的動搖〉等共四篇；第六卷關於從變法運動到五四運動的改革和革命時期，包括〈變法運動與立憲運動〉、〈「教案」與義和團〉、〈民國革命論〉、〈辛亥革命的展開〉和〈五四運動〉等共五篇論文；第七卷關於從軍閥割據到抗日戰爭的時期，包括〈軍閥統治與聯省自治〉、〈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北伐〉、〈南京

國民政府的成立與其性質》、〈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立過程與其意義〉、〈抗日戰爭〉和〈位於東亞的日本之現代化〉等六篇論文。這套書也可說是，將韓國學界至 80 年代為止對中國史的研究成果做另一個總結，且又對未來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方針。

### 三、研究論文

研究論文可分明清史、近代史和現代史三個部分進行敘述。

#### 一、明清史

首先，就明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而言，金英珍對朱元璋集團的性質加以分析。<sup>⑤</sup>全淳東探討明代的教育制度與永樂帝的權力基礎。<sup>⑥</sup>尹貞粉分析明代的軍制。<sup>⑦</sup>高昌錫探討明代東廠和西廠。<sup>⑧</sup>權重達從明朝君主獨裁的性質去研究明代的教育制度。<sup>⑨</sup>崔晶娟對明朝的統治體制與政治變化進行簡要的分析。<sup>⑩</sup>曹永祿，除了前述的著作以外，還研究明末清初東林、復社運動的始末。<sup>⑪</sup>吳金成從社會史的觀點去分析明清時代的學校制度和科舉制度，以澄清明代紳士階層在制度和實際上形成的背景。<sup>⑫</sup>

關於清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而言，金斗鉉分析清朝政權的成立和發展過程。<sup>⑬</sup>金培喆對清朝入關初期確立地方統治的過程，以湖南地域為中心

⑤ 金英珍：〈關於朱元璋集團的性恪〉，《大丘史學》35，1988。

⑥ 全淳東：〈永樂政權的形成和其性格——其權力基盤為中心——〉，《湖西史學》13，1985；〈關於明監生的履修制〉，《忠北大論文集》31，1986；〈明初社學的設立和其推移〉，《忠北史學》1，1987。

⑦ 尹貞粉：〈明代軍屯制研究〉，《東方學志》39，1983；〈關於明代軍戶制和衛所制〉，《東方學志》43，1984。

⑧ 高昌錫：〈明代東廠、西廠的考察〉，《慶北史學》4，1982。

⑨ 權重達：〈明代的教育制度——有關明王朝的君主獨裁之性格——〉，《大東文化研究》17，1983。

⑩ 崔晶娟：〈明朝的統治體制和政治〉，《講座中國史IV——帝國秩序的完成——》，知識產業社，1989。

⑪ 曹永祿：〈明末、清初的東林、復社運動〉，《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漢城，1990。

⑫ 吳金成：〈中國的科舉制與其政治性、社會性機能——以宋、明、清時代的社會性階層移動為中心——〉，《科學》，漢城，1981。

⑬ 金斗鉉：〈清朝權力的成立和發展〉，《講座中國史IV——帝國秩序的完成——》，漢城，1989；〈遼東支配期的奴兒哈赤的對漢人政策〉，《東洋史學研究》25，1987。

進行分析。<sup>⑭</sup>朴赫淳透過順治十一年陳名夏的彈劾事件來分析清朝權力結構在順治親政期間中的性質。<sup>⑮</sup>崔晶娟透過清朝理藩院制的分析來探討一個作為征服王朝的統治體制之另一面。<sup>⑯</sup>宋正洙從明清時代的鄉約和保甲制去分析其鄉村統治和農村的秩序。<sup>⑰</sup>徐正欽研究清初的圈地問題。<sup>⑱</sup>最後，吳金成澄清國家的政治權力與紳士階層的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關係，尤其在明末清初動盪期至清朝確立政權的過程當中，以長江三角洲和江西南部地域為主，更具體地分析這種國家與紳士階層之間的權力關係。<sup>⑲</sup>

就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金九鎮以農業為中心研究明代滿洲女真社會的發展情況。<sup>⑳</sup>金鐘博探討明代土地測量和一條鞭法的問題。<sup>㉑</sup>崔甲洵分析明清時期的農民叛亂和清代宗族制的社會功能。<sup>㉒</sup>崔晶妍重新檢討自明末至清中期江浙地域的抗租運動。<sup>㉓</sup>朴元煥分析明末清初有多樣的民眾運動和叛亂。<sup>㉔</sup>崔震奎探討清中期白蓮教亂的產生動機和其在宗教上的主張，<sup>㉕</sup>河世鳳也分析此時期鄉勇的成立背景。<sup>㉖</sup>俞長根探討十九世紀初中國東南地區的天地會叛亂之始末。<sup>㉗</sup>曹秉漢透過《儒林外史》分析紳士階層與商業之

- ⑭ 金培詰：〈在湖南的清朝統治的確立過程——以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的剿撫策為中心——〉，《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12，1988。
- ⑮ 朴赫淳：〈對陳名夏彈劾事件的一考察——有關順治親政體制的性質——〉，《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科論集》12，1988。
- ⑯ 崔晶娟：〈理藩院考〉（上下），《東亞文化》20，21，1982，1983。
- ⑰ 宋正洙：〈明末清初的鄉村統治制度的變遷〉，《學林》5，1983；〈清初鄉村統治的理想——以黃六鴻的保甲制為中心——〉，《慶尙大論文集》（人文）22，1983；〈明清時代鄉約的成立和其推移〉，《慶尙史學》1，1985。
- ⑱ 徐正欽：〈清初圈地的發展過程〉，《論文集》（安東大）5，1983。
- ⑲ 吳金成：〈睿親王攝政期的清朝的紳士政策〉，《韓右昞博士停年紀念史學論叢》，漢城，1981；〈順治親政期的清朝權力和江南紳士〉，《歷史學報》122，1989；〈明、清時代的國家權力和紳士〉，《講座中國史Ⅳ——帝國秩序的完成——》，漢城，1989；〈清朝權力的地方浸透過程——以明末、清初的江西南部地方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35，1991。
- ⑳ 金九鎮：〈明代女真社會的經濟生活樣式和其變化〉，《東洋史學研究》17，1982；〈明代女真社會和姓氏的變化〉，《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漢城，1983。
- ㉑ 金鐘博：〈明代一條鞭法的成立過程〉，《史學志》15，1981；〈明代嘉靖期的土地丈量 and 一條鞭法的出現〉，《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漢城，1983。
- ㉒ 崔甲洵：〈明清代的農民反亂〉，《講座中國史Ⅳ——帝國秩序的完成——》，漢城，1989；〈從清代宗親看族內統制〉，《東洋史學研究》15，1980。
- ㉓ 崔晶妍：〈明末——清中期的蘇、浙地域的抗租運動〉，《漢城大東洋史學科論集》10，1986。
- ㉔ 朴元煥：〈明末、清初的民眾叛亂〉，《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漢城，1990。
- ㉕ 崔震奎：〈清中期五省白蓮教亂的宗教性的動機〉，《東洋史學研究》27，1988。
- ㉖ 河世鳳：〈清代白蓮教亂期的鄉勇的構成〉，《慶大史論》2，1986。
- ㉗ 俞長根：〈十九世紀初中國東南部地域的天地會動向——以1802年的惠州叛亂為中心——〉，《慶大史論》2，1986。

間的牽連關係。<sup>28</sup> 元廷植分析乾隆年間北京的煤炭供需問題和清廷的對策。<sup>29</sup> 金弘吉整理清代前期出現在全中國的罷市問題，尤其對湖南新寧縣的個案加以更深入的分析。<sup>30</sup> 最後，吳金成，除了前述的著作以外，還從人口移動和農業及商品經濟的發展去探討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遷，又從宋代到 1900 年的長時期農業發展去重新檢討明清時代社會變遷在歷史上的意義。<sup>31</sup>

關於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權重達分析朱元璋集團和參加永樂政權的人物之思想。<sup>32</sup> 金良燮探討方孝孺的君主論和正統論。<sup>33</sup> 曹永祿研究陽明學的成立和其後來的展開。<sup>34</sup> 申龍澈探討李卓吾的歷史觀和社會思想。<sup>35</sup> 吳相勳探討王龍溪和顏元的思想。<sup>36</sup> 權重達探討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sup>37</sup> 南成勳重新檢討黃宗羲政治思想在研究觀點上的幾個問題。<sup>38</sup> 崔甲洵，在探討明清時期雜處的民間信仰的教義上常見的「三陽」說和「無生老母」信仰當中，對這些信仰的變遷和其救濟觀加以分析。<sup>39</sup> 曹秉漢研究《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思想。<sup>40</sup> 在史學史的研究上，曹秉漢又探討章學誠的史學思想。<sup>41</sup> 黃元九以韓文譯註《明史、朝鮮傳》，以出刊《

- 
- <sup>28</sup> 曹秉漢：〈從儒林外史看紳士層和商業〉，《東義史學》3，1987。
- <sup>29</sup> 元廷植：〈乾隆年間北京的石炭需給問題和其對策〉，《東洋史學研究》32，1990。
- <sup>30</sup> 金弘吉：〈關於清代前期的罷市——以乾隆 29 年湖南新寧縣為中心——〉，《歷史教育》49，1991。
- <sup>31</sup> 吳金成：〈明末、清初的社會變化〉，《講座中國史Ⅳ——帝國秩序的完成——》，漢城，1989；〈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論〉，《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漢城，1990；〈中國近世的農業與社會變化（960-1900）〉，《東洋史學研究》41，1992。
- <sup>32</sup> 權重達：〈朱元璋政權參與儒學者的思想背景〉，《人文學研究》14，1987；〈性理大典的形成和其影響〉，《中央史論》4，1985。
- <sup>33</sup> 金良燮：〈方孝孺的正統觀和君主論〉，《慶熙史學》12、13，1986。
- <sup>34</sup> 曹永祿：〈陽明學的成立和展開〉，《講座中國史Ⅳ——帝國秩序的完成——》，漢城，1989。
- <sup>35</sup> 申龍澈：〈李贄的歷史觀試論〉，《慶熙史學》11，1983；〈李卓吾的歷史人物評〉，《歷史和人間的對應》，漢城，1984；〈李卓吾的社會批評〉，《東洋史學研究》19，1984。
- <sup>36</sup> 吳相勳：〈在王龍溪思想的“無”〉，《釜山史學》6，1982；〈顏元的思維構造——明末、清初思想史的一位相——〉，《歷史和人間的對應》，漢城，1984。
- <sup>37</sup> 權重達：〈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明末、清初社會的照明》，漢城，1990。
- <sup>38</sup> 南成勳：〈黃宗羲政治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全北史學》4，1980。
- <sup>39</sup> 崔甲洵：〈明、清代宗教結社的“三陽”說〉，《歷史學報》94、95，1982；〈明、清代民間信仰的無生老母〉，《金哲俊教授華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1983；〈還源和收元——明、清代民間信仰的救濟觀——〉，《東洋史學研究》26，1987。
- <sup>40</sup> 曹秉漢：〈《紅樓夢》的社會史的分析〉，《釜山史學》，1986；〈清中期八股科舉制下的社會心理和在野士人文化的形成——以《儒林外史》的社會思想為中心——〉，《釜山史學》13，1987。
- <sup>41</sup> 曹秉漢：〈章學誠儒家史學的基本概念和其政治的意味〉，《歷史學報》103，1984。

中國正史朝鮮傳譯註》第四卷（國史編纂委員會，1990）。吳金成也介紹朝鮮時代的學者們對明史的研究。<sup>④</sup>

## 二、近代史

韓國學界對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戰爭）和此時期的研究並不活躍。俞長根在尋找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時，他認為與其歸究為英國的侵略，毋寧強調顯現出中國的內在矛盾所引發的原委。<sup>⑤</sup>方用弼以通商和關稅的問題為主探討鴉片戰爭以後的中英關係。<sup>⑥</sup>辛勝夏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研究，除了前述的著作之外，還對清廷從英法聯軍出兵到北京條約締結當中所採取的對策和其對西方認識的變化加以詳細的分析。<sup>⑦</sup>表教烈集中分析使慈禧太后取得政權的辛酉政變，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各種問題與恭親王之間的牽連關係。<sup>⑧</sup>曹秉漢在十八世紀後半以來學風當中尋求龔自珍改革思想的產生契機，尤其在章學誠史學與龔自珍經世學之間所隱藏的思想結構當中，澄清其共通的方向和連繫性。<sup>⑨</sup>李學魯探討道光年間鴉片嚴禁論的性質。<sup>⑩</sup>成惠英與柳景善皆分析魏源的經世思想和經濟策略。<sup>⑪</sup>

就太平天國運動的研究而言，朴基水以廣西省為主探究太平天國之前所發生的民眾起義。<sup>⑫</sup>金誠贊分析，在太平天國的「安民」論之結構和其「安民」政策的展開過程當中所反映的太平天國領導階層之立場，又尋找使初期革命集團發展為革命政權的內在契機。<sup>⑬</sup>河政植探討，在太平天國內的農民

④ 吳金成：〈朝鮮學者之明史研究〉，《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83。

⑤ 俞長根：〈關於阿片戰爭時的“漢奸”〉，《慶南史學》創刊號，1984。

⑥ 方用弼：〈阿片戰爭以後的清英關係（1842-51）——以通商和關稅問題為中心——〉，《人文論叢（漢陽大）》16，1988。

⑦ 辛勝夏：〈清咸豐時的英佛聯合軍和對外認識的變化〉，《東洋學》14，1984。

⑧ 表教烈：〈關於西太后政權的成立過程——辛酉政變的再檢討——〉，《東洋史學研究》21，1985；〈1860年清朝的英佛聯合軍對應〉，《釜山史學》10，1986；〈太平天國期上海官紳的“借兵助剿”論和恭親王——1860年為中心——〉，《蔚山史學》1，1987。

⑨ 曹秉漢：〈龔自珍經世思想的“史”與公羊學——有關章學誠的史學——〉，《東義史學》2，1985。

⑩ 李學魯：〈清道光年間的鴉片嚴禁論爭〉，《大丘史學》33，1987。

⑪ 成惠英：〈魏源的經世思想和經濟策〉，《東亞研究》5，1985；柳景善：〈魏源的經濟改革思想〉，《梨大史苑》22、23合輯，1988。

⑫ 朴基水：〈太平天國和華中地方的農民鬪爭〉，《成大史林》2，1977；〈太平天國以前（1830-1850）廣西民眾蜂起〉，《東洋史學研究》31，1989。

⑬ 金誠贊：〈太平天國的確立過程和安民政策〉，《東洋史學研究》27，1988。



卻在其實際層面上被設定為被支配的階層。<sup>52</sup> 金宜慶探討洪仁玕的宗教觀和儒教觀。<sup>53</sup>

就洋務運動時期的研究而言，朴赫淳以 1880 年代上海為中心分析官督商辦的企業，指出 1883 年上海的金融恐慌之主要原因為對外貿易結構上的矛盾所引起的。<sup>54</sup> 俞春根注重分析洋務運動時期清廷的海軍建設，以及與此有關涉的輪船購買問題。<sup>55</sup> 孫準植探討北京同文館在經營管理上的問題。<sup>56</sup> 崔熙在探討，作為一個引起洋務運動時期海防和塞防爭論的背景亦即洋務官僚對當代的認識以及其爭論的經過。<sup>57</sup> 權錫奉和姜判權皆分析洋務官僚的對外觀。<sup>58</sup> 尹世哲探討，在 1870 年以後，外交權落入李鴻章之手的背景。<sup>59</sup> 關於洋務時期改革思想家有柳景善和申聖旭的研究。<sup>60</sup> 鄭哲雄以清末長江中游地域為主，探討其商業活動。<sup>61</sup>

至於變法運動和清日戰爭時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閔斗基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此外，朴志焄、李賢珪、朴鍾玄和申聖旭皆各自進行這個時期幾位思想家的研究。<sup>62</sup> 金培喆探討王夫之思想在湖南地區裏傳承和變化的過程，尤其由湘軍系紳士從戊戌改革時期所提出的改革論，經過辛亥革命期的排滿論

- 
- <sup>52</sup> 河政植：〈太平天國的農民觀和其政策——以官民意識為中心——〉，《崇實史學》5，1988。
- <sup>53</sup> 金宜慶：〈洪仁玕和太平天國〉，《梨大史苑》22、23 合輯，1988。
- <sup>54</sup> 朴赫淳：〈1883年上海金融恐慌和官督商辦企業〉，《東洋史學研究》20，1984；〈1880-81年招商局運營方針論爭〉，《東洋史學研究》23，1986。
- <sup>55</sup> 俞春根：〈清末的輪船購買計劃和總稅務士代理赫德〉，《關東史學》1，1982；〈關於清末輪船購買計畫的挫折的一考察〉，《關東史學》2，1984；〈清末艦隊解散事件的檢討〉，《論文集》（關東大）14，1986。
- <sup>56</sup> 孫準植：〈關於清末新式學堂的一考察——以北京同文館的變遷和其運營過程為中心——〉，《中央史論》6，1989。
- <sup>57</sup> 崔熙在：〈1874-5 年海防、陸防論議的性格〉，《東洋史學研究》22，1985；〈洋務派的臺灣事件對策論和“清議”〉，《歷史教育》39，1986。
- <sup>58</sup> 權錫奉：〈清同治年間洋務官僚的對日觀〉，歷史學會編，《日本的侵略政策史》，漢城，1984；姜判權：〈洋務官僚的清佛戰爭對策論〉，《大邱史學》38，1989；〈清佛戰爭期清流的對佛對策論〉，《大邱史學》40，1990。
- <sup>59</sup> 尹世哲：〈天津教案和清朝外交的變容——有關三國通商大臣專役制的廢止——〉，《歷史教育》30、31 合輯，1982。
- <sup>60</sup> 柳景善：〈鄭觀應的改革思想研究——以商戰思想為中心——〉，《梨大史苑》20，1983；申聖旭：〈黃遵憲的改革思想〉，《東方學志》39，1983。
- <sup>61</sup> 鄭哲雄：〈清末揚子江中流地方的商業活動〉，《東洋史學研究》39，1992。
- <sup>62</sup> 朴志焄：〈關於譚嗣同的政治思想〉，《梨大史苑》18、19合輯；1982；李賢珪：〈康有為的經濟論〉，《東洋史學研究》29，1989；朴鍾玄：〈章炳麟的改革和革命〉，《歷史教育》45，1989；全容萬：〈關於梁啟超的變法論〉，《東亞研究》6，1985。

到民初對王夫之表彰，其中所產生的王夫之思想之演變過程。<sup>63</sup>

關於義和團運動的研究而言，崔熙在首先分析，使得湖南人保持根深蒂固的反基督教之傳統背景，進而探討由周漢在 1891 年 5～9 月之間引起的反基督教運動的經過和張之洞的對策。<sup>64</sup> 許元探討，十九世紀後期反基督教運動最激烈的四川省對 1898 年教案的處理過程。<sup>65</sup> 金鍾健主要探討義和團運動初期在山東地區產生仇教運動的過程和在其成員、組織及呼口號裏所反映的性質。<sup>66</sup> 車瓊愛探討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其與秘密社會聯合活動的展開過程以及清廷的對策。<sup>67</sup>

至於辛亥革命時期的研究而言，首先，閔斗基在其著作裏對辛亥革命的性質所提起的觀點是值得注意的。<sup>68</sup> 作者在研究辛亥革命當中，深入檢討對反清與反帝的評估、共和制的意義、對「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理解以及「革命情勢」的性質，進而在國民革命的前提之下將辛亥革命理解為「民國革命」之第一階段（又稱第一次民國革命），再將五四運動理解為其第二階段，這是他獨特的研究觀點。尹惠英透過與有離心力的地方分權化對抗的中央集權化努力的這一面以及革命派和改革派對袁世凱認識的另一面，來重新評估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和其角色。<sup>69</sup> 金衡鍾首先以地域史的觀點去探討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政權在上海逐漸穩定的過程，又探討辛亥革命時期在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爭論中所反映的反滿革命論，以及革命派的革命瓜分論的內容與性質。<sup>70</sup> 張義植探討清末教育改革與科舉制廢除的過程。<sup>71</sup> 陸銀均探討袁

<sup>63</sup> 金培詰：〈清末民初湖南的王夫之思想〉，《歷史學報》114，1987。

<sup>64</sup> 崔熙在：〈1890-92 年在湖南省的反基督教宣傳的強化和其背景〉，《史學志（壘國大）》21，1987；〈周漢教案和張之洞的對應〉，《歷史教育》43，1888。

<sup>65</sup> 許元：〈清末的基督教和帝國主義——以19世紀末四川省的教案處理過程為中心——〉，《釜山史學》，1987。

<sup>66</sup> 金鍾健：〈1899 年山東省平原縣的仇教運動〉，《慶北史學》9，1986；〈冠縣義和團的仇教運動〉，《大邱史學》39，1990。

<sup>67</sup> 車瓊愛：〈關於義和團運動的性格〉，《梨大史苑》20，1983；〈關於義和團的形成過程〉，《梨大史苑》22、23 合輯，1988。

<sup>68</sup> 閔斗基：〈「民國革命」試論——兼之對作為現代史起點的「辛亥革命」性質的理解——〉，《中國國民革命之分析的研究》，漢城，1985。

<sup>69</sup> 尹惠英：〈袁世凱帝制運動的歷史性格——以集權體制和分權傾向的葛藤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15，1980；〈袁世凱（1859-1916）和辛亥革命〉，《高柄翊先生同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1984。

<sup>70</sup> 金衡鍾：〈上海的辛亥革命展開過程——革命政權和各政治勢力的對應——〉，《東洋史學研究》20，1984；〈辛亥革命中的反帝問題認識和實踐——「革命瓜分論」和革命派的對應——〉，《東洋史學研究》30，1989。

<sup>71</sup> 張義植：〈清末對科舉制廢除的各界反應和舊科舉層對策〉，《東洋史學研究》28，1988；〈清末的科舉制廢止過程研究〉，《歷史學報》103，1984；〈關於清末的教育改革〉，《史叢》30，1986。

世凱帝制復活運動的背景，又分析在東南亞地區發生的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對立、爭論和其意義。<sup>72</sup> 李美喜探討 1911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設立過程。<sup>73</sup> 此外，尹世哲分析宋教仁對社會主義思想所採取的態度，<sup>74</sup> 千聖林分析劉師培和章炳麟的思想。<sup>75</sup>

### 三、現代史

首先，就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而言，羅弦洙分析日本政府在五四運動的展開過程當中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和其與英美之間的關係。<sup>76</sup> 白永瑞集中焦點於朱執信去分析五四運動期間由接近孫文的人士以同人方式經營的《建設》雜誌，又探討 1920 年代中國大學生的日常生活裏所反映的認同之混亂問題。<sup>77</sup> 吳在環探討五四時期（即 1920 年代初期）知識分子的反基督教運動。<sup>78</sup> 曹焄總括這個時期民族工業的發展問題。<sup>79</sup> 此外，申延澈、裴京漢、申一燮、申聖旭、咸洪根和金鐘圓皆各自以孫中山、胡適、陳獨秀和吳虞等個人為主研究這個時期的思想史。<sup>80</sup>

至於 1920 年代軍閥史的研究而言，首先，辛勝夏研究 1910 年末至 20 年代初軍閥成形的背景以及北洋軍閥和西南軍閥的性質。<sup>81</sup> 尹世哲將地方主

<sup>72</sup> 陸銀均：〈有關袁世凱帝制復活運動背景的研究〉，《論文集（淑大）》25，1984；〈清末南洋地域革命派新聞的活動〉，《金俊樸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漢城，1983。

<sup>73</sup> 李美喜：〈關於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淑大史論》13、14、15合輯，1989。

<sup>74</sup> 尹世哲：〈宋教仁（1882-1913）和社會主義〉，《高柄翊先生回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1984。

<sup>75</sup> 千聖林：〈章炳麟（1869-1936）的資本主義批判——以《民報》時期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38，1992。

<sup>76</sup> 羅弦洙：〈日本政府的五·四運動對應〉，《歷史教育》36，1984。

<sup>77</sup> 白永瑞：〈《建設》雜誌和朱執信的作用——五·四期中國國民黨指導層的思想摸索——〉，《東洋史學研究》19，1984；〈1920年代中國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體現的正體性危機——與傳統的家族制的衝突——〉，《東洋史學研究》39，1992。

<sup>78</sup> 吳在環：〈五四運動期前後中國知識人的反基督教論爭〉，《歷史學報》111，1986。

<sup>79</sup> 曹焄：〈關於中國土著資本的發展——以第 1 次世界大戰以後上海地域土著棉工業為中心——〉，《成大史林》6，1990。

<sup>80</sup> 申延澈：〈五·四運動以前孫文的革命思想和行動〉，《人文科學（成大）》11，1982；裴京漢：〈關於陳獨秀的初期思想〉，《釜山女大論文集》14，1983；申一燮：〈陳獨秀的康有為論——陳獨秀對康有為的孔教論和立憲君主論批判——〉，《湖南大論文集》11-1，1990；申聖旭：〈中國五·四期（1915-9）個人主義思想研究——以胡適和陳獨秀為中心——〉，《東方學志》29，1981；咸洪根：〈中國新文化運動期的儒教批判——吳虞的論說為中心——〉，《梨大史苑》22、23 合輯，1988；金鐘圓：〈五·四期的“孔教”運動和儒教批判〉，《釜山大人文論叢》35，1989。

<sup>81</sup> 辛勝夏：〈1920 年代中國的政治和軍閥——以 10 年代末和 20 年代初為中心——〉，《中國研究》2，1980。

義分成洋務時期 Regionalism、辛亥革命時期 Provincialism 和軍閥時期 Warlordism 來做分析。<sup>②</sup>金世昊探討 1920 年代前期在湖南以地方軍閥掌握軍政的趙恒惕逐漸鞏固其支配體制的過程。<sup>③</sup>林地煥研究民初四川軍閥的地區支配和其鹽政。<sup>④</sup>

有關國民革命時期的問題大致上是韓國學界最活躍地進行研究的部分。有關這個部分的研究已有前述的三卷共同研究著作。此外，閔斗基首先還提出，中國國民黨在改組以前作為中間階段的「改進」與這個「改組」之間有任何關聯的問題，然後進一步指出，國民黨的「改進」雖然是黨內的合作（意謂黨內整合），但孫文卻應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而採取更有積極的「改組」（意謂重組）路線。他又在如此的認識之下對國民革命時期領導者進行個案研究，尤其將這個時期領導者之一徐謙描繪為「政客型革命家」的地位。<sup>⑤</sup>羅弦洙首先研究，國民政府對其北伐初期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之一，即 2.5% 暫定附加關稅的問題，所因應的措施，再以這樣的觀點指出北伐初期極為重要的 1926 年 10 月國民黨聯席會議的意義。他又指出，廣東政府時期所採取的大眾之反帝政策，雖然導致廣東政府加強其權力基礎的效果，但這種政策卻反而在武漢政府時期成為其崩壞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他指出，這個政策造成武漢政府崩壞的原因，實與武漢地區的經濟結構有關。<sup>⑥</sup>白永瑞認為，學界已往在分別國民黨內部派系當中所使用的左右派之分別概念是不切當的，從而據此新的觀點透過其核心人物之一鄒魯的活動去探討西山會議的性質。<sup>⑦</sup>裴京漢首先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兼有合作與對立、聯合與鬥爭等雙面的國共合作時期當中，對其合作的對方即孫文和國民黨做任何評估和因應。然後，再探討孫文去逝之前的反直三角同盟，以及孫文與此牽連的情況。進而分析在北伐過程當中出現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以及蔣介石對

② 尹世哲：〈近代中國的地方主義〉，《東亞文化》21，1983。

③ 金世昊：〈1920 年代初趙恒惕軍閥政權的政治性格〉，《歷史學報》113，1987。

④ 林地煥：〈民初四川地域軍閥和四川鹽政〉，《全北史學》-13，1990。

⑤ 閔斗基：〈中國國民黨的改進和改組——關於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改進”階段的性格試論——〉，《東方學志》33，1982；〈徐謙（1871-1940）：政客和革命家間——為國民革命期政治指導者像的一接近——〉，《東洋史學研究》33，1990。

⑥ 羅弦洙：〈北伐初期國民政府的對外關係的展開——以 2.5% 暫定附加關稅徵收為中心——〉，《歷史學報》99、100，1983；〈關於 1926 年 10 月的國民黨聯席會議〉，《江原史學》3，1987；〈武漢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政策〉，《江原史學》5，1989。

⑦ 白永瑞：〈中國國民革命期西山會議派的性格再檢討——以鄒魯和廣東大學糾紛為中心——〉，《歷史學報》121，1989。

反蔣運動的因應。<sup>88</sup>此外，李昇輝探討，20年代初期上海的商工階層因不承認北京政府而提起「商人政府論」的原委和其意義。<sup>89</sup>

至於中國共產黨史的研究而言，全寅甲透過中國共產黨和上海總工會在上海所扮演的角色，來提出一個與學界一般的共識不同的見解，即是其領導力量的局限性。<sup>90</sup>林相範分析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成立與其初期領導者的思想及活動。<sup>91</sup>方用弼對與中國共產黨活動有關係的農民運動發表幾篇論文。<sup>92</sup>具秀美也檢討湖南地域的農民運動。<sup>93</sup>

至於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國民政府時期的研究而言，李炳柱乃是首創最積極地研究的學者。首先，他力圖避開將國民政府喪失大陸的原因從外在因素中尋求的觀點，而以初期國民革命理念的變質、保守的和權威性的政治傾向以及政治的個人化和軍事化等內在因素來說明其原因。其次，他分析教育改革家陶行知的生平和教育活動。最後，他概括地整理，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與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對應，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推動改善的鄉村建設運動之經過，來提示這個運動在現代史上所佔有的地位和意義。<sup>94</sup>此外，姜明喜分析，30年代國民黨政府在江蘇省內推動合作社運動的背景、其展開的情況以及其經營的實態。<sup>95</sup>林地煥概括導致廢兩改元的過程和其意

<sup>88</sup> 裴京漢：〈中國共產黨的對國民黨評價和對應——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半期為中心——〉，《釜山女大史學》1, 1983；〈反直三角同盟和孫文的北上〉，《釜山史學》8, 1984；〈蔣介石和4·12政變〉，《東洋史學研究》38, 1992。

<sup>89</sup> 李昇輝：〈1920年代初上海總商會的政治性格〉，《東洋史學研究》20, 1984。

<sup>90</sup> 全寅甲：〈5·30運動和上海總工會——有關上海5·30運動的性質——〉，《東洋史學研究》38, 1992。

<sup>91</sup> 林相範：〈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創立和初期活動〉，《東洋史學研究》34, 1990。

<sup>92</sup> 方用弼：〈1920年代廣東省農民運動的起源〉，《中蘇研究》5-3、4, 1981；〈軍閥陳炯明的對農民政策（英文）〉，《亞細亞研究》28-1, 1985；〈澎湃的革命試圖（1921-22）〉，《比較文化研究（漢陽大）》4, 1985；“Landlords and Peasants under Warlordism in the East River Region in the 1920s”，《中國學論叢》，1983；“Peng pai and Revolution from Above in Haifeng, 1921-1922,”《史叢（高麗大）》131, 1987；“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Peng pai in Haifeng, 1922-1923,”《中蘇研究》12-2, 1988。

<sup>93</sup> 具秀美：〈關於中國湖南農民運動——以北伐時期的土地問題為中心——〉，《成大史林》6, 1990。

<sup>94</sup> 李炳柱：〈國民政府部大陸喪失原因考——以南京時代的政治特性為中心——〉，《東亞研究》6, 1985；〈中共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1951-1953）〉，《東亞研究》10, 1986；〈對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管見〉，《梨大史苑》22、23合輯, 1988。

<sup>95</sup> 姜明喜：〈南京政府（1927-1937）下的合作社運動展開和其限界——以江蘇省信用合作社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31, 1989。

<sup>96</sup> 林地煥：〈關於廢兩改元〉，《全北史學》11、12, 1989。

義。<sup>97</sup> 梁必承檢討蘇州在共產革命之前的農村經濟問題。<sup>98</sup>

就抗日戰爭的研究而言，李洪吉批判，在西安事變之前對於抗日運動有曲解的認識，以檢討學生、知識分子、國民黨和共產黨各個對抗日所採取的態度。<sup>99</sup> 辛勝夏將西安事變產生的背景，以抗日救國運動的展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立場以及兩人與中共接觸的過程為主進行研究。<sup>100</sup> 白永瑞以知識分子、中共和國民黨的動向為中心研究國共合作的成立過程。<sup>101</sup> 金正賢探討，在30年代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過程當中以救國會為中心的知識分子之活動。<sup>102</sup> 此外，李陽子探討宋慶齡。<sup>103</sup> 至於這個時期的思想，李洪吉分析胡適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和其西化論的性質，還提到新生活運動。<sup>104</sup> 曹秉漢檢討，新生活運動在歷史上的背景和其動因以及其運動在思想上的邏輯性。<sup>105</sup>

金稔子獨自繼續研究婦女運動史。她這些研究的範疇不僅包括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對婦女運動所採取的政策，還擴大到自辛亥革命至中共成立以後即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婦女運動史。<sup>106</sup>

#### 四、結 語

如上所述，簡單地介紹了韓國學界在 1980 年以來所發表的有關明清、近現代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當然，其研究著作的數量更多，但因篇幅的關係

<sup>97</sup> 梁必承：〈中國農村的土地集中和飢餓地帶——以共產革命以前的蘇州為中心——〉，《（建國大）學術志》35，1991。

<sup>98</sup> 李洪吉：〈全面抗日以前的中國的對日態度〉，《歷史學研究》（全南大）11，1983。

<sup>99</sup> 辛勝夏：〈西安事變——以其背景和和平的解決為中心——〉，《中國研究》（楡國大）3，1987。

<sup>100</sup> 白永瑞：〈抗日戰爭期中國民族運動的課題和統一〉，《創批》1987-夏卷。

<sup>101</sup> 金正賢：〈1930年代中國知識人的政治活動和理念——以救國會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7，1988。

<sup>102</sup> 李陽子：〈宋慶齡的反蔣、抗日救國運動〉，《東義史學》5，1989。

<sup>103</sup> 李洪吉：〈胡適的東西文化觀〉，《歷史學研究》10，1981；〈新生活運動的背景〉，《歷史學研究》8，1978。

<sup>104</sup> 曹秉漢：〈1930年代新生活運動和蔣介石的政治觀——儒教傳統和國家主義“革命”——〉，《東義史學》5，1989。

<sup>105</sup> 金稔子：〈關於中共女性運動〉（1-4），《中共的現實》（亞細亞問題研究所）1、2，1980、1981，《亞細亞研究》25-2、26-2，1982、1983；〈廣東婦女運動考〉，《東亞研究》6，1985；〈關於中國國民黨婦女政策研究〉，《梨大史苑》22、23 合輯，1988；〈中國革命過程的婦女人力動員政策研究——以共產黨婦女政策為中心——〉，《（梨花女大）女性學論集》7，1990。

不能一一介紹。因此，有關韓中關係史的研究著作和未公開出版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就省略了。不過，更具體的研究目錄都由東洋史學會在每年底整理刊載於〈東洋史學研究〉「國內東洋史關係論文要目」和「國內東洋史關係學位論文目錄」之中，請參考。

由上所述的內容可知，1980年代可說是為韓國的中國史學界建立新紀元的時期。但韓國學界的研究仍然難免有許多不足的部分。例如，目前的研究情形仍然過於集中在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兩方面，有關能夠澄清社會結構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則有待加強。有關中國共產黨史和30、40年代的研究似乎是空白。其原因之一還是研究人員的嚴重不足，而且基礎資料的缺乏也是不可忽視的另一個原因。

儘管如此，一些論文和專著早已以中文、日文和英文翻譯介紹了，因此世界學界逐漸開始矚目韓國學界的研究水平。今後的研究環境條件勢必有所改善，筆者相信韓國的近代中國史研究一定有飛躍的進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三種□

膠澳專檔（光緒二十三年——民國元年）

十六開 一冊 422頁 精裝400元

保薦人才、西學、練兵（光緒三年——民國元年）

十六開 一冊 201頁 精裝300元

澳門專檔（一）（同治元年——宣統元年）

十六開 一冊 564頁 精裝500元

### □目錄彙編兩種□

外交檔案目錄彙編

十六開 二冊 734頁 精裝1000元 平裝900元

近史所檔案館藏中外地圖目錄彙編

十六開 二冊 1446頁 精裝2800元 平裝2700元

函購八折，郵費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E CHINESE EXPERIENCE

Zhang Kai-yuan & Peter Tze-ming Ng\*

The Theses of John K. Fairbank's 'impact-response' paradigm and Joseph Levenson's 'tradition-modernity' paradigm have long been the classical framework adopted by American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sup>①</sup> With the coming of the book,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in 1984, Paul Cohen put forward a new premise which was then became popular among the American sinologists.<sup>②</sup> The so-called 'China-centered Approach' is found especially relevant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past decade have been experiencing drastic changes in historical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

\* Prof. Zhang Kai-yuan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 Peter Ng is a Lecturer at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oth of them are Research Fellows at Yale University, 1991-1992.

① See Fairbank and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and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in 3 volu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1965)

② See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I

Ever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took over China in 1949,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adopted an exclusive, Marxist view in their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formerly Christian colleges were at that time seen as mere mean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by Western powers. Hence, they did not have any positiv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It was only by the end of 70s that scholars in China were able to enjoy more academic freedom under the open door policy. Chinese historians then attempted to break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ogmatic constraint and move ahead to develop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y began to value the importance to 'liberate thought' (解放思想)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实事求是).

During the 80s,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attempt seriou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Some, like the scholars a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attempted even to retriev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ir own university (formerly known as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was then seen a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crucial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to the history of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as well as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Western relationship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On June 1-3, 1989,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Pre-1949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was held a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in Wuhan, mainland China. It was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such kind held in mainland China for the past forty years. Participants came all over mainland China from Beijing,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Fujian, Hangzhou and Wuhan. There were about ten overseas schola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Hong Kong. Most of them were professors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cluding a handful of archivists. More

than thirty papers wer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and twenty four were chosen and compiled into a book entitled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s* (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sup>③</sup> This wa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such topics and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Hence, it i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s held on June 1-3, 1991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Nanjing.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w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Participants were from Mainland China, United States, Canada, Hong Kong and Taiwa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t was for the first time a professor from Taiwan was invited. Prof. Qi Shi Hao w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Being a graduate of Ginling College, Prof. Qi could share with the participant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student of Ginling College in the 1940s. There were again thirty presentations at the conference and the papers will soon be published too.

Besides, there have been two other workshops held in February 1990 and March 1991, both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Most of the papers collected in the workshops were in English and will soon b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II

We are happy to see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ve eventually broke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which had brought negative results to any research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Nowadays no one would question that in the past 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ristian universities might have had association of some

---

<sup>③</sup> The book was co-edited by Zhang Kai-yuan and Arthur Waldron and was published by Hube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May, 1991.

kind with western colonization and might have also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religious fervour akin to 'Christian Occupation in China', which resulted in strong criticisms and repulsion by the Chine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vertheless, Chinese scholars are now more ready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is was but a partial picture about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perhaps too one-sided to be true. As it was explicitly stated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the popular view was biased 'because there was no clear distinction made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its religious role which were later becoming less significant in Christian colleges; and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made between the norma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the imperialistic policies pressed upon by western powers'. ④ Today, Chinese scholars are learning to put aside sensitive elements behind their nationalistic fervour and historical bias so that they can attempt serious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an open attitude, adopting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objective and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es. This is a pre-requisite to any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research in China. We are glad to report that such statement was re-affirmed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⑤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 in the two conferences held in China, there are indeed some fascinating trend of development worth reporting. We shall summarize them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 A. Research Content and Depth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in 1989 suggested that preliminary researches were underway. Chinese scholars were beginning to retrieve the history of their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For instance, there were paper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

④ Read Prof. Zhang's opening speech at the Wuhan Conference. See Zhang and Waldron (ed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e* (Hubei: Hube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1) p. 3.

⑤ For the original statement, see *ibid.* pp. 1-4.

Soochow University', ⑥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John Leighton Stuart', ⑦ 'On Huazhong University's Moving West'⑧ and 'A Hard Transform: Francis Wei and Huazhong University in the Period of Founding of the PRC'. ⑨

In the Nanjing conference in 1991, scholars began to articulate and attempted to address to som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For instance, Xu Yi Hua and Shi Jing Huan brought up the issue of objective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his paper, 'Education and Religion: St. John's University as a Means of Evangelization', Xu raised doubts 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evangelistic works in St. John's University. ⑩ Shi, on the other hand, presented a paper on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Modernist Educa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Schools in China'.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Calvin Mateer and John Leighton Stuart, Shi argued that som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ere shifting towards the modernist view on education in China as many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did in the United States. ⑪ A sense of history and change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was thus evolved. And the issue of the rol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will continue drawing attention from the scholars in the future conferences. ⑫

⑥ See Zhang Meng Bai'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 Description of the Founding of Soochow University' in *ibid.* pp. 189-198.

⑦ See Chen Shi Wei's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John Leighton Stuart' in *ibid.* pp. 164-188.

⑧ See Yu Zi Xia, in *ibid.* pp. 301-311.

⑨ See Ma Min, in *ibid.* pp. 319-338.

⑩ Xu is working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American Studies in Fud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Ph. D. candidat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and his thesis is on the history of St. John's University.

⑪ Shi Jing Hu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he completed h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in 1989, which was published by Men Wei Publishing Co. in Taiwan in 1991, entitled: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Calvin Mateer and John Leighton Stuart in China*.

⑫ Scholars may read also a former paper by Peter Tze Ming Ng, 'The Rol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Serving the Educational Enterprise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Lingnan University, Canton'. See Ng, in Zhang and Waldron (eds.), *op. cit.* pp. 241-259.

There were other papers which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to reflect upon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r analyse various features of campus culture. They were: Zhou Hong Yu's 'Huazhong University: A Miniatur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up>⑬</sup> Sun Hai Jing's 'So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Ginling College';<sup>⑭</sup> and Li Yong Ning'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and Their Continuity of Campus Culture in Lingnan University'.<sup>⑮</sup>

### B. Scope of Research

The Conference at Nanjing also witnessed to a trend of widening the scope in the stud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 were attempts to relate the work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to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For instance, there were papers relating Christian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such as Prof. Hu Jing Zhong's excellent paper o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sup>⑯</sup> Lu Yong Ling et al presented a paper on 'From Chen Tan (Aurora) University to Fudan University—A Study of Ma Xiang Bo's Educational Thought'.<sup>⑰</sup>

There were other papers which focussed on the social concern or actions from the faculty or students i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For instance, Xu Hai Yan attempted a paper on 'The Concern for Social Service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i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

<sup>⑬</sup> Zhou is a lecturer at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sup>⑭</sup> Sun Hai-jing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up>⑮</sup> Li Yong Ning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Guangdo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p>⑯</sup> Hu Jing-Zh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Fudan University. He co-authored the paper with his colleague, Mr. Shao Yi Dan.

<sup>⑰</sup> Lu Yong-Ling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She wrote the paper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including Dr. Ruth Hayhoe from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a';<sup>⑮</sup> Wang Yun-lai presented a paper on 'The Contribution of University of Nanj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in China'<sup>⑯</sup> and Chen Shi-wei submitted a paper on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Faculty of Yenching University'.<sup>⑰</sup>

### C.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problem of methodology has been raised and discussed since the Wuhan conference. Prof. Zeng Ju-shéng presented a paper on 'Some Issues on the Study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sup>⑱</sup> which drew the participants to the attention of some of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On the whole, Chinese scholars were consciou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methods which they had been using. They were attempting, however, to build upon it a new premise that could carry a more dynamic sense of development, which can pave way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history.

Two papers were presented for follow-up discussion at the Nanjing conference. Ren Li-jian submitted a paper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An E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Research Methodology',<sup>⑲</sup> and Prof. Gao presented a paper on 'A Dialectical Thesi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sup>⑳</sup> Much discussion were aroused and though there were no final position reached, the statement of 'seek truth from facts' was re-affirmed.

---

⑮ Xu Hai-yan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⑯ Wang Yun-lai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⑰ Chen Shi-wei received his M. A. in History at Beijing University. He is at present a Ph. D. candida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SA.

⑱ See Zeng, in Zhang and Waldron (eds.), *op. cit.* pp. 39-43. Ze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angzhou University.

⑲ Ren-li-jian is the vice-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⑳ Gao Shi-li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scholars striving hard to work out new premises and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some scholars who began to adopt approach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To quote two of them, there was one paper o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rflow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up>②</sup> the other one was Li Yong-ning'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and Their Continuity of Campus Culture in Lingnan University'.<sup>③</sup> The latter paper is an excellent one in applying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n the study of campus culture in Lingnan University. We are hoping that mor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will be adopted in future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 III

Research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indeed a new and challenging subject for Chinese scholars. The work was just started a decade ago.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issues to be explored and much problems lying ahead.

Firstly, there are much archival materials essential to the study but are scattered all over China.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rchives are now preserved in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 Library in Nanjing; some are kept in the provincial, city archive libraries in various places. Some are remained in those librarie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once been or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erly Christian colleges. There is still a small portion kept by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Committee (Protestant & Roman Catholics) in Shanghai. At present, some scholars are beginning to retriev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ir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For instance, Zhang Kai-yuan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been building

---

② The paper was presented by Hu Jing Zhong, Wang Lei-quan and Shao Yi Da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ee *ibid.* pp. 12-24.

③ See note 16.

up an archive library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② Ren Li-jian and his researchers are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in celebrating its centenary. ③ The archival materials kept in the two universities are now open to outsid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archives of the other 13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re still scattered and kept closed in various places. Many are still not accessible to researchers from outside.

Secondly, even though many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ready freed themselves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there are still many who hold firm the traditional, exclusive view on Christian colleges. Many still look upon Christian colleges as 'weapon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foreign faculty or missionaries as 'spies', and Christian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s 'running dogs' or 'unpatriotic'. Henc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remains a sensitive issue for many scholars. Against such an environment, much effort are needed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ose scholars who dare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attempt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Thirdly, for the same reason,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scarcely received adequate support from the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or from the govern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are exceptional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deep-rooted linkage with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and partly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verseas. Most scholars in China are lack of funding to attempt any research which requires extra expenses to travel in searching for materials, to arrange interviews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 or to make large amount of photo-copies. The two conferences were exciting events for Chinese scholars who could then have closer contact with fellow researchers and share one another's research findings. Yet these were

---

② A brief catalogue has been produced, which can be obtained directly from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③ The book, *A Hundred Year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1888-1988* was publish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simply impossible without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Henry Luce Foundation.

#### IV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e now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At present, Chinese researcher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co-ordinating center or an information unit (within a university or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researchers and establishing linkage among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associated with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 newsletter may be published once or twice a year to help building linkage for communication and for exchange of ideas among researchers in the area.
2. Since the archival material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China and there is still not any guide to tell scholars the whats and whereabouts of the materials. Hence, an equally urgent task is to collaborate Chinese researchers together to compile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he Chinese archives. Such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is a prerequisite to any serious research and is certainly another way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Chinese scholars who are attempting research in the area. As we know,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ready been produced by Dr. Archie Crouch et al in the States.<sup>②</sup> There is another project led by Fr. Jerome Heyndrickx in Belgium to produce a similar guide to archival materials kept in Europe. 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a scholars' guide to archives in China or Asia will also be produced alongside with the other two

---

② The book entitle, *Christianity in China—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by Archie Crouch et al) was published by M. E. Sharpe, Inc. in 1989. A second edition is underway.

guides. ②

3. At the moment, Chinese researches in the area are mostly initiated by elderly scholars who were graduated or had been once teaching in the forme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Young scholars are yet to be emerged. It is our hope that there are more project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o encourage young Chinese scholars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research in this area, so that research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continue even in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② Dr. Archie Crouch has presented a paper on 'Model for a Global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ristianity in China'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held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on September 5-9, 1990. He had a vision of producing a global bibliographical guide which we very much wish.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 |      |                     |             |
|------|---------------------|-------------|
| (33)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 215頁        |
|      | 黃俊傑訪問、紀錄            | 精350元 平300元 |
| (34) |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           | 122頁        |
|      | 張朋園訪問 鄭麗榕紀錄         | 精250元 平200元 |
| (35) |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           | 172頁        |
|      | 郭廷以、沈雲龍訪問 謝文孫、劉鳳翰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6) |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 148頁        |
|      | 楊翠華訪問 楊明哲、萬麗鵬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7) | 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 222頁        |
|      | 郭廷以、王聿均訪問 劉鳳翰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9) | 黃通先生訪問紀錄            | 516頁        |
|      | 陸寶千訪問 鄭麗榕紀錄         | 精450元 平400元 |
| (40) | 賈蕪茗先生訪問紀錄           | 226頁        |
|      | 王 萍訪問 洪慧麗、蔡說麗紀錄     | 精350元 平3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國史館館藏臺灣工業發展檔案介紹

許 月 順\*

國史館館藏檔案中，與臺灣工業發展關係最密切的是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資委會）檔案中的臺灣案卷。

資委會早在民國21年（1932）即已成立，但其經營臺灣工礦事業則遲至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對於戰後收復區各項事業的處理，皆由行政院制定法規以實行，其中關於工礦事業，凡與資委會經營的事業性質相同者，經敵偽產業處理局審議後，交由資委會接辦，因此自民國 35 年（1946）5 月開始，資委會陸續接辦日本人在臺灣設立的工礦事業。除此之外，資委會還創辦臺灣金銅礦務局等各項事業，在臺灣工業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所以研究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資委會檔案是不可忽視的一項史料。

本文擬就此介紹資委會檔案，以下就各相關案卷分類整理，並將該史料年代列入括號中。

### 一、總 類

1. 資委會接收敵產事宜、處理敵產辦法（民國 34~37 年）
2. 資委會各單位接收及估價敵產情形（民國 37 年）
3. 臺灣日產處理委員會接辦敵產估價簡表（民國 36 年）
4. 復員以來資委會工作述要（民國 37 年）
5. 擬定臺灣省公營事業範圍（民國 36 年）
6. 資委會由滬疏運來臺物資（民國 38 年）
7. 請省府飭有關機關對配售物品時會屬單位亦得享受（民國 38 年）
8. 資委會各級長官蒞臺視察（民國 36 年~38 年）
9. 經濟部與臺灣省主席會談

---

\* 國史館助修

- 10.呈報臺拓會社處理經過情形（民國 36 年～37 年）
  - 11.臺南縣市警局查緝私運鎊砂案（民國 37 年～38 年）
  - 12.基隆市警察緝獲金鋼砂案（民國 37 年）
  - 13.資委會產銷量表（民國 37 年～40 年）
  - 14.臺灣各事業單位呈報生產設備能力（民國 39 年）
  - 15.省參議會建議案（民國 37 年～38 年）
  - 16.戰後工業建設綱領（民國 40 年）
  - 17.臺灣各事業董事會開會報告（民國 40 年）
  - 18.臺灣各事業董事會開會報告（民國 37 年）
  - 19.資委會在臺各事業機關月報、工作簡報、廠務報告（民國 35 年～37 年）
  - 20.臺灣各單位檢討會議記錄（民國 37 年～40 年）
  - 21.各單位呈送工作進度表及職員錄（民國 37 年）
- 以上共計 57 卷、567 件。

## 二、人 事

- 1.大會調臺人員及調查表（民國 36 年～38 年）
  - 2.留用日籍人員（民國 36 年～37 年）
  - 3.資委會所屬單位 35～41 年職員名冊（民國 35 年～41 年）
  - 4.人事任免（民國 37 年～38 年）
  - 5.各單位調派人員（民國 36 年～38 年）
  - 6.臺省機構日治時代與現有人數比較（民國 36 年）
  - 7.選用各校應屆畢業生（民國 36 年～37 年）
  - 8.職工獎懲（民國 37 年）
  - 9.職工考績晉薪案（民國 37 年～38 年）
  - 10.資委會團體壽險辦法（民國 40 年）
- 以上共計 40 卷、685 件。

## 三、資 金

- 1.臺灣各事業籌議週轉資金及增資案（民國 37 年～40 年）
- 2.資委會國營民營生產計畫、數量、流動金表、週轉金數表（民國 37 年～38 年）
- 3.與臺銀訂約借款（民國 35 年～38 年）

- 4.各事業單位借款情形案（民國 35 年～37 年）
  - 5.各單位請撥週轉金、遣散費（民國 38 年）
  - 6.各單位呈報 36 年度、37 年度營業收支盈虧大數（民國 36 年～37 年）
  - 7.臺省各事業各項外幣貸款及央行結匯數（民國 37 年）
- 以上共計 23 卷、326 件。

#### 四、材 料

- 1.資委會銅料輸入配額
  - 2.資委會臺灣各事業單位器材庫存調查（民國 39 年）
  - 3.資委會需要物資單（民國 39 年～40 年）
  - 4.臺省內海送煤炭數量分配表（民國 37 年）
  - 5.疏運高雄碼頭積存器材（民國 38 年）
  - 6.臺灣水泥生產配售統計表、各單位水泥申請及配購（民國 37 年）
  - 7.臺省水泥分配、電力分配、油料分配、臺省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會議（民國 38 年～39 年）
  - 8.資委會材料供應處工作月報及銷售報表（民國 39 年）
- 以上共計 18 卷、232 件。

#### 五、資委會臺灣辦事處

- 1.調用人員、人員到職（民國 36 年）
- 2.員工名冊、各單位送臺辦處職員錄及名冊（民國 35 年～38 年）
- 3.人員考績、員工壽險、發給年終獎金、員工制服（民國 35 年～38 年）
- 4.各單位接收前彼此間各項債權務股權處理案（民國 35 年～36 年）
- 5.各事業與臺銀債權債務情形案（民國 35 年～36 年）
- 6.各事業生產情形及資金概況（民國 38 年）
- 7.調整員工待遇、擔保借貸款、經常費預算案（民國 38 年）
- 8.年度概算書（民國 35～36 年）
- 9.追加概算及經費概算（民國 36 年）
- 10.借款辦法（民國 35～38 年）
- 11.各單位物資倉庫狀況報告（民國 38 年）

- 12.成品原料、物資外匯調查(民國 38 年)
  - 13.由滬疏運來臺物資(民國 38 年)
  - 14.各單位託購器材(民國 36~38 年)
  - 15.各單位產品價格(民國 35~38 年)
  - 16.各單位營業收入額及員工人數(民國 38 年)
  - 17.各單位年度營業總收入(民國 36 年)
  - 18.各單位產銷資料(民國 36 年)
  - 19.工作概況(民國 37 年)
  - 20.業務、待遇、土地及聯席會議等記錄(民國 35 年~38 年)
  - 21.各事業煤料小組會議紀錄(民國 37 年~39 年)
  - 22.組織規程、辦事細則(民國 35 年~38 年)
  - 23.籌組及成立各項同業公會(民國 37 年)
  - 24.發佈新聞、採集新聞、展覽會、業務宣傳、各事業照片(民國36~38 年)
  - 25.員工配糖(民國 36~38 年)
- 以上共計 73 卷、1,288 件。

## 六、資委會所屬事業單位

### (一)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1.糖業試驗所移交清冊(民國 37 年)
- 2.職員名冊(民國 37 年)
- 3.員工年終獎金(民國 37 年)
- 4.招考農務實習員(民國 38 年)
- 5.各廠及各分所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6.糖廠職員貪污舞弊案(民國 37 年~38 年)
- 7.申請褒獎事實清冊(民國 39 年)
- 8.簡化 36、7 年期蔗農原料價款付款手續辦法(民國 37 年)
- 9.接收各會社清算後資產負債表、接管日資企業資產淨值表(民國 37 年)
- 10.決算、成本彙總表、年報表(民國 35 年)
- 11.會計年報、固定資產明細表(民國 35 年~36 年)
- 12.創、營業概算(民國 36~38 年)

- 13.財務月報（民國 38 年）
  - 14.財務、外匯盈餘（民國 37~38 年）
  - 15.借款擔保、貸款轉貼現案（民國 36 年~38 年）
  - 16.墊付臺紙購紙漿款案（民國 38 年）
  - 17.勞軍捐款、各項地方捐款（民國 37 年~38 年）
  - 18.煤斤旬報表、煤運事宜（民國 37 年~39 年）
  - 19.徵購土地及處理經過（民國 36~37 年）
  - 20.各廠鐵道器材及設備大批失竊調查（民國 38 年）
  - 21.遷廠委員會苗栗工程處遷川機件明細冊（民國 37 年）
  - 22.臺糖錦屏磷礦公司銷售產品（民國 37 年）
  - 23.各廠甘蔗種植面積統計表（民國 37~38 年）
  - 24.酒精工場作業統計表（民國 39 年）
  - 25.第一次三年計畫草案、39 年度革新計畫案（民國 38~39 年）
  - 26.總公司及分公司業務報告、工作概況、工作紀要、工作電報底表、工作述要及工作月報（民國 38~39 年）
  - 27.各廠事業概況及復興實況（民國 35 年~39 年）
  - 28.臺糖考察報告、檢查報告（民國 37 年）
  - 29.糖廠損失報告（民國 37 年）
  - 30.章程規則（民國 37 年）
  - 31.組織員工勳進會及規則（民國 36 年~38 年）
- 以上共計 75 卷、940 件。

(二)臺灣電力有限公司

- 1.臺灣電力公司接收報告（民國 35 年）
- 2.臺電公司廠地附近圖（民國 36 年）
- 3.職員錄（民國 37~39 年）
- 4.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5.聘用工程師合約（民國 37 年）
- 6.資委會調查前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美金公司債券文件（民國 35 年）
- 7.接收財產估價表冊（民國 35 年）
- 8.創、營業概算及營業決算（民國 35~37 年）
- 9.現金結存、銀行透支明細表及費用明細表（民國 36~37 年）
- 10.會計月報、成本彙總表（民國 35~37 年）

- 11.開發發電工程之業務及經費問題（民國 37 年）
- 12.財產估價表（民國 35 年）
- 13.借款擔保案（民國 36~38 年）
- 14.臺電材料清單（民國 36 年）
- 15.資委會接收前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向日訂購未交清器材清冊（民國 35 年）
- 16.接收日本發電設備、電力籌配審委會會議記錄及組織、免徵電業營業牌照稅、調整資本董監會議記錄（民國 38 年）
- 17.天冷工程處現存物資調查表（民國 38 年）
- 18.財產目錄、物料結存表（民國 36 年）
- 19.呈報標售鋁廢品情形（民國 38 年）
- 20.北部火力發電所設備說明略圖（民國 37 年）
- 21.補充器材清單及說明書（民國 37 年）
- 22.中心倉庫物資調查表（民國 38 年）
- 23.申請頒發美金器材許可證表（民國 37 年）
- 24.向日本訂購器材（民國 37 年）
- 25.調整電價表（民國 37 年）
- 26.工作月報（民國 37 年~39 年）
- 27.事業述要、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7~39 年）
- 28.年度工作報告（民國 35~37 年）
- 29.臺灣省參議會報告（民國 37 年）
- 30.臺灣電力事業復興概述、臺電概況（民國 36~39 年）
- 31.臺電公司定期檢查發電工程及其設備草案（民國 37 年）
- 32.臺電公司營業章程、營業規章（民國 36~37 年）
- 33.臺灣電氣工業同業公會組織章程（民國 37 年）

以上共計 73 卷、528 件。

(二)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 1.臺紙公司接收興業株式會社清算報告表（民國 36 年）
- 2.移交清冊（民國 39 年）
- 3.職員姓名表（民國 36 年）
- 4.職員錄（民國 37~40 年）
- 5.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6.申請褒獎事實清冊(民國 39 年)
  - 7.向大會財務處借款歸還案(民國 35~36 年)
  - 8.年購原料金額折算美金比較表(民國 39 年)
  - 9.撥劃東莞糖廠創業費及流動金以應急需案(民國 38 年)
  - 10.總公司及各分廠財產估價清冊(民國 33~35 年)
  - 11.處理金圓券、借款、收款結帳案(民國 38 年)
  - 12.決算盈虧補發表(民國 36~37 年)
  - 13.美金貸款(民國 38 年)
  - 14.補繳各項稅款(民國 36 年)
  - 15.借款擔保(民國 36~38 年)
  - 16.創營業概算、歲入歲出概算表(民國 36~38 年)
  - 17.決算(民國 37 年)
  - 18.會計月報、年報(民國 35~37 年)
  - 19.訂製機器等合約(民國 37 年)
  - 20.財物報廢案(民國 38 年)
  - 21.颱風損失材料報廢表(民國 35 年)
  - 22.資產報廢單(民國 37 年)
  - 23.生產情形及售紙案(民國 37 年)
  - 24.臺中廠三十六年度盤存虧損及運輸損失報核表案(民國 37 年)
  - 25.工作月報、年報(民國 35~39 年)
  - 26.視察報告、視察資料及工作簡報(民國 37~39 年)
  - 27.總公司及所屬各廠事業述要及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39 年)
  - 28.業務計畫(民國 38 年)
  - 29.公司概況(民國 36~39 年)
  - 30.臺南廠修建計畫說明(民國 37 年)
  - 31.修正組織系統表(民國 38 年)
  - 32.臺語訓練班(民國 37 年)
  - 33.高嶺火災案(民國 38 年)
  - 34.臺紙公司章程暨聲請登記事項報告書(民國 36 年)
- 以上共計 166 卷、1,114 件。

(四)臺灣水泥有限公司

- 1.員工動態月報表(民國 37 年)

- 2.職員錄（民國 36~41 年）
  - 3.申請褒獎事實清冊（民國 39 年）
  - 4.高雄廠接收財產估價表（民國 35 年）
  - 5.接管日產企業資產淨值表（民國 35 年）
  - 6.處理民股及調整資本總額辦法案（民國 38 年）
  - 7.創營業概算（民國 35~38 年）
  - 8.會計年報、月報（民國 35~37 年）
  - 9.決算、決算說明、各項報表及決算報告（民國 35~37 年）
  - 10.銀行押借（民國 38 年）
  - 11.請速撥外匯案（民國 38 年）
  - 12.借款擔保案（民國 36~38 年）
  - 13.購日器材及其估價與規格備考（民國 37 年）
  - 14.運銷國外水泥記錄（民國 38 年）
  - 15.興建蘇澳廠計畫及預算書（民國 35 年）
  - 16.創立會議記錄、第一次董監會議記錄（民國 36 年）
  - 17.工作月報（民國 39 年）
  - 18.總公司及所屬各廠事業述要、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 年~39年）
  - 19.年度總報告（民國 37 年）
  - 20.廠務簡報（民國 37 年）
  - 21.擬建鐵路公路表（民國 37 年）
  - 22.臺灣水泥工業視察報告（民國 35 年）
  - 23.水泥公司概況（民國 36~40 年）
  - 24.高雄水泥廠工潮、職員舞弊（民國 35~36 年）
- 以上共計 62 卷、287 件。

(五)臺灣肥料有限公司

- 1.臺肥人員名冊、職員錄（民國 37~39 年）
- 2.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3.各廠財產估價清冊（民國 35 年）
- 4.民股清理、核撥經費及外匯數案（民國 38 年）
- 5.借款案、增貸案（民國 36~37 年）
- 6.營業概算、決算、創業決算（民國 35~37 年）
- 7.資本支出明細表、資金收支表（民國 35~37 年）

- 8.會計月報、年報（民國 35~37 年）
  - 9.請價讓廣州鋼廠設備案（民國 38 年）
  - 10.瑞典向臺肥推銷化學氮（民國 37 年）
  - 11.臺灣販賣肥料消耗量統計表
  - 12.熔製磷肥計畫書圖（民國 40 年）
  - 13.工作月報、年報（民國 37~39 年）
  - 14.事業述要、工作概況表及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39 年）
  - 15.董監會議記錄（民國 36 年）
  - 16.臺肥公司照片
  - 17.徵購第五廠地圖件（民國 36 年）
- 以上共計 57 卷、520 件。

(六)臺灣鹼業有限公司

- 1.移交清冊（民國 37 年）
- 2.職員名冊（民國 39~41 年）
- 3.職員矢忠切結、請求復職（民國 38~39 年）
- 4.工程預算（民國 37 年）
- 5.創營業概算、決算（民國 35~38 年）
- 6.資金收支表（民國 35~37 年）
- 7.會計月報、年報（民國 37 年）
- 8.借款擔保案（民國 36~38 年）
- 9.增資案（民國 37 年）
- 10.與南華債務糾紛處理經過情形（民國 35~36 年）
- 11.資產負債淨值表（民國 37 年）
- 12.歸還土地、新建工程驗收（民國 38 年）
- 13.在美訂購器材改在滬進口案（民國 37 年）
- 14.各廠物資調查表（民國 38 年）
- 15.報損清冊（民國 37 年）
- 16.舊材料利用清單配置圖（民國 37 年）
- 17.材料庫火災損失單、颱風損失情形（民國 37 年）
- 18.調整鹽酸價格、出讓變壓器（民國 38 年）
- 19.損益估計表（民國 35 年）
- 20.臺鹼公司生產情形（民國 36 年）

- 21.工作計畫（民國 38 年）
- 22.公司概況、工作進展概要（民國 35~39 年）
- 23.工作月報、年報（民國 37~39 年）
- 24.各處室辦事細則（民國 36 年）
- 25.臺鹼公司臺肥公司第三廠開運橋改建工程合同（民國 37 年）
- 26.工程合同、說明圖件（民國 37 年）
- 27.臺南鹼廠發生火災案（民國 37 年）
- 28.臺鹼鹽田圖

以上共計 71 卷、548 件。

(七)臺灣機械有限公司

- 1.接收船渠株式會社原始接收清冊（民國 35 年）
- 2.接收東北興業會社清冊（民國 35 年）
- 3.職員錄（民國 37 年~41 年）
- 4.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5.財產估價清冊及資產負債平衡表（民國 35 年）
- 6.財產債務及器材之劃分（民國 37 年）
- 7.借貸案、借款擔保案（民國 37~38年）
- 8.營業概算、決算及繼續經費概算（民國 35~38 年）
- 9.會計年報（民國 35~37 年）
- 10.材料盤存報告（民國 35 年）
- 11.工具報損案（民國 38 年）
- 12.修理延平輪案（民國 37 年）
- 13.製造小型機車說明書暨照片（民國 37 年）
14. 40 年度營業計畫及預算（民國 39~40 年）
- 15.修復事業及臺胞就業情形（民國 36 年）
- 16.業務報告（民國 36 年）
- 17.工作月報、年報（民國 38~39 年）
- 18.事業述要及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39 年）
- 19.公司概況（民國 37 年）
- 20.機械修運處重機械廠呈行政院視察委員之廠務報告（民國 40 年）
- 21.臺灣機械有限公司之自我檢討（民國 39 年）
- 22.臺灣機械造船公司結束案（民國 37 年）

以上共計 65 卷、434 件。

(八)臺灣造船有限公司

- 1.全體員工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2.申請褒獎事實清冊（民國 39 年）
  - 3.增產計畫請增資案、改組增資案（民國 38 年）
  - 4.借款擔保案（民國 37~38 年）
  - 5.歸還大會借款案（民國 38 年）
  - 6.固定資產報損單（民國 38 年）
  - 7.營業預算（民國 38 年）
  - 8.營業決算及會計報告（民國 38 年）
  - 9.會計月報（民國 36 年）
  - 10.修船、進口器材、撥借船塢（民國 38 年）
  - 11.基隆廠盤存表（民國 36 年）
  - 12.三千噸船塢撥借海軍案（民國 38 年）
  - 13.承租基隆港案（民國 37 年）
  - 14.第一次董監聯會記錄、創立會議記錄（民國 37 年）
  - 15.臺船改組成立（民國 37 年）
  - 16.改組後擬辦業務（民國 38 年）
  - 17.工作月報（民國 37~39 年）
  18. 37 年度總報告
  - 19.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民國 37~39 年）
  - 20.辦理臺語訓練班（民國 37 年）
- 以上共計 27 卷、353 件。

(九)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 1.接收敵產估價單（民國 36 年）
- 2.中油嘉義溶劑廠接收資產清冊（民國 35~36 年）
- 3.職員名冊（民國 38~39 年）
- 4.職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5.人員失職違法案（民國 37 年）
- 6.借款擔保案（民國 36~38 年）
- 7.會計年報（民國 36 年）
- 8.成本計算表（民國 36 年）

- 9.高雄煉油廠油料被盜懲辦案(民國 37 年)
  - 10.物料收發結存明細表(民國 36 年)
  - 11.固定資產明細表(民國 36 年)
  - 12.財產目錄(民國 36 年)
  - 13.生產概況(民國 37 年)
  - 14.歷年產量表(民國 40 年)
  - 15.工作月報(民國 37~39 年)
  - 16.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民國 38~39 年)
  - 17.駐港代表結束案(民國 39 年)
  - 18.董監聯席會議記錄(民國 37 年)
  - 19.中油公司及所屬公司組織規程及修正組織規程(民國 35~37 年)
- 以上共計 75 卷、855 件。

#### (十)臺灣鋁廠

- 1.臺鋁公司工廠配置圖(民國 35 年)
- 2.臺鋁公司籌備處估價清冊(民國 36 年)
- 3.臺灣電冶業接管委員會高雄鋁廠、花蓮鋁廠移交清冊(民國 35 年)
- 4.職員錄(民國 37~39 年)
- 5.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6.申請褒獎清冊(民國 39 年)
- 7.冶鋁過程訓練計畫(民國 35 年)
- 8.將借入流動金轉入大會資本調整案(民國 38 年)
- 9.需用外匯結匯案(民國 38 年)
- 10.借款案(民國 36~38 年)
- 11.創營業概算(民國 35~37 年)
- 12.會計月報、再生產成本計算表(民國 35~39 年)
- 13.借貸抵押品清單(民國 36 年)
- 14.徵購土地案(民國 37 年)
- 15.請禁止進口鋁錠(民國 37~38 年)
- 16.合作開發鋁業(民國 37 年)
- 17.工作月報(民國 39 年)
- 18.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民國 38~39 年)
- 19.臺鋁熔融工廠復工經過報告(民國 35 年)

以上共計 26 卷、671 件。

(ㄅ)臺灣金銅礦務局

- 1.移交清冊（民國 37 年）
  - 2.職員錄及名冊（民國 37~40 年）
  - 3.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4.申請褒獎清冊（民國 39 年）
  - 5.借貸案（民國 37~38 年）
  - 6.借款擔保案（民國 36 年）
  - 7.創營業概算（民國 35~38 年）
  - 8.決算（民國 35~37 年）
  - 9.年報及統計年報（民國 36 年）
  - 10.會計月報（民國 35~37 年）
  - 11.現金結存及銀行透支表、損益表（民國 35~36 年）
  - 12.金銅礦被當地民眾盜採礦砂（民國 35 年）
  - 13.購料輸入結匯案（民國 37 年）
  - 14.中央電工器材廠請臺灣金銅礦務局供銅案（民國 37 年）
  - 15.集資開採金砂礦、勘查礦品（民國 38 年）
  - 16.籌備處開放偏僻礦區案（民國 38 年）
  - 17.臺灣銅礦籌備處工作進行報告書（民國 34~35 年）
  - 18.工作計畫（民國 37 年）
  - 19.工作月報（民國 39~40 年）
  - 20.工作電報底表、事業述要（民國 38 年）
  - 21.資委會臺灣金銅礦務概況及困難情形（民國 36~39 年）
- 以上共計 44 卷、595 件。

(ㄆ)臺灣鋼廠

- 1.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2.借資添建設備（民國 39 年）
- 3.借款擔保案（民國 37~38 年）
- 4.大會撥款美金 15 萬元（民國 38 年）
- 5.廣州製鋼廠及粵糖廠機件移運臺灣及海南遷建工程案（民國 38 年）
- 6.請配第三批賠償器材暨廣州製鋼廠遷併案（民國 38 年）
- 7.工作月報（民國 39 年）

8.事業述要及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39 年）

以上共計 11 卷、178 件。

(㉔)新竹煤礦局

- 1.新竹煤礦設立經過案（民國 37 年）
- 2.煤總局上海營運處劃撥新竹煤礦局款案（民國 37～38 年）
- 3.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4.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39 年）

以上共計 6 卷、10 件。

(㉕)中國蠶絲有限公司

- 1.接收廣東辦事處財物損失案（民國 38 年）
- 2.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3.工作報告、工作月報及工作電報底表（民國 38 年）

以上共計 4 卷、7 件。

(㉖)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1.職員矢忠切結（民國 39 年）
- 2.試製產品（民國 37 年）
- 3.業務（民國 38 年）

以上共計 4 卷、40 件。

(㉗)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 1.船員、職員名冊（民國 39 年）
- 2.職員被控投匪嫌疑及貪污事實（民國 39 年）
- 3.借款擔保案（民國 37～38 年）
- 4.抵押透支貸款案（民國 36 年）
- 5.臺廠因眾利輪爆炸損失案（民國 38 年）
- 6.油輪業務案、永澄輪解體案
- 7.36年度營業報告書（民國 36 年）
- 8.工作月報（民國 39 年）
- 9.撤銷臺北辦事處業務由總公司辦理（民國 38 年）

以上共計 13 卷、29 件。



# 德西檔案館所藏中德關係史料 (1927-1938)

馬 文 英\*

德西地區三大檔案館分別是位於弗萊堡 (Freiburg) 的聯邦軍事檔案館 (Bundesarchiv / Militärarchiv)、位於波昂 (Bonn) 的外交部政治檔案館 (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 和位於柯布倫茲 (Koblenz) 的聯邦檔案館 (Bundesarchiv)。三館皆收藏豐富的中德關係史料，其收藏方向與各館名稱相符。聯邦軍事檔案館以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 (Die deutsche Militärberaterschaft) 為主。外交部政治檔案館則以德國駐華外交人員對德國外交部的報告為重點，涉及政治、經濟和軍事各層面，不但對中德關係史的研究深具價值，即使對這一時期中國內部狀況之瞭解亦頗有助益。聯邦檔案館為上述三館中設備最優、使用最易，且可為學人預籌住處者，雖然館藏中國資料較少，但可補前二館之不足，所以也併入本文，加以簡介。

## 一、聯邦軍事檔案館

有關史料分為兩大類，編號 Msg 160 者專收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的資料，編號 N 者為個人遺贈文件。其中相關者為 N246 法肯豪森文件集 (Alexandra von Falkenhausen) 和 N247 塞克特文件集 (Hans von Seeckt)，茲分述如下：

1. Msg 160/1 佛采爾將軍信件和報告書 (Brief u. Berichte des Generals d. Inf. Wetzell)，內容重點為教導師訓練報告和 1930 年中原大戰的報告。

2. Msg 160/2 戰況報告和建議書 (Lageberichte, Denkschriften, 1929-1935)，內容重點為 1929 華北白俄作戰計畫、1930 中原大戰評估、

---

\* 德國漢堡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931 剿共戰役、1932 中日上海衝突和 1935 中國之抗日保衛戰。

3.Msg160/3 佛采爾將軍與南京顧問辦公室之往返信件 (Schriftwechsel Wetzell mit Beraterbüro Nanking, 1932-1934)，內容重點為砲兵訓練建議書、佛采爾離職和其親信布塞基斯事件 (Busekist)。

4.Msg 160/4 佛采爾與柏林聯絡處之往返信件 (Brief Wetzell an Verbindungsstelle Berlin, 1932-1934)，內容重點為顧問遴選事宜和塞克特整軍建議書。

5.Msg 160/5 塞克特與蔣介石會談記錄 (Einleitende Besprechung v. Seeckts mit Chiang Kai-shek, 1934-1935)，塞克特以總顧問身份對蔣介石就軍備、軍火採購、軍事學校、教導團和顧問地位等事項提出建言。

6.Msg 160/6 塞克特之私人 and 公務旅行記聞 (Privatdienstliche Schreiben des General v. Seeckt über Reisen u. s. w., 1934-1936)，本冊尚包括塞克特死後召法肯豪森就職事項。

7.Msg 160/7 德國對華貿易關係：哈布樓公司 (Deutsche Handelsbeziehungen zu China: Hapro) 內容重點為德國駐滬公司建議書和德國駐滬貿易處關於國家條約之機密紀錄。

8.Msg 160/8 中日戰爭 (Der chinesisch-japanische Krieg, 1937-1938)，內容重點為戰況報告、軍事評估和南京淪陷紀實。

9.Msg 160/9 顧問團南京辦公室和日後之漢口辦公室等事項 (Büroangelegenheiten der Beraterschaft in Nanking, später in Hankow)，內容重點為顧問名單、人事調度、獎勵文件和顧問團之解散。

10.Msg 160/10 維爾克將軍任中國政府軍事顧問之聘書兩份 (Angestellungsverträge des sp. Gen. a. D. H. Wilck als Militärberater bei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1932-1935)。

11.Msg 160/11 麥爾瑪德致狙擊隊領袖隆姆信件，附其子安德雅斯之有關德國政府授意在廣西省生產武器的報告 (Brief des Majors Mayer-Mader an den Stabchef der SA, Röhm, mit Bericht seines Sohnes, des Hptm. a. D. Andreas Mayer-Mader betr. Waffenherstellung in China unter deutscher Regie, Provinz Kwansi, 1933)。

12.Msg 160/12 為德譯臺北國防部史政局出版之「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紀要」。

13.Msg 160/13 為影印自德外交部政治檔案館之資料，乃法肯豪森與

OTL 虞克曼之通信，報導顧問團在華狀況 (Situation der Beraterschaft in China - Korrespondenz von Gen. v. Falkenhausen mit OTL Rückmann, 1934-1936)。

14. Msg 160/14-38 為 Schmidtman, Hans Albert 的博士論文計畫。該項計畫始自六〇年代初，故能大規模訪談德顧問。透過其訪談紀錄和與顧問之通信，可對顧問團在華工作情況作更深入的了解。此外，這部分檔案還包括影印自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和德國外交部政治檔案館的史料，以及蒲列山將軍文檔 (Akten Nolte)。

15. N246 為梁錫輝教授轉贈的法肯豪森 遺留文件。法氏在華經歷見諸 N246/7、8、9、12-14 各冊。法肯豪森為歷任總顧問中在華時間次長者 (1935. 3. 5~1938. 7)，舉凡第五次剿共、兩廣事件、西安事變和中日戰爭皆有其大量的軍情分析、作戰指導和戰略、戰策之擬訂。本檔中尚有豐富的軍事組織改良計畫書。

16. N247 為塞克特遺留文件，其旅華時間不及一年 (1934. 4. 11~1935. 3. 5)，相關史料僅見於 N247/18 和 N247/133。前者為其 1935 年元旦至 1936 年底的日記；後者收有在華時期信件。

## 二、外交部政治檔案館

德國外交部檔案之重要性，郭恆鈺教授已於「德國外交檔案」一書中詳加說明。本文僅就該館二、三〇年代中德關係之館藏加以扼要介紹。

### 1. 閣員辦公室檔 (Büro des Reichsministers)

(a) 37 China 共計五冊，分別是：Bd. 1, 1920. 10~1928. 7, R28540; Bd. 2, 1928. 8~1929. 10, R28541; Bd. 3, 1929. 10~1931. 9, R28542; Bd. 4, 1931. 9~1932. 12, R28543; Bd. 5, 1933. 1~1935. 6, R28544。

(b) 40 Japan 僅一冊：Bd. 1, 1920. 10~1935. 5, R28553。

### 2. 國務秘書辦公室檔 (Büro des Staatssekretärs)

(a) Ochi China 有二冊：Bd. 2, 1927. 3~1927. 4, R29225; Bd. 3, 1927. 4~1927. 12, R29226。

(b) OA Ostasien 一冊：Bd. 4, 1927. 12~1929. 4, R29227。

3. F-M 第一部門 (軍事與海軍) 檔 (Abteilung II F-M (Militär und Marine))

(a) K6 至亞洲之派令與復命 (Kommandierungen nach Asien und

umgekehrt), 一册: Bd. 1, 1929. 1~1933. 3, R 33314。

(b) K41 販賣至亞洲之戰略物資 (Verkauf von Kriegsmaterial nach Asien) 一册: Bd. 1, 1926. 5~1934. 12, R 33381。

以上各册或以中國為主, 或著眼於亞洲全體, 但多為一般例行公事, 且報告內容簡短, 各册頁數亦薄。豐富之重要史料則見諸下列兩檔。

#### 4. 第四部門機密檔 (Geheimakten der Abteilung IV, 1920-1936)。

(a) Ostasien Allg. 東亞——一般事務 (Ostasien-Allgemeines) 共計六册: Bd. 1, 1932. 8~1934. 3, R 31231; Bd. 2, 1934. 4~1934. 10, R 31232; Bd. 3, 1934. 10~1935. 3, R 31233; Bd. 4, 1935. 3~1935. 12, R 31234; Bd. 4a, 1935. 3~1935. 12, R 31235; Bd. 5, 1936. 1~1936. 5, R 31236。

(b) Ostasien Allg. 1 承認問題: 滿州國之承認問題 (Anerkennungsfrage: Die Frage der Anerkennung der Mandschurei) 未分册: 1933. 12~1936. 5, R 31237。

(c) Ostasien Luftschiffahrt 1A 楊格飛機有限公司和史文赫定亞洲飛航之裁決案 (Sanierung der Junkerswerke A. G. Dessau u. der Asienflug Sven Hedins) 未分册: 1924. 4~1929. 12, R 31247。

(d) Ostasien China, Handel 11, No. 3 物資交換與經濟條約 (Austauschgeschäfte u. Wirtschaftsabkommen) 二册: 恩獨克斯計畫; (Projekte Endrucks), Bd. 1, 1935. 1~1936. 5, R 31248; 克蘭計畫 (Projekte Klein), Bd. 1, 1934. 2~1936. 5, R 31249。

(e) Ostasien China, Pol. 13 中國軍情 (Militärangelegenheiten in China) 一册: Bd. 10, 1935. 6~1936. 5, R 31250。

本檔多採專題編册方式, 其中 Ostasien Allg. 為對東亞各國之例行公事報告。Ostasien Allg. 1 收有大量彼時德國駐日大使狄克森 (Dirksen) 及駐華公使陶德曼 (Trautmann) 對於德國應採親日或親華立場之辯文, 已見德國遠東政策由重華轉為重日之端倪。Ostasien Luftschiffahrt 1A 牽涉之楊格飛機公司對於國府飛行人員技術之訓練、飛機購買和維修皆有重大貢獻。Ostasien, China, Handel 11, No. 3 則關係中德之軍火貿易, 後者尤其重要, 但該册僅收有條約, 至於交涉過程和德方之評估則散見以下政治第四部門檔。最後, Ostasien China, Pol. 13 則為編檔列册之錯誤, 應屬於政治第四部門檔。

### 5. 政治第四部門檔 (Politische Abteilung IV)

(a) Po. 2 Chi 中國對德之政治關係 (Politische Beziehungen Chinas zu Deutschland) 共七冊，本文相關者計有四冊：Bd. 4, 1926. 8~1928. 6; Bd. 5, 1928. 6~1930. 12; Bd. 6, 1931. 1~1934. 12; Bd. 7, 1935. 1~1936. 3。

(b) Po. 3 adh. chi 中日衝突所致之武器運送 (Waffenlieferung aus Anlaß des chin.-jap. Konfliktes, 1931-1932) 共二冊：Bd. 1, 1931. 11~1933. 2; Bd. 2 1933. 2~1934. 10。

(c) Po. 13 Chi 軍情 (Militärangelegenheiten) 共九冊 Bd. 1, 1920. 5~1928. 12; Bd. 2, 1929. 1~1929. 12; Bd. 3, 1930. 1~1930. 5; Bd. 4, 1930. 6~1931. 12; Bd. 5, 1931. 1~1932. 3; Bd. 6, 1932. 3~1933. 3; Bd. 7, 1933. 4~1933. 12; Bd. 8, 1934. 1~1934. 6; Bd. 9, 1934. 7~1935. 6。

(d) Po. 23 A Chi 中國之內戰 (Bürgerkrieg in China) 共六冊，本文相關者計有二冊：Bd. 5, 1927. 6~1930. 9; Bd. 6, 1930. 10~1933. 11。

(e) Po. 29 Chi 法西斯主義 (Faschismus) 不分冊：1934. 9~1935. 1。

本檔可謂德國外交部所藏一九三〇年代中德關係史料之精華，其中又以 Po. 2 Chi 與 Po. 13 Chi 兩部分內容最為充實。包括德國駐華外交人員對中國重大事件的報告、各方勢力發展的評估和中德外交關係如何定位之建議，亦有大量的德國外交部的意見，以及外交部與相關部門相互討論之文件。此外，在中德軍火交易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克蘭計畫」於該二次檔中亦較於他處收錄更為詳盡。其他如 Po. 3 adh. Chi Po. 23A Chi 和 Po. 29 Chi 皆為專題編冊，Po. 3 adh. Chi 主要是關於販賣軍火之德公司和中國各地方政府自行向德國購買軍火之報告；Po. 23A Chi 除了對中原大戰的報告外，尚有對各地方武力的評估以及兩廣自行聘用德籍軍事顧問的報告，Po. 29 Chi 是對中國境內具法西斯意識型態的政治團體之報告與評論。

### 三、聯邦檔案館

本館所藏為德國財政部檔，多為中德商約交涉過程和德國工業界對華經貿環境之評估報告，內容總量雖不及前二館之多，但仍頗具使用價值。此外，館藏若干旅華德人的遺存文件，包含大批在華工作時的資料，茲簡介如下：

### 1. 個人文件

(a) 鮑樺爾文件 (Nachlaß Bauer) 近九十冊。鮑樺爾為首任總顧問，在華時期重要工作成果乃成立德國軍事顧問團、將德式訓練引入近代中國軍事教育內，建立中德軍火採購的正式官方管道，並草擬編遣會議之重大原則，這些工作內容和過程見諸文件之第三十九冊至第七十二冊。

(b) 席爾貝文件 (Nachlaß Silberg) 席氏為地方行政專家，其文件中頗多對華北地方行政規畫之建議書。

### 2. 財政部檔 (Reichsfinanzministerium)

(a) R2/24580 出口條約 (Exportsverträge)

(b) R2/16443 出口貨單、國家擔保 (Exportaufträge, Reichsbürgschaften)。

(c) R2/9971 財政部 (Reichsfinanzministerium)。

(d) R2/10181 對華商約 (Handelsverträge mit China)。

(e) R43I/1428c (無檔名) 重要內容為 1937 夏，孔祥熙訪德與德國銀行總裁沙赫特 (Hjalmar Schacht) 之會談記錄。

(f) R43II/1454 日本：中日衝突與外交部紀錄 (Japan: Chin.-jap. Konflikt, u. a. Aufzeichnung des AA Feb.-Sep. 1932)。

以上德西三大檔案館因使用者席位有限，需事前函申請閱讀位子。外交部檔案館還要求外國人繳交該國外交部的推薦信函。上述三館影印收費不低，尤以外交部檔案館最為昂貴，每張 0.9 馬克，且毫無優惠，其他二館對於學生則有折扣優待，讀者宜善加利用。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名人日記

王世杰日記	手稿本	10册	精2000元	平1500元
徐永昌日記 (一~二)	木刻本	2册	精 800元	平 700元
徐永昌日記 (三~十二)	手稿本	10册	精4000元	平3500元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 保存與整編概況（十二）

莊 樹 華\*

## 農林部：畜牧業機構、漁業機構

### 一、畜牧業機構

農林部畜牧建設包括舉辦畜牧實驗、防治獸疫、繁殖耕牛役馬，改進西北羊毛等。就機構而言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實驗研究改進機構，包括中央畜牧實驗所、西北羊毛增產委員會、西北羊毛改進處；第二類為役畜繁殖改良機構，先設第一役馬繁殖場及七處（第一至第七）國營耕牛繁殖場，抗戰勝利後裁併改組新設成三處：良豐牛種改良繁殖場，淞縣牛種改良繁殖場、西北役畜改良場；第三類為獸疫防治機構，先後成立者有第一～三獸疫防治總站、西南獸疫防治處、西北獸疫防治處、東南獸疫防治處、華北獸疫防治處、華西獸疫防治處、東北獸疫防治處、河南獸疫防治處、青海獸疫防治處、晉綏獸疫防治處、川康鹽區獸疫防治所等。

#### （一）實驗研究改進機構：

1. 中央畜牧實驗所：40 函（民國 29～38 年），農林部於民國三十年六月創設中央獸牧實驗所於廣西桂林，掌理改良家畜品種、增進獸醫技術、研究家畜飼養管理及畜產加工等任務。現存檔案 40 函（民國 29～38 年）包括組織章程、移交、總務、人事、各年度經費報告、業務及工作報告。

2. 西北羊毛改進處：28 函（民國 29～38 年）包括：組織成立、移交、總務、人事、經費、生活補助費、業務及工作報告。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3.西北羊毛增產委員會：現存檔案5函（民國29～34年）包括機構之成立、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 （二）役畜繁殖改良機構：

1.農林部直轄第一役馬繁殖場：凡農林部經營之役馬繁殖場均稱為直轄役馬繁殖場，並以設立之先後冠以序數。第一役馬繁殖場成立於民國31年。現存檔案26函（民國31～37年），包括組織、移交、總務、人事、經費、財產增減表、業務、工作報告等。

2.第七國營耕牛繁殖場，後改稱陝西寶鷄耕牛場：檔案共4函（民國31～37年）包括：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民國35年農林部將第一役馬繁殖場、第七國營耕牛繁殖場二機構合併改組為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場，辦理陝西、寧夏、甘肅三省役畜改良繁殖事宜。

3.第二國營耕牛繁殖場，後改稱貴州湄潭耕牛繁殖場，檔案有17函（民國30～35年）：組織成立、移交、總務、人事、經費、公糧、生活補助費、業務、工作報告。

4.第四國營耕牛繁殖場，後改為湖南零陵耕牛場，檔案有21函（民國30～35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第二、第四國營耕牛場均屬水牛改良場。

5.第一國營耕牛繁殖場，後改稱四川南川耕牛場，從事黃牛改良工作，檔案有20函（民國30～35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各年度經費報表、生活補助費、公糧費、支出憑證簿、業務、工作報告。

6.第三國營耕牛繁殖場：成立於民國30年，至32年併入中央畜牧實驗所，檔案有8函（民國30～37年）：組織章則、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7.廣西良豐耕牛場：檔案共8函（民國34～38年）：組織、移交、總務、人事、各年度經費報表、業務、工作報告。

8.滁州耕牛場：檔案共9函（民國34～38年）：組織、成立、總務、人事、各年度經費報表、業務、工作報告。

## （三）獸疫防治機構

1.第一獸疫防治總站：檔案4函（民國31～37年）：辦事細則、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2. 第二獸疫防治總站：檔案 3 函（民國 32~33 年）：組織、成立、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3. 第三獸疫防治總站：檔案共 17 函（民國 31~38 年）：組織、成立、總務、人事、各年度經費報表、生補費、業務、工作報告。
4. 東南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9 函（民國 32~38 年）：組織、成立、總務、職員任用、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5. 西北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23 函（民國 30~38 年）：組織、成立、總務、職員任用、經費、血清製造費、業務、工作報告。
6. 華北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6 函（民國 31~37 年）：組織、交接、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7. 華西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5 函（民國 36~37 年）：組織、成立、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8. 東北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1 函（民國 25~37 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
9. 河南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8 函（民國 30~34 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10. 青海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11 函（民國 31~38 年）：組織、移交、總務、人事、經費、各年度經費報告、生補公糧費、業務、工作報告。
11. 晉綏獸疫防治處：檔案共 2 函（民國 35~37 年）：組織、成立、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12. 川康鹽區獸疫防治所：1 函（民國 31~33 年）：組織、成立、總務、人事、業務等。

## 二、漁業機構

漁業機構中僅國營淡水魚養殖場成立於抗戰期間，其他蓋成立於民國 35 年以後，有中央水產實驗所，冀魯、江浙、閩臺、廣海等四區海洋漁業督導處，南海、黃海、中華等三家水產公司（中華係官商合營），以及漁業銀團、漁市場（分設各地）等。37 年 9 月起籌設海帶、真珠貝、蛭蚶、牡蠣等養殖場；另外，35 年 9 月起與善後救濟總署合辦漁業善後物資管理處。

1. 中央水產試驗所（民國 34~38 年）：我國東濱太平洋，漁場遼闊，內地川澤密布，水產豐富，自臺灣、澎湖、東北等地光復以後，水產業之

範圍益加擴大，政府爲發展戰後漁業之改進與研究，於第五屆十中全會上曾有籌設中央水產實驗所之決議。然礙於經費困難而暫緩，後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供應我國大批新式漁輪、漁具及水產加工機械，並且派漁業專家來華協助，使得中央水產試驗所得以在民國 36 年正式成立，以促進新式漁業之發展及海產增殖之改進。本館所藏檔案共 8 函包括成立經過、內部人事、經費、業務、工作計畫及報告。

2. 漁業督導處：分(1)東北漁業督導處，1 函（民國 35~37 年）；(2)冀魯區漁業督導處，10 函（民國 35~38 年）：組織、總務、人事、會計報表、業務、工作報告；(3)江浙區漁業督導處，8 函（民國 33~38 年）：組織、總務、人事、會議、會計報表、業務、崑山漁港、防浪堤、工作報告；(4)閩臺區漁業督導處，8 函（民國 35~38 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會議、業務、工作報告；(5)廣海區漁業督導處，9 函（民國 35~37 年）：組織、移交、人事、經費、漁業改進會、業務、工作報告。

3. 漁業銀團：民國 26 年實業部應漁業界要求創立漁業銀團，其目的在於調劑漁業金融，爾後因戰事爆發業務隨告停頓，值抗戰勝利後才恢復。檔案共 2 函（民國 30~38 年）：組織、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會議。

4. 中華水產公司：係戰後接收日本在上海所辦之華中水產公司、林兼商店、帝國水產、國際水產、中國水產株式會社等機構合併而成。檔案數量 5 函（民國 34~37 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5. 黃海水產公司：此公司係接收青島之日本水產事業機構而來。檔案數量 4 函：組織、總務、人事、會議、業務、工作報告。

6. 海南水產公司：總公司設於海南島榆林，經營水產物之漁撈養殖及冷凍保藏加工運銷等業務。檔案共 2 函（民國 35~38 年）：組織、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7. 淡水魚養殖場：成立於民國 30 年，其工作內容爲採卵孵化、培養成魚、指導捕魚、淡水養殖試驗工作及提倡池塘及稻田之養魚。檔案共 16 函（民國 29~36 年）：組織、移交、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8. 魚市場：魚市場爲水產品集散分配場所其功能爲擴張銷路、平準市價、改良運輸、平衡產銷。經營方式以官督民營爲原則。本館檔案共存 17 函（民國 34~37 年）包括上海、廣州、青島、天津各魚市場之組織、總務、人事、業務、調查統計報告。（農林部至此期已全部介紹完畢。）



## 新書評介

**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李孝悌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1 年，241 頁。

本書探討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時間斷自 1901 年至 1911 年。這是近代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且極富意義的課題，但過去的歷史學家顯然一直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自 1980 年代以後，中國在各方面都已進入一個激烈變化的時期，而過去幾十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無論中外，基本上可說都是在試圖重建、解釋這個巨變的因果、本質和影響。在研究的過程中，歷史學家的興趣很自然地首先就關照這個變化上層的事件或人物。以清末來說，維新運動、新政運動等大事，康有為、梁啟超等要人；以啟蒙運動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陳獨秀等主題，一向都是炙手可熱的題目。究其故，一方面由於這些事件或人物在歷史上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主題在史料的掌握上極為方便。相對於這個上層變革的豐碩研究成果，歷史家對此一歷史變革下層的探討，就顯得極為薄弱、不足，尤其是清朝末年這一段，更是如此。其原因，一方面是史料零碎，難以掌握；另一方面，有關下層社會變化的主題及其意義不易適切地把握，也未嘗不是重要因素。因此，就近代中國研究來說，李孝悌先生這部專著相當有價值。這部書以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為主題，其用意是欲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如其導論指出的：「本書意圖透過清末這段歷史的描述，來說明在舊王朝的最後十年，中國社會其實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動。」（頁 6）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說明全書的旨意；從第二章到第五章，作者詳述清末最後十年民間志士對下層社會進行的各種啟蒙努力；最後一章「結論」則討論此一運動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社會史上的意義。全書題旨明確，章節架構層次分明，細部討論也緊扣住主題。整體來說，是篇處理得十分完整、周延的論文。

在「導論」中，作者指出：清末對下層社會的啟蒙工作，在 1900 年以

後，已由理論進入實踐、由零星的努力匯為大規模運動的程度。「理論加上實踐，使得整個風潮成爲一個自覺、綿續、有理念、有目的，而且有相當程度組織力的運動。」（頁6）這個運動自有其歷史的重要性：一方面，作者強調，這是中國史上首次以密集而多樣的方式對下層社會作啟蒙工作；另一方面，這個運動更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民粹運動」的源頭。這種重要性自然是作者寫作本書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作者對本書所謂的「啟蒙運動」與「下層社會」二詞亦作解釋，以明其涵義。就「下層社會」而言，它所指的是中國社會中廣大的不識字或僅初識文字的羣眾。至於採用「啟蒙運動」一詞，一方面是因「啟蒙」二字乃當時開民智者常沿用之詞，另一方面，也是因此運動「開啟蒙昧」的本旨與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基本訴求和論旨暗合的緣故。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全書的主體，分別討論針對下層社會啟蒙工作的需要而起的各種啟蒙手段，包括：「白話報刊與宣傳品」（第二章）、「閱報社」（第三章）、「宣講、講報與演說」（第四章）與「戲曲」（第五章）。不過，就啟蒙工作的對象而言，這四章實際上可區分為兩大部分：前兩章討論的是針對下層社會中粗識文字的民眾的啟蒙努力，而後兩章討論的則是針對那些不識字的芸芸大眾的啟蒙工作。針對不同智識層次提出各式各樣啟蒙手段，顯示當時從事啟蒙運動志士的用心：「二十世紀初的啟蒙者，多方設法，務期用盡所有可能用得到的方式，把高遠的理想落實到滿目瘡痍的廣闊土地上。」（頁56）

文字是知識傳播的主要工具，在第二章中，作者討論當時的啟蒙者如何運用新興的白話刊物來達到開通民智的目的。這些白話刊物包括1900年以後大量出現的白話報紙與官府和民間大量刊發的白話宣傳品。白話刊物的出版，作者指出，主要是「爲了使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人，能够有一個比較容易的管道去接觸新知識、新思想」。（頁22）在內容上，這些刊物大都以勸戒惡習、破除迷信、介紹新政、推廣新知爲主，但是也不乏攻擊傳統制度，甚至宣傳革命的激烈言論。這些內容除了顯示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精神外，也點出了這個運動與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微妙關係。此處，作者特別討論清末啟蒙運動與五四啟蒙運動之間的關聯，（頁26-29）爲五四啟蒙運動的源流找到一個新的注腳，可說是本書的一個貢獻。

白話報刊文字再白，若無人閱讀，仍達不到啟蒙的目的。而當時一般下層民眾，溫飽之不暇，又沒有閱讀習慣。因此，啟蒙者還需積極推廣閱報，

吸引多數的消極讀者，而閱報社的設立就成為其主要的推廣手段。本書第三章討論的就是1904年以後，熱心人士為誘導人民看報，而興起的廣設閱報社或閱報牌的風氣。這裏作者談到閱報社的源起，閱報社地點的選擇、經費的籌措、經營管理等問題。不過，最有意義的是，作者指出推動閱報社的人，「大多是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乃至一般的商人，甚至還包括了和尚，喇嘛等出家人。漸漸地，官府和士紳也加入行列」。（頁 46-7）從參與推動閱報人物的出身，可看出清末啟蒙運動層面的廣泛。另一有趣之處是作者指出宗教與清末啟蒙思潮之間的微妙關係。迷信雖是清末啟蒙運動欲破除的對象，然而不但宗教人士參與推廣閱報，許多閱報處所也都是設立在寺廟裏面。（頁 50-1）

中國的下層社會有為數更眾的文盲。對這羣不識文字羣眾的啟蒙顯然更為緊要，但即使最明白的白話文字在這裏也派不上用場，因此需另闢蹊徑。「口語啟蒙」是其主要方法之一。作者在第四章從各種方面詳細討論清末的啟蒙者如何化文字為淺顯的口語，以啟迪廣大不識字的羣眾。「口語啟蒙」的手段包括：講報、宣講與演說，其共同目的都在開民智，使不識字的羣眾也能够接受新的智識，養成「作一個新時代的國民，所應具備的特質」。（頁 146）本章篇幅很長（近九十頁，佔全書五分之二），內容自然是多樣且豐富，但讀起來容易產生壓迫感。加上文中舉例極多，讀者容易在林立的個案中迷失。此外，作者對宣講與演說兩種口語啟蒙方式之間的異同——「講報」根據作者的描述應屬廣義的「宣講」之一種——似界定得不够明確，易使讀者產生混淆。事實上，作者是把「宣講」與「演說」看作是不同的口語啟蒙方式，若將其差異作更清晰的界定，然後分章個別討論，所舉的例證稍作精簡的處理，可使文章的效果更佳。

「人民看不懂艱難晦玄的符號，他們可以換一套表現方式，用下里巴人的村言俚語寫出他們的救世良言。再不懂，他們可以把書寫的文字換成口說的語言。如果口說的也不能引人入勝，無法喚起民眾的口應、共鳴，他們乾脆就把人生、世事都幻化作舞臺，粉墨裝點地訴說出心中無限的衷曲。」（頁 57）本書第五章所論的以「戲曲」作為啟蒙工具，顯然是清末啟蒙者的匠心獨運，別出心裁。這也顯示出他們為了啟迪蒙昧大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裏，作者詳細討論清末啟蒙志士為配合啟蒙的需要而對中國戲曲所作的改良，及其如何用戲曲傳達他們所要傳達的新訊息。其間，作者並引用許多歌謠作實例，具體說明清末啟蒙者對戲曲的運用，使文章顯得極為生動、活

潑。

在詳細分析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後，作者在最後的「結論」對這個運動的歷史意義做了一個非常深刻有力的闡釋。一方面，作者說明它在清末思想、文化、社會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更闡發這個運動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史上的意義。就前者而言，作者指出，儘管清末的中國有其因襲不變、封建朽腐的一面，但這個基本上民間自發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卻顯示當時中國民間社會的深具活力，社會各階層的積極主動參與啟蒙救亡運動「共同繪製、營造出一個不尋常的時代：一個高越激昂，理想色彩濃厚，而且動力十足的時代」。（頁 214）就此而言，本書對清末啟蒙運動的討論使我們對清末中國社會的特質有一個嶄新的認識。從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作者認為清末的啟蒙運動乃是往後中國諸多思想、社會運動的根源。一方面，清末啟蒙運動在精神上與後來的五四啟蒙運動不無關聯；另一方面，作者強調，清末啟蒙志士的積極參與下層社會的啟蒙，更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階層「走向民眾」運動的起點和第一波，開日後中國「民粹主義」運動的先河。這裏，作者對清末啟蒙運動歷史重要性的解釋，應屬合情合理。

在上述對本書的介紹中，筆者曾對本書的特點及優缺點稍有觸及，現再提出幾點，以終本篇。首次，就論文結構來說，筆者除了對第四章有所批評外，整體觀之，全書架構層次分明，理路清晰，導論與結論前後呼應，可以說是一本十分完整、周延的論文。其次，在史料方面，本書以清末的報紙為主要史料，充分地發揮了報紙的史料價值，是其特色。報紙記載的資料往往十分瑣碎，蒐集整理解釋均不易。作者能從這些瑣碎史料中重建出如此重要的歷史問題，足見其具有頗為廣闊的歷史視野，適切地掌握了其研究時代的歷史脈動。其三，在文字表達方面，本書大體上可謂行文流暢，析理明確，兼顧了歷史家應具的分析能力與敘事的本事。除此之外，在字裏行間，作者也偶爾稍微投注了史家的情感，這有助於增進其文字的感動力與可讀性。不過，本書也偶有文字誤植或欠明確處，雖無害於大體，若及時改正，可增加本書文字的精確。本書第二十七頁第十二行「一個比較容易的管道」及第八十五頁第十五行「宣講則有比較明確的指稱」，兩個「載」字顯然是「較」字之誤。而第九頁「就宣導對象而言，歐洲的啟蒙運動和……清末的啟蒙運動不僅不同，其用心、立意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的南轅北轍」一段指的似乎是兩個啟蒙運動對下層民眾的態度不同，而文中使用「用心」、「立意」二詞，

顯然並不適切。又如第十二頁「這個由救亡逼出來的啟蒙運動，並不僅限於知識階層。幾乎就在同一個時候，少數幾個走在時代前端的思想家就已經注意到開啟一般人民智識的重要性」一段中的「並不僅限於知識階層」指的應是「對象」不僅限於知識階層，但上文所指似並不明確。諸如此類都是本書文字上可更進一步精確的地方。

除了上述文字上的小缺失外，本書另一個缺憾是在導論中沒有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史作一討論。雖然，從書末所附徵引書目推斷，本書可能是第一本比較全面探討清末中國庶民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專著，作者若能在導論中對其研究史作個檢討評估，則更能彰顯本書在清末社會、文化史研究上的定位。

儘管如此，綜合觀之，本書仍然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佳作。晚清的社會史和文化史，迄今仍是有待史家發掘的領域，而有關中國「庶民文化」的研究，更是個嶄新的範疇。在這些方面，本書都將有積極的價值，這是可以斷言的。

□臺灣大學歷史系·楊肅獻□

**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合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351頁。

書名題記：

作者對於本書書名「十字街頭與塔」之題記為：在中國近代，存在一個主要由知識階層構成的自由主義羣體。他們在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的十字路口奮起吶喊，呼喚人的個性解放，鼓吹人權，崇尚理性，追求西方模式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理想與現實的激烈衝突中，他們中的許多人由熱烈而厭倦，終而走進「象牙之塔」。

1992年9月，我訪問清華大學文化研究所，胡偉希教授以本書相贈，單看書名，就引起了我的興趣。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後，鼓吹思想解放，實為自由主義的趨向，但不幸又視自由主義為「精神污染」，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下，本書之出現，應有特殊的意義。在詳細閱讀以後，發現本書確有超越前人之處，故決定寫這篇評介。

本書由三位年輕學者共同執筆，其中，胡希偉撰寫第一、二章（佔全書百分之四十），張利民寫第二、三章（百分之十），高瑞泉寫第五、六、七章及餘論（百分之五十）。自由主義思想這一主題，在中國大陸是屬於政治敏感的領域，過去甚少大陸學者嘗試。三位學者認為此一思潮，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政治均發生過影響，有深入研究的價值，希望對此一思潮來龍去脈和消長的過程，作實事求是的重建。在定稿以前，三人曾作過討論和修訂，惟亦有不一致之處。全書均有詳細的事實描述。在各章中，以第一章緒論為最長，是綜合的分析，亦是全書之精華所在，較易為讀者所了解。由於全書篇幅過長，作內容介紹，即以緒論為主，可以說是全書精華之摘要。從第二章起，只列提綱和簡要介紹。在介紹內容之後，再提出我的一些觀感和批評。

#### 內容簡介：

在第一章緒論中，作者首先批評林毓生《中國意識危機》一書缺點：一謂林不應以「思想為解決文化問題的唯一途徑」，理由是單憑思想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二謂林混淆近代知識分子之「所言」與「所行」。因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有很多人，不僅「坐而言」，且亦「起而行」，如五四後之自由主義者，要以和平手段使當權者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等是。從這二點批評，可知本書作者的關照點比較廣泛，包括思想、行動及其互動關係。作者謂西方自由主義，是由社會內部各種因素促成的，是將傳統和現存觀念運用於實踐，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實際情況而生者，且經歷長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惟自由主義之流派很多，有英式自由主義，大陸理性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和功利型自由主義等，都必須一一加以釐清。十九世紀之歐洲有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三大社會思潮，三者之價值取向相異。中國知識分子在介紹西方文化思想時，應視國情和社會條件而有所選擇。可是自嚴復、梁啟超到五四後之留美學生，都不分青紅皂白，「全盤輸入」。如嚴復誤認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富強，是由以穆勒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型自由主義造成的，卻忽視為十九世紀英國文明奠定基礎者，乃洛克等人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謂各國有其特殊歷史文化背景，不能一成不變的抄襲。（頁 1-15）

緒論之第二部分，介紹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作者認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產生的背景有二，一是鴉片戰爭後的社會期待變遷心理，一是中國思想文化上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嘉慶後學者為應付社會問題，



主張調和漢宋之爭，力倡經世致用之學。魏源的《海國圖志》和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是為代表。其次為今文經學的崛起和社會批判意識的抬頭，以龔自珍為例，龔氏批判統制者摧殘知識分子。龔氏的著作對晚清知識分子發生影響，起而學習西學。由此而產生維新派康有為和自由主義分子如嚴復、譚嗣同、梁啟超、胡適和徐志摩等人和五四運動。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嚴復自由主義思想的特徵，謂其為認識論上的實證主義，倫理觀上的個體主義，歷史觀上的進化觀和經濟思想上的放任主義（追求個人的利益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但作者謂嚴復《原富論》一書所表達的宗旨，卻不在個人幸福，反而是富國強兵。不過嚴氏這種放任的經濟理論對後來的自由主義者甚有影響。

作者對自由主義者之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亦有精彩的陳述和分析。他說除嚴復引進英式自由主義之外，譚嗣同是將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自由主義推進的第一人。譚在甲午戰後，思想轉變，從傳統經世致用之學轉向追求西學。他的「仁學」就有要求消滅一切差別，徹底實現社會平等的觀念。戊戌變法以後，梁啟超亦轉向自由主義思想，成為輿論界之「驕子」。但又被革命運動之民族主義浪潮所淹沒。1912年以後，自由主義走向高潮，五四時期是黃金時代，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蔡元培等為本期主要代表人物。傅斯年、羅家倫為胡等培育之自由主義新秀。1923年之《新月》雜誌，和稍後之《獨立評論》，由思想自由轉向政治改革和爭取人權。在1930年代初期和國民黨發生了衝突。但由於日本之侵略，民族主義高張，中國自由主義者遂告分裂，加入不同黨派，至抗戰勝利後才又活躍起來。此時之主要自由主義刊物為《世紀評論》、上海《大公報》、和《觀察》，其代表人物為胡適、周綏章、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等人，而其組織則為「中國民主同盟」。但由於1949年國共兩黨以戰爭決定勝負，自由主義者所尋求的第三條路遂告失敗，並由此而沉寂。（頁32-40）。

在緒論之第三部分，作者批評「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悖論」。亦就是作者探討自由主義不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原因。首先，作者認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者所代表的僅是一部分「精英文化」，與傳統之「大眾文化」相悖。前者受到後者之制約，不能發揮作用。再者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家族觀念，文化認同，一元主義。這樣的文化特徵對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親和力」，對自由主義思想則有「拒斥力」。這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遇到挫折的原因。其次，是由於自由主義者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的衝突。自

由主義所強調的是個人價值和自由，但在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者眼裏，自由主義被視爲是富國強兵之道。如嚴復認爲爭取國家富強應重於個人自由。梁啟超亦以民族主義優先於個人自由。總之，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發生矛盾時，中國之自由主義者多放棄價值理性，而投向工具理性，如嚴復之支持袁世凱，蔣廷黻之支持獨裁，和丁文江之主張開明專制，而胡適亦知其理想難行於中國。這一段分析，除誤認傳統爲「大眾文化」外，都說之有理，持之有故，相當精彩。

在權威政治下，中國近代之自由主義者被迫分爲觀念人物和行動人物。前者以胡適爲代表，後者以丁文江爲代表。行動人物參政以後，亦往往放棄其原有之自由主義理想；而觀念人物，又不爲現存之政治勢力所接受。此外，有一些人走入象牙塔，搞純文學，如周作人、梁實秋和徐志摩，喪失原有立場。從急進與保守觀點看，自由主義者個人自己和彼此之間，都存在著困惑和矛盾，如嚴復前期主漸進，1902年有「全盤西化」的急進主張。譚嗣同和梁啟超前期比嚴復急進，但譚之仁學，矛盾蕪雜。〔梁於1905年以後，徘徊於急進和保守之間。五四後之自由主義者如胡適、丁文江等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1940年代末，自由主義者想在國共之間，開闢第三條出路，但紙上談兵，脫離人民大眾，理論上亦出現空前混亂，最後爲社會主義所吸取。這就是自由主義不能在中國生根的原因。

緒論之第四部分，談歷史發展的「理」和「勢」。這是作者對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不能在中國獲得發展原因的綜合批評，分爲四點。一、近代中國之自由主義者與西方之古典自由主義脫節。作者認爲，中西自由主義之發展路徑不同。西方國家如英國是先有自由主義運動，然後才產生自由主義之觀念和理論，而中國則是先從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學說，然後才從事實際之運動，所行者乃「觀念的現實化過程」，與西方不同。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是從十七八世紀之古典自由主義，過渡到十九世紀之功利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自由主義。前一階段之自由主義本質，是西方中產階級向貴族階級和王權的鬭爭。所爭取者爲中產階級的利益。十九世紀後之自由主義者關心的是勞資糾紛、政教關係、對外經濟和社會福利等參與政府公共事務問題。前期強調個體與社會的對立，要求個體自由之保障；而後期則重視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近代中國之自由主義沒有經歷西方第一的階段，而直接引介西方十九世紀以後之功利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自由主義，嚴復如此，後來者亦一樣。二、與西方不同，中國之自由主義者因受儒家文化影響，最少在潛意識裏，傾向

「精英政治」，和民眾保持「天然的距離」。三、中國自由主義者沒有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而在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時，往往亦吸收了西方其他社會思潮，所以顯得思想理論的駁雜性。如三四十年代，不少自由主義者還提倡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西社會思想發展之時差所致。即十九世紀末，西方自由主義已漸被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取代。而方興之中國自由主義者，不分青紅皂白，囫圇吞棗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四、作者認為，中國之自由主義僅為少數人的運動，五四時期主要亦限於青年知識分子和文化教育領域。理由之一是中國之中產階級不發達，理由之二是與近代中國之時代課題脫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僅滿足中國社會貧苦之要求，亦成為少數知識分子的信念，因此，中國之自由主義思想無法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中去。

儘管如此，作者認為自由主義仍舊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思潮，它的產生，除了能滿足近代中國之「社會期待」外，亦滿足隨著洋務運動後，逐漸壯大的中產階級。辛亥革命後，尤其是五四以後之反傳統思想，和留學生之紛紛回國，是自由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不過其影響僅限於思想層面，而非政治層面。理由是中國之環境特殊，歷史傳統和內戰不停，武力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使主張和平漸進之自由主義，無用武之地。不過，作者認為「歷史尚未成為過去」，從當時之自由主義者看現在，他們仍「懷抱這希望走向未來」。作者雖沒有表白自己，讀者想亦能體會其意。

第二章介紹維新時期（1895~1898）的政派和社會思潮，政派方面比較分析帝黨、張之洞、康有為和西化派的形成和主張異同。作者認為張反民權，康從今文學出發，主張較急進，以立憲為富強手段，但不談個人自由和民主。西化派之嚴復則主自然漸進，重民智、民力、民德，全盤西化和個人自由。至社會思潮則分別介紹嚴復式自由主義基本信念，及其思想的內在疑難。謂嚴詮釋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時，亦有「誤讀」和「誤解」的情形，故在強調競爭意識、私心、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同時，又將個人自由從屬於國家之富強。嚴因受社會進化論和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同意「天賦人權」論，導致後來以民智未開為由，主張緩行立憲，及晚年主張開明專制，參加籌安會，依附袁世凱的悲劇。譚嗣同「仁學」中的自由主義意識和進化觀近似嚴復，而革命思想比嚴強烈。儘管譚之自由主義思想是空想的，但對二十世紀初之中國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有影響。梁啟超的「新民」說是嚴復思想的翻版，雖不若嚴氏縝密，對新文化一樣發生影響。

第三章標題「自由主義的早春」，敘述民初資產階級改革派和保守派間之鬭爭，形成僵局，於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啟蒙者進入歷史舞臺，以觀念變革挽救中國。作者用很大篇幅，分析陳獨秀的中西文化比較和批孔言論。介紹胡適的再造文明、文學革命和反傳統主張。最後作者謂胡之反對學生運動，是獨善的個人主義者。

第四章標題「歧路與選擇」，介紹自由主義在俄國革命和五四事件以後發生分化。胡適、丁文江等堅持本來立場，但已漸失影響力。李大釗等轉向馬克斯主義，獲得廣泛反響。在這裏，胡代表漸進主義，李代表急進主義。二者爭辯，急進者出主歷史舞臺。對胡之批判社會主義，亦作了忠實的陳述。不過胡徘徊於思想啟蒙與談政治之間，二者皆無所獲。在介紹東西文化和科學與人生觀二大論戰時，對胡頗有微辭。作者認為自由主義者對傳統文化之分析不够，缺乏創造性，以致不能在中國發展。

第五章標題「高壓下的蟄伏與抗爭」，分析自由主義者在政治、教育、文學和人權運動等方面，均遭到國民黨壓制而失敗的經過。在政治方面，作者認為自由主義者疏離革命，當然被時代所冷落。在教育方面，蔡元培的理想未能實現，其反對學生運動，亦不符時代潮流。其與蔣的關係亦由參與、疏離到分裂對抗。在文學方面，作者精詳地分析了周作人、羅隆基、和沈從文等人的作品，雖亦有些貢獻，但終為國民黨所抑制而走進十字街頭的象牙塔。新月派的人權主張，亦不過是一個烏托邦而已。作者認為社會革命才是歷史發展的真諦，人權派未能掌握情勢。作者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對新月人權派之理論和失敗，加以諷刺。

第六章標題「政治自由的高潮及其沈寂」，大意說戰後中國之自由主義者所表現的是政治上之自由主義。但「歷史並不站在自由主義一邊……全面內戰決定了缺乏實力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必須做出……選擇」，或左傾如羅隆基，或右傾如胡適，或走入象牙塔如梁實秋。總之，中國之自由主義從此退出文化和政治舞臺，銷聲匿跡。第七章餘論和後記，對自由主義之死，有幾分同情，亦有幾分諷刺。

以下是我讀後的感想和一點意見。

本書在內容結構方面，從上述章節中就可以看到，結構完整細膩，材料豐富，內容翔實。在方法論上，本書最顯著之特色有三：一為深入比較中西自由主義發展路徑之不同，與我們在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所見相同，即西方之自由主義，是內發式的，基於個人和社會需要而生者。中國近代之自由主

義，則為插枝式，可惜當時沒有適合的土壤。二從中國自由主義發展過程中，作個別人物和派系之前後比較，以了解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困境。三為對中國自由主義之土壤包括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時代課題」的研究，分析其興衰過程和自由主義不能移植成功的原因。邏輯嚴密，分析和綜合均強勁有力。在文字和寫作技巧方面，條理清楚明白，應是上乘之作。

但本書作者的立場搖擺不定，有時是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引龔自珍之批判專制統治者摧殘知識分子之恐怖畫面謂，「於是專制君主無不把士當作仇敵，必欲摧殘其獨立思想而後快。辦法是摧鋤他們，使其喪失廉恥（即獨立人格），……經過這樣的一番折磨，士的軀體儘管沒被消滅，但其精神及人格力量卻已消磨殆盡，類如行屍走肉……」，「讀到此，我們與其說是對當時不振的士感到可嘆，不如說對封建專制政治挫折人才的罪惡感到憤懣」（頁 18），有若感同身受。引儲安平評國共二黨均是自由主義之敵人，口是心非，既高喚民主，而又反對民主（頁 337）。可見在當前大陸政治環境下，尚保持一份自由主義者的批判精神。但有時又站在另一立場，謂自由主義者無法克服內在和外在矛盾，而認定社會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唯一可行的道路（頁 40-77）。因之對自由主義之死亡而哀鳴；在哀鳴中，帶有幾分悲觀和消極，且又缺乏同情之心。如云，1949 年，自由主義終歸沈寂（頁 40），「自由主義留下了它的印痕」（頁 344），並敘述胡適和羅隆基分途，表示羅的選擇正確；梁實秋和梁漱溟被毛澤東拒絕，是多麼不光榮的事。

總起來說，作者的立場仍然是偏左的，這是多數中國大陸學者的共同點。全書重點為自由主義和國民黨的對抗。中國共產黨反而是迎接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論點不能令人苟同。作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最好的出路，為歷史發展之必然。作者引毛澤東的話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羣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呼口號，講革命」（頁 339）。認定這些自由主義者已放棄原有立場，真心信奉社會主義。我不贊成這種筆法。中共只是利用自由主義者，作為與國民黨政治鬭爭的工具。我們知道，1949 年，當中共成立政府時，周恩來對中國民主同盟人士說，從今而後，諸位的任務是協助中國共產黨搞好教育和文化工作。言下之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民主同盟諸公不許再有自由主義的主張。這亦正如作者所說，1949 年以後，自由主義正式在大陸被宣佈死亡。閱讀至此，難免亦期待作者為自由主義之死亡作出公正的評論，但結果是令人失望。

此外，作者亦有論斷錯誤之處，如云自由主義到了抗戰時期即銷聲滅

跡。這不正確。戰時之昆明西南聯大，在聞一多等人的領導下，自由主義亦有蓬勃的發展。在國民參政會中，亦有響亮的聲音，發揮一定的影響力。抗戰勝利以後，在中共的策動下，自由主義的聲音更加響亮，「反內戰」，「反饑餓」和「爭自由」的口號，響徹雲霄。國民黨就在這樣的壓力下垮臺的。

關於中國近代自由主義失敗的原因，作者完全同意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觀點。費氏認為失敗於沒有法制保障和獨立經濟基礎。（頁 345）但作者沒有進一步的解釋。沒有經濟基礎是中國當時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中產階級基礎薄弱。沒有法制保障是誠如作者在正文中所說，當時是以「槍桿子出政權」的時代，自由主義分子反對暴力，無武裝組織，談不上實力。（頁 349）公平地說，前期是受到國民黨的壓制，後期則是受到共產黨的徹底消滅所致。

事實上 1950 年以後，自由主義在臺灣和海外，仍存有火種。除胡適等人在美國外，在臺灣大學有殷海光（西南聯大學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徐高阮（他亦是西南聯大學生），在東海大學有徐復觀教授等人。這些人雖然受到一些限制，但他們仍有人身和言論自由，並沒有銷聲匿跡。我們知道，民主同盟 1945 年的政治綱領，諸如議會制、責任內閣、人權保障、軍隊國家化、普及教育、學術自由、勞工福利和男女平等等主張，（頁 313）迄今仍為大陸和臺灣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近年來的臺灣民主運動和大陸上的六四運動，都說明自由主義並沒有從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消失。誠如胡偉希所說，「歷史尚未成為過去」，舊的和新的自由主義者，仍將「懷抱這希望走向未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蘇雲峯□

**宋子文評傳。**吳景平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547 頁。

附圖。彭明序。

此書係吳景平氏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擴充撰就。由於傳主不僅同孫中山、蔣介石有密切的感誼淵源，而且長期在中國政壇位顯任重，親身經歷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直接參與財經和外交方面政策措施的制訂與實施，一部完善的傳記，其意義固不僅限於記述個人行藏，對於認識和研究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也富有參考價值。然而，據筆者所知，對於中國近代史上這個深值研究的人物，迄今尚無一部專著問世。吳著是有關宋子文傳記的第

一部，筆路藍縷，十分值得注意。

全書除引言和結束語外，共分十一章。書前刊圖照三十一幀，書末附主要參考資料目錄和西人姓名中譯表。在引言簡述傳主家世、教育背景和1917年美國留學歸來最初幾年的經歷後，第一章記述傳主自1923年步入政壇至1926年為廣州革命政府理財，對國民革命所作重要的貢獻。第二章記述1926年末離粵北上，出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東抵上海接收江浙財政的情況，兼論他在此時期同蔣介石關係的變化。作者用三章的篇幅論述傳主1928~1933年六年間的活動和思想發展，包括南京理財（第三章）、九一八事變後對日本態度（第四章）、1933年出訪歐美和是年10月猝然辭去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及其原因（第五章）。第六、七兩章分敘傳主去職後從事籌建中國建設公司、參與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改組、幣制改革等經濟活動，和抗戰爆發前後在西安事變與廬山蔣介石——周恩來談判中斡旋與磋商等活動。第八、九兩章則以抗戰時期外交活動為主要內容，分述作為蔣介石私人代表訪美（1940年）、出任外交部長（1941年）後簽訂「平等新約」和爭取美援等活動，以及赴蘇聯談判的經過（1945年）。第十章集中討論出長行政院期間（1944年12月—1947年2月）為爭取美援而作出的努力和對戰後中美經濟合作的積極謀求。第十一章以「從政壇頂峯隕落」為題，歷敘傳主在抗戰結束後主持敵偽產業接收工作，以及為擺脫政府財政經濟困境而採取若干措施未能奏效，反而使局勢惡化，引起強大的「倒宋」風潮，終於辭職下臺，其後雖受命主持粵政，但畢竟已回天乏術，於1949年去國，寓美度完晚年歲月。結束語則是作者對傳主一生功過是非所作總評價。

從全書內容可以看出，作者在搜集史料方面用力至勤。除與傳主有關的著作和資料匯編外，作者詳細查閱了《廣州民國日報》、《漢口民國日報》、《上海民國日報》，以及較為常見的報刊如《申報》、《大公報》和《東方雜誌》等，充分利用了中國政府財政和外交公報，美國和英國外交文件匯編，尤其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認真研究了國民政府行政院、財政部、外交部、中央銀行和中國銀行等機構卷帙浩繁的檔案，從中排沙揀金，去蕪取精。史料采輯豐富，為全書立論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一部人物傳記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能否對傳主的思想、活動及其影響作出符合歷史真實的評斷與分析。本書對於宋子文早年熱情投身國民革命，以後在外交上堅持反對日本侵略和大國強權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在經濟上試圖將西方制度引入落後的中國，力除積弊，謀求改革，給予積極的

肯定；同時認為他所奉行的方針政策主要是從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結果使極少數所謂「豪門」獲得巨大好處，而包括一般中小工商業者在內的廣大民眾處境日益艱難。對於許多具體的問題，作者力圖以翔實的資料作具體的分析。譬如，傳主每被人視為拒日派的強硬代表，作者根據其言論，認為他在處理濟南事件時，仍持溫和派的立場，不同於胡漢民、戴傳賢等人的強硬主張，他對日本的態度有一個逐步發展變化的過程，這一變化以九一八事變為分界，大體上與當時中日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相一致。又如，論者常以孔宋並提，孔任財長時間最長（1933年10月—1944年11月），從《評傳》可以看出，在財政金融方面的影響，宋實超過孔，40年代商洽外債的主要決策人是宋而非孔。再如，傳主同蔣介石的長期關係，書中指出，兩人合作曾在寧漢交惡後暫時中止；寧漢合流後傳主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期間，先是合作繼又破裂；出任外交部長後同蔣關係雖稱融洽，但非無分歧，不過這種分歧並未超過這樣的限度，即傳主「始終只是一個『補天派』」，他「把自己的抱負的實現寄托在這個〔國民黨〕政權上」（第534頁）。這些力避簡單化的具體分析，頗具說服力量。

正是力求在詳細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對具體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作者對於傳記所涉及的近代若干史事，也能不囿於流行的說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933年中美棉麥借款，不少經濟史或近代史著作強調美國的目的在於轉嫁國內經濟危機，並藉此控制中國的關稅和財政，國民政府則以此款用於反共內戰。本書認為，還應看到它是美國對國民政府內外方針的肯定和支持，以及它對日本侵略擴張所起的制約作用。作者同時指出，此項借款僅屬商業信貸性質，同軍火信貸有本質區別，同一般政治借款（現金借款）更大不相同；而且實際借額只有二千萬美元，而非五千萬美元，經營棉麥借款收入用於南昌行營所謂「剿匪」治本治標費比重極小，如果同與第五次「圍剿」直接有關的1933年財政年度軍務費相比，僅為後者的1.2%（第193-196頁）。這些分析澄清了以往關於棉麥借款的片面論斷。至於1935年幣制改革，不少論者持否定態度，認為它加速了國民黨金融資本的集中，未能充分發揮現代貨幣的作用，甚至導致後來的通貨膨脹，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評傳》則分析傳主支持幣制改革的原因，指出宋意識到這一改革是擺脫財政金融困境的根本途徑，又是從經濟上抵制日本擴張的必要前提，正是基於這樣的憂患意識，宋與孔祥熙為實行改革而坦誠合作，並欲藉此實現他所信奉的西方經濟統制理論的抱負，兼以消彌與蔣介石的嫌隙，重



返國民黨的權力中心（第 274-275 頁）。這些論述亦頗有新意，有助於對幣制改革的全面認識和重新評價。書中類似分析時有所見，上舉不過兩個例子而已。

《評傳》還從宋子文活動的角度為近代中國若干史事提供了重要材料，豐富了歷史研究內容。例如，經濟方面，關於 20 年代廣州革命政府的歷史，民國史研究者多著眼於政治或軍事方面，經濟文獻極少，一些著作所根據者亦多限於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文件資料，本書還根據當時報刊和其他史料，對那個時期廣東統一財政、整理稅項等方面作詳細記述，補充了這方面的空白。外交方面，如 1945 年中蘇會談，作者的研究除中蘇雙方外，特別將注意點放到美國，強調宋受到來自蘇聯和美國兩方面的壓力，而最後則聽命於蔣介石。作者不同意那種認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完全是宋子文一手包辦的」（第 412 頁）和宋在「最後一分鐘」拒絕在條約上簽字（第 424 頁）等說法，指出他既未能違背蔣的基本主張，又極不現實地尋求美國支持，以致雖曾與斯大林力爭，卻無法改變不利的結局。宋在會談中折衝細節，對於深入了解當時中蘇關係和兩國盟約簽訂的真相，無疑不無裨益。

作者對於史料的使用，持慎重的態度。如傳主於 1931 年夏險遭暗殺一事，向有不同說法。作者引用重光葵回憶錄認為出於日本軍方策劃的說法，同時將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的另一說法（認為係杜月笙手下青幫分子所為），附注說明（第 145 頁）。關於傳主離開大陸前積累巨額私產，當時道路傳聞紛紛：儘管言者鑿鑿，但畢竟未見直接史料足以佐證確切數額，作者在書中對此寧付闕如，不輕下斷言（第 526-527 頁）。個別名詞如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曾有「美國復興金融公司」、「美國財政復興公司」、「美國財政善後公司」、「美國建設銀行公司」等不同譯稱，本書一一列舉注末，而獨取宋在全國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報告中所使用的譯名「美國金融復興公司」（第 191 頁），於細微處亦足見作者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

傳主生活的時代，是社會動盪激烈、政治風雲變幻詭譎的時代。《評傳》反映了傳主同蔣介石關係的演變，也涉及同孔祥熙、汪精衛、張學良等人的關係，但同國民黨內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和派系關係如何，書中未有闡述。傳主作為政府財經政策的決策者、經濟機構的領導人，自己又有所經營，一些私營大企業（如榮家資本集團、劉鴻生系統企業和簡家南洋煙草公

司)的史料,均可看到他對這些企業經營的影響,可惜本書未加以利用,遂使傳主同私人工商業者的連繫和矛盾的複雜歷史,未得充分展開研究,成為全書相對薄弱的部分。

作者主要利用在大陸可以得到的檔案資料和書籍報刊,無緣接觸現藏臺灣和國外的有關史料(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傳主私人檔案資料最多,凡五十餘盒及微捲等,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呂芳上先生文),這不能不是重大的遺憾。也許正是由於缺乏私人檔案,包括親友來往函電,整部《評傳》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不平衡布局,早歲與晚年生活均嫌簡略,作為主體的20~40年代的歷史,亦著重公務活動。歷史人物傳記對於傳主的求學、婚姻、家庭、生活信仰與情趣,以及社會交游等方面,若能給予適當的篇幅描繪,則所傳人物的性格將生動地凸顯於讀者面前。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陳絳□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公開徵稿

- 一、本刊於每年六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 二、本刊為一國際性的學術刊物,園地公開,凡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之中、英、日文論著(不超過二萬字)、學術討論(不超過一萬字)、研究動態(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所歡迎。論著請依照一般學術論文加註格式撰寫。
- 三、來稿以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如經發表,版權即屬本刊所有。
- 四、來稿一律交由本刊編輯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審查。
- 五、來稿如因時間過遲影響出版進度,本刊編委會得斟酌情形,將該稿移至下一期出版。
- 六、來稿刊出之後,一律贈送本刊五冊,論著另贈送抽印本二十冊,不另致稿酬。
- 七、來稿牽涉版權部份(如圖表及較長篇幅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八、來稿請註明姓名、工作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號碼,以便聯繫。
- 九、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收。為恐稿件遺失,請自備底稿。



## 論文目錄

#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91~1992)

李達嘉\* 輯

### 一、博士論文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臺灣大學	81年6月	薛化元	張君勳思想研究——以憲政思想的探討為中心	李永熾
文化大學	80年6月	黃建淳	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	程光裕
文化大學	80年6月	陳木杉	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理論與實際之研究	宋晞
文化大學	80年6月	李潤和	中韓近代史學之比較研究	宋晞

### 二、碩士論文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臺灣大學	81年6月	李福鐘	改造一個共和國——中國大陸改革運動的展開(1976~1984)	陳永發
臺灣大學	81年6月	宋家復	章學誠的歷史構想與比較研究	錢新祖
臺灣大學	81年6月	王鴻泰	「三言二拍」精神史研究	李永熾
臺灣大學	81年6月	柳智元	清初滿族薩滿教的演變及其文化性格	陳捷先
臺灣大學	81年6月	劉康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919~1949)——中國啟蒙運動與極權主義之辯證法	陳永發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臺灣大學	81年6月	林春成	1952年日華和平條約之研究	曹永 吳密 和察
政治大學	81年6月	洪慈璘	臺灣報紙企業化發展之研究(1949~1992)——以中央日報、聯合報為例	閻沁 恆
政治大學	81年6月	王文裕	北伐前後的桂系與國民政府	林能 士
政治大學	81年6月	廖德修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郵政事業	林泉
政治大學	81年6月	李秉璋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鹽業政策	陳慈 玉
政治大學	81年6月	朱旭華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與臺灣土地改革	
政治大學	81年6月	劉龍心	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	杜維 運
政治大學	81年6月	葉惠芬	唐生智與北伐前後政局	林能 士
政治大學	81年6月	宋秉仁	常勝軍研究	
政治大學	81年6月	吳淑鳳	中共的聯合政府要求與國民政府的對策	張玉 法
政治大學	81年6月	陳進金	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1928~1937)	蔣永 敬
政治大學	81年6月	王凌霄	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	張玉 法
政治大學	81年6月	管美蓉	吳景濂與民初國會	林能 士
政治大學	81年6月	葉梅蘭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上海勞工運動(1927~1936)	陳永 發
臺灣師大	81年6月	葉高樹	降清明將研究(1618~1683)	王家 儉
臺灣師大	81年6月	鄭建生	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	呂芳 上
臺灣師大	81年6月	洪美華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	莊吉 發
臺灣師大	81年6月	王淑芬	清前蘇州絲織工人之研究	王家 儉
臺灣師大	81年6月	黃德宗	蔣廷黻及其政治思想的形成	張玉 法
臺灣師大	81年6月	朱高影	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研究(1938~1947)：國府爭取青年運動權之努力	張玉 法
臺灣師大	81年6月	李和承	東北民族資本中聯號的研究(1860~1931)	李國 祁
臺灣師大	81年6月	吳芳芳	《新月》雜誌之研究	呂芳 上
臺灣師大	81年6月	王添法	明清時代所譯的《幾何原本》之研究	呂實 強
臺灣師大	81年6月	李舜傑	抗戰時期貴州的高等教育	李國 祁
臺灣師大	81年6月	藍博堂	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1971~1987)	張玉 法 尉天 驄
清華大學	81年6月	許進發	十九世紀前中國知識份子的自然知識——以鄭復光為例	洪萬 生

清華大學	81年6月	廖秀玲	呂柟的生平與學術思想研究	朱鴻林
清華大學	81年6月	張劍維	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現代民歌的發展史——建制、正當性論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	陳光興 傅大為
清華大學	81年6月	王秀雲	「女性與知識」的歷史比較——以當代女性科學家、七〇年代臺灣、清末及民初為例	傅大為
清華大學	81年6月	蕭世暉	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興起——以「沈括研究」為例	傅大為
成功大學	81年6月	張志相	張深切及其著作研究	林瑞明
成功大學	81年6月	陳憶蘇	復興閣皮影戲劇本研究	馬森
成功大學	81年6月	王月華	清代紅樓夢繡像研究	康來新 吳達芸
成功大學	81年6月	盧彥光	清代養女制度之研究	石萬壽
東海大學	81年6月	李光雨	朝鮮官員對太平天國的認識——以燕行使節的報告為中心	陳哲三
東海大學	81年6月	梁榮華	中年汪精衛之研究 (1917~1932)	朱宏源
東海大學	81年6月	潘繼道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	戴寶村
東海大學	81年6月	楊志遠	章實齋史學思想之研究	杜維運 呂士朋
東海大學	81年6月	林素珍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臺灣原住民宣教之研究 (1912~1990)	查時傑
東海大學	81年6月	邱正略	清代臺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拓墾之研究	戴寶村
東海大學	81年6月	城戶康城	日據時期臺灣鴉片問題之探討	張勝彥
文化大學	80年6月	李汾陽	清代蠲恤制度之研究	陳捷先
文化大學	80年6月	湯志敏	明代嘉、隆、萬三朝的反王學運動	王家儉
文化大學	80年6月	簡耀東	我國圖書館法的研究	王振鵠
文化大學	80年6月	嚴鼎忠	國立北平圖書館之研究	王振鵠
文化大學	81年6月	李世偉	中共與民間文化 (1935~1948)	陳永發
文化大學	81年6月	林正芳	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 (1895~1945)	賴澤涵
文化大學	81年6月	吳仁棠	清末《申報》的社論——政治層面評析 (1872~1905)	王綱領
文化大學	81年6月	鄭仁臺	清末浙江地區革命運動之研究——以會黨與光復會為中心	王綱領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1年7月~1993年2月)

游 鑑 明\* 輯

(1991) 7. 10 由南開大學主辦之「第二屆國際明清史學術討論會」，在天津舉行，中國大陸及各國學者約計百餘人與會，大會歷時4天(至7. 13)結束，會中分「文化」、「社會生活」、「中外關係·經濟」與「政治」等四組進行討論，發表論文共計73篇；另於大會報告之論文計10篇，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如下：(1)王鍾翰：〈試論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2)山根幸夫：〈最近十年間日本的明史研究〉；(3)李洵：〈明武宗和他代表的封建貴族階級〉；(4)關文發：〈明代翰林制度考述〉；(5)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清代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6)蔡美彪：〈明代的蒙古〉；(7)水野明：〈豐臣秀吉侵朝征明的檢證〉；(8)李來福：〈非壓制性國家的比較歷史學——明清地方社會試析〉；(9)丁荷生：〈明清福建民間信仰與地方歷史〉；(10)曹貴林：〈明清農村經濟生活中的鄉風俗例〉。

8. 17 中國明史學會、復旦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合辦之第四次「國際明史學術討論會」，假上海召開，會期6天(至8. 22)，與會中外學者約百餘名，大會發表論文計32篇。

10. 25 由辛亥革命研究會主辦之「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在日本女子大學舉行，會議以「辛亥革命と中國の近代化」為主題，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與會學者約計 160 名，會期 3 天（至 10.27）。大會除進行演講及分組討論之外，另宣讀論文計 9 篇，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如下：(1)饒懷民：〈論辛亥革命時期劉揆一的近代化思想〉；(2)久保田文次：〈世界史における辛亥革命〉；(3)金衡鍾：〈1911年の汪精衛——國事共濟會活動を中心に〉；(4)山田辰雄：〈民國初期の政黨政治について〉；(5)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建設の摸索——天壇憲法草案を中心にして〉；(6)桑兵：〈清末民初電播業の民間化與社會事業〉；(7)中村哲夫：〈東亞同文會と 1900 年のこつの起義〉；(8)小島淑男：〈留日女子學生と辛亥革命〉；(9)劉望齡：〈日本在漢的世論宣傳與思想近代化——以『漢報』爲中心〉

10.26 廣島史學研究會及中國四國歷史學地理學協會合辦之年度大會假廣島大學舉行，會議共計 2 天（至 10.27），「東洋史部會」共宣讀論文 7 篇，其中 3 篇論文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茲列如下：(1)丸田孝志：〈中國共產黨の邊區統治について〉(2)山腰敏寬：〈アメリカの中國における宣傳活動と五・四運動〉；(3)水羽信男：〈中國民主同盟の國民統合論——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催準備時期を中心として〉。

12.4 爲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召開「中華民國歷史問題學術座談會」，與會者主要來自東方研究所、遠東研究所與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等機構之學者，共發表論文 14 篇：(1) Yu. M. Garushyants：〈辛亥革命以後政黨鬭爭の有關問題〉；(2) A. S. Kostyayeva：〈民國初期人民運動的特點〉；(3) Ye. Yu. Staburova：〈評孫中山思想〉；(4) Z. D. Katkova, Yu. V. Chudodeyev：〈孫中山第一次訪問日本〉；(5) A. A. Krushinskij：〈晚年嚴復怎樣對待西方？〉；(6) Ye. A. Belov：〈中俄關係中的巴爾虎問題，1912～1915〉；(7) N. S. Kuleshov：〈辛亥革命與西藏獨立，1900～1914〉；(8) V. S. Kuznetsov：〈辛亥革命與中國之回教團體〉；(9) N. L. Mamayeva：〈國民黨の歴史特點，1923～1927〉；(10) P. M. Ivanov：〈1927～1937 年中國小政黨和派別〉；(11) A. N. Karneyev：〈中華民國稅務不平衡的原因〉；(12) V. A. Kozyrev：〈國民黨國家體制的演變，1937～1945〉；(13) A. A. Pisarev：〈辛亥革命中之土地問題〉；(14) Ye. V. Zavadskaya：〈蕭嫻飛白書法中之革新〉。該會歷時 2 天（至 12.5）結束。

(1992) 3.14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邀請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先生爲「到訪傑出學人」，於 3 月 14 至 19 日

訪問該書院，並以「西方眼中的中國」為題，舉辦兩次公開演講，其講題分別是「對新事物的接受」和「體系建構與想像」。

5.5 由《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及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聯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洋務運動史討論會」，在湖北宜昌舉行，會議收到論文 82 篇，主要討論洋務運動的區域研究、洋務運動的總體評價、洋務企業的個案研究、人物研究、洋務運動與城市化等問題。會期 7 天（至 5.11）。

5.9 由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舉辦之「張岳軍先生與對日抗戰」學術討論會，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行，會期 1 天，計有 5 位學者發表論文，其題目分別如下：(1)唐振楚：〈張岳軍先生之思想行誼〉；(2)蔣永敬：〈張羣與調整中日關係〉；(3)李雲漢：〈張岳軍與抗戰初期之政府決策〉；(4)呂實強：〈張羣與四川對抗戰的貢獻〉；(5)陳鵬仁：〈張羣與戰後中日關係〉。

5.26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假揚州舉行，會期歷時 4 天（至 5.29）結束，提交論文計 40 餘篇，會議主要就揚州在中外關係上的地位、長江流域地區在對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中國歷代對外關係中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其中有關近代中國史之論文如下：(1)吳士英：〈清初中期經濟交流略論〉；(2)周中堅：〈明遺民東渡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3)呂一燃：〈清俄合辦外蒙古金礦初探〉；(4)盧明輝：〈恰克圖買賣城中俄邊境貿易的興衰變化〉；(5)葛鳳花：〈日蘇「滿」非法買賣中東鐵路與中國政府的抗議〉；(6)黃盛璋：〈明代後期開放海禁後出口貿易若干研究〉；(7)晁中辰：〈明後期白銀的大量內流及其影響〉；(8)郁龍余：〈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

5.31 加拿大亞洲協會 (Canadia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1992 年年會，在加拿大加東夏洛頓市 (Charlottetown) 的愛德華太子島大學 (Univ.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舉行，會期歷時 3 天（至 6.2）結束，約有 130 餘位學者與會，共分 34 個專題小組，與中國有關的有 14 個，論題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者茲如下述：(1) David P. Barrett, "The 'Strange and Complex' Natur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Chinese Trade with the Enemy and Western Responses to It," (2) Larry N. Shyu, "Military Turncoa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The Role of Weijun in the Military Balance of the War."

6.9 「孫逸仙思想與中國現代化學術座談會」假北京香山飯店舉行，



與會學者計 51 人，分別來自臺灣、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香港和澳門等地，會中有 40 餘人發表論文，針對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主張與構想進行探討，並著重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討論，大會歷時 3 天（至 6.11）結束。

6.26 「中國雲南少數民族的文化與近代化國際研討會」，假日本上智圖書館舉行，會期兩天（至 6.27），發表論文 13 篇，其論題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相關者如下：(1)王均：〈イ族の傳統刺繡文化と近代化〉；(2)劉光智：〈民族實狀にあった民族教育の發展と近代化の加速化〉；(3)王叔武：〈雲南少數民族近代化の發展〉；(4)諏訪哲郎、山本英治：〈中國における近代化政策と少数民族〉；(5)黃惠焜：〈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中國民族問題〉；(6)胡起望：〈南方少数民族の傳統文化と近代化に關する考察〉。

7.4 臺灣研究基金會假臺灣大學舉辦第四屆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國民國家與臺灣歷史」，會中發表 10 篇論文，相關論文如下：(1)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2)吳密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變遷〉；(3)王昭文：〈日據時代臺灣社會運動的同化迷霧〉；(4)秦先玉：〈從「性政治」的觀點看五〇年代外省女性的反抗〉；(5)陳俐甫：〈臺灣民族意識發展史研究〉；(6)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7)劉蔚之：〈一個山地學校的多元化教育之俗民誌研究〉。會期 2 天（至 7.5）。

7.14 由日本九州國際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及華僑大學共同舉辦之「世界の中の東アジア海域」國際研討會，假日本九州市舉行。會中除由臺大教授曹永和先生以「東アジア海域交易圈について——臺灣からの視點——」作專題演講之外，另發表論文計 5 篇，與近代中國史有關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翁其銀先生、日本九州國際大學教授和田正廣先生之〈東アジア海域經濟文化圏と上海・長崎——上海『茂記號』と長崎『泰益號』——〉

8.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俄羅斯東方研究所研究員、臺灣研究中心主任葉文基（Peter Ivanov）先生演講，其講題是：「談俄國的中國研究」。

8.30 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日本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聯合主辦之「第一屆中琉關係史研討會」，假日本沖繩縣圖書館召開，與會中日學者共計 60 餘人，會中發表論文 5 篇，相關論文如下：(1)豐見山和行：〈在琉球有關對中國關係的公文書〉；(2)俞玉儲：〈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3)戈斌：〈從清宮檔案看琉球國朝貢活動〉；(4)濱下武志：〈關於東亞地區「人」的

移動與琉球)；(5)秦國經：〈清代國子監的琉球官學〉。

4～8月 美國哈佛大學舉辦學術討論會，與近代中國史有關者，其講者、講題及日期分別如下：(1)Leonard Blussé: “Reconsidering the Tribute System: Chinese Expansio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 Ming,” (4.20) (2)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Area Capitalist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937-1945”. (5.8)

9.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永發先生報告：「政治控制和羣眾參與：白雀園肅反」。

9.13 第9屆「歐洲漢學會議」，假巴黎法蘭西學院(Collég de France)召開，與會人士來自歐洲各地會員與世界各國著名漢學家，約計250餘人，會中邀請 Jaiques Gernet 演講，講題為「轉變中的中國」(La notion de Changement en Chine)，另宣讀論文計80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9.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該所訪問學人、政治大學教授巨煥武先生演講，其講題是：「明刑與隱刑——沈家本考論執行死刑的方式及其場所」。

9.2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姜廣輝先生、交通大學共同科詹海雲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女士、黎明工專劉君燦先生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林慶彰先生主講，講題是：「明清實學研究的現況及展望」。

9.22 由瀋陽師範學院主辦「中國社會史第四次研討會」，假瀋陽遼寧大廈舉行，討論的重點包括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關於農村社會變遷的幾個問題以及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的理論和典型個案分析，會中共計發表論文25篇，其中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論文茲如下述：(1)忻平：〈近代上海變異民俗文化特點研究〉；(2)涂文學：〈加強洋務運動時期的社會環境研究〉；(3)沈殿忠：〈論僑民史在社會史中的地位〉；(4)李華興、吳前進：〈美國華僑華人文化變遷考察〉；(5)何曉明：〈近代中國社會構成論綱〉；(6)張玉興：〈從詩文筆記看清初東北社會動向〉；(7)鈔曉鴻：〈明清時期關中經商之盛及奢糜之風〉；(8)常建華：〈試論明代社會消費風俗的變遷〉；(9)馬敏：〈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史的新探索〉。會期歷時4天(至9.25)結束。

9.2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舉行研討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副教授藤井志津枝女士演講：「對臺灣少數民族歷史研究的自我挑戰——以日據時期理藩政策研究為例」。

9.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牛津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與聖安東尼學院研究員曾銳生先生演講，其講題是：「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的反攻大陸政策」。

9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分別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教授章慶遠先生、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王戎笙先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徐藝圃先生及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馮爾康先生主講，講題與日期分別如下：(1)「兩岸學者談近代中國史的研究」（9.19）(2)「清代檔案資料與清史研究概況」（9.24）。

10.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舉行研討會，邀請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蔡慧玉女士演講：「日據時期的保甲制度——以動員為例（1915～1945）」。

10.1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該所約聘助研究員朱榮貴先生發表演講，其講題是：「清初書院之學術自主性及其反政治意涵」。

10.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黃福慶先生報告：「滿鐵調查部檢舉事件之探討」。

10.17 「紐約州亞洲研究會議」(New York State Conference on Asia Studies) 於紐約綺色佳學院 (Ithaca College) 舉行，會中發表論文 11 篇，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論文如下：(1) Sewall Oertling, "Why the Landscape as Subject Declin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2) Margo S. Gewurtz, "Women and Religion in China: The Building of a Rural Church in North Henan, 1888-1911."

10.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 Institute of History, Far Eastern Branch,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教授耿納季·特卡欽柯 (Guennadi I. Tkatchenko) 先生演講，其講題是：「中國近代史上蘇聯因素起的作用」。

10.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王爾敏先生報告：「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

10.31 韓國「東洋史學會」秋季研討會，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召開，與會學者計 100 多名，發表論文 6 篇，其中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者如下：(1)鄭炳喆：〈明清時代華北水利工事的性格〉；(2)金承旭：〈在北伐時期上海自

治運動之一考》；(3)崔震奎：〈天父天兄的下凡以及上帝教的變化〉。

11.3 由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 9 個單位聯合召開的「中國東南地區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於杭州、湖州二地舉行，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美國等地之學者約計百餘人與會，提交論文計 60 篇，分 3 組討論，其中與近代中國史相關之論題如下：(1)何炳棣：〈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才〉；(2)易惠莉：〈江南地區早期近代人才優勢概論〉；(3)林正秋、陶士和：〈近代浙江實業人才的興起及其原因初探〉；(4)孫善根：〈近代寧波籍工商人才輩出探因〉；(5)萬仁元、王奇生：〈近代江蘇人物的量化分析〉；(6)許懷林、陳劍安：〈試論近代江西人才狀況的變化及其啟示〉；(7)金幹：〈西方醫學教育的傳入、發展及歷史經驗〉；(8)林偉功：〈福州船政學堂對近現代科技人才的影響〉；(9)蔡一平：〈浙江東陽、義烏與湖州人才的比較研究〉；(10)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籍女教師的培養～以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例〉；(11)游修齡：〈從明清時期的農學家看農業人才問題〉；(12)方祖猷：〈時代思潮和浙東學派在寧波的形成〉；(13)何信恩：〈試論紹興人才輩出的內外因素〉；(14)王增清：〈藏書樓、圖書館與江浙人才〉。會議歷時 4 天 (11.6) 結束。

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黃仁宇教授演講，講題是：「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

11.10 中華民國史料中心舉辦之「中國現代青年運動之發展學術討論會」，在政大公企中心召開，與會學者 130 人，發表論文計 5 篇，茲如下述：(1)陳三井：〈蔣經國先生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2)蔣永敬：〈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抗戰建國〉；(3)李國祁：〈近代中國青年的第一次怒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青年運動〉；(4)呂芳上：〈娜拉出走以後——五四到北伐青年婦女的活動〉；(5)葉明德：〈大陸知識份子之政治參與〉。

11.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宋光宇先生報告：「清代臺灣的善書與善堂」。

11.20 由琉球中國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舉辦之「第四回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假日本沖繩大學召開，計有臺灣、韓國、中國大陸和日本等地 28 名學者提交論文，相關論文茲列如下：(1)徐玉虎：〈明琉封貢中「官生入監讀書習禮之研究」〉；(2)莊吉發：〈從朝貢貿易看明清時期中琉文物的交流〉；(3)陳捷先：〈明清中琉封貢關係源流略考〉；(4)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考察〉；(5)賀恒仁：〈李鴻章與「分島換約」〉；(6)鄭樑生：〈琉球在明代册封體制中的定位試探〉；(7)楊國楨：

〈明代發展中琉友好關係的漳州人〉；(8)劉耿生：〈明清國子監的琉球留學生〉；(9)石橋崇雄：〈中琉關係史研究と清朝滿漢文檔案史料——「各科史書」をめぐって〉。大會歷時4天（11.23）結束。

11.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蘇雲峰先生報告：「是誰吹縵了這池春水：談清華『校長問題』（1918～1931）」。

11.26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Charlotte Furth 演講，其講題是：“Ming-Qing Fu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11.27 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亞裔研究系主辦之「『落地生根：各國華人法律、政治、經濟之現況與問題』全球華人國際研究會」，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行，與會學者來自世界各地，計二百餘人，會中分別就各項主題進行分組討論，會期歷時3天（至29日）結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9～11月 美國哈佛大學舉辦學術討論會，與近代中國史有關之講者、講題及日期分別如下：(1)李歐梵 (Leo On-fan Lee), “The Meaning of Modernity in 20th Century China,” (9.22) (2)葉維力 (Ye Weili), “Crossing the Cultures: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5,” (10.9) (3) Susan Naquin, “Studying Peking: Some New Sources and New Problems,” (10.19) (4)李歐梵, “The Urban Literary Imagination: Shanghai, 1927-1937,” (10.23) (5) Philip A. Kuhn, “Chinese Collective Agriculture as a Historical Subject.” (11.13)

11～12月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渝先生應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與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邀請，先後於該二所舉辦之學術討論會公開演講，其講題及日期如下：(1)「關於魯迅評價的若干問題」（11.9）；(2)「魯迅的中西文化觀」（12.3）。

12.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假該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日治時代臺灣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座談會，邀請吳文星、柯志明、陳芳明、林瑞明與吳密察等五位先生為引言人，其主題依次是：「殖民地教育史」、「殖民經濟史」、「政治運動史」、「新文學史」、「殖民地政策」。

12.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張壽安女士報告：「禮理爭議——嘉道漢宋學問之一論域」。

12.21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召開之「『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假該所會議室舉行，與會學者分別來自臺灣、美國、澳洲、香港及中國大陸，約計 64 人，發表論文 35 篇，並依論文性質分成十個主題如下：(1)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2)近代民族主義含義及危機；(3)晚清社會中的民族主義；(4)民族主義理念及比較觀；(5)近代人物的民族主義觀；(6)民族主義理念及形態；(7)區域意識與民族主義；(8)近現代思潮與民族主義；(9)文化心態及其他；(10)文化與民族認同。會期共計 3 天（至 12.23）。

12.22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假該院學術活動中心召開「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會期兩天（至 12.23）結束，與會學者約計 200 人，除由何佑森先生作主題演講：「清代經學思潮」之外，共發表論文 18 篇。

(1993) 1.3 由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等單位主辦之「第二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研討會」，假北京中國社科院舉行，會期共 6 天（至 1.8），與會學者來自各地，計有百餘人，會議首先邀請沈予和井上清講演，講題分別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和平交涉』」和「天皇與日本的侵華戰爭」，其後分組討論，討論主題包括中日甲午戰爭研究、中日關係、孫中山與日本、中日經濟關係、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抗日救亡運動、張學良政權研究、抗日戰爭研究、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政策研究、日本對華謀略、地方實力派與日本關係、日軍侵華暴行、中日關係與國際政治、中日關係、日軍侵華暴行以及日本的「民間外交」；最後由 5 位學者做專題報告，報告人與講題如下：(1)俞辛焯：〈孫日關係研究方法論〉；(2)朱永德：〈日本帝國主義與財閥集團〉；(3)張振鷗：〈日本侵華與昭和天皇的獨白〉；(4)吳天威：〈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之初步比較〉；(5)李侃：〈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

1.4 「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會史，1620~1920」會議假北京清華大學舉行，會中發表論文 14 篇，會期共計 2 天（至 1.5）（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啟雄先生報告：「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驗證」。

1.1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召開研討會，邀請文化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李乾朗先生演講，其講題是：「臺灣建築歷史的研究方法」。

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范毅軍先生報告：「走私、貪污、關稅制度與明清國內貨物流通稅的徵收——明清時代關稅資料性質的檢討」。

1.14 亞洲學會東南地區(Southeast Regional Conferenc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32屆年會，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舉行，會期歷時3天(1.16)，會中發表論文約計51篇，論題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者如下：(1)孫隆基(Lung-Kee Sun), "The Fin-de-Siecle Lu Xun," (2)Qing Xu, "The Chinese Are Like That," (3)Sun Qing-Qiu, "Nationalism and Nationism in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4) Hugh Shapiro, "Downward Mobility in 1930's Peiping: Evidence From the Peiping Municipal Psychiatric Hospital," (5) Dorothea Martin, "Juxtaposing China's 19th and 20th Century Ti-Yong Dilemma," (6) Peter Van Dooijert,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7) Randal Dodgen, "Salvaging Kaifeng: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1841 Flood," (8)Douglas Gamble, "Economic Development's Impact on the Hydrology of the Zho Jiang River Delta," (9)Lousie Kilgore, "American Bankers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Mexico: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0) Andrea McElderry, "Limiting Liability in Law and Custom in Republican China," (11) Lawrence Kessler, "Education, Evangelism, and Estrangement: The Sprunt Academies at Jiangyin," (12) Kathleen Lodwick, "The May 4th Movement at the Presbyterien Mission Schools on Hainan Island," (13) Li Li, "Sophia Lenneau and Wei Ling Girls Academy.: A Southerners Reaction to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1920's," (14) Judith Liu, "Contested Terrain at St. Hilda's School For Girls."

1.28 由國際歷史人口學會主辦之「1993年歷史人口學國際研討會」，假日本麗澤大學舉行，與會學者共計35人，會議分成「由歷史觀點看性比例的社會經濟影響」與「東亞人口史」等兩個部分，發表論文計26篇，其中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論題如下：(1)Michel Cartier, "Chinese Population around 1900: 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 (2)葛劍雄(Ge Jianxiong), "An Estimation of Population Size of the Ming Dynesty in Early

17th Century,” (3)米紅 (Mi Ho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Evolution Course in Chinese History: Ming Dynasty,” (4)王豐 (Wang Feng) 和李中清 (James Lee), “Two Kinds of Preventive Checks: Marital Fertility Control in China’s Historical Population,” (5)李中清和王豐,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Social Structure and Parental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6)劉翠溶 (Liu Ts’ui-ju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neage Populations,” (7)賴惠敏 (Lai Hui-min), “Adoption in Imperial Lineage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8)林滿紅 (Lin Man-houng), “Opium Cultivation,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Late Ch’ing China’s Population, 1880-1906.”

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假該所檔案館會議室召開，與會學者共計 160 餘人，會議發表論文 37 篇，歷時 3 天（至 2.6）結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2.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該所約聘研究助理陳巨擘先生報告：「日據時期臺灣民族主義與政治文化的形成」。

2.22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該所研究助理江日新先生報告：「一九二三年『人生觀之論戰』與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觀』學說」。

2.2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舉行研討會，邀請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任黃秀政先生演講，講題是：「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

2.25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賴澤涵先生報告：「陳儀與民國政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史料叢刊

(15) 束雲章先生年譜 朱沛蓮編 368 頁 精400元 平350元

本年譜有下列幾方面重要記載：(一)抗戰前北方金融界之活動，(二)抗戰時  
西北之實業建設，(三)勝利後中紡公司之成立，(四)臺灣光復後紡織業之建立，  
(五)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工商政策之討論，(六)宋子文之用人見識。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消息

## 新書出版消息

游 鑑 明\* 輯

### 一九九〇年出版

- 上海企業發展史鑒編輯部編 上海企業發展史鑒 北京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九月
- 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號史料編寫組等編 山西票號史料 太原 山西經濟出版社 十月 八三八頁
- 中國企業集團(公司)編委會 中國企業集團(公司)(第一卷)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三月 三六〇頁
- 中國農業科學院 南京農業大學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研究課題組編 太湖地區農業史稿 北京 農業出版社 十月 四七六頁
- 巫昌禎、王德意、楊大文主編 當代中國婚姻家庭問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四月 四二二頁
- 宋德宣 康熙思想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十月 四一一頁
- 馬汝珩、馬大正編 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十一月 四五五頁
- 何寶善、韓啟華、何滌塵 萬曆皇帝朱翊鈞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七月 二九三頁
- 侯志英主編 大別山風雲錄：豫東南土地革命戰爭史稿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月 七〇六頁
- 孫啟泰、熊志勇 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四月 三六四頁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 晉察冀邊區北岳區婦女抗日鬪爭史料編輯部編 烽火巾幗——晉察冀邊區北岳區婦女抗日鬪爭史料 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 二月 五三一頁
- 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輯組等編 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八五二頁
- 晨朵編 秋瑾年表(細編) 北京 華文出版社 六月 二三八頁
- 郭曉平、路海江編 太岳抗日根據地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七〇頁
- 俞興茂編 特工秘聞：軍統活動紀實 北京 中國文化出版社 五〇五頁
- 張仲禮主編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一一六〇頁
- 張子申、薛春德編 斃命中國的百名日軍將領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七月 四〇八頁
- 張鐵男、宋春、朱建華主編 中國統一戰線紀事新編(1919~1988)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五二二頁
- 嵇文甫 晚明思想史論 上海 上海書店 一二一頁
- 鄭德榮、王維禮主編 中國革命紀事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七九二頁
- 鄭德榮、黃景芳 毛澤東思想史稿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四四八頁
- 趙震江主編 中國法制四十年(1949~1989)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月 三八五頁
- 蔣順興、李良玉主編 山西王閻錫山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十月 二九四頁
- 遼寧省檔案館編 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十二冊)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 鍾文典編 近代廣西社會研究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三六一頁
- 戴詩煒主編 鄧小平文化思想研究 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 一月 二九三頁
- 魏蒲、陳廣相編 新四軍研究資料索引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二七一頁
- 譚丕模 清代思想史綱 上海 上海書店 一五六頁
- 矢澤利彥 西洋人の見た十六~十八世紀の中國女性 東京 東方書店 十二月 一九四頁
- Bailey, Paul. *Reform the Peop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

- ular Educa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Edinburgh Univ. Press, 296 pp.
- Hoffman, Steven A.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4 pp.
- Luo, Zi-ping. *A Generation Lost: China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von Books Press.
- Shih, Chihyu.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231 pp.
- Stackmann, Ulrich.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Bibliothek Tian Yi Ge vom 16.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26 pp.
- Wang, Chi.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Guide.* Mclean, Va.: Academic Press of America.

#### 一九九一年出版

- 入江昭、孔華潤編 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二七五頁
- 上海市檔案館編 五卅運動（三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一八一頁
- 上海機器業工人運動史編寫委員會編 上海機器業工人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三六五頁
- 上海法電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 上海法電工人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四月 四三一頁
- 中共上海海運管理局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海員工會上海海運管理委員會編 上海海員工工人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三八八頁
- 中共上海市郵電管理局委員會編 上海電話公司職工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二九八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 劉少奇論黨的建設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七六二頁
- 中共中央黨校本書編寫組編 閻錫山評傳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五月 五〇二頁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同盟會在山東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二六二頁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 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三六四頁
-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 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1924~1949）（第二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八八四頁
- 中國銀行總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 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匯編（1912~1949）（上編）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十月 二六八八頁
- 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 辛亥風雲與近代中國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九月 四〇二頁
-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 太平天國文書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一三四頁
- 王千國 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史略 成都 成都出版社 八月 二五三頁
- 王立誠 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二四頁
- 王佩環 清帝東巡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八月 七六五頁
-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 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1920~1949.2：北大地下黨概況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六月 六八一頁
- 王耿雄 孫中山與上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三一〇頁
- 王駒、邵宇春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三月 一八四頁
- 王滬寧 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六〇四頁
- 皮明床 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踪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四月 四六三頁
- 任武雄主編 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文集 上海 百家出版社 五月 六八一頁
- 任振池、劉寒主編 省港大罷工研究：紀念省港大罷工六十五周年論文集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六月 三四二頁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文件匯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六月 四一一頁
- 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 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 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 六月 七一六頁

- 朱斐編 東南大學史：1902~1949 南京 東南大學出版社 十月 三四八頁
- 李文海、周源 災荒與饑饉（1840~1919）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月 三五二頁
- 李田貴編 中國民主黨派史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三六四頁
- 李茂盛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八月 四五七頁
- 李峰 曾紀澤與中法越南交涉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八月 一八四頁
- 李敬文主編 中國革命史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五四頁
- 肖萬源 中國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觀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三月 三六八頁
- 宋春、劉志超主編 民主黨派與中共合作史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五九五頁
- 安徽省財政廳編 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五二三頁
- 余湛邦 張治中與中國共產黨——張治中機要秘書回憶錄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十月 二四五頁
- 呂觀仁、仁國 滿漢名臣傳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周英、蕭培等 學潮現象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月 二〇七頁
- 姜鳴 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七月 四七六頁
- 林家有編 辛亥革命運動史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八月 六六四頁
- 林增平 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 長沙 湖南出版社 八月 四一七頁
- 林增平等主編 辛亥革命史研究備要 長沙 湖南出版社 九月 七三六頁
- 邱思達編 中國近代鑄幣圖說 北京 中國書店 四月 三三〇頁
- 馬勇 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月 一九五頁
-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 明清史論文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三六三頁
- 胡逢祥、張文建 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九月 三七一頁
- 洪學智 抗美援朝戰爭回憶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一月 二七六頁
- 倪大奇 毛澤東經濟思想研究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十月 二八三頁

- 秦千里、易豪精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現代化 長沙 湖南出版社 五月  
三六六頁
- 秦英君、張占斌 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傳 北京 紅旗出版社 六月  
五四六頁
- 袁振國、張癸編 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七月 三九二頁
- 孫志亮、張應超 陝西辛亥革命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〇八頁
- 徐新吾主編 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月 四五六  
頁
- 徐鼎新、錢小明 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七月 四五四頁
- 唐瑞裕 清代吏治探微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十一月 二三八頁
- 陳至立、劉吉編 中國共產黨建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月 一一  
八一頁
- 陳旭麓、李華興主編 中華民國史辭典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三二頁
- 陳華新編 洪秀全思想研究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八一頁
- 陳鋒、劉經華 中國病態社會史論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九五頁
- 陳鴻祥 王國維年譜 濟南 齊魯書社 十二月 三五九頁
- 張洪祥等編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一四七頁
- 張玉荅 清朝皇嗣制度 大連 大連出版社 六月 二四三頁
- 張仲禮等著 太古集團在舊中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月 二四四頁
- 張海峰等編 鴉片戰爭與中國現代化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八月 三四  
四頁
- 曹均偉 近代中國與利用外資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十月 四四  
八頁
-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二冊）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三月 九八八頁
- 崔維志、唐秀娥 沂蒙抗日戰爭史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七二四頁
- 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六四二頁
- 郭卿友 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二一

## 六一頁

- 郭毅生 太平天國經濟史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一月 四三二頁
- 莫世祥編 馬君武集：(1900~1919)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十月  
四九〇頁
- 章開沅主編 辛亥革命辭典 武漢 武漢出版社 五五四頁
- 章開沅、林蔚主編 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四七三頁
- 章開沅、劉望齡、葉萬忠主編 蘇州商會檔案叢編(1905~1911)(第一  
輯) 武昌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九月 一三五八頁
- 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編 傅斯年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 馮天瑜、何曉明 張之洞評傳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四四九頁
- 偉大的長征編委會編著 偉大的長征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五月 八三  
六頁
- 喻松青、張小林編 清代全史(第六卷)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十月  
四六三頁
- 喬明順 中美關係第一頁：1844年「望厦條約」簽訂的前前後後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八月 二四六頁
- 楊先國、賈之惠編 清中期川東北白蓮教起義始末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五月 二六三頁
- 楊奎松等 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 上海 上  
海人民出版社 十月 二二四頁
- 楊學琛 清代民族關係史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月 二八二頁
- 董方奎 清末政體變革與國情之論爭——梁啟超與立憲政治 武漢 華中師  
範大學 七月 三九二頁
- 趙玉芝、李建勛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史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十月 三三二頁
- 趙銘忠、陳興唐編 民國史與民國檔案論文集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十月  
六三九頁
- 廖國良、李士順、徐焰 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十  
一月 六六四頁
- 肇慶市葉挺獨立團紀念館編 葉挺獨立團史料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  
月 五五三頁

- 鄭開頌、黃啟臣編 澳門港史資料匯編：1553~1986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六月 四九七頁
- 鄭德榮、朱陽主編 中國革命史長編（下卷）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十月 六二八頁
- 劉大可 日本侵略山東史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二月 三三一頁
- 蔣俊、李興芝 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五月 四一二頁
- 錢任坤 太平天國史散論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三〇八頁
- 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編 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滿鐵秘檔選編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六三二頁
- 蘇智良、陳麗菲 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三月 二七四頁
- 小峰和夫 滿洲——起源・植民・霸權—— 東京 御茶の水書房 十一月 三一〇頁
- 東北財經委員會調查統計處編 舊滿州經濟統計資料：「偽滿時期東北經濟資料」（1931~1945） 東京 柏書房 一月 五八六頁
- Anderson, James Peardon. *The Study of Change: Chemistry in China 1840-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4 pp.
- Bachman, David and Yang. Dali L., *Yan Jiaqi and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rmonk, NY: E. Sharpe, Inc.
- Blank, Carolin and Gescher, Christa. *Gesellschaftskritik in der Volk srepublik China: Der Journalist and Schriftsteller Liu Binyan*. Bochum: Herausberger Chinathemen, 595 pp.
- Bochuan, He. *China on the Edge: The Crisis of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c.
- Brokaw, Cynthia J. *The Lead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287 pp.
- Chan, Ming K. and Dirlik, Arif.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Anarchists, the Guomindang,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1927-1932*.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339 pp.



- Chang, Dnry H. and Gordon, Leonard H.D. *All Under Heaven...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53 pp.
- Coble, Parks M.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Edward, Pickowicz, Paul G. and Selden, Mark.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336 pp.
- Heberer, Thomas. *Korruption in China: Analyse eines politischen,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Problem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363 pp.
- Joseph, William, Wong, Christine P. W. and Zweig, Davi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1 pp.
- 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87 pp.
- Opitz, Peter. *Gezeitenwechsel in China: Die Modernisierung der chinesischen Aussenpolitik*. Zurich: Texte Thesen, 149 pp.
-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52 pp.
- Roberts, Priscilla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563 pp.
- Rosemont, Henry Jr. *A Chinese Mirror: Moral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30 pp.
- Shenkar, Oded, e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1979-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 Tong, James W. *Disorder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äth, Alfons.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421 pp.

- Will, Pierre-Étienne, Wong, R. Bin.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and Civil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Ann Arbor MI: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607 pp.
- Wilson, Dick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4 pp.

### 一九九二年出版

- 王仲清主編 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二二八頁
- 王奇生 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九月 三九三頁
- 孔令仁 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二冊）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六月
- 牛軍 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八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七二八頁
-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料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河南卷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 朱沛蓮編 束雲章先生年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15）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三六八頁
- 邢思陸 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三月 四三九頁
- 吳孟雪 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六月
- 吳振強 東三省官銀號奉票 瀋陽 遼瀋書社 五月
- 吳景平 宋子文評傳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九月
- 吳量愷 清代經濟史研究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四月 三五八頁
- 余英時等著 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 臺北 聯經出版社 九月 一三八頁
- 李台生 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研究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三月 二九八頁
- 李林 滿族宗譜研究 瀋陽 遼瀋書社 六月 三五〇頁
- 李喜所 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七月
- 李雲漢 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 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九月 三九四頁

- 邱坤良 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新劇與舊劇（1895~1945） 臺北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六月 五一二頁
- 林中 中國近代法律思想史新論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八月
- 林代昭 戰後中日關係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十月
- 林詩輝 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之研究 臺北 正中書局 五月 八一三頁
- 麥天樞、王先明 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七月 四八九頁
- 韋政通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下)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九月 九八九頁
- 重慶大轟炸編委會 重慶大轟炸（1938~1943） 重慶 重慶人民出版社 七月 二一三頁
- 重慶市檔案館編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法規（二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七月
- 高時良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十二月
- 夏誠華 近代廣東省僑匯研究（1862~1949）：以廣、潮、梅、瓊地區為例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大學出版社 四六二頁
- 郝晏華 從秘密談判到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八月
- 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六月
-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2）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一二四頁
- 陳元暉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十二月
- 陳君愷 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十月 二三〇頁
- 陳宜安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的容共與反共 臺北 正中書局 三月 二五七頁
- 陳書麟、陳貞壽 中華民國海軍通史 北京 海潮出版社 十月
- 陳勝崑 近代醫學在中國 臺北 橘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月 二九一頁

- 許政雄 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二月 一六四頁
- 張秀民 中越關係史論文集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三月 三三八頁
- 張晉藩 清律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七月
- 張靜如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 黃秀政 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十二月 四〇七頁
- 義和團研究會編 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濟南 齊魯書社 十月
- 虞和平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月
- 詹璋 吳稚暉與國語運動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四月 二二四頁
- 隗瀛濤 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 成都 成都人民出版社 九月 四二八頁
- 雷慧兒 尋求富強：晚清改革派的威權思想 臺北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三〇九頁
- 趙保玉主編 清官史話 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月 三〇〇頁
- 趙秉忠、白新良 清史新論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七月 四五七頁
- 鄭淑蓮 國民革命與臺灣 臺北 正中書局 三月 一四五頁
- 楊一凡 洪武法律典籍考證 北京 法律人民出版社 八月
- 楊建成 華僑參政權之研究～中華民國僑居國外國民對祖國參與實例之統計分析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八月 一一四頁
- 劉秉榮 國民政府秘史(二冊) 北京 華藝出版社 八月
- 蔣洪斌 陳毅傳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九月 七四九頁
- 錢宗范 康乾盛世三皇帝 南寧 廣西教育出版社 九月
- 閻崇年 努爾哈赤傳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八月 四三五頁
- 謝國興訪問，蔡淑瑄、陳南之紀錄 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1)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三三一頁
- 譚洛非等 巴金與中西文化 重慶 四川大學出版社 九月 五一三頁
- 羅吉甫 野心帝國：日本經略臺灣的策謀剖析 臺北 遠流出版社 五月 二六八頁
- 佐佐木衛編 近代中國的社會と民眾文化 東京 東方書店 二月 四〇九頁

頁

- 東一夫 歴史を彩る中國の女性——近代化への動脈 東京 風響社 十月  
二四五頁
- Bagby, Wesley M. *The Eagle-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Newark: Univ. of Delaware Press, 306 pp.
- Bernhardt Kathryn.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Chun-shu and Chang, Shelley Hsueh-lun.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u's Worl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452 pp.
- Coble, Parks M.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492 pp.
- Diko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 Hurst Co., 251 pp.
-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 Fan, Kang et al.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A Chinese View*. Armonk: M. E. Sharpe, Inc., 318 pp.
- Fisher, Carney T. *The Chosen One: 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30 pp.
- Harrell, P.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50 pp.
- Jeans, Rogar B.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20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385 pp.
- Ladany, 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Hurst., B. 588 pp.
- Newman, Robert P.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lachek, James M.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Powell, Simon G. *Agricultural Reform in China: From Communes to Commodity Econom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31 pp.
- Rafe, De Crespigny. *China this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i, Shirin M. *Resistance and Reaction: University Politics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ssabi, Morris. *Voyager from Xanadu: Rabban 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West*. Tokyo, New York,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Stepanek, Antoinette Farnham. *A Town Called Shaoyang: Witnessing Dynastic Changes in China*. Boulder: Gold Hill Publications.
- Tisdell, C. 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70 pp.
- Tong, James W. *Disorder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5 pp.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73 pp.
- Wang, David Der-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and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67 pp.
- Waldron, Arthur ed. *How the Peace Was Last: The 1935 Memorandum—Developments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Yeung, Yue-man and Hu, Xu-wei eds.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研究討論

##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A Response to Mr. Ch'en Chü-po's Criticism

Thomas A. Metzger\*

Dear Sir:

In issue # 14 (Sept. 1992) of your distinguished periodical there is a review by Mr. Ch'en Chü-po of Ramon H.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May I be permitted to respond to his criticisms? My letter, unfortunately, is lengthy, but I believe the questions he raised are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enough to require patient discussion.

### I.

The heart of the Myers book consists of fifteen specialized articles each dealing with one basic aspect of either the R.O.C. or the P.R.C. Each article presents empirically-based generalizations about one such aspect. Because Professor Myers was careful to have each article written by a scholar known for his knowledge about the topic discussed,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sound and rather uncontroversial. Indeed, no critic, including Mr. Ch'en, so far as I know, has disputed even one of them. Most of the contributors are economists, sociologists, or political scientists, but each of the articles is historically sound. When these empirical points about the two societies are compared to each other, moreover,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This point too is not

---

\* Senior Fellow,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disputed.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was to establish these differences in a scholarly way and then assess their significance. Therefore Myers from the start designed the list of topics rather systematically, facilitating such comparison. His list not on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less changing and the more developmental aspects of each society but also made topical distinctions in the usual fashion between societal dimensions such as ideology, polity, and economy. Finally, he organized a discussion to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clearly presented differences. He and I advanced one interpretation, and he invited another scholar, Professor Paul A. Cohen, to critique our outlook.

By devising this little symposium, Professor Myers wanted to avoid dogmatism, to help readers think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issues, rather than just offering them one approach, and thus to present the fifteen empirical articles not as supporting just one viewpoint but as raising comparative questions for which there might be more than one answer. To pursue this goal of fairness, Professor Myers was especially careful to bring into this symposium a scholar like Professor Cohen whose thinking to a large extent was critical of ours, as shown by not only the reply Cohen eventually gave us to publish but also his earlier criticism of our "Sinological Shadows" (see Professor Cohen's article in *Republican Studies*, fall 1983). Professor Myers could instead have invited another, equally distinguished scholar, an expert on P. R. C. society, who largely shares our views. Professor Myers also courteously gave Professor Cohen the last word instead of critiquing his critique. We relied on our readers to sort out the arguments. Some may suspect us of also relying on the principle of *hsien ju wei chu* (the first argument one hears is the one one accepts)! In fact, however, the argument that sways people is often the last one they have heard (*hou ju wei chu*) (Professor Cohen's). In any case, before this letter, neither Myers nor I attempted to respond to Professor Cohen's criticisms.



We also made clear (p. xiv) that each of the fifteen articles "stands on its own"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either our views or those of Professor Cohen. Thus Mr. Ch'en's suggestion that we treated any of these authors "unfairly" is as surprising as is his claim that we quoted them "out of context." According to p. 163 of his review, we took Professor Thomas B. Gold's words "out of context" when we cited his factual statements about the P. R. C. economy, because Gold disagrees with our view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 O. C. economy. (In other words, I may quote the statements only of scholars who completely agree with all my views! Mr. Ch'en seems unaware that, all other conditions being equal, one has good reason to regard a statement contradicting the inclinations of the speaker as more reliable than a statement in accord with these inclinations. I regard Professor Gold as a scholar more inclined than, say, Professor Myers to find hope in the P. R. C.'s modernization efforts. Therefore, if even Professor Gold find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 has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s he did, his view that carries special weight. Conversely, if even Professor Myers fou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 did not hamper it, his view would carry special weight. I am a little distressed that these elementary principles about how to make use of factual or interpretive statements have to be spelled out in these pages.

Myers organized this little symposium because he felt that, while any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societies was bound to be controversial for both poli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asons, scholars still should address this major comparative issue as thoughtfully as possible, not restricting themselves to more narrowly empirical questions. Thus we asked: when we look at each of these societies as it had evolved by the 1950s and 1960s, to what extent do we see a systemic structure of some sort? Using S. N. Eisenstadt's metaphor of a "package" of traits, we had in mind the idea of a pattern, that is, actions and thoughts that are repeated in a more or less identical way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e. g. those making up a particular kinship tradition), and the idea of a society entailing a number of such patterns which caus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or mesh together, the way, say, that Maoist thinking meshes with the procedures and norms of an economic system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a centralized state. This is indeed the common concept of a societal "structure." If each society by the 1960s did have a systemic character, was the systemic character of each different only in degree from that of the other, or was there a difference in kind? To what extent was the systemic character of each society caus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at societ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especially "the three breakthroughs" experienced by the R. O. C.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rise of a largely urbanized, middle-class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 R. C.'s lack of such breakthroughs?

## II.

In dealing with these questions, Meyers and I emphasized somewhat complicated point about historical causation. Mr. Ch'en says we "committed the error of inferring the cause from the result," "the fallacy of being intelligent only after the event" (*shih-hou ts'ung-ming-te mao-ping*) (pp. 162, 164). Presumably, he means that we merely, say, looked at the recent democratization of the R. O. C. and then, without historical evidence, claimed that certain earlier developments were the causes of this happy result. Mr. Ch'en must be unaware that in 1980, about thirteen years ago, Myers and I described the R. O. C. as "firmly committed to democratization"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80, p. 113). A little after, but still almost ten years ago, in 1983,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 O. C.'s system of elections, we said that we "now can predict that within two years it will become as fashionable to praise the Guomintang's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it already has become to praise its economic policies" (A. A. Wilson, S. L. Greenblatt, R. W.

Wilson, eds.,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Prager Publishers, 1983, pp. 48-49). If we now have committed "the fallacy of being intelligent only after the fact," at least we did not commit "the fallacy of being stupid before the fact" (*shih ch'ien pen-te mao-ping*)!

More basically, Mr. Ch'en incorrectly criticized us for offering a thesis about historical causation without furnish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ur hypothesis about causation is logically based on widely accepted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on a widely used sociological theory, that of legitimization. I thought these two points were too obvious to require elaboration. Now, given Mr. Ch'en's criticism, I shall try to be more explicit.

With regard to historical evidence, since the collapse of various Communist economies, the switch of formerly Communist economies to capitalistic methods, and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etc., few scholars have doubted that history has vindicated F. A. Hayek: economic modernization causally requires the maximization of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minimiz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is can be done only by a fundamentally capitalistic economy. Moreover, historical evidence supports a second, equally crucial point: Rousseau was wrong about the question of how causally to implement the democratic ideal of rule by the governed. This historical point is largely accepted in the West, where Rousseau is often regarded as a brilliant but flawed thinker, bu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o,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such as Professor Chu Hung-yuan or Professor Chin Yao-chi, admire Rousseau as the great thinker of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 What Rousseau failed to deal with is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in a large society, practicable democratic procedures do not allow the citizens directly to rule themselves, and these procedures cannot be based on a unified, objectively moral "general will." A major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freedom is bound to be combined with competition between selfish but legal interest groups,

as well as with disagreements between such groups about basic poli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ose about social justice, foreign policy, and even national identity. A third historical point, overlapping the other two and implicit in Karl W. Deutsch's work, is that an effectively modernizing society has to be "open" to the historical and global flow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 and so needs considerable intellectual pluralism.

In other words, historical evidence strongly suggests that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ausally requir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hat Myers and I called "the three pluralisms" or "the three marketplaces," that is,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of competing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free marketplace of ideas. To assess our argument about historical causation, therefore, the reader ha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m in modern China.

At this point, however, Myers and I had to make a further point to clear up the confusion into which the discussion of pluralism has often fallen, especially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Pluralism is often discussed as a morally ideal condition: an economic marketplace *without* serious inequalities; a free marketplace of ideas *without* polarization and other confusing intellectual contradictions; a political marketplace *without* bargaining between "tricky politicians" (*cheng-k'o*), who manipulate the la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order to pursue selfish ends. If, however, people can embrace only this kind of sublime, ideal pluralism, they cannot embrace the only kinds of pluralism tha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can actually and practicably be put into effect.

In other words, *practicable* pluralism (*k'o-hsing-hsing-te to-yuan chu-i*) has historically always been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pathologies. This point is illustrated by historical pluralism today whether in Taipei or the U. S. More precisely, scholars may question this point by noting that it is hard objectively to define these pathologies. Scholars will agree, however, that, in pluralistic societies, there

always are accusations and counter-accusations to the effect that so-and-so is immoral or irrational (*ch'i yu tz'u li!*), and no reliable way has been found to end these arguments by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public standards of right and wrong in a way that the whole society accepts. What the whole society can agree on are only procedural rules, such as voting rules.

To be sure, many of us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based on uncontroversial moral standards (*jen t'ung tz'u hsin, hsin t'ung tz'u li*). But this ideal has seldom if ever been historically realized in a large modern society and so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actual, practic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pluralism. In 1986, for instance, Professor Yang Kuo-shu regarded this ideal as an imminent historical fact, writing that as soon as Taiwan became an "open,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tensions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those devoted to Taiwanese nationalism would end (*Chung-kuo-jen-te shui-pien, Kuei-kuan t'u-shun kung-ssu*, 1988, p. 228). History, again, is instructive. The December 1992 election in the R. O. C. was about as open and free as elections can be, but the polarization Professor Yang referred to has persisted if not increased. Even if this polarization subsides, another will appear. The R. O. C. has democratized but, like every other democracy in the world, it has failed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a society unified on the basis of uncontroversial idea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major moral-political questions of the day.

One can, therefore, have utopian dreams about a perfectly harmonious future, but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verwhelmingly shows that, around the globe, deep, alarming controversy between people who regard each other as immoral and irrational is integral to the three pluralisms or marketplaces. This fact brings up the problem of legitimization. According to a widely accepted, Weberian theory of legitimization, people will accept and pour their best energies into an institution only if, in their eyes, it accords with not only their

rationally calculated needs (*Zweckrationalität*) but also their moral values, their beliefs about how normal, good people should act (*Wertrationalität*). To accept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nd comfortably work in them, therefore, people would have to accept the immoralities and irrationalities these interactions entail, believing that these dissonances are integral to a desirable, modern,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n other words, they would need what Professor Chang Hao has called *yu-an i-shih* (an awareness of the dark side of public life), a legitimization of the music of modern life as discordant to a large extent, as well as a concept of law as a morally neutral instrument based not on justice (*cheng-i*) but only on highly controversial attempts to define the ideal of justice.

Why, then, has it been hard to establish the three marketplaces in China? First, there is an ideological reason, usually overlooked. Modern China's prevalent moral language ha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mphasis on creating a morally "harmonious" (*ho-hsieh*) society, rather than one able to fashion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out of morally discordant elements. Not one of the modern Chinese ideologies has identified the discordances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nd described them as an unavoidable and normal part of that modernity generally desired by Chinese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West." Chinese Marxists, of course, tried to modernize China in a way entirely fre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Sun Yat-sen similarly sought to establish morally harmonious rule by "the enlightened vanguard" (*hsien-chih hsien-chueh*), a democracy without "tricky politicians" (*cheng-k'o*) or "selfish" political parties, and an economic system according to which capitalism would not undermine equality. Even Professor Yang Kuo-shu, the leading spokesman for "pluralism" on contemporary Taiwan, described the "pluralistic, open society" as entirely fre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 (see my *Tang-tai* articles, vols. 73 and 74, as well as my "Optimistic, Impractical This-Worldliness," written for the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s as Cultural Carriers

during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Oct. 31–Nov. 1, 1992, New York). How could Chinese legitimize capitalism, when it entailed inequalities they regarded as immoral? How could they legitimize a chaotically open marketplace of ideas (*fen-yun*), when they regarded such a lack of moral-intellectual consensus as undermining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How could they legitimize a political marketplace of "tricky politicians," when they believed government must be based on "selfless devotion to the public good" (*ta-kung wu-ssu*)? How could they accept a morally controversial legal order, when they believed that in a democracy, the laws would be directly and simply based on an objective, uncontroversial standard of "justice" (*cheng-i*)? How could they accept society as a marketplace of morally ungraded, unpredictable individual impulses, when they believed society should be guided by enlightened and unselfish leaders?

Second, while the pervasive moral language of modern China thus made it difficult for many Chinese to accept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s a vital part of their society's normal structure, there also was another, more obvious reason that institutionalizing these three marketplaces in modern China was difficult: whether in the P. R. C. or the R. O. C., the autocratic core of the ruling party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its control over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economy, and ideological or intellectual life. Thus in both societies, both the autocratic core of government and a widespread moral language shared by the latter with the intellectual world served as obstacles imped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In other words, while legitimizing the marketplaces was har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ccepting the marketplaces was hard also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olitical interests. Surely these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have been obvious in the case of the R. O. C., where over the years there were so many objections to reducing governmental control of the economic,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These obstacles have been, of course, still more obvious in the case of the P. R. C., as the

Myers book and recent events make so clear. It logically follows that tendencies reducing these two types of obstacles must have had great causal importance in the ca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discussing historical causation, therefore, Myers and I did not ignore historical evidence. We instead depended on three propositions supported by overwhelming historical evidence: globally, institutionalizing the three, morally discordant marketplaces has proved to be a necessary though not sufficient cause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legitimization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has been impeded in China by an incompatibility or tension between them and modern China's mainstream moral language; there also has been a similar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s and the strong modern Chinese tendency toward autocracy or authoritarian rul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hree empirical points, Myers and I compared the R. O. C. and the P. R. C. societies by emphasizing these obstacles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nd any tendencies reducing these obstacles. When we looked for thos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ocieties which could be called "structural" or "differences in kind," we looked, above all, for a contrast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tendencies preserving these obstacles and those eroding them. Our entire argument hangs on the point that, although these obstacles were present in both societies (the point, roughly speaking, that Professor Cohen emphasized), the R. O. C. framework set up by the 1960s, unlike the Maoist one, *also* included very basic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tendencies that tended to reduce these obstacles and so to facilitate the ris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This was the difference which we regarded as a "structural" difference "in kind," and which Professor Cohen tried to minimize.

With regard to the ideological obstacles, that is, the problem of moral language, we relied on a distinction that great scholars like Ernst Troeltsch and Ch'ien Mu have seen as perhaps the most basic way of



categorizing thought and ac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ying to rid the world totally of all evil (*pa-pen se-yuan*) and a gradualistic approach tolerating the persistence of some evil. If this is not a difference "in kind," then indeed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ideological modes is a difference in kind! When using this distinction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1973), pp. 74-79, I called these two outlooks "realism" and "radicalism." In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1977) (pp. 164-165, 155-156), I used "moderate realism" and "radicalism" but also started using "accommo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reafter, other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such as Professor Myers, Dr. Wu An-chia, and Mr. Huang K'o-wu, as well as I, increasing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transformative" and "accommod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ivilization during recent centuries.

Scholars like Professor Cohen proposing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 O. C.'s and the P. R. C.'s development are mainly "situational" simply ignore the fact that Maoism was a vigorously transformative system of both thought and political action aiming precisely to eliminate all traces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from "capitalism" to "bourgeois liberalism," not to mention "selfish material interests." Conversely, they ignore the fact that Sunism and the KMT's political mode were accommodative.

Needless to add, Cohen also ignores my point that the R. O. C.'s accommodative, eclectic, complex ideological mode inherently accepted a good deal of moral-intellectual contradiction and dissonance, logically called for an ope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and global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cluded full access to traditional China's universe of ideas and aesthetic values, endorsed the Confucian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s moral-intellectual autonomy, and emphasized a commitment to Millsian rather than Marxist democratization. Cohen instead dilates on the fact that, in Taiwan, the above tendencies were complemented by an effort to ban Marxist writings, which indeed

could have undermined the solidarity of a small state menaced by a huge and—as everyone today agrees—“evil empire.”

To repeat, censorship, heavy-handed types of state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opposition to the rise of an opposition party have indeed all been part of the R. O. C.'s history, precisely illustrating those obstacles to the ris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discussed above. As Cohen observed, when the face of Mao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Time*, it was x'ed out. In the R. O. C., however, those obstacles were accompanied by an ideological or cognitive tendency that was in some harmony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and that was missing under Mao, namely, an accommodative approach to progress accepting the persistence of much “selfish” behavior, endorsing capitalism despite its perceived immorality, tolerating some ideological modes at odds with the official doctrine, emphasizing Confucianism's self-centered ethical outlook (not to mention the exaltation of Wang Yang-ming), and positing a need for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llsian sense. None of these were peripheral trends (Chiang Kai-shek himself admired Wang Yang-ming). As an accommodative way of thinking, they coincided with or were close to the norm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typified the three marketplaces. This was a major, structural point of contrast with the Maoist framework.

Turning from the problem of moral language as an obstacle to that of political interests resisting the rise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Myers and I focused on what Edward A. Shils has called a “political center.” We identified this center with “the legally most powerful roles and collectivities in a society, along with their [subordinates and centripetal elites” (p. xvii). We then looked for behaviors that habitually were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is center, such as the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of R. O. C.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a capitalistic economy, and the social decision-making of such citizens in terms of their traditional kinship, ethical, and religious patterns. The regular schedule of local elections also proved to be important. We thus saw

a basic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to allow "leeway" for the activities of "self-propelled adults," as opposed to politically formed teams of people obeying a centralized "line" sent down by the autocratic center as it nationalized the economy and regimented the society (pp. xxxiv, xviii). Allowing much less "leeway," the latter kind of center was called "uninhibited" by us, while the one allowing "leeway" was called an "inhibited center." This "leeway," we think,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places" as patterns of societ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free choices of "self-propelled adults" rather than commands coming from the political center.

Our point thus wa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 O. C. and P. R. C. society, as each had evolved by the sixties, were "differences in kind" because the ideological modes and the political centers differed so much. The combination in the R. O. C. of institutional "leeway" and an accommodative ideological mode was crucial and missing under Mao. True, in both societies, there were grass-roots impulse "from below" seeking more economic,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 for the individual, and each political center exhibited a tendency to repress these impulses, to control the economic,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decisions of its citizens. In the R. O. C., however, the political center also to a very basic extent legitimized these "impulses from below," since it legitimized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capitalistic economy, respecte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and kinship patterns, treated as normal considerable intellectual diversity and discordance (most notably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the official doctrine and Hu Shih's iconoclastic liberalism), propagated the Confucian ideal of individual moral-intellectual autonomy, and was prominently committed to the goal of Millsian democratization (as opposed to the Marxist concept of "democracy").

When Myers and I, moreover, assumed that such a legitimized patter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propelled adults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marketplaces," we were not being "intelligent

only after the fact" but instead, like so many other historians, offering a causal hypothesis based on a mix of historical evidence, common sense, and logic. To be sure, Mr. Ch'en is far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causal reasoning of scholars who say Taiwan's economic success was primarily the result of it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 162, footnote #2). These scholars, Mr. Ch'en seems to believe, do not commit "the error of inferring the cause from the effect." 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 they face, however, is perhaps more serious: illogicality. I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s decisive, why have so many societ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Venezuela, or Mexico, which all enjoyed international trade opportunities at least as good as Taiwan's and are far more stocked than Taiwan with natural resources, been unable to escape the misery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Admittedly, neither Mr. Ch'en's reasoning nor ours amounts to a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way of determining historical causes. Yet—and this point probably needs to be made more in Taipei than in Cambridge—the study of history is hardly susceptible to such a rigorous methodology. As Aristotle said, the degree of precision a scholar should seek is relative to the subject matter.

### III.

Offering to explain the "point of departure" used by Myers and me to raise our questions and devise our approach to them, Mr. Ch'en (p. 160) suggests our purpose was just to respond to Professor Cohen's earlier article,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3, Aug. 1988). The issues at stake, however, have been under discussion for many years. Myers and I were offering an answer to the prevalent Fairbankian view, elegantly represented by Professor Cohen's article, that the struggle to modernize China has followed just one path, a single "unfolding revolution" or "institutional mainstream." Myers and I instead see two competing path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ing ou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 by contrasting an 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 following accommodative policies with an uninhibited center following transformative ones; b) by noting how each center's way of revising the various inherited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differed so much from the other's; c) by noting that one modernization path led far more easily than the other to those "three marketplaces" objectively needed to realiz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d) by contrasting the fact of "the three breakthroughs" in the R. O. C. with the lack of these in the P. R. C.; and e) by suggesting that each distinctiv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cluded causal connections, as just discussed.

I am happy to say our argument has not entirely fallen on deaf ears. Just as Marx dissociated himself from the Marxists, so Fairbank was not a Fairbankian. In his last book, Fairbank, who had often criticized my views or perhaps just ignored them, favorably referred to my suggestion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hampered by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herited moral language ("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 and the three pluralisms (*China: 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31), although he still did not grant that the successes of the R. O. C. were causally related to its ideologic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distinctive way of dealing with this contradiction.

One may also note that the argument made by Myers and me coincid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with the viewpoint of Professor Chin Yao-chi (Ambrose Y. C. King) in his *Chung-kuo she-hui yü wen-hua*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Hong Kong: Oxford Press, 1992), p. xiii. He notes that, in the R. O. C., despite the hegemony of the KMT, "the position of the state was gradually limited" and was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e "state socialism" of the P. R. C., because the KMT regime,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allowed the existence of a 'civil society,'" which included a "market economy." He even accepts our terminology, seeing the R. O. C.'s center as "inhibited"

and the P. R. C.'s as "uninhibited," though not accepting the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center also was inhibited (*ibid.*, pp. 122-123, 104, 96).

Indeed, even Professor Cohen partly agreed with our viewpoint. To be sure, he said that he puts less emphasis than we on the systemic aspects of society. In his eyes, he prefers "causal explanations that rest heavily on contingent, contextu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pp. liii-liv). Indeed, his subtitle—"Situational versus Systemic Factors in Societal Evolution"—leaves the impression that his exchange with us is between a historian like him who emphasizes the situational aspects of history (the play of particular events, the partly accidental combinations of circumstances) and scholars like Myers and me who overemphasize the systemic aspects of history. Actually, however, Professor Cohen's work emphasizes the systemic aspects as much as ours. Thus his article on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epicted a set of coherently interrelated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tendencies which he identified as China's political mainstream during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quest for wealth and power through authoritarian reform) (p. xv). His argument with us is not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history is patterned, but about which patterns are important. Nor does he entirely reject our analytical distinctions (p. xlvi). Moreover, he agrees "that, in some limited sense,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taken by the two societies 'hung together' in systemic, mutually reinforcing ways" (p. 1).

He disagrees with us in that he puts "overriding emphasis... on situational factors" in the case of the R. O. C.'s successes (p. xlix). He quite rejects our central point, that the KMT framework was systemically far more receptive to the three pluralisms than the CCP framework (p. liii).

As already indicated, we see him as trying to brush aside overwhelming evidence. He sees us as presenting the evidence in an

unbalanced way, arguing that our article is "colored" by our "preference for the R. O. C. over the P. R. C." (p. 1-li). He is polite and sincere in making this point. Yet the reader may well wonder who is biased. The Fairbankian view just mentioned indeed coincides with Professor Cohen's attempt to ascribe the KMT's successes mainly to "situational factors" (p. xlix) and has often been combined with a certain, quite peculiar "preference" for the CCP over the KMT. The prevalence of this extraordinary bias in Western sinological circles has now been abundantly documented and is no longer open to doubt or even a matter of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but it is reflected in Professor Cohen's effort to brush aside the KMT's highly distinctive and successfu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ar less biased and far more informed about Taiwan was Professor Yang Kuo-shu, who, despite his credentials as a liberal critic of the KMT, already in 1979 hailed "the Taiwan model"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highly preferable alternative to the P. R. C. model (*K'ai-fang-te to-yuan she-hui*, Taipei, Tung-ta t'u-shu ku-fen yu-hsien kung-ssu, 1985, pp. 113-123). (But I suppose that Mr. Ch'en would not allow me to adduce any of Professor Yang's views, because Professor Yang does not fully agree with all of mine!)

Also unfortunate is Professor Cohen's attempt to muddy the waters of our discussion by claiming that Myers and I misread the purpose of his article. He suggests that, because his original article focused on the Mainland and included only a "brief reference" to post-1949 Taiwan (pp. xlvii-xlix), his thesis entailed no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atter and society under the P. R. C. Yet, though his reference to post-1949 Taiwan indeed was brief, it implied such a comparison, and, when Myers and I spelled out his thinking about this comparison, we did not in the slightest misinterpret his meaning. Indeed, in his reply to us, he himself spelled out this comparison in a way coinciding with our account of his thesis. Moreover, the very fact that his original reference to Taiwan was so brief precisely corroborated our point

that, in his eyes, the Taiwan experience included no distinctiv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worth mentioning. Obviously, had he seen post-1949 Taiwan as diverg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mainstrea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e would have added—careful scholar that he indeed is—a caveat to the effect that his account of this mainstream bypasses the complex question of Taiwan's development under the KMT. By complaining that Myers and I had misused his article while being unable to show that we had misinterpreted it, Professor Cohen divert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away from the issues at stake. (Yet he did indeed raise another major question which Myers and I had not dealt with, the extent of the discontinuity between the post-1949 and the pre-1949 R.O.C. In my opinion, this is a far more intriguing historical question than all those still being so energetically pursued about exactly which policy Mao favored at which time.)

Besides repeating some of Professor Cohen's criticisms, Mr. Ch'en says that Myers and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to study historical causation; that we try to compare two societies without "systematically using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analysis"; that we made the mistake of using Max Weber's allegedly "unclear" concept of "elective affinity" (I assume Mr. Ch'en knew this is Weber's concept and was demonstrating the right of a graduate student to brush aside a concept developed by the world's most respected social scientist); that we were "unfair" to the other authors and quoted them "out of context"; that in including twice as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P.R.C. than about the R.O.C., we failed to compare the two societies in a balanced way; and so on.

I must bluntly say that, so far as I can see, Mr. Ch'en's is not a review written in an astute and fair-minded way. Myers and I have rather often engaged in debates with other scholars. This is illustrated by our promotion of the debate with Professor Cohen. Most recently, Myers' debate with Professor Philip C.C. Huang was discussed by Professor Albert Feuerwerker when the latter gave hi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 Nov. 1992, pp. 760-763). Open debate is the Socratic basis of intellectual life, so far as I know. If any serious scholar wants to add to the criticisms Professor Cohen directed at our article, we shall be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respond as best we can. Our position now is that Professor Cohen indeed discussed the unavoidable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ies entailed by a comparative effort such as ours, but that he erred in brushing aside overwhelming evidence supporting our basic thesis.

With all best wishes,

Sincerely Yours,

Thomas A. Metzger

Senior Fellow

cc: Mr. Ch'en Chü-po

---

本期通訊，承蒙呂實強、王樹槐、張存武、張朋園、張玉法、陳三井、陸寶千、李恩涵、陳永發、許雪姬、楊翠華、呂芳上、張瑞德、陳秋坤、賴惠敏、黃自進、葉其忠、范毅軍、李孝悌、羅久蓉、沈松僑、李達嘉等先生女士協助文稿之審查或潤飾，范毅軍、李宇平、李慧玲、龐桂芬、周碧華、張珍琳、陳雅鈴、連雪瑁等先生女士幫忙文稿之校對，謹此誌謝。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史料叢刊兩種

### (13)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430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精400元 平350元

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中研院近史所刊布了《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甚受各界注意及肯定，於是第二冊之編輯。本選輯共包括三個部分，一為總統府的大溪檔案，一為李翼中的〈帽簷述事〉，一為徐鄂雲的〈看臺灣二二八問題在歷史的天平上〉，都是第一次向外界公開的史料，甚具價值。

### (14) 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260頁

彭軻(Frank N. Pieke)著 莊國土譯

精350元 平300元

本書原係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當代中國資料中心，應荷蘭政府內政部之委託，所作的一項研究調查報告，由彭軻先生總其成。所用的資料大多是檔案、統計，以及田野採訪等第一手材料，係迄今為止關於荷蘭華人現狀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對於瞭解華人移民荷蘭、荷蘭華人的家庭和社會結構等問題，必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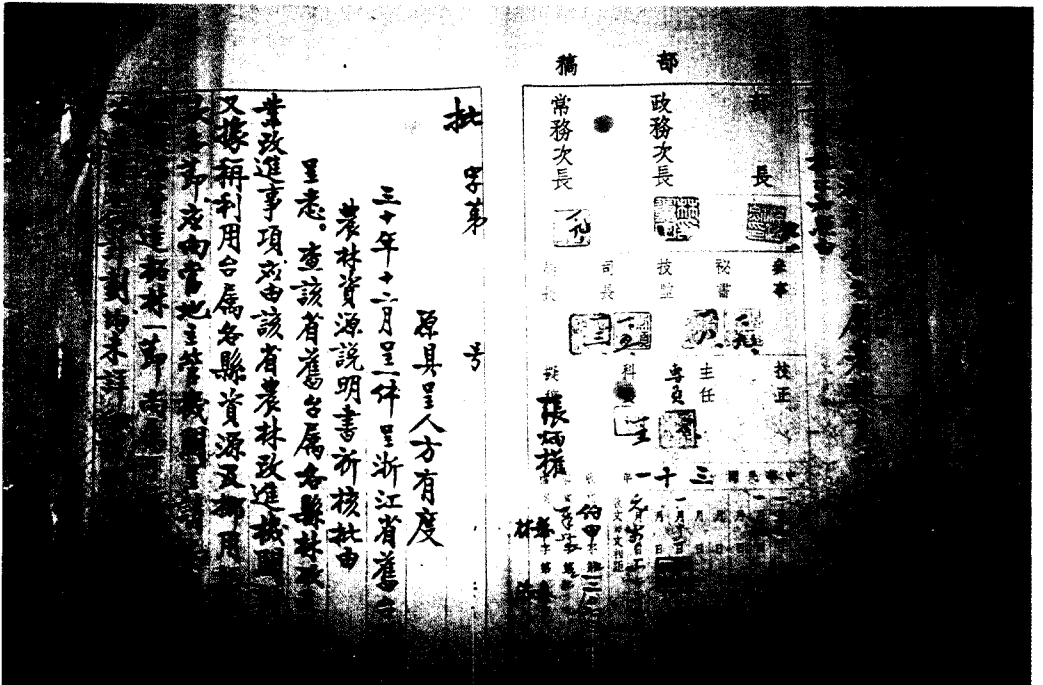
函購八折，郵撥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七)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何炳棣教授治學以宏博見稱，史識卓絕，其論著影響深遠  
 ⇨入江昭教授對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深受學界重視



本所檔案館所藏農林部檔案

## 本期要目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

「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會史」研討會

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

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

學人簡介——何炳棣、入江昭 (Akira Iriy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研究計劃

香港的明清史學者及其研究動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來的研究工作

近十年來韓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國史館館藏臺灣工業發展檔案介紹

德西檔案館所藏中德關係史料

新書三本評介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